



第一卷

(1905—1949)

復旦大學歷史編寫組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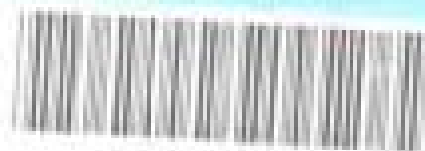
527815

复旦大学志

周谷城题

第一卷

(1905—1949)



C0207273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

复旦大学志

第一卷

(1905—1949年)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

*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125 插页16 字数404,000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

书号：11253·019 定价：2.50元



震旦学院、复旦公学
创始人马相伯。1939年4
月6日百年大庆时在庐山
留影

(复旦大学文书档案室供稿)



复旦公学第二任监督（校长）严 复

1A279/05



↑ 私立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奠基人李登辉



复旦公学第三任监督夏敬现↑



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章 兹 一



↑ 复旦大学解放后首届校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志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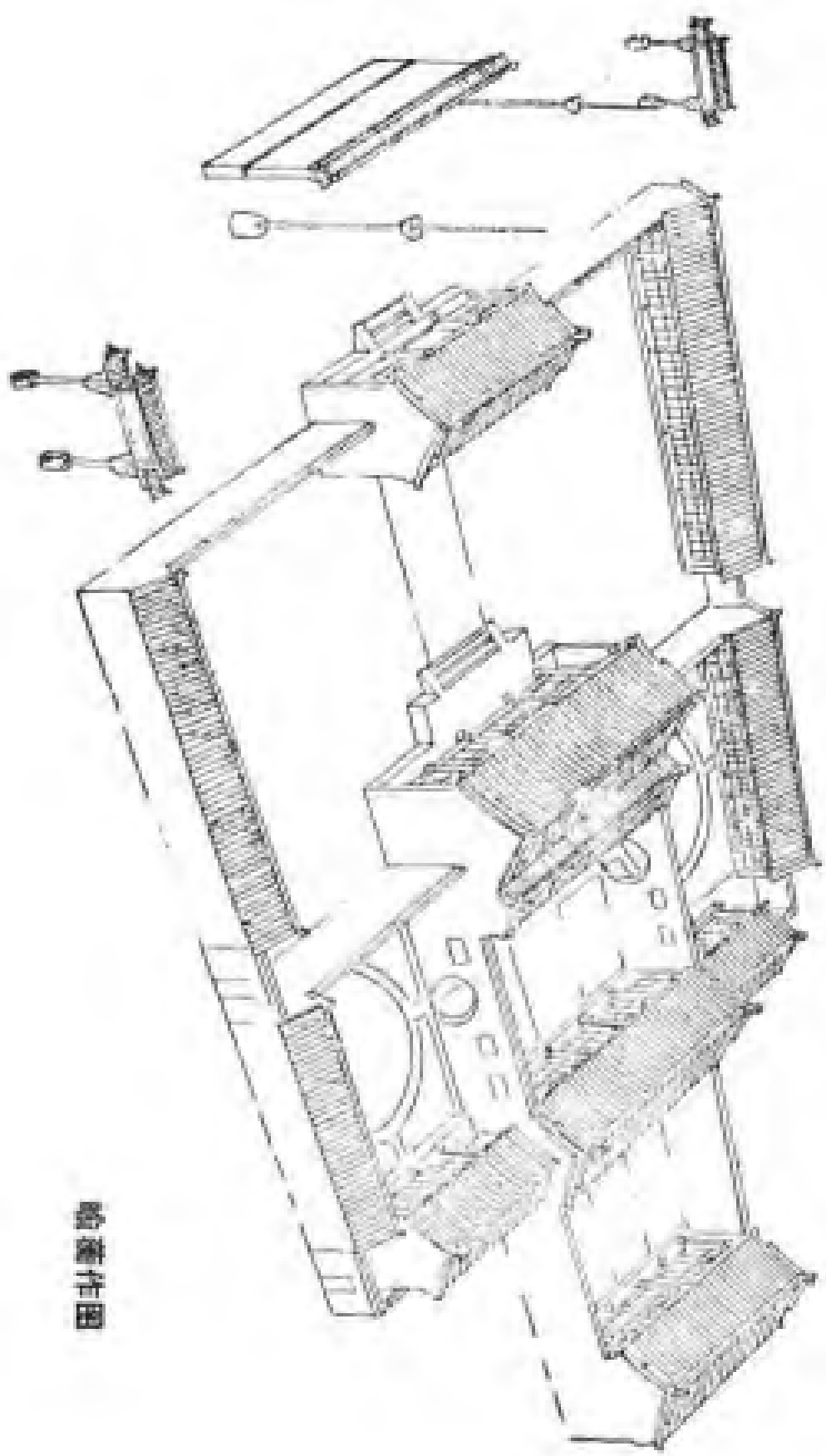


↑ 复旦大学解放后首届校务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校长 陈望道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李正文宣读
接管复旦大学命令 (舒宗侨摄)



復旦大學昆蟲時期宿舍復原圖



宿舍在圖

目 录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八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代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沿革	(27)
第一节 创立经过	(27)
附录:	
一、马相伯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二、马相伯笔录	
三、震旦学院章程(1902年)	
四、震旦学院开学记	
五、蔡子民先生与二十四个学生学拉丁文	马相伯
六、从震旦到复旦	马相伯
七、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马相伯
八、中国人的演说	马相伯
九、祝震旦学院之前途	梁启超
十、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	
十一、忠告震旦学生	吼
十二、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 学生公白	
十三、徐家汇震旦学院(广告)	
十四、复旦公学广告(一)	
十五、复旦公学广告(二)	

- | | |
|---------------|---------|
| 十六、复旦公学集捐公启 | 严复等 |
| 十七、相伯夫子与复旦 | 复旦大学同学会 |
| 十八、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 | 于右任 |

第二节 公学时期 (57)

附录:

- | | |
|--------------------------|-----|
| 一、《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 | |
| 二、一九〇五年《复旦公学考取新生全案》 | |
| 三、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摺 | 端 方 |
| 四、复旦最早的学生会主席叶景莱 | 胡国枢 |
| 五、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记 | 喻 衡 |
| 六、复旦学院广告(1911年12月4日) | |
| 七、复旦职员之热忱 | |
| 八、复旦同学公鉴(广告)(1912年3月16日) | |
| 九、复旦公学招生广告(1912年4月20日) | |
| 十、复旦公学始业式志盛 | |
| 十一、复旦公学招生(广告)(1912年7月3日) | |
| 十二、丞相祠堂作学堂——本学期之复旦公学 | |
| 十三、复旦公学开学记(1912年9月8日) | |
| 十四、复旦公学风潮记 | |
| 十五、复旦之卷土重来 | |
| 十六、新复旦之观成 | |
| 十七、复旦公学招生(广告) | |
| 十八、一九一三年《复旦公学章程》 | |
| 十九、复旦公学毕业式 | |

第三节 私立大学时期 (106)

附录:

一、《复旦大学章程》（1920年）	
二、复旦大学一九二五年年刊何葆仁先生序	
三、在复旦建校二十五周年时的讲话	李登辉
四、吾人之希望	李登辉
五、复旦大学第八次校董会记录	
六、因爱国惨案改组后的复旦	黄任之
七、复旦大学第九次校董会议记录	
八、复旦大学受赠太湖大雷嘴校地文献原稿	吴南轩
九、吴敬恒致吴南轩函	吴敬恒
十、吴敬恒致钱新之函	吴敬恒
十一、叶楚沧致吴南轩函	叶楚沧
十二、陈望道致荣毅仁函	陈望道
十三、荣毅仁复陈望道函	荣毅仁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期…………… (151)

附录：

一、大学西迁记	顾仲彝
二、母校被毁简报	费 巩
三、入川后之本校	吴南轩
四、李登辉复吴南轩等函	李登辉
五、吴南轩、金通尹致李登辉函	吴南轩、金通尹
六、李登辉再复吴南轩、金通尹函	李登辉
七、关于改国立的电报六件	
八、母校改归国立之校史文献	吴南轩
九、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 (178)

附录：

- 一、修正国立复旦大学组织章程
- 二、蒋介石电教育部防止复旦大学学生收听延安广播
- 三、中央调查统计局情报：复旦奸伪希图控制全校壁报言论
- 四、蒋介石就复旦覆舟事件给教育部的代电
- 五、教育部训委会关于防范张志让教授的代电
- 六、我们对于此次学生请愿的意见 洪深等人
- 七、章益就国权路血案辞职书
- 八、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快电代邮
- 九、一九四七年五月卅日复旦大逮捕的经过
- 十、教育部训委会关于复旦劝募寒衣的密函

第二章 学校行政 (205)

第一节 行政组织 (205)

附录：

- 一、复旦大学校董会章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重订
- 二、复旦大学行政院章程 一九二四年
- 三、修正复旦大学行政院章程草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 四、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
一九二七年
- 五、复旦大学校务会议规程 一九二九年九月
- 六、修正复旦大学教职员全体大会规程
一九二九年九月

第二节 爱国老人马相伯传略…………… (217)

附录:

- 一、中共中央电马翁祝贺
- 二、重庆新华日报短评
- 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唁马相伯家属
- 四、重庆新华日报《编者按》
- 五、重庆新华日报短评:《悼马相伯先生》
- 六、拉丁文通序言(摘录)
- 七、马相伯备忘录(节录)
- 八、为日祸敬告国人书 马相伯
- 九、泣告青年书 马相伯
- 十、新年告青年书 马相伯
- 十一、马相伯与熊希龄、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
国国难救济会通电
- 十二、双十节献词 马相伯
- 十三、致复旦大学学生书 马相伯
- 十四、苏联对中国毫无野心 马相伯
- 十五、马相伯的救国谈话
- 十六、马相伯先生题赠全救第二次执委会词
- 十七、致冯焕章将军书 马相伯

第三节 李登辉传略…………… (247)

附录:

- 一、李登辉主张废除华工禁约
- 二、《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序 李登辉
- 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 李登辉
- 四、成功的意义——勸毕业同学 李登辉

五、蒋介石致李登辉的电报	
六、李登辉复蒋介石的电报	
七、我的兴趣	李登辉
八、为毕业纪念刊所作序言	李登辉
九、诔三三届毕业同学	李登辉
十、教育之真谛	李登辉
十一、适应新环境的新教育	李登辉
十二、悼李老校长登辉先生	陈望道
十三、祭李登辉师文	金通尹

第四节 章益自传…………… (276)

第五节 陈望道传略…………… (284)

第三章 系科设置及教学特点…………… (299)

第一节 概况…………… (299)

附录:

一、编制沿革图

二、本校编制之沿革

三、一九〇八年~一九二九年

复旦公学及复旦大学初期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第二节 文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307)

一、文学院系科概况

二、中国文学系

三、外国文学系

四、新闻学系

五、教育学系

六、史学系

附录:

- | | |
|------------------|-----|
| 一、一九二五年文科经过之报告 | 余楠秋 |
| 二、中国文学科底过去未来 | 刘大白 |
| 三、中国文学系概况 | 陈望道 |
| 四、外国文学系概况 | 余楠秋 |
| 五、新闻学系概况 | 谢六逸 |
| 六、教育学系概况 | 章益 |
| 七、史学系概况 | 余楠秋 |
| 八、中国文学系系史 | |
| 九、新闻学系系史 | |
| 十、教育学系简史 | 章益 |
| 十一、教育部指令 高33965号 | |

第三节 理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227)

- 一、理学院系科概况
- 二、土木工程系
- 三、化学系
- 四、生物学系
- 五、数理系

附录:

- | | |
|---------------|-----|
| 一、复旦理科之现状及将来 | 金问洙 |
| 二、心理学系成立纪事 | 胡寄南 |
| 三、心理学院之将来 | 郭任远 |
| 四、今年之复旦理工科 | 金问洙 |
| 五、生物学科之成立及其将来 | 蔡翹 |
| 六、土木工程学系系况 | 金通尹 |
| 七、化学系史 | 林继庸 |

第四节 法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339)

一、法学院系科概况

二、政治学系

三、市政学系

四、法律学系

五、社会学系

六、经济学系

七、经济研究所

附录:

一、社会科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刘芦隐

二、社会学系概况 应成一

三、政治学系概况 吴颂皋

四、市政学系概况 温崇信

五、呈请增设司法组由法二字2052号

六、教育部指令

第五节 商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350)

一、商学院系科概况

二、银行金融系及银行专修科

三、工商管理系

四、会计学系

五、国际贸易系

六、统计学系及统计专修科

七、合作学系

附录:

一、复旦商科之实况 李权时

二、复旦商科历年概况及今后计划 李权时

- 三、银行学系概况
- 四、会计学系概况
- 五、国际贸易学系概况
- 六、工商管理学系概况
- 七、复旦大学统计学系要旨
- 八、交通银行、国立复旦大学合办银行专修科合约
- 九、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附设统计专修科章程草案
- 十、解放前复旦大学商学院概况

焦雨亭、沈承溶

第六节 农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371)

- 一、农学院系科概况
- 二、农艺学系
- 三、园艺学系
- 四、茶叶专修科和茶叶研究室
- 五、农业化学系

附录:

- 一、复旦大学垦殖专修科章程草案
- 二、国立复旦大学茶叶组及茶叶专修科办理概略
- 三、农学院成立经过及现状 陈国荣
- 四、复旦大学农学院十四年

复旦大学农学院院史编辑组

第七节 教学特点…………… (392)

- 一、致力培植经济发展和社会亟需的实用专门人

- 才，创设一批国内第一流的应用学科专业
- 二、重视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教学，扩大学生知识面，努力使学生做到“博大精深”
- 三、注意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附录：

- | | |
|-----------------|-----|
| 一、理工科 | 徐文台 |
| 二、从沪江转学本校后的几点感想 | 石 濡 |

第四章 学 生 (403)

第一节 学生概况 (403)

第二节 革命烈士传略 (406)

- 一、黄君珏烈士传略
- 二、费巩烈士传略
- 三、黄天烈士传略
- 四、杨奚勤烈士传略
- 五、王朴烈士传略
- 六、陈以文烈士传略
- 七、石文钧烈士传略
- 八、胡其芬烈士传略
- 九、胡作霖烈士传略
- 十、艾文宣烈士传略
- 十一、张永昌烈士传略
- 十二、唐慕陶烈士传略
- 十三、何柏梁烈士传略

第三节 著名学生传略 (451)

一、邵力子生平简史

二、金通尹传略

三、竺可桢传略

四、俞颂华传略

五、孙越崎传略

六、孙寒冰传略

七、沈霁春传略

八、朱颐龄传略

第五章 体育文娱活动 (520)

第一节 体育活动 (520)

第二节 文娱活动 (524)

附表一：国立复旦大学组织系统表

附表二：一九三〇——一九四九年

复旦学历届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编后记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八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代前言)

复旦大学是我国古老的学府之一。它自1905年创办以来，经历了八十年的漫长岁月，其间备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压迫与摧残，爱国师生对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以后，它在前进过程中也曾几遭挫折，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现在它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

光荣而悠久的历史

复旦大学的前身，是复旦公学。它的创立，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和青年学生一起，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而采取的一个爱国主义壮举。

1902年，马相伯创办了震旦学院，借用天主教徐家汇天文台旧址为校舍，聘请了一些法国传教士来校任教。1905年，法国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阴谋夺取震旦学院的领导权，强迫马相伯离校养“病”。爱国学生愤而从大门上摘下校牌，集体离开校舍，拥戴马相伯另在吴淞镇的提督行辕中筹备复校。天主教竟盗用震旦学院名义，于1905年5月27日在《时报》刊登广告招收学生。为了不与帝国主义势力相混，马相伯引用《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亦于同日登报声明，将学校改名为复旦公学，既表达了对光明的追

求，也寓有恢复震旦的爱国意向。1905年8月，复旦公学正式成立。

复旦公学在马相伯校长主持下，得到国内名流的广泛赞助。当时的青年革命者于右任，作为一名学生领袖，在马相伯筹办复旦公学时，发挥了重要的襄助作用。最早将赫胥黎、穆勒、孟德斯鸠等西方哲学名著介绍进中国的严复，在马相伯离校后任“监督”。辛亥革命后，复旦吴淞校舍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因复旦是具有反帝革命传统的学校，竭力支持她复校，后来又题写“努力前程”四字表示勉励。1913年，美国留学生李登辉被董事会推举担任校长。李登辉是一位把全部感情都交给了复旦的爱国教育家。他先后主持复旦校政二十多年，在白色恐怖下，真诚地庇护爱国的学生，直到1936年反动当局逼他在辞职或支持政府镇压学生两者之间择一时，他毅然选择了辞职一途，表明了他对复旦爱国学生的深厚感情。

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亲赴南洋各地募捐，回国后在江湾附近购地70亩。1922年，第一批校舍落成，复旦大学正式迁入新址，这就是今天复旦的所在地。复旦是一所私立学校，但没有大资本家作经济后盾，学校的建设，依靠全体师生的团结一致，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经过多年惨淡经营，到1929年，才成为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学，拥有文、理、法、商四个学院，十五个系。校内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民主风气浓厚。

复旦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复旦师生中的先进分子一直站在斗争最前线；有的并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五四”运动爆发后，复旦立即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先行者。上海学联的领导骨干中，多数是复旦大学学生，对组织和

推动上海全市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复旦就与党的活动有关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邵力子就是复旦大学教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来复旦出席有关会议。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商务印书馆编辑杨贤江在1923——1925年，一边在复旦听课，一边与恽代英、沈雁冰等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中工作。二十年代，复旦大学正式建立党组织。从此，复旦进步师生有领导、有组织地展开对反动派的斗争。当“九·一八”日本军队侵略沈阳的消息一传到上海，九月廿五日，数百名复旦学生满怀爱国抗日的激情，赴南京请愿，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南京政府命令上海铁路局不许学生上车，学生在学校的支持下，经过斗争，终于与上海各校学生到达南京，会同来自全国的学生几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出兵抗日的运动。在此期间，上海和全国学生多次去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当局蓄意制造“珍珠桥惨案”，三十多学生被刺死，一百多学生受重伤，完全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凶残的反动面目。“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复旦爱国学生组成抗日义勇军，参加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抗日，被分配到后方做宣传教育工作。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被南京政府破坏后，复旦三十余名学生集体北上，投笔从戎，后来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战役。“一二·九运动”期间，复旦学生表现也十分突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复旦一迁庐山，再迁重庆，选择重庆的菜园坝和北碚的夏坝两地为校址。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中共南方局按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在复旦建立了“据点”（“核心小组”）领导复旦的斗争。从此，复旦逐渐成为蒋管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堡垒之一，与西南联大遥相呼应。蒋介石曾经下达手令，要军警当局注意复旦大学师生中的共产党活动，并

特意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将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但复旦地下党的力量不断增强，并团结了一批进步教授如陈望道、方令孺、张志让、洪深、周谷城、孙寒冰、章靳以、卢于道等。党组织还通过学生进步社团出面，邀请学者名流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王芸生、钱俊瑞、戈宝权、阳翰笙、胡风、老舍、黄炎培、马寅初等来校讲演，发展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声势。在复旦迁往四川期间，留在上海的一部分师生，请被迫辞职的李登辉出来领导。李登辉慨然应允，在租界另择校址，办了复旦大学补习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李登辉提出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否则宁可停办的“三不方针”，维护了民族气节和复旦声誉。

抗战胜利后，复旦筹备返沪，陈望道教授等因旅费无着，亲自抱了衣物到镇上摆地摊变卖，才勉强筹得一些川资。1946年，全校回到上海旧址，党组织也与上海补习部中的地下党胜利会师。自此以后，配合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斗争，如1947年1月的反对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1月的抗议反动当局杀害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的斗争，1948年1月“同济风潮”中与反动的上海市长的面对面斗争，以及从1948年到解放前夕的“应变护校”斗争等等，都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胜利，大大发展了革命的力量，当1949年全校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时，尽管校外仍是反动当局的黑暗牢笼，而在校内，革命歌剧《白毛女》，革命歌舞《我们的队伍来了》等已公开在登辉堂（学校大礼堂）与全校师生见面了。五月二十七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复旦从此获得了新生。为了纪念这个盛大的节日，陈望道校长提议，定每年的这一天，为复旦的校庆节。事有巧合，这一天也正是1905年马相伯等爱国师生登报声明更改校名的日子。

从1905年到1949年的44年中，复旦大学在反动势力的巨大

岩石下，辛苦挣扎，共培养了毕业生7245人，其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物，有著名科学家、诗人和艺术家，有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有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或敌人屠刀下的革命烈士。他们都是复旦的骄傲。

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李正文为军代表接管了复旦大学。随后，学校进行改组，八月一日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张志让、陈望道分任正、副主任委员。由于张志让已去北京，不久即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所以实际上由陈望道主持学校行政。从这时起直到1977年陈望道去世，他主持复旦校政先后二十八年。他和马相伯、李登辉一样，是将自己毕生事业与复旦大学联系在一起的一位教育家。

解放初的复旦大学，有文、理、法、商、农五院二十多个系（科）。为了发展人民高等教育事业，1950年高校初步进行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大、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1952年秋，全国高校普遍进行了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调出，分别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和沈阳农学院；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大学。从此，复旦大学成为一所大大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文、理科综合性的大学。这次调整，虽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完全照搬了苏联办综合大学的模式，割裂

了某些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的合理联系，给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边缘科学造成了障碍。

五十年代初期，复旦大学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师生员工参加了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1—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的开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旦大学的领导。复旦大学党组织于1951年宣布公开，结束了几十年的秘密状态，既有利于党的领导，也是把党组织的活动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中。在以上的政治运动中，党对待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问题的处理没有经验，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但由于党的作风是健康的，这些缺点一经发现后，基本上得到了纠正。知识分子表示，对待党组织的错误缺点，“不以一管掩大德”。

五十年代后期，党在阶级斗争的指导理论上出现失误。1957年4月，复旦大学开展大鸣大放，7月转入“反右派斗争”。由于斗争面的扩大，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打击。1958年初进行“红”“专”关系大辩论，不恰当地贬低了“专”的作用，在“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口号下，挫伤了认真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大跃进运动中，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师与学生经常为了某一个具体的指令而全部出动：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等等。提倡“摆擂台”、说大话的结果，败坏了复旦大学多年形成的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风气。1959年初，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口号，片面号召大学生做普通劳动者，不提做专门家，于是产生了忽视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偏向。各系师生纷纷打起背包，下乡办学，下厂办系，昔日弦歌声声的学府，一时间冷冷清清。直到1959年下半年的新学年开始时，才认识到并提出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应当维护正常教学秩序。1960年，逐渐把革命与秩序结合起来，一方面，教育革命仍在进行；另

一方面，重新开始了解与研究教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在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后，复旦大学从1961年起制订和执行过渡性教学计划，减少了劳动时间，增强了课堂教学时间；原来合并得不适当的课程，重新分设；原来对基础理论课的学时削减太多，予以增加；没有条件开设的新课，留待具备了条件以后开设。经过这样一系列调整以后，教学工作回到了正常轨道。大批教师从田间、车间回到教室和实验室中来。1962年9月，全校共有707名教师上课，比1958年2月的391人多316人，增加了80.8%，共开设课程354门，比1958年2月的134门多220门，增加了164%。

但是，也应当看到，1958年复旦大学的教育工作，并非一无是处。在“解放思想、自力更生”正确口号下，复旦大学致力于新学科的创建，在既无设备、又无经验的困难条件下，自己动手，逐步创造条件，经过了几年的奋斗，到1962年，已经正式建立的新专业有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计算数学、力学、高分子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无线电物理、电子物理等共九个。围绕新专业开出了一批新的基础课，如概率论、高分子化学、无线电基础、生物物理等，还开出了一批反映现代科学新发展的课程，如数学系的近世代数、随机函数、赋范环论，物理系的电解质物理、固体电子论、超高频电子管等。有的新专业在建立以前，甚至连本专业的研究内容也不清楚。电子物理专业的真空物理组青年教师，详尽地查阅了1956年以来国内外发表的有关“真空获得”方面的文献，并调查了美、英等国家55个学校的真空训练情况，14个学校真空技术课程的讲授内容，9个学校的真空实验内容。经过这样大量工作后，确定与建立了自己的方向。到1963年，复旦大学的新专业已建成实验室34个，包括一些比较高级、复杂的实验设备，如加速器、等离子体、超高真空、光源、放射生物学等，都主要依靠教师、

技术人员和部分高年级学生自己动手制作成功。这些实验室建成后，共开出实验206只，对建立新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在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知识分子政策也有所调整。各级组织对于过去政治运动中搞错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一一上门陪礼道歉，消除他们心中的疙瘩，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有一位曾经下决心“不留一字在人间”的老教授，从此捐弃前嫌，重新投入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双百方针”也得以在复旦大学贯彻，复旦大学领导积极鼓励老学者畅所欲言，展开争鸣。1961年起，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课程重新开设。尤其是对长期以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些学派，复旦大学根据党的方针，允许其存在，鼓励他们发表创见参加争鸣，在争鸣中发展科学。如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解放后被看作资产阶级“伪科学”，把摩尔根与米丘林两大遗传学派之争，说成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学教研组共有教师13人，其中有谈家桢教授为首的摩尔根学派7人，米丘林学派2人，其余4人则认为两派各有所长。1961年，复旦大学领导鼓励两派积极开课，结果开出了摩尔根派课程10门，米丘林派3门。复旦大学对于开课的教师要求他们先讲清本学派的基本理论，然后再介绍两派理论和方法的区别，以利于学生的鉴别、吸收，也有助于学科的发展。这样的做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谈家桢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认为复旦大学是摩尔根的‘防空洞’，我认为复旦大学对‘双百方针’是贯彻得好的。”以1961年为分界，在这以前的十年左右时间中，谈家桢教授及其同事们一共只发表过两、三篇文章，而从这以后到1962年的一年时间中，就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还在南京、济南、杭州等地作了十多次学术报告。为贯彻“双百方针”所采取的实际措施还包括给知名学者指派助手，帮助老学者整理文稿，把老学者的学术财富继承下

来。全校共为五十多位知名学者指派了八十多个助手。有的助手本人就是学术上有了一定成就的副教授，复旦大学党委要求他们全心全意发挥助手的作用。

1961年，是复旦大学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新时期。1962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分配给了复旦大学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起初，上海市承担教育部所布置的文科教材编选任务共19种，其中12种由复旦大学主持编选，占上海市编选总任务的63%。后来，教育部又继续下达给复旦新的编选任务9种，前后共计21种。这反映了复旦大学文科的力量和复旦大学教师为繁荣社会科学事业而抱着极高的热情。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编选出版后，得到各方面肯定的评价。除了以上21项主持编选的任务以外，复旦大学文科还参加了另外十六门教材的编选工作。国家下达的教材编选任务，带动了复旦大学自身的教材建设。1961年下半年，全校共开设了336门课，其中241门课是采用的自编教材，占开课总数的71%。有些自编教材可能不及统编教材的水平，但自编教材针对性强，比较切合本校学生的实际，能较好地与原有课程相衔接和为将开设的课程作铺垫。

在这一段时期中，由于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走上正轨，知识受到重视，加上复旦大学党委把建设师资队伍作为办好学校的基本建设来抓，因而青年教师的成长也比较迅速。以青年教师的开课情况来说，“大跃进”年代，教学不正常，青年教师的开课数字缺乏统计。“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半年，全校开课的教师共737人，其中青年教师420人，占总数的56.9%。1961年下半年，全校共开课336门，其中青年教师开的有257门，占总数的76%。1963年上半年，青年教师开课数进一步提高。全校担任基础课的教师311人，其中青年教师270人，占总数的

86.8%，这三年的统计数，虽然口径不一，但仍能清楚地说明问题。青年教师在新专业建设中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全校新建学科30个，其中有24个学科是清一色的青年教师。青年教师还主编出版了全国通用教材七部。

理科的科学研究在这个时期中也取得较好进展。到1965年，已取得的科研成果有质子静电加速器，电子感应加速器，602型电子计算机，103型电子计算机，顺磁共振波谱仪，核磁共振波谱仪，光激射器，真空量具，有机硅薄膜以及新型电光源等，在当时都居于国内领先地位。1964和1965年的两次传统元宵节上，复旦大学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灯会”，蔡祖泉的三十多种奇异的新光源，在“灯会”上组成了一片星空，象征了复旦大学正处在空前繁荣的时期。可惜这个繁荣时期过于短暂，1966年“文革”的政治风暴，降临了中国大地，这一切新气象就很快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校园变成打派仗的“战场”，教室被当作“公堂”和“监狱”。特别是由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直接控制和破坏，复旦大学的损失更加严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大批党政干部和几乎所有的老学者都被诬为“牛鬼蛇神”，青年业务骨干被打成“修正主义带头羊”。接着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等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中，更多的人被栽上骇人听闻的罪名，全校处级以上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90%惨遭迫害。据统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全校被非法抄家达五、六千户；717名教师和职工（占全校教职工总数40%）被非法立案审查，三百多人遭毒打，三十六人受迫害含冤死去，其中有副校长两人，处级干部三人，党总支正、副书记三人，副系主任两人，教授、副教授七人。此外还有六人被摧残得精神失常。复旦在这场浩劫中被荡平后，“四人帮”又指使人在这里进行种种“试验”，

企图把复旦搞成展览“四人帮”的“理论”的窗口。复旦被糟塌得不象样子，社会主义大学的成果摧毁殆尽！

今日复旦的特色

粉碎“四人帮”以后，复旦大学与全国其它兄弟院校一样获得新生。1977年恢复了招考制度。1978年教育部确定复旦大学为全国重点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复旦大学又一次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复旦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全校师生员工的艰苦劳动，这些年来又努力贯彻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努力进行教育改革，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这些特色主要是：

（一）学科齐全，突破了原来文、理科综合大学的模式，发展为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多科性综合大学。

解放初，复旦大学学习苏联经验，逐步建成一所文、理科综合大学。近年来，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出现，这种文理科综合大学的不适应性已日益明显。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相互渗透。工程技术的发展日益要求基础理论与之相结合，而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更加需要先进的技术 and 实验手段的支持。一个单独的学科不可能解决复杂而精深的研究课题。复旦大学领导集体认识到了这一趋向，于1980年开始，将原来理科的某些专业加以改革，进行学科的组合，使之与应用科学相结合，建立了技术科学学院。在教育部没有批示以前，复旦大学成立了技术科学、应用数学、经济科学三个“联合体”，作为成立新的学院的第一步。其中的应用数学“联合体”，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管理科学三方面，把理

论、模型、计算和软件开发等内容联成一体进行综合性的开发研究。经济科学“联合体”是综合使用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世界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管理方面的师资力量，培养兼具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活动才能的高级人才。1984年，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成立技术科学学院。技术科学学院包括了五个系（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光源与照明工程、应用力学）和四个科研单位（电光源研究所、材料科学研究所、大规模集成电路中试基地、电光源中试基地）。这个学院不仅具有材料、器件、电路、计算机系统、测试等方面的能力，而且学校内部的有关学科还能提供表面物理、半导体物理、激光技术、全息技术……等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在这样的优越条件下，特别有利于年轻的开拓型人才的成长。

跨学科“联合体”建立起来后，发挥了很好作用。它有利于承担重大和超重大的科研任务。例如国家下达给复旦大学关于上海地区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综合性课题，复旦的应用数学“联合体”（数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联合体）因为已经能够将理论分析、建立模型、计算与软件开发等联成一体进行研究，因而有能力承担这一重大课题。“联合体”还有利于创办一些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新专业，如国家统计局委托复旦举办数理统计专业，数学联合体组织了数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三个方面的力量，很快就把这个新专业建立起来，1983年暑期已招收了第一期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班也于1984年开学。

经过这几年对学科设置的初步调整，复旦大学现在共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新闻学、哲学、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法律学、管理科学、数学、应用力学、统计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电子工程、原子核科学、化学、生物学、生物工程、材料科学、照明工程等22个系，55个专业，其中34个被教育部确定为重点学科。有些专业在国内

尚属少见。生命科学方面在生物系和生物工程系共设了十个专业，是国内这一方面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大学之一。数学系所设置的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数理统计、力学五个专业，已经包括了数学方面的主要专业。

文科的专业设置，努力适应于当今世界科学发展中“文理渗透”的趋势。例如新闻系，已有55年历史，过去都以采写人文和社会方面新闻为主。然而近年来的新闻报导工作，对理工农医等科学技术方面的要求很高，因而1983年新闻系在设立双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时，招收了一部分理科学生，新华社对此表示赞赏。再如人口学专业，过去一般只从人口问题的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研究，现在注意到发挥文理综合的优势，从经济、数学、生物等各方面进行探讨，还建立了有关的数学模型，不仅能进行人口数量的预测，而且能对人口质量问题提出科学见解。管理科学系的文理渗透，就更加明显了。

总之，多学科的、文理渗透与理工结合的大量新专业的设立，正在改变着复旦大学的面貌，使这所古老而又年青的、有影响的大学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更好地发挥骨干作用。

(二) 拥有比较雄厚的师资力量，在几代教师队伍中都出现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并形成了一大批学术带头人。

复旦大学现有教师 2400 人（其中包括教授、副教授 356 人，讲师 1050 人），比解放初的 275 人增加了七倍多。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些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复旦大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校共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位，经国务院审定有权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38 位（文科 13 位，理科 25 位），担任教育部学科规划组组长的 4 位。此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中文、数学、物理三个学科的学位评议组也由复旦大学的三位教授负责。

复旦大学的著名老学者有：名誉校长兼数学所所长苏步青

教授，专长微分几何，计算几何，并对射影曲线、射影曲面、射影共轭网理论以及一般空间微分几何等方面有很深造诣，先后发表论文150篇，出版《射影曲线概论》、《计算几何》等专著一批。校长、中共中央委员谢希德教授，是我国著名女物理学家，长期从事物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固体物理理论的研究，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有论文一批和著作多部。学校顾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谈家桢教授，是我国老一辈遗传生物学家，近来他又主持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生物工程系。著名历史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教授，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研究领域遍及文学、史学、社会学、逻辑学和美学，他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部专著，在史学界受到赞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于1955年被吴晗同志举荐，编绘毛泽东主席所倡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他带领一批助手，组织有关单位协作，历时三十年，绘出地图300余幅，被党中央领导同志表扬为建国以来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此外，在老一辈学者中还有古典文学专家朱东润教授、汉语学家吴文祺教授、张世禄教授，哲学家胡曲园教授、西方文论和中国画论专家伍蠡甫教授、政治经济学家漆琪生教授、核物理学家卢鹤绂教授（复旦大学目前还健在的几位一级教授中的一位），化学家顾翼东教授，病毒学家王鸣岐教授，遗传学家盛祖嘉教授等，他们都有较深的造诣，执教几十年，桃李遍中外。

在中年教师中，也出现了一批有声望的学者。副校长谷超豪教授，专长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与数学物理，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在偏微分方程和规范场的研究中获两项国家科学奖。另一位副校长华中一教授，是我国一位有影响的真空物理与技术专家，研制成功了多种真空泵和真空材料及仪器，并出版专著。一批中年学者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

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们当中有科学院学部委员夏道行教授，在低能核物理方面有显著成就的杨福家教授，专长光谱学与信息处理的章志鸣教授，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成绩突出的章培恒教授，在数学领域中成果显著的中年数学家胡和生教授、许永华教授、李大潜教授、严绍宗教授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复旦大学目前学术水平的代表。

建立一支以中年教师为主的学术带头人的队伍，是复旦大学多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学术带头人是由热爱人民教育事业、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掌握国内外本门学科的最新发展动向、并能组织力量从事攻“关”的教师担任的。在复旦大学学术带头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初步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

首先是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复旦大学的有些学术带头人，在学生时期就是又红又专的“尖子”。毕业后，党组织既从政治上和业务上全面关心他们，又对他们严格要求，其中有的是党员教师，还安排他们担任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工作，年轻的教授李大潜、许永华、杨福家、倪光炯，当年都曾担任过党总支委员或政治指导员。在从政治上严格要求他们同时，对他们的业务成长也十分重视。二十多年来，他们在各种政治风浪中，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甚至在逆境中仍孜孜于学术研究，“许永华定理”的发明人许永华，就是这样做的。对于一些非党教师，在作为学术带头人的苗子加以培养时，党组织抓紧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在他们有了入党要求并基本符合入党条件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

其次是压重担，“逼”人才。学术带头人责任重大，必须是足以承担重任的人。为此，复旦大学在培养学术带头人时，注意从教学、科研的重担中锻炼他们。经验证明，担子重一些，再辅以必要的条件，是可以“逼”出人才来的。数学系是学术

带头人成长较快的一个系，从1958年的两个学科方向已发展到今天的十几个学科分支，每一个学科都有了学术带头人。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让青年教师在教学与科研的紧张工作中经受锻炼。1957年毕业的李大潜，担任过偏微分方程、微分方程及数值介等多门课的教学，主编出版了三本教材，发表三十多篇论文，现在才四十多岁，已成为偏微分方程、控制理论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和应用数学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授。又如外文系陆国强副教授，大学一毕业，每周就担任十六节课的基础课教学，在繁重的任务中，逼着他思考自己的不足，努力进修，从而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他从教学实践中搜集了大量作文中的错误，编写了十四万字的《现代英语构词法》，近年来先后发表了十四篇论文，成为现代英语方面的学术带头人。

再其次是为学术带头人配备班子。工作班子的任务是配合和协同学术带头人进行创造性研究。物理系在五十年代末为当时的华中一讲师配备了几名擅长于设计图纸、理论分析或实验技术的教师和技工做他的助手，华中一本人专长于真空物理、电子物理，又善于及时把握国内外有关的学术动向，调整工作方向，因而研制成了七十多项高真空技术设备，成为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电真空专家之一。

最后，在学术带头人成长过程中，复旦大学注意到不断鼓励拔尖，并从理论上、政策上确认拔尖，根据他们的实际水平和贡献，评定职称，提升级别，给予奖励。数学系教师严绍宗，先后教过十门课，完成论文二十多篇，有的获得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1978年复旦大学提升他为副教授，此后他更致力于学术研究，又写出了十几篇论文，有的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1980年，距上次提升职称才两年，复旦大学又提升他为教授。象这样三年中连续提升两次的，还有李大潜、许永华、杨福家、章培恒、郑北涓等多人。

(三) 加强基础理论教学，重视智能培养，拓宽学生科学视野，以适应形势需要，是复旦大学教学改革的特色。

复旦大学一直十分重视学生的基础课教学，安排学术水平较高、又有较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讲授基础课。苏步青教授在古稀之年时还亲自上基础课。谷超豪、夏道行教授也开基础课。1983年，全校教授、副教授担任基础课的人数占开课教师总人数的比例，文科为42%，理科为25.6%。学校还规定，基础课主讲教师由系主任亲自决定，再由主讲教师挑选辅导教师，以此保证基础课的教学质量。

由于复旦大学多年来从上到下严格进行基础理论教学，因而复旦大学学生以基础知识扎实、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强而受到各方面的称道。1982年，复旦大学对八一、八二两届毕业生进行了普遍调查，单位领导人和复旦的老校友普遍认为，复旦毕业生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理论思维能力强，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后劲”足，刚开始工作时可能平平，但过不多久，就显示出功底厚的优点。这些长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校期间基础打得好。

复旦大学重视对学生的智能培养。教师在课堂上不只是传授知识，同时努力提高学生的智能，包括读书方法，思维（推导、抽象、分析与概括）能力，写作技巧等。数学系副教授欧阳阳光中的教学法，曾受到苏步青教授的赞扬。他的特点就是在讲授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智能。他说：“知识好比军舰的吨位，智能则是军舰上的武器系统。光讲吨位不讲究武器系统的改进，是没有战斗力的。教师不仅要使学生成为知识的接受者，而且要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为了培养学生的智能，历史、中文等系实行“导师制”，新生一进校，就配备一批讲师或副教授担任他们的导师，每一个导师固定指导6—10名学生，为期两年。在一年级时，着重指导学生掌握大学学习方法，包

括怎样记笔记,怎样借书、读书,怎样积累思想素材和知识素材等,为四年的大学学习打好基础。二年级时,进一步指导学生掌握专业学习的方法,学会选题、取材、谋篇等写专业论文的知识。进入三年级后,结束普遍指导制度,改为对优秀学生(一般占学生总数的3—5%)“跟踪培养”。优秀学生在学方面可获得与研究生基本相同的条件。

复旦大学重视与推广好的教学方法,成立了教育研究室,出版教育研究刊物《复旦教育》。全校已涌现出一批教学“尖子”。外文系副教授董亚芬,教学态度认真,教学效果显著,连续三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历史系副教授李华兴,开展“讨论式教学”,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讲授方法,提高了学生钻研问题的能力。数学系教师秦曾复,讲授《数学分析》课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学习成绩普遍比较好,他也因而较早地被评为副教授。在“尖子”带动下,全校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文科的一类课已占18%,理科占28%。学生中的佼佼者不断涌现。近几年,本科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人数比例不断提高,1984年平均占毕业学生总数的40%左右,其中数学、物理、生物等系则达50%左右。1983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门学科的赴美研究生举行全国统考,复旦大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数学、物理、化学的总分第一名均为复旦考生。1984年全国化学学科举行赴美留学统考,复旦化学系又获总人数和单科两项第一名。不久前,全国经济学科出国考试,复旦管理科学系学生荣获第一、第二名。前十名中,有五名为复旦学生。

为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学校大力支持学生成立科学技术协会。协会除邀请专家教授讲学以外,还由协会会员自己上台宣读论文,已经有300多名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了协会。会员自己组织科学报告会,仅1984年的校庆节,学生科协就组织了十场科学报告会和讨论会。

教材建设是复旦大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文化大革命”前,复旦大学的教材建设就有较好的基础。近年来,复旦大学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把它看成是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的双重意义的大事。复旦大学近年已出版全国统编教材74种(文科29种,理科45种)。这些教材基本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郭绍虞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伍蠡甫的《西方文论选》,胡裕树的《现代汉语》,刘放桐的《现代西方哲学》,都获得高教界肯定评价。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绝大多数理工科大学,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采用复旦大学数学系编的一套高等数学丛书作为基本教材。

图书资料的积累和建设,为复旦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援。复旦大学图书馆是全国高校中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现有藏书260万册,包括中文图书185万余册,外文图书50万余册,期刊合订本23万余册,藏书中有不少是珍本孤本。报刊的收集相当齐全,如德文《数学杂志》,从1826年创刊迄今已达159年,复旦图书馆全套收藏,一本不缺,为国内外图书馆所罕见。教育部在复旦大学设立了外国教材中心图书馆,向上海、浙江、福建、江西的高校教师开放。复旦图书馆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的储藏馆。复旦的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一方面勤勤恳恳地做好日常服务工作,另一方面积极钻研业务,著书立说。如历史系资料室主任王明根,近年来主持编写并出版了《文史工具书的使用》、《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目录》等书。由于他工作出色,连年被评为学校先进工作者,他所领导的资料室,1984年也被评为上海高教系统图书馆先进集体。

(四) 具有比较雄厚的科学研究能力,科研有力地促进了教学,使复旦成为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复旦大学专设的科研机构有十五个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历史地理、世界经济、中国古籍整理、人口学、物价、数学、现代物理、材料科学、遗传学、电光源、微电子、计算机科学、应用化学、经济计量模型）和不隶属于研究所的十一个研究室（外国文学、现代英语、新闻学、拉丁美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史、西欧政治、社会主义经济、人口理论、现代西方哲学、汉语大辞典编写组），还有兼具科研与生产职能的为全校服务的计算中心与测试中心。1985年又成立了以谢希德校长为主任的美国研究中心以及跨系跨学科的经济研究中心。

除了这一支专职研究人员的队伍以外，复旦大学全体教师，都既从事教学也进行科研，因此复旦大学有能力承担重大科研项目。1983年，国家和上海市分别下达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复旦大学文科各系共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十七项，其中由复旦主持的九项（包括蒋学模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王运熙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谭其骧教授主编的《国家地图集·历史卷》、余开祥教授主编的《欧洲共同体——机制和趋势》等），文科各系还承担上海市重点项目十三项，其中由复旦主持的八项（包括江泽宏教授的《比较经济学》、胡曲园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章培恒教授的《全明诗》）等。复旦理科承担了32项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其中关于数学现代理论、表面物理、分子生物、遗传工程等研究项目，复旦是主持单位。复旦大学材料研究所，已被上海市定为电子材料综合研究基地。这表明复旦大学在当代技术前沿学科的研究中负有重要责任。为此，复旦大学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跨系跨学科的攻关，如“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剖析系统”和“光学、计算机混合处理系统”等项目。此外还开辟了各学科横向“交

叉”、“渗透”的研究方向，如“核技术用于表面和半导体器件”，“激光技术用于表面科学、化学与医学”、“化学和物理在材料科学上的结合”、“物理、化学、生物在育种上的结合”等。为了贯彻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1982年，复旦与常州、南通两市结成科研、生产联合体，1984年又与深圳市正式达成协议，在深圳建立复旦大学生产与科研、教学基地。还正在与温州等中等城市建立协作关系，同时积极在上海市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为了推动理论研究，复旦大学于每年校庆日（5月27日）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中断），以检阅师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复旦大学出版双月刊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世界经济文汇》、季刊的《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现代英语研究》，不定期的《历史地理》、《新闻大学》、《复旦教育》以及《中国文化》、《华东人口文汇》等。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主持编辑《数学年刊》。近年来，复旦师生每年发表在校内外报刊上的论文约有六、七百篇之多，光是数学系和数学研究所的教师，四年来就发表了五百余篇论文，平均每年一百余篇，表明了复旦大学科学研究的繁荣。

复旦大学的科研成果在社会上获得较好评价。五年来，共获各级奖励 193 项，其中全国科技大会奖 47 项，上海市科技大会奖 41 项，国家发明奖 9 项，自然科学奖 5 项，中央有关部委奖 20 项，国防科委系统科研奖 11 项，上海市科委重大科技成果奖 57 项等，由于科研成果具有高水平，因而得到迅速推广应用。在理科的 213 项属于应用科学的研究成果中，有 210 项已被有关生产单位应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重大成果有《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反映我国历代疆土政区沿革的地图集；《新英汉辞典》，是国

内目前最全的一部英语辞书，大部分编委是复旦教师；此外还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复旦大学出版社成立的短短几年来，出版的社会科学专著和统编教材已达300种。1984年，上海市高教系统对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及论文进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评奖，复旦文科共有20部专著、38篇论文获奖，约占上海市高校获奖论著的二分之一。有的论文获《红旗》杂志优秀论文奖。

（五）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活跃，使复旦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中心。

复旦大学已经与北京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开展学术交流，互派教师到对方学校讲课，代培学生或研究生，以克服“近亲繁殖”的弱点，繁荣学术，提高教学质量。由于复旦大学历来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都愿意接受邀请来复旦讲学。

近年来，复旦大学先后举办了一些大型学术讨论会，产生了较好影响。1981年8月，以历史系为主，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新闻、哲学等系参加，举办了“清末明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全国十一个省市二十六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美国、日本、英国的四位汉学家专程赶来参加或送交了学术论文。由于与会者包括了各学科的专家，因而这次学术讨论会从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的各个不同侧面进行探讨，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与会的美国汉学家费维凯赞扬“和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中美学术讨论会一样好”。1982年9月，复旦大学与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联合主持召开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全国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六十多个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士107人以及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海野一隆、斯波义信，爱知县立大学讲师秋山元秀等。1983

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十一个省市中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有研究的学者六十七人出席会议。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黎澍主持了这个讨论会。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在会上各抒己见，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与答辩，学术气氛十分活跃。此外，世界经济研究所1984年与兄弟单位一起在济南、厦门等地举办了三次关于欧洲共同体经济的学术讨论会。1984年11月，复旦大学又在上海主持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取得很大的成功。复旦大学举办的这一系列讨论会的特点是准备工作周到，不图虚名而求真正的学术交流，每次讨论会上复旦所提出的论文都是与会各单位中最多的，因而有力地促进了复旦与国内外学者的交往，提高了复旦大学在学术界的地位。

为了解国外学术信息，取长补短，进行学术交流，近年来，复旦大学派遣了一大批教师出国讲学、或作访问学者、或与外国科学家共同进行研究。理科有91位正、副教授出国讲学、考察或出席学术会议，占理科正、副教授总人数的53.8%；文科正、副教授为同样目的出国的有42人，占文科正、副教授总人数的23.5%。谷超豪教授、孙鑫副教授赴美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中文系章培恒教授赴日本讲学，日本学者赞扬他是“第一流的文学评论家”。为了使国际学术交流经常化，复旦大学已与十一个国家的五十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其中有南斯拉夫的卢布尔耶那大学，罗马尼亚的克鲁日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与奥尔巴尼分校、明尼苏达大学、西北大学、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厄巴那——商边分校，法国的巴黎第七大学，英国的里兹大学，日本的庆应大学、关西大学、亚非语言学院，德意志联邦的康斯坦茨大

学，等等。近几年中，复旦邀请外国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已达二百多人次，并聘请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家玮、郭子斯、李远哲、沈元壤、黄克孙、吴瑞、傅京逊、邱成桐、乔祖尧、道许、邦纳、多林、勒斯姆生、利翁斯、池田大作、基沃斯等十八位为名誉教授，吴仲蓉、汪黔生、孙宪铎、朱孝颖、杨叔进和薛君度等六位为顾问教授。此外，日本的茅诚司教授和美籍学者杨振宁接受了复旦所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复旦大学图书馆参加了国际图书馆联合会，与美、英、法、德、日等十多个国家的230多个图书馆建立了交换关系。

为了提高复旦大学的教学与科学水平，复旦大学已派遣了375名教师、159名研究生和96名大学生出国学习，一部分已学成归国，有8名青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20名也已通过博士资格的考试。从1984年起，复旦将每年派遣10—15名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去英国里兹大学学习一年，同时也相应接受里兹大学学生来复旦学习。

复旦大学的上述特色，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包含了几代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清除“左”的影响，贯彻执行了教育“三个面向”的方针，对于复旦大学特色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当然，这些特色，至今仍远远不是完善的，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去创造和发展。

向世界第一流大学目标迈进

1984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复旦大学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复旦今后的奋斗目标，是全面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的方针和党的一系列政策，努力把复旦建设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第一流的多科性综合大学。为此，复旦大学在制订今后发展远景规划时，注意到了发挥多科性的优势，实行五大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相互渗透,走学科“内联”的道路;要加强学科建设,力争多数学科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要坚持教学改革与管理改革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工作方针,把培养高质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放在突出地位。

解放以来,复旦大学已向国家输送了大学毕业生24746人,研究生1163人。到1990年,复旦大学各层次学生的总数将达到一万五千人,其中本科生将从现在的六千余人增至九千人;研究生将从一千人达到三千人;外国留学生由一百四十人增至四百人;干部专修科一千二百人;高等学校进修教师一千人;大专班四百人。除此以外,还将招收夜大学学生四百人,自学考试和各类短训班每年一万至一万五千人次。

复旦大学将进一步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国家队”。粉碎“四人帮”后,复旦大学在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最先招收博士研究生和最先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现有博士授予权专业29个,博士指导教师36名;硕士授予权专业72个,硕士指导教师295名。几年来已培养出博士19名,硕士500名。学校将在大力提高各学科水平的基础上,争取增加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和导师。还要进一步建立“博士后”制度,拟从1985年开始,在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等条件较好的十一个学科正式接受国内外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来校,指导他们进一步提高科学水平。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教师亦将由现在的2400人增至4000人,增加66.6%。其中教授、副教授人数将由356人增至1400人,他们在教师总人数中的比例将由现在的14.8%增至1990年的35%,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人数将占教师总人数的40—50%,到了那时,全校教师队伍的结构将有很大变化。

复旦大学将进一步进行教育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

授、副教授上基础课的比例将从现在的20%提高到50%；一类课（指有较好的教学质量、形成了教学梯队、有较高质量的教材）要从目前的25%上升到38%以上，为此要在加强师资培养的同时，重视教材建设。各重点学科争取在科学研究上作出重大成绩，其中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表面科学、激光物理、催化、真空物理、低能核物理、模式识别、遗传和遗传工程、中国文学、现代英语、中国历史地理、西方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口学、传播学等学科，各要逐步建设成为国内公认的研究中心之一。表面科学、低能核物理、激光物理、模式识别、遗传和遗传工程、分析测试中心、计算中心等七个实验室，到1990年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人口学、广播电视、汉语语音、外语语音的教学手段要实现现代化。

为了适应世界科学发展的横向联系的趋势和特点，在体制上，复旦大学正逐步在校、系两级行政机构之间增设学院，以加强教学、科学研究的领导。已成立了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今后还将逐步成立生命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文学院、政法学院、理学院等等。这就完全打破了旧的文理模式的综合大学，而成为新型、多学科的名副其实的综合大学。

一个规模宏大、人才荟萃的复旦大学将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为祖国的“四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章 历史沿革

第一节 创立经过

复旦大学的前身是复旦公学，而复旦公学的原名是震旦学院。

一九〇二年冬，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于上海徐家汇。他酝酿多年的办学宿愿，终于实现。①

一八九四年冬，甲午战败，外御无策。有识之士提出要废科举，兴学堂。马相伯“慨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有意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②

一八九六年梁启超来沪办《时务报》，就近向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学习拉丁文。③戊戌变法时，梁启超报请设立编译学堂，④特邀马相伯主持其事，⑤旋因变法失败而止。

一九〇〇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八月，马相伯毁家助学，将祖遗家产松江、青浦良田三千亩。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斧资所不及”。⑥马相伯当时认为：“个人之建设，势不能久，故托耶稣会团体，以期长久”。⑦不料耶稣会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并不办学。

其后，马相伯居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两地相近，蔡元培常去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并介绍二十四名优秀学生到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法文、数学等，筹组译社。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

二百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离校退学。^⑧退学学生请求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除与教育会协助成立爱国学社外，还介绍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⑨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学院，定名震旦。震乃秦字谐音，系古代外国对中国之称呼，旦即早晨，“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震旦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马相伯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

震旦学院既与爱国学社同时建立，内部也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其不同者，爱国学社，倡言政治，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标；震旦学院，重视学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宗旨。不久，爱国学社因《苏报》案牵连，自动解散，其学生多转学震旦。^⑩因此，震旦学院的学生多具有民主思想。震旦学院是从封建统治中脱颖而出的新型学校。

震旦创立之时，既无校舍，又乏师资，马相伯凭其社会关系，借天主教徐家汇天文台余屋为校舍，聘耶稣会教士为义务教师。^⑪当时，马相伯自任监院（即院长），主持教务。他继承中国书院传统，吸取外国研究院优点，采用名儒师徒传授办法，以六十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诱导。^⑫马相伯虽世奉天主教，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毅然宣布办学信条有三：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⑬

马相伯宣称：“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⑭震旦学

院章程规定：“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二年，分文学、质学(科学)两类，各科均以外文教授。^⑤其施教方针，概括起来，共有四点：

一、培养青年的自治精神。马相伯对学校内部事务，规定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除总干事、会计由马相伯从学生中选定外，其余干事由学生选举，轮流担任。^⑥

二、指导研究科学的门径。当时学生，多为成年积学之士。马相伯针对学生特点，着重启发式教学，指导学生钻研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他在选择教材时，一反当时使用浅薄外文作课本的习俗，精选西欧名著为教材，如用西塞罗(Cicero)演说为拉丁文课本，选莎士比亚作品为英文课本。^⑦

三、注重世界大势的讲演，每逢星期日上午，马相伯必召集学生进行演说，或研究时事，或讨论学术，或纠正学生违反校规的行为，习以为常。马本善于演说，高谈雄辩，庄谐杂出，语言动人，效果极佳，他还拟定题目，指导学生练习演说。^⑧

四、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军事训练。马相伯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⑨

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知道震旦学院成立的消息，十分高兴，著文说：“吾闻上海有震旦学院之设，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吾祝震旦学院万岁。”^⑩

震旦学院建立以后，学科由文理两科逐渐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科，学生人数由二十四人迅速增长至一百三十二人。^⑪著名革命党人马君武、刘成禺、邵力子等人均为当时学生。马相伯从阅报中得知：青年举人于右任，作诗讽刺西太后，被通缉逃亡沪上，便派人招其

入学，虑其经济困难，特免除学膳等一切费用。马相伯还对于右任说：“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于右任遂化名“刘学裕”入学。^②由此可见，马相伯对革命青年是十分爱护的。但是，他又在院章中规定：“教师上课，不谈宗教；学生在院，不谈政治”，要学生专心学业。

法国天主教中某些人，在创办震旦时，若即若离。对中国学生学习拉丁文，更是讥笑，^③等到办学成效显著，又“见猎心喜”。^④他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阴谋夺取学校领导权，改变学校性质。

首先，在一九〇五年开学之初，教会对震旦学院提出干涉学院行政的通牒。声称非有满意的答复，不派教师上课，进行要挟。^⑤

其次，引诱学生专习法文。原来学院分为英文班和法文班两种。这时，法国传教士将法文班的课程订得比较完善，而将英文班的课程订得很差，企图引诱学生专学法文。^⑥后来，公然要马相伯不顾学生反对，裁去头二班的英文课程。^⑦

最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南从周竟然命令马相伯去医院养病，由他来管理学院中的一切事务。实际上是赶走马相伯，夺取学院全权。^⑧南从周在夺得学院权力以后，“尽改旧章”，^⑨妄图把中国学生训练成法帝国主义的奴才。

这样，震旦学院这所刚刚从封建枷锁中挣脱出来的新型爱国民主学校，又面临着被法帝国主义篡夺的危险。

具有爱国民主精神的震旦学生，见此情形，极为愤慨。于是开会讨论对付办法，当场推定沈步洲同学为主席。沈步洲即席发表演说，大意是：我们来此读书，主要是因为马相伯先生，他是中国人，热心祖国教育事业，创办震旦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目前马相伯没有生病，法国教会却命令他住院，另派法国传教士南从周来院掌握一切，实际上是驱逐马相伯，夺取学

院领导权。学院原来的课程，英法文并重。现在取消英文，专用法文，法国天主教会的用心十分明白，要使震旦学院变为法国教会掌握的工具。由于马相伯是天主教徒，不可能直接与教会争执。目前我们学生的唯一办法是退学。同意退学的同学请签名，不同意退学的也不勉强。结果，全校一百三十二名学生中，签名退学的有一百三十名，不签名的仅为二人。^⑧

学生们把退学的签名簿送给马相伯看。马相伯老泪纵横，饮泣吞声，悲痛至极，他向学生表示，自己是天主教徒，为教会控制，不能自由。他同意学生退学，并将学生所缴学费退还学生。于是，学生纷纷携带行李物品出校，马相伯也住进医院，一所声誉日著的震旦学院就此停办。

如果说，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学学生集体退学，是为了反对专制奴化，要求自由平等，表现了民主主义的觉悟，那么，一九〇五年震旦学院学生集体退学，则为了抵制外国教士侵夺，捍卫国家教育主权，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属创举。

震旦学院散学以后，不数日即由沪学会推马相伯为会长，并召集离校学生，商议复校办法。^⑨学生们推定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等七人为干事，协助马相伯共同办理复校事宜。当时租定爱文义路（即今北京西路）某宅为临时联络地点。^⑩学生遂将震旦学院校牌及所添置的校具、图书、标本等项物品暂存该处。^⑪至于在徐家汇天文台内新建的宿舍楼一座，因无法搬走，只能无偿地送给教会了。

震旦学院散学以后，社会各界人士深表同情，但因震旦学生中有不少是知名的反清志士，为清政府所通缉，因而不敢公开支持。其时，周馥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马相伯与其关系很好，订有旧交。马便申请周馥支持震旦复校。周馥即奏准拨发一万两银子为学校开办经费，拨交吴淞官地七十亩为建校地

址，并暂借吴淞提镇行辕为临时校址。^⑤

马相伯又聘请社会名流严复、曾铸、萨镇冰、熊季廉、袁观澜、狄葆贤等二十八人为校董，协助募集学校基金，共同管理学校。^⑥

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中帝国主义分子，对劫夺震旦学院的失败，很不甘心，便决定破坏震旦复校。他们利用马相伯捐献的家产、盗用震旦学院的名称，于五月份向《时报》洽登广告，宣称徐家汇震旦学院将于七八月份招生开学。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这种做法，性质极为恶劣。《时报》馆负责人狄葆贤为马相伯聘请的校董之一，当将此事告知马相伯。但是，当时政府腐败，国事机阻，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中国横行，马相伯和退学学生对此无力阻止，只能同时登报，说明事实真相。

因此，在一九〇五年五月廿七日的《时报》第一张第一页上，同时刊登出两张广告：一张是徐家汇天主教堂刊登的《徐家汇震旦学院》广告，内称：“震旦学院前因学生误会意旨解散。而本学堂及各教员于中国教育之前途，热心未懈，即院中书籍、标本等，亦一切无恙”，现拟“商订学课规则，定期招考学生，于七八月间开办，先此广告”。^⑦这是一则精心杜撰的广告，首先它歪曲震旦学生离开徐家汇的真相，学生们不是什么“误会意旨”，而是洞察帝国主义的阴谋；其次，它将徐家汇天主教堂假冒为震旦学院的创办人，伪装成“热心”“中国教育前途”的人士；第三，它先发制人，夺取校名，妄图阻止震旦离散师生复校，用心可谓毒矣。另一张广告为《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告白》，它宣布：震旦解散后，“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与教会毫无纠葛，“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现暂借吴淞提镇，定

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③更名复旦者，隐含恢复震旦之情，又具复兴中华之意，这是迫不得已而又寓意深远的命名。^④

此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人士，果然“袭用”震旦旧名，办起学校。据长期担任该院院长的胡文耀先生说：该院“行政教务一切权力，都在外国神甫掌握之中”，“他们办学的目的不在教育，而以传教为名，进行文化侵略为实”。^⑤

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四日（阴历八月十六），复旦公学在马相伯、严复、熊季廉、袁观澜等先生和全体学生的努力下，终于在吴淞正式开学。这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胜利。

从复旦公学的诞生历程中可以看出，她是在反抗封建压迫中诞生，抵制帝国主义夺权中重建，是一所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爱国民主学校。

注释：

① 关于震旦学院的建立时间，一般都根据法国天主教人士所写《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或《震旦大学一览》的记载，认为是一九〇三年，实误。现经考订，应为一九〇二年，其根据有五：第一、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出版的《缙译世界》第二期，刊有《震旦学院章程》，震旦的成立，当在其前；第二、一九〇五年由严复领衔的《复旦公学集捐公启》中说：“震旦学院者，丹徒马君相伯良之所创立也，于壬寅（一九〇二年）开课。……三载之间，绰有成效”，明确指出震旦创立在一九〇二年；第三、一九三九年复旦大学同学会著文《相伯夫子与复旦》中云：“民国纪元前十年，丹徒马师相伯创办震旦学院于上海徐家汇”，则亦指一九〇二年；第四、邵力子：《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光绪壬寅癸卯间，先生既创震旦学院，复创复旦公学”，壬寅即一九〇二年；第五、震旦学院学生，大多为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在一九〇二年十一月，震旦的创立，当在其时。

② 见《马相伯笔录》

③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五十六页至五十七页。

④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四二三卷第十六页。

⑤、⑥ 见《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

⑦ 见《马相伯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⑧ 见《马相伯捐产兴学摺记》。

⑨ 见《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

⑩、⑪ 见马相伯：《蔡子民先生与二十四个学生学拉丁文》，又见毛西壁：《校史》。

⑫、⑬、⑭ 见陈传德：《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

⑮、⑯ 见《复旦公学集捐公启》。

⑰ 见马相伯：《想当年创办震旦》。

⑱ 见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

⑲、⑳、㉑ 见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

㉒、㉓ 见梁启超：《祝震旦学院之前途》。

㉔、㉕ 见马相伯：《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㉖ 见《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大陆报》第三年第三号。

㉗ 刘学裕为“留学于”的谐音。

㉘、㉙ 见李青崖：《马相伯先生与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油印本。

㉚、㉛、㉜、㉝ 见《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

㉞ 见（1939）复旦大学同学会著文：《相伯夫子与复旦》。

㉟ 同注（10），又见谢德风：《北碚建校纪念观感记》一文中谈到1937年校友节时，曾在江湾展出复旦前身〔震旦学院〕的铜牌。据此，震旦散学学生当将校牌取下带走，一直保存在复旦大学内，直到抗战爆发后，移入徐家汇复旦附中内。

㊱ 见《瑞忠敏公奏稿》卷八：《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摺》。

㊲、㊳ 见《时报》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广告。

㊴ 见一九四七年《国立复旦大学一览》。

㊵ 见胡文耀：《人民震旦》创刊词。

附录

一、马相伯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立献据人谨承先志，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并希望为西满安德肋献祭，祈求永承罔替，中外善堂概由输献。此系主前熟思，遵先志以献者。自献之后，永无反悔，且系先人所遗名下私产，故族中一切人等，毋得过问。其系教中者，自无敢有违善举；其系教外者，则非先父先兄之嗣也，更无得过问，特此书献存档。时天主降生后一千九百年秋分后一日，即光绪庚子又八月一日。

立献据人江苏镇江府若瑟马良

计开青娄田亩契据有绝有押一并献存。外清册一通、油坊一所。

又近上海等处地亩数方，其契据俱一并在内，左译文另有添注，合并声明总之。

以上摘自上海市高教局历史档案，第599卷。

摘录人：赵少荃1983年11月12日

二、马相伯笔录

慨自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入手工夫则文字尚无。但欧美国际文字多用法文，故设震旦，生等且请加拉丁，始亦姑从其愿焉。而于算学尤斤斤，无他，为科学等根本故。但先弟已故，而余年已过花甲，恐不能继，故请耶稣会士以襄其成。按其会规，如颁有基本金，必继续为之，此团体工作，所以永久也。为此，将余名下松青两邑田三千亩捐为基

本金。光绪庚子年润八月初，立有西文捐据，并另立典于记名目以别于公产，委朱相公于泗宅代理之。因外国人于租界外，例无买地出租权。后又因在罗家湾造校舍，地价四百元一亩，余又捐现洋四万元。英法租界地八处，不索余捐据者，因在租界故也。犹忆朱相公随将一地贱价售于某相识。余深责之。但余既不为名，又不为利，而琐碎记之者，盖时势空隙[穴]来风莫测，以免累后人！

相伯亲笔

三、震旦学院章程

一九〇二年订

宗旨

一、本院以广延通儒、培成译才为宗旨。

功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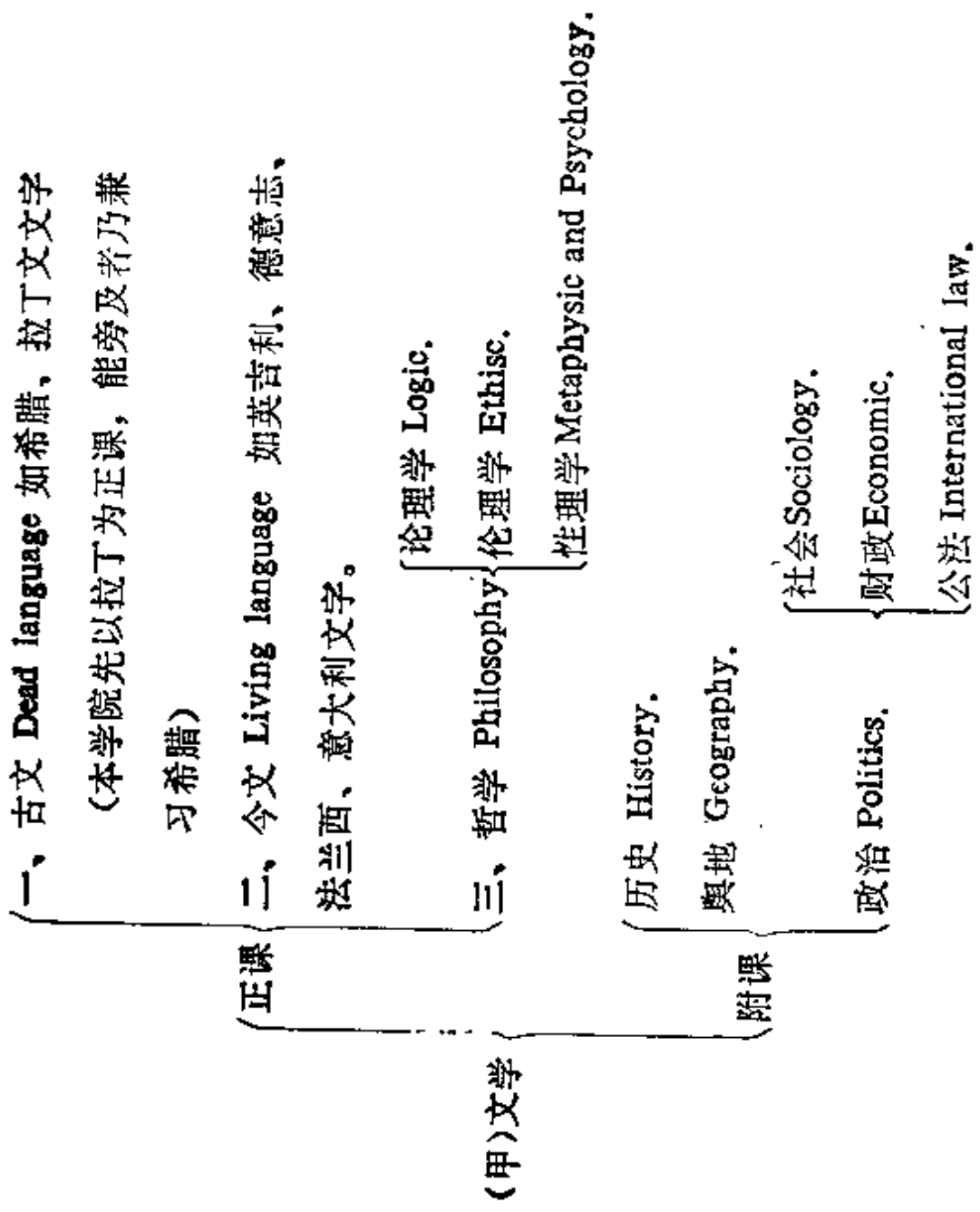
一、拉丁为任读何国文(指英法德意)之阶梯，议定急就办法，限二年毕业，首年读拉丁文，次年读何国文，以能译拉丁及任一国之种种文学书为度。

一、先依法国哲学大家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之教授法，以国语都讲随授随译，译成即可为他学校课本。

一、本学院既广延通儒，治泰西士大夫之学，其肄业之书，非名家著 Classical author 不授。

一、按日上午二小时，下午二小时，为授课时刻。三小时授正课，一小时授附课，通计二年，除星期外，六百日共二千四百小时，首一千二百小时为授拉丁文时刻，次一千二百小时，为授任一国文时刻，除讲授时刻外，每日四小时为独修时刻，二年共四千八百小时为肄业时刻。

一、课程遵泰西国学功令分文学 Literature、质学(日本名之曰科学) Science 两科。



算学 Arithmetic.
几何 Geometry.
代数 Algebra.
八线 Trigonometry.
(三角)
图授 Description Geometry.
(立体几何)
重学 Mechanics.
(力学)
天文学 Astronomy.

物理学 Nature Philosophy.
化学 Chemistry.
象数学 Mathematics.

正课

(乙)质学

动物学 Zoology.
植物学 Botany.
地质学 Geology.
农圃学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卫生学 Hygiene.
簿记学 Book Keeping.
图绘 Drawing.
乐歌 Singing.
体操 Gymnastics.

附课

一、本学院所授功课，限二年毕业者，单就文学论也，至于质学，非两年所能毕事，有志精进者，得于二年外延长肄业时刻，本学院可特别教授，卒业期限，亦以二年。

一、本学院总教习为马相伯先生，精希腊、拉丁、英、法、意文字，曾奏派游历欧米各国，一切功课，均由马君鉴定。

一、本学院于光绪癸卯年，西历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开办，的确开学日期，登报声明。

一、本学院设在上海徐家汇，房宇敞爽，大适宜于卫生，花园、操场、演说厅均极宽豁。

一、入院办法肄业者分为普通、特别两科。

（甲）普通科银百两为一率，捐一率即可入院肄业，有力者可任捐十率、贰百率，以赞成此莫大教育事业。

（乙）特别科，无力而有学问者，不能岁捐银一率，可以其著作介绍，一通人代递，并言明其精于何种学科，入院试读一月，其学行经本院干事三人认可，即得免送捐金，住院肄业，卒业后在本院所捐译社内充译员二年，仍得稿值五成之权利。

一、捐银分二期缴清，正月缴银五十两，六月缴银五十两，凡百两。统交本学院簿记所收领，给收单为凭。

一、试读一月后，虽有捐金，而其学问不及译书程度，或资性太钝者，随时由教习谢退，计月取房膳银十两，余金发还。

一、走读者，岁捐银半率。

一、拉丁教习一人，英、法、德、意教习各一人，总干事一人，分干事五人，每学生十人，置执役一名，一除用款外，储赢为开办译社、学会及奖励一切公共利益之用。

以上摘自《翻译世界》第二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公历1902年12月30日）出版。

（按：此为震旦学院最早的一份章程）。

四、震旦学院开学记

壬寅二月朔，上海震旦学院开学，其师为南徐马相伯先生也。先生尝曰，我国人士谭西学、诵西文数十载矣，然所事皆彼中童幼商工所普习，而非我士大夫所当及也。鄙人潜思三十余人〔年〕，非经典之书不读，非名家之作不观。所心得、所置意者唯此士大夫之学，所乐与好学深思之士，共相讨论也。先生此意，苍有年矣。然此震旦之设，实东甌项君谓臣发起之。院设于上海西乡徐家汇、即天主堂古天文旧屋也。先生居于土山湾工艺学堂，相隔约半里许，是日先生临院，诸生皆降阶相迎。先生谦身含笑而入，相与同登演说厅，行师生相见礼。先生西南立，诸生皆北向以对，各三揖而退。于是入课堂，各以次就座。先生曰，西国学堂开课之日，教师必演说，今日我震旦学院开学，鄙人亦演说一短篇，略表宗旨，其文录下。

今日我震旦学院，虽一小小学院。然恢张宏远，前程何限，如一芥之微，撒之艺之，可以遍地，我震旦其奚异哉。然诸君之集籍来游，麇集于兹者，非为学乎，兹姑言学。夫学问者，世界所最尊贵者也。彼富贵功名，非不重矣。然卑鄙齷齪、胸无点墨之辈，欲荣誉之，则荣誉之；欲富贵之，则富贵之。此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也。定如此一点灵犀，父子不能相传授，兄弟不能相取移，朋友不能相提赠，照耀大地，没世不忘之难能而可贵哉。虽然学问之道，有人己之别也。我国自秦汉以降，皆为人之学也。曰策论则策论矣，曰诗赋则诗赋矣，曰经义则经义矣，降而至于八股则八股矣。我不解奴隶性质之何以若是之深入而难移也。譬之一家之中，其家主虽粟麦之不分，是非之莫辨，然其奴隶必崇拜之，服从之，彼为人之学奚异哉。故为学亦有奴隶与非奴隶两派。我不解中国奴隶之学，何以若是之盛

哉。故无论落第之士，牢骚抑郁，或掩涕一室，长嘘空山，作种种丑态之可笑可怜也。即彼大魁天下，置身通显，峨冠博带，焜耀耳目者，试叩其所学，则抑复嗤鼻。凡此奴隶之学，非所乐闻。今兹所讲，为格物穷理之学，求之一己，而无与人者也。故开宗明义，力求自主，夫自主与自由异。自由者，今日欲左则左之，明日欲右则右之。而自主则不然，有坚忍不拔之气，强立不返之志，旦而矢之，则万变不离。所谓三军之帅可夺，而匹夫之志难移，此鄙人所欲与诸君子共勉者也。

摘自《苏报》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

(阳历三月一日)《学界风潮》栏内

按：壬寅当为癸卯之误。朔，为初一日，震旦学院于二月初一日（阳历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开学。

五、蔡子民先生与二十四个学生学拉丁文

马 相 伯

我从法国回来以后，到了天津去见李中堂，结束我到美国去的使命。我很感慨向中堂说“很好的事体(指借款)，被他们弄糟了”。中堂道：“政府不想好。又什么办法呢？”中堂其时不敢明说旗人之无用，就已慨乎言之！后来中堂见嫉于翁师傅（同龢）遂从北洋大臣，调任两广。我也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重新过我书呆子的生活。

当时蔡子民先生在南洋公学（即现在之交通大学）任教职，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骨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子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语文，那就无从了解。子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烦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

果要指望他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南洋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当时我在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楼下就是大门)，孑民先生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种理由，我就孑民先生提议，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较优秀一点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孑民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就派了二十四个学生来学。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和孑民先生一样，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我没办法，只好教了。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我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以学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季宰六(Cicera)的演说。四个月后，经过考试，他们都居然写得出来，说得出来(发音自然有些不确)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胡敦复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道，他们统统学过了，我说，你们且慢，等待我教一点，你们才说，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罢，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的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的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对于数理的研究有了深造。

后来我又教他们学哲学，凡哲学术语，一本丁拉“不徒欲探欧语之源流，并欲探希腊拉丁人震古铄今之爱知学也。”(见余所著：《致知浅说付刊叙》(商务书馆版)《致知浅说》与《拉丁文通》旧稿本已散，民国以后所刊，系“辑散补亡，勉续未成”之作。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日

六、从震旦到复旦

马 相 伯

我教了二十四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觉得有把组织扩大之的必要，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 Akademie 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我们当时以为这样学校应该把范围放大，藉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数种信条：

- 一、崇尚科学；
- 二、注重文艺；
- 三、不谈教理；

不过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复旦初办的時候，经济非常艰窘，校址又没有。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厂，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大家决定了，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玉山(馥)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并请他帮助些经费，他回电很鼓励我们，吴淞旧镇署照拨，并汇了两万两银子给我们做经费。周玉山之所以如此慷慨，还是李文忠的一点关系，因为周氏本是淮军出身，我们弟兄也与淮军有关系，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假使当时两江总督是李中堂，那他对于我们的学校更要大大地帮助。文忠之豁达大度，信人不疑，（当时阁臣疆吏中实无第二人，曾左都未免书生之见，与三家村的态度，胡文忠局度恢宏，

然而天不永年，中道捐弃，可惜！他于愚弟兄所创办的学校，定然另具一副眼光相看。

我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先生荐给我，他本是华侨，在美国读书的。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来我辞了校长的职务，李先生便继任校长，一直到今。还是他在那儿维持。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七、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马 相 伯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颞顽，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却从拼音字母教起，使他们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国语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却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狄斯丕尔，等等的著作，给学生讲习，藉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各生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员也都赞成。而且他们当我创办震旦时，都若即若离的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于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容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

有用。我因以上种种关系便毅然决然地离开震旦，组织复旦。我前次已经说过，复旦开学未几，便遇着辛亥革命，上海经过了一次“光复”，复旦学校被军队占据，大家就带着全校学生跑到无锡，暂借李汉章的祠堂做校址，我好多年不上家乡的茶馆了，在无锡时，又常和二三友人在茶馆吃了几次茶，说来也奇怪！无锡那时的茶馆，楼上楼下都是满座，但楼上从楼板缝里看楼下看得逼清，楼上的人一行动，楼下的茶桌上便灰尘遍处，然而大家都安之若素，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我那时看了这种情形，便万分不耐，于是感慨万端。幸而我们在无锡住了一个月光景，革命后，我们又把学校搬回上海。回到上海没有校址，于是我就写了一呈文给江苏都督庄蕴宽，请他把李文忠公祠拨给复旦做校址，庄很好，马上批准了。李文忠公的儿子伯行先生对我大发其少爷脾气，说我不该强占文忠公的祠堂。我答道：并不是我强占它，而是庄氏批准的。同时我允他：凡于纪念李文忠的碑记、塑像、牌位，皆丝毫不动，一律保存。大家也很尊重我的意思，一直保存到今。复旦在中国的教育上，总算尽了相当的作用，用李文忠祠堂来做它的校址，不但不辱没李文忠，实在是看得起他老先生。

我在复旦（以前也是这样，）对于学生非常爱护，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有了困难，也常来找我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几乎要起哄，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道：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而是来求学的，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而应以社会为家庭，等等。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得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

八、中国人的演说

马 相 伯

当我创办复旦公学时，我曾立下规则：凡星期日上午，学生均不准外出，由我拣定许多演说题目，轮流命诸生练习演说，我把演说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始怎样能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于他的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一班学生都很感兴趣。大概中国对于演说，知所注重，恐怕就是这时候起的。不过演说只是人类在社会中发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种工具，演说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因此我想起法国的一个大政治家，他的名字叫退尔 Thiers，他少年时只是一个店员，十八岁以前便常常投考到报纸做文章，大为报纸编辑所赏识，旋即被请去当编辑。他后来竟做了拿破仑第三的大臣，他的演说非常有力，当他任期满时，国会一般人对于他都反对，但当他在国会做一度辞别的演说时，国会又全体投票举他留任，如是者三次，但到后来，国会不许他再做辞别的演说了。可见天才的演说的“吸引力”之大！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

九、祝震旦学院之前途

梁 启 超

教育议兴，即已两年。而至今无一稍完备之私立学校，不得不谓国民之耻也。译书局如林，译才如鲫，及考其所谓译事者，不过裨贩至粗极浅之东籍。未曾通一国之语言文字，乃至或并日本之文字亦未认识，而贸贸然曰从事于翻译，徒以

麻沙燕石耗读者之日力，损读者之脑筋，虽科以欺骗杀人之罪，不为过也。吾闻上海有震旦学院之设，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该学院总教习为谁，则马相伯先生，最精希腊、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所在地则徐家汇也。……

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一国语言文字者，几不可以人类齿。而欧洲各国语学，皆导源拉丁。虽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补习拉丁，而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益有根底焉。此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论也。眉叔亡后，士林痛惜，此学院即相伯独力所创也。其愿力洵宏伟，其裨益于我学界前途者，岂可限量。

文学一科，各国大学所必有之分科也。虽然，以日本之进步，至今犹未有一学校专以研究文学为目的者，而吾中国今已见此院，吾为中国前途贺。

院中肄业之例，以本国文学优长者为及格。盖如此然后进步易也。我国学界，今渐滔滔然有蔑视国文之恶风，得此庶可规正之。

我青年诸君，今后固不能不广求新知识于世界，非游学欧洲，殆不足以占优胜也。苟在此院两年，以其所学得者为基础，然后外游焉，以附益之，则学有本而成自易矣。吾祝震旦学院万岁！

摘自《癸卯新民丛报汇编》第819—823页

十、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

震旦学生退学一节，因该校马相伯君，接天主堂教士南君函：谓将头二班英文裁去。如不愿者听之，并令马君入病院养病，即命南往学院中管理一切。马君即出条云，将学费缴齐始

行上课，并谓一切教育事务，均归于南君。于是，同学开会宣布一切，并由沈君步洲演说，约谓现在震旦学堂，已变为教会。如昔日学科，皆英法并重，今则专用法文。且各科亦以法文教授，厥证昭著。且吾辈所以入学院者，以马君在院。马君为华人，且热心教育，今马君无病而入病院，不啻教会逐马君而夺全校之权也。处今之时局，若使马君设法与教会争，则彼亦教会中人，必不能直与教会争执。故今日唯有退学之一法，如诸君赞成退学，即乞签名；不愿退学者亦听。沈君说毕，学生签名者共一百三十人，不签名者二人。由是众学生以签名簿示马君，马君对学生饮泣，以为己身为教会所制，不能自由，并将学生所缴学费退还。学生遂纷纷出校。而马君亦从此入病院矣。凄惨之情，不可言喻。昨日学生相议，谓吾辈团体，决不可解散，在张园拍一小照，以为纪念。而沪学会又请马君到会演说，发表已见；并请各学生到会，于前一日偏发传单，其词曰：“本会敦请马相伯先生为会长，顷闻贵院散学，诸同志劳燕东西，能无离群之感，同人深愿联络声气。特属本会干事胡君慕超、叶君藻廷，为招待员。会所现设小南门外曹家湾。倘蒙签名入会，不胜欣盼。明日午后二下钟，相伯先生到会演说，发表意见，届时务祈诸君早临，特此通知。”又闻沪学会此举，系欲保全该校，并请马君出教云。

摘自《大陆报》第三年第三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发行）

按：《大陆报》，实系由留日回国学生，曾在京主办《国民报》之駸翼霖（元丞）、杨廷栋（翼之）等所主持。

十一、忠告震旦学生

吼

震旦学生，因与教会冲突，全班退学，电求各当道援手，拟另建新校。诸君独立之精神，与向学之苦衷，当无人不佩服者矣。然余谓有百余英锐青年之团体，有何事不可为，况区区觅一校舍。（有百余学生，有热心教师，无形之学校已成）而必倚赖官场为赞助，甚不可解，得毋为经济之故乎。夫合百余人之学费，为数甚巨，即不敷开办之用，而草创伊始，无妨粗就。且缔造愈艰难，则诸君之精神能力愈显。若必待筹有足款，而后举事，则任指一人优为之，毋贵乎团体也。昔南洋公学学生反对总办，全班退学，未逾月而成爱国学社。初未尝藉官力为之引援。后虽因别事解散，不能谓之经济问题所致。藉曰非得巨款，决不能成立，即亦与其筹之与官场，毋宁筹之于绅商。即如震旦现捐集之数万金，其出于官者乎，抑仍出于绅商者乎？若夫款出于官场，而必自予官场以干涉之路。揆之诸君子退学之初志，疑有未合也。侧闻震旦创办人，至有电请南洋大臣定名之说。夫校名犹不敢自定，则一切课程更可类推，他日诸君之不惬意，恐更有出教会上者，诸君亦尝熟思之乎。虽然，以诸君学识之高，此种常解，断无猜想不及之理，意者其别有深意存欤。

摘自《大陆报》第三年第三号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发行）

十二、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

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

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轶轳。现暂借吴淞提轅，定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白。

录自：《时报》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五月廿七日第一张第一页

十三、徐家汇震旦学院

震旦学院前因学生误会意旨解散。而本堂及各教员于中国教育之前途，热心未懈，即院中书籍、标本等，亦一切无恙。现拟延请中国清望素著，讲求教育之人，为本学院名誉赞助员，商订学课规则，定期招考学生，于七八月间开办，先此广告。

录自：《时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五月廿七日，第一张第一页

十四、复旦公学广告(一)

震旦旧名，有人袭用。嗣后海内外寄本学函件，请迳寄吴淞提轅，或英界张园北爱文牛路二十二号复旦公学事务所，以免误投。本学教授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评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一切续行刊布。前震旦旧生，无论本埠外埠，请亲来或投函报名，以便位置，定七月初六日截止。余额另补新生，张园北爱文牛路二十二号复旦公学事务所启。

录自：《时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六月廿一日，第一张第一页

十五、复旦公学广告(二)

本校校舍建筑需时，暂假吴淞提辕先行开学，暂定学额百六十人。前震旦旧生报到者百二十人，余额改补新生。兹定本月二十四日，就张园对面爱文牛路本公学事务所，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考试。上午八点钟至十二点钟考汉文，已习西文者，下午二点钟至五点钟加考一次。俟录取后登报通知入校。吴淞提辕只容寄宿生八十人。因来学者众。复在校外租借宿所，略广学额，以免向隅。凡能刻苦自励，愿来就学者，于二十日前报名备考。本校学程现定预科四年（一为实业专门之预备，一为政法专门之预备期，可直接大学），专科二年。校费暂分三等，校内寄宿者期年百二十元，校外寄宿者（宿所由校赁定）每年百元。梳栉、洗衣、操衣费，床账等一律在内。自赁宿所，仅在校午膳者每年六十元，操衣在内。应缴校费，分上下两学期，开校时缴足。开校定八月初二月。旧生须一律于月杪前到校。教授管理法另刊。

录自：《时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七月十八日第一张第一页

十六、复旦公学募捐公启

以中国处今日时势，有所谓生死问题者，其惟兴学乎。问吾种之何由强立？曰惟兴学问。民生之何以发舒？曰惟兴学（问）。欲地力之任乎，非学其术末由。欲治法之善乎，非学其效莫致。他若进民行、卫民生、言除旧、言布新，皆非不学无术者所可幸成。故中国维新以来，他议或有异同，乃至兴学，无贤不肖智愚，万喙一声，皆以为不可更缓。十稔之间，以中

外形势之日益分明，屢宣明诏，诏京师泊各直省一切设立学堂，有公私之别，大中小普通专门之差，训词深厚、主义宏远。盖深知民智不开，人才消乏，虽日取旧法，改弦而更张之，无补于强，于国益病。此凡属国民，所宜深体朝廷用心，而知何者为最急之义务矣。虽然其事有诚难者，以地方财力之有限，则经费难。以新学讲求之无素，则师资难。而泔泔学子，或负笈担簦，间关走数千里，向学无从，月月跳丸，年力坐耗。审而言之，此岂独学子私人之不幸。国之所损，尤莫计程。故不佞等每见志学少年辗转失望，然犹奋发绵力，结合侪侣，呼吁将伯，所蕲得者，不过一师立法成之地，得以自拔其躬，具后日国民资格，不至更为国种羞。辄感其志尚。嘘（疑为悲之误）者不可为累歎，不觉涕下如绠縻也。岂诸公而独无感乎。震旦学院者，丹徒马君相伯良之所创立也，于壬寅开课。当是时，无经费、无师资，徒以少年求学之殷，本其诲诱不倦之意，草创缔合，谈艺分科，惟绌经费，故不得不借地于教门；惟乏师资，故不得不借才于会友。然而三载之间，绰有成效。其所课者，皆微至朴属之学，为他校之所无。既有以屢学者之怀来矣，而有朋自远，日益加盛。盖开课之始，就班者不过二三十人。至于今春，乃百四五十而未已，乐与饵、过客止，兹非其验欤。所不幸者，以经费师资之绌乏，而借地借才；以借地借才，而教育之权界不清；以教育之权界不清，遂终于相激而解散。此今者复旦公学所以继震旦而求立，而募捐之举，所不得已而望海内外诸公之见助也。不佞等寓居海上，每见东西人士，于利益同种之业，不惜捐斥鉅貲，至于建设学校，培养后生，尤多指产倾貲，不遗余力。又见我国数年以来，如救济、救急、十字、善邻诸举，凡属为善，不吝解囊。今者复旦募捐，确实兴学，其为社会利益，影响垂百千年，遍各行省，关系本图尤远且大。是以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周尚书知之，当震旦解散之

始，即殷然以维持规复为己任，首拨鉅金，为海内倡。又蒙江南提督杨军门假以吴淞行辕，暂充校舍，栖止生徒。苏松太道袁观察禀拨吴淞官地若干亩，为建筑新校之用。惟是造端宏大，需款犹多，必资众擎，而后克举。用敢据实布启于海内外诸公。上自公卿，下逮士庶，倘蒙慨助，请列台衔，邮兑法马路洋行街德发洋行曾少卿处掣取收条，登报鸣谢。此外中外日报馆、时报馆二处亦可代收转交。至落成开学以后，所有用费，以及每年出款功效，容随时造册，胪列报端，庶使热心教育者，晓然于款不虚糜，事有实济。总之，此举关系国家公益，亦非区区发起者所敢居其成功也，诸公鉴之。

严复 曾铸 陈涛 汪诒年 汤寿潜 庞元澄 黄公绶
袁希涛 萨镇冰 熊希龄 陶在宽 姚文楠 王清穆 沈卫
熊元鐸 李钟珏 张睿 方硕辅 叶景葵 吴馨 沈桐 陈季
同 刘钟琳 王维泰 蒯光典 施则敬 况仕任 狄保贤 同
启

十七、相伯夫子与复旦

复旦大学同学会

民国纪元前十年，丹徒马师相伯，创办震旦学院于上海徐家汇，其组织方式，虽循教会学校之旧，而在讲授学习上，则隐然树立革新社会政治之始基。以故颇负人望，在当时已自成壁垒，迨纪元前七年（前清光绪卅一年）因学校行政及宗教等问题，校内意见不甚统一，师以平时主张思想自由，并主张校务应由学生自行管理，以养成共和精神，爰决议迁校，于是年二月率全体学生携校额、校具、图书等项，离徐家汇旧地，以

校舍未定，寄迁于沪市爱文义路新闸路间之某宅，推叶仲裕、刘学裕、邵仲辉（即邵力子先生之学号）、王侃叔、沈步洲、张秩欧诸君为干事，旋以沈王张三君先后出国留学，邵则赴陕任教职，其为师左右策划校务，促进新校之成立者，惟叶仲裕及亡命沪上变姓名为刘学裕之于君右任，于以当时为清廷刊章通缉，不能显露姓名。故凡与各方接洽校事者，均由叶君出名，而于君恒居复壁中，其工作勤苦，尤为师所倚重。嗣由师邀集严又陵、熊季廉、袁观澜诸先生，共筹新校舍，惟时馆舍未定，新申两报上，忽发见徐家汇震旦学院招生广告，师乃与严熊袁三先生联名登报声明，震旦之名被人袭用，即日起改名为复旦，此复旦之名之始见于社会也，时清廷对于新起党人，钩稽备至，震旦知名人士，尤在侦逻之列。沪上人士，对吾校表同情者虽多，以碍于耳目，未敢公然将伯。适其时江督周玉山与师有旧交，且极崇仰师之为人，因得请而以吴淞营地七十余亩备建校舍，同时拨给开办费万元，又借拨吴淞提镇行辕为临时校舍，修葺既竣，规模粗具，师乃延李登辉先生总教务。聘张汝楫先生昆季暨王培元先生等多人分任教席，于是年中秋节正式开校。生徒凡二百余人，分为英文班及法文班两部。除国学外。法文班各科学，均用法文讲授，英文班亦然，盖当时实无高深译本也。先是，在震旦时代，师自授拉丁文、哲学、测量等学，而其他学课。则由师请天主教士义务讲授，校务则由学员能孚众望者承师意处置之，学员纳费，仅资膳宿图书之用，束修薪水，既无所需。故经费不虞竭蹶。迁吴淞后，学校行政，虽仍由师派指叶刘邵诸君执掌，而教员束修，筹措为难。师乃自授法文班各课，以节支出。时师年已六十有六，而当其兀坐讲台时，阁铜框巨目镜于鼻端，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开校以后规模渐扩，学科荐增，需费亦渐繁。是年冬，师乃再请于江督，月拨经费二千元，学校之根基乃渐固。纪元前六年春，

师因事东渡，乃商请严又陵先生任校长。师虽奔走国是，而于校事时加存问焉。三四年间，校中历校长三人，严先生、夏剑丞先生、高梦旦先生是也。纪元前三年冬，高先生力辞，朝野僉以师为复旦创办人，校长一席，实非师莫属。师亦慨允复职，同时并延于右任先生授国学，是时清廷号立宪，渐解党禁，于先生已得出而从事于新闻事业，旋仍以鼓吹革命，遭当局之忌，所办民呼、民吁各报相续被封。而师乃毅然请之来校，藉以启发青年革命思想。纪元前一年秋，革命军兴，吴淞校舍、充作光复军司令部，师徒罢散。历年所聚仪器图书，几毁损无遗，迨民国纪元，于右任邵力子两先生，承师意，呈准大总统孙，并得陈英士都督之协助，拨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并拨给经费万元，河山光复，学校亦光复，师欣然曰，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之学校，今始遂吾愿也。二年春，师北上，乃请李登辉先生继主校长。二十余年来，校务蒸蒸日上，人才辈出，知人善任，其师之谓乎。近年师鲜与外事，然每值复旦举行典礼，辄躬临，对后学训勉有加。二十四年夏，复旦同学会为师九六称觞，师固不欲，且以倾跌伤足，不良于行，群拟趋土山湾师门叩祝，议未定，请命于师，师曰必无已，其在复旦附中乎，亦以见师之始终垂念复旦焉。

摘自《复旦同学会刊》八卷二期一九三九年三月号

十八、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摘录)

于 右 任

马先生是一个世界学者，但马先生一生，则无时无刻不为国家民族努力……。以右任受知于先生，自先生办震旦之时始，故今以文为先生寿，亦拟自震旦时代说起。

当民国前九年癸卯之岁，海上志士云集、革命救国之声，

风发泉涌，清吏为之侧目，先生则曰：“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于是遂有震旦学院之创设。我国之有新式学校，业已三四十年，其含有国家民族之意识，致力于近代科学，而不受当时殖民地教育传统思想之束缚者，实以震旦开其新纪元。然其时先生则已六十有四岁矣。桑榆之年，不自暇逸，犹勤勤恳恳，以造福于来学，则先生努力于国家民族之精神为之也。

震旦之创设也，无校舍，借徐家汇天文台偏院为之。无教员，以先生私谊，挽耶稣会诸教士义务任之。筚路蓝缕，仅具规模，然其教学之精神，与刻苦经营之成绩，实有非一般学校所能及者。故知名之士，一时纷集。而余之肄业震旦，则在民国前八年之夏季。先是，余以作诗讥时政，为清廷名捕，自开封间关走海上。困处吴仲旗先生寓中，几无以为生，先生阅报知其事，使同乡雷君祝三招余入院，且特免其学费，余遂以刘学裕之名著籍。时适在苏报案之后，文网苛密，颇有以先生此举为不利于学校者。先生独不惧，笑谓右任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于戏，广厦杜陵，望门张俭，此种爱国保士类之盛心，又岂仅右任个人所当感激图报已哉。而駸駸三十年来，自问对于国家民族，力绌心长，略无建树，此则余之所以抱惭负疚而愧对于师门者也。

震旦学院之特点，可于此附带述之，一曰尚自治。时及门诸子，既泰半为成学负志节之士，故先生除自长教务外，校中行政，一切派学生任之。其初级教科，亦由高材生转相传习。盖先生以吾国政治习于专制，国民自治能力，久已消失，欲藉此为实施民治之试验地也。二曰导门径。学院毕业，仅限二年，寻行数墨，非特为时间所不许，抑与教育成材之法不合。故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自由研究之风。彼教会学校

以教授儿童之法教授成人，实由不知心理发展之过程所致。先生此法，实当日过渡时代对症之良药也。三曰重演讲，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亦震旦一特点也。四曰习兵操，学院规制，参酌欧美研究院而定，普遍课程，不必求备。惟兵式体操，则为人人所必习，且延法国驻沪军人为教官，备置枪械，实行打靶，形式整齐。时有以此媒孽先生于当道者，当道与先生有旧交，勿置议，然而先生之用心，则深远矣。

先生以七十之年，勤劬密勿，为国家储才养士，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以自开教育独立之风气。故其人格之感化，深入人心，至震旦学院散而诸生仍相从弗去。盖普通之学校，以章程规制管理学生，而先生则的一身之道谊情感维系学生者也。及复旦公学成立，经费师资，两皆匮乏，环境困难，较震旦时代且倍蓰过之。然以先生不懈益励之精神，故复旦虽屡经波折，卒能延续其生命。犹忆民国成立之初，复旦经停顿而复开，先生语人曰，“中华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因喜不自胜。今复旦已改大学、声誉日著、人材辈出、兀然为东南学府一重镇。然则先生之学、固已展转授于青年、而显其效用于国家民族矣。先生之心，其亦可以少慰欤。……

摘自《复旦同学会会刊》1939年3月号

（八卷二期，第21—22页）

第二节 公学时期

自一九〇五年秋至一九一六年冬，是复旦公学时期。在这

短短的十一年中间，复旦公学经历了由公立到私立的变化，但始终是一所具有爱国精神和民主传统的学校。

一九〇五年秋建立的复旦公学，是一所公立的高等学堂。

马相伯与严复等人，在重建复旦公学过程中，曾经吁请清朝地方政府和各界士绅援助，根据清廷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学堂分为三种：由官府设立的名为官立；由地方绅富捐集款项、或集自公款的名为公立；由一人出资的名为私立。复旦完全符合公立规定。因此，在一九〇八年中所订《复旦公学章程》、一九一〇年填报的《江苏省宝山县公立学堂一览表》中，都自称为“公立学堂”。

在复旦公学建校过程中，原震旦学生出力很多，特别是叶景莱、于右任、邵力子等人放弃出洋机会，奔波校事。叶景莱还担任学校干事，向各方募捐，并于一九〇七年请两江总督端方奏准辅助常年经费每月银一千四百两，使学校经费有所着落。历任监督对学生比较信任，仍循震旦旧制，实行学生自治。学生中绝大多数比较自觉，校内学习风气浓厚，革命精神弥漫。同学多半富于革命思想，每周的中文作文，较多论及时局政治、实业问题。于右任在办民呼、民吁报时，往往择其优者，作为该报社论发表。当时舆论认为复旦是革命党的产生地。^①

震旦学院原来属于大学性质，复旦公学则改为高等学堂。清朝规定：京师设立大学堂，各省省城设立高等学堂，府州县设立中学堂。高等学堂处于大学堂和中学堂之间，实际上为大学的预备学校。复旦公学既受清廷资助，不得不按高等学堂章程办理，内部分为二类：一类为政法科、文科、商科大学之预备；一类为工科、理科、农科大学之预备，学制三年毕业。其时刚刚废科举、兴学堂，全国尚无中学毕业生。因此，复旦公学在高等科外，另设预科。预科学制先为二年，后改三年，一

九〇九年改预科为中学，五年毕业。

复旦公学的第一任校长（后改监督）由师生共推为马相伯先生。一九〇六年马相伯辞职，由严复继任；一九〇七年，严复辞职，由夏敬观为监督；一九〇九年夏敬观辞职，由高凤谦继任；一九一〇年高凤谦辞职，马相伯复为监督。这几任监督虽然任职不久，都因故辞职，但对办学却十分认真，他们注意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热心教育的学者担任教师。先后聘请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赵国材等担任教学或主持教务工作，教学要求严格，效果较好。

复旦公学在招收学生时，要求也比较严格。一九〇五年第一次招生，报名者五百多人，由严复、马相伯亲自主考，只录取了五十名，学生质量比较高。^②

复旦公学在教学上具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重视外语教学。除本国语文、历史、地理及伦理外，其他学科，沿习震旦之旧，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复旦校章中详述采用外语教学的理由：一、外国历史、地理的名称，如翻成汉文，“叶音贅牙，不便记忆”；二、外国科学，哲学、法律等名词，“一时势难遍译，不如径用西文，较为简便”；三、“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者，必先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四、“西籍浩繁，非赅译所能尽收”，

“况泰西科学，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末由取益，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③这些认识，与严复有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一九〇二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说：“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他批驳那种认为学习外语就不爱国的论调，说：“此其见真与儿童无以异。爱国之情，根于种性，其深浅别有所系，语言文字非其困也。”^④严复协助马相伯建立复旦公学，就进一步阐明他的主张。

其次，重视国学。校章规定：发现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由于复旦学生一般国学程度都比较好，所以上课不多，但规定学生每月要交出作文一、二篇，作为考试。^⑤

第三、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进行演说训练。校章指出：“中国行将立宪，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皆有聚众会议之事”，学生应讲求“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马相伯和一些教师，每星期都集会发表演说，规定学生在课余之暇，可以随时开会辩论，以便“习练语言，摩厉识力”。^⑥

从教学效果来看，复旦公学毕业的学生，思想比较进步，知识比较扎实、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早期学生中，有些人不待毕业便出洋留学，其中如张大椿、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曹惠群、郑蕃(桐荪)、李谦若、李兆濂、陈寅恪、竺可桢等人，这些人多数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的七年中，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五十七人。

辛亥革命以后，复旦公学经历了由公立到私立的变化。

辛亥革命一经爆发，复旦学生多数参加革命军，加上经费停发，吴淞校舍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校一度停办，复旦公学的公立阶段遂告结束。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中旬，复旦校长马相伯、教务长胡敦复等人，在无锡士绅的支持下，借惠山李汉章公祠为课堂，昭忠祠为宿舍筹备复学。由于震旦本系大学，改为复旦后，依清制降为高等学堂。这时，马相伯将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学院，拟建成为哲理、文学、政治、象数、理化各科大学。^⑦他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但因该地“接近花市，箫鼓画船，实不宜建设学校”。^⑧上课月余，被迫回沪。

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大局初定，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一时各校纷纷筹备复课，复旦则因校址无着，经费困难，束手无策。

复旦学生于右任，这时担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便与邵力子一起，将复旦情况向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汇报。孙中山以复旦为富有反抗外国压迫精神的学校，且为提倡高等教育，极为关注，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当即拨发补助金一万元。^⑧于右任、胡敦复等又向教育部申请立案，拨借校舍。当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江苏省都督庄蕴宽准借徐家汇李鸿章公祠为校舍。^⑨于右任、胡敦复、邵力子、叶藻庭等人，便在《民立报》馆二楼，设立“复旦筹办事务所”，公推马相伯为校长，聘请陈英士、沈缦云等为校董，积极筹备复校。但是，李公祠内尚驻有军队，不得已暂借爱而近路（今安庆路）为临时校址，~~先行招生~~并于五月十日开学，仍名复旦公学。^⑩八月，李公祠内驻军裁撤。九月，复旦迁入李公祠内。^⑪

复旦复学后，虽经教育部批准照大学办理，但从实际出发，乃改高等正科为大学预科，分文、理两类，学制三年，并附设中学部。

复旦校长马相伯，在江苏省都督府内，担任重要职务，不能亲理校务。其后，马相伯又应袁世凯之聘，远赴北京，出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等职。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为教务长胡敦复，庶务长叶藻庭。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经费困难。由于公费停发，学校收入全靠学费，员工薪金，难于支付，校具设备，无法维修。庶务长叶藻庭忙于筹集经费，未能及时处理学生与工友的纠纷。时值社会大变动之际，学生情绪偏激，稍有不满意，动辄罢课。复旦学生亦因此琐事，于十二月中旬罢课。对此，《民立报》发表《呜呼上海之学风》，批评复旦学生：“闻我最敬爱之上海某公学有罢课事”，“其投函中实无必须停课之理由。”

但历叙旧学生与办事人感情关系为多，即非挟嫌，亦觉小题大做”，“学生真意气用事，何尝以学业为前提哉！”^⑬

罢课以后，学校校董开会研究，认为校务涣散的主要原因，是校董会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正式组织学校董事会，聘请孙中山、陈其美、于右任、王宠惠等为校董，^⑭推举王宠惠为董事长，聘请原教务长李登辉为校长。^⑮王宠惠即召集校董陈英士、于右任、曹成父、虞和甫、郭健霄等人开会，决议学校务求学科完美，经费不足之处，由各董事共同负责。^⑯李登辉先生系归国华侨，耶鲁大学文学士。他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学术渊博，道德高尚，性格坚强，不慕荣利，矢志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为把复旦办成全国第一流大学，而终生奋斗。复旦的发展和它关系极大。

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复旦公学重新开学。三月二十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五月三日，上海学界公祭宋教仁，复旦公学派人布置灵堂，校长李登辉、教师邵力子、蒋梅笙等均在会上发言。^⑰不久，查明袁世凯是暗杀主使人，国民党人举兵讨袁，史称“二月革命”。但是这次革命迅速失败，著名国民党人均被通缉，复旦校董中多人逃亡国外，学校经费补助来源，又告断绝。

袁世凯在沪党羽，对复旦环伺侦逻，学校经济又极困难。李登辉校长一面应付袁世凯党羽的干扰，一面千方百计地开源节流。他以多招学生、提高学费来增加收入，用少聘教员、降低工资来减少支出。由于教职员中，大多是复旦旧人，或是本校毕业生，他们对学校怀有很深的感情，宁愿多做工作，少取报酬，以维持学校的生存。^⑱这样，终于使学校收支趋于平衡。挽救了陷于困境的学校。正是在这样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养成了复旦师生团结斗奋、精打细算、讲求效率的传统。

虽然经费拮据，教师待遇较低，但是所聘教师仍属一时之

选，如邵力子等人教国文，李登辉等人教英文，薛仙舟教德文，曹惠群、李松泉教物理、化学，朱葆芬教数学等。他们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学生学习刻苦，风气淳朴。整个来说，毕业生水平较高。一九一五年大学预科毕业生张薦，经美国耶鲁大学特许，插入该校本科二年级学习。当时报纸誉为留学界的“异彩”。^①

由于袁世凯阴谋称帝，复旦教师邵力子等人在课堂上借题发挥，尽情揭露，以启迪同学。复旦学生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养成谈论政治、评述时事的风气，其中华侨学生，尤其爱国。这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特点。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恨而死。当年国庆，复旦师生兴高采烈，大肆庆祝，演剧三天。^②

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共培养大学预科毕业生十五人，中学毕业生一百五十人，其中著名的有张志让、孙越崎等人。

注：

1 吴念邨（士恩）：《母校创办时期之回忆与杂谈》，见《西北通讯》1944年7月15日出版，第一卷第六期

2、余斐山：《求学时代之回忆》，见《三十年的复旦》

3、5、6一九〇五年秋《复旦公学章程》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第993页

7、1911年12月4日至6日《民立报》（广告）

8、《复旦公学始业式志盛》，1912年5月11日《民立报》

9、10、季英伯：《本校立案始末记》，1926年9月22日《复旦周刊》

11、一九二五年《复旦年鉴》第282页，《教育部批示》、《江苏都督庄咨复教育部文》。

12、《丞相祠堂作学堂——本学期之复旦公学》，1912年9月4日《民立报》

13、《嗚呼上海之学风》（东方），1912年12月16日《民立报》；

又参见《复旦公学风潮记》，1912年12月26日《时报》

14、金问洙（通尹）：《母校大事年表》，1938年10月《复旦同学会会刊》（第七卷第三期）

15、《复旦之卷土重来》，1913年1月17日《民立报》

16、《新复旦之观成》，1913年1月24日《民立报》

17、《杜鹃声里哭先生》，1913年5月3日、4日《民立报》

18、根据1913年《复旦公学章程》中所列教职员名单分析、统计。

19、《西报载留学界之异彩》，1915年11月5日《申报》

20、《三志国庆纪念之异彩》，1916年10月13日《申报》

附录： 一、复旦公学章程

一九〇五年订定

第一章 纲领及宗旨

（一）本公学由各省官绅倡捐，并牒准大府檄拨吴淞官地，择宜建校。兼借提镇行辕，先行开学。

（二）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培有用之人才，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宗旨正鹄，固如是已。

（三）除备斋本国历史、舆地、数学诸科，须用汉文外，余皆用西文教授，以〔为〕正法。论中国学校，固宜悉用汉文。今本公学定以西文教授者：一、以西国历史、舆地诸名目，虽以音传，各函意义。今若纯用汉文，传授此等名义，叶音聱牙，

不便记忆。二、以科哲法典所用名词，大抵祖希腊而祢罗马，经学界行用日久，一时势难遍译，不如径用西文，较为简便。三、英儒约翰孙有言，言语文字者，所以取一国典章，一民智慧之价值也。东西成学之士，当国之家，国文而外，鲜不旁通三四国者。况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者〕，必以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四、以西籍浩繁，非赅译所能尽收，若置不窥，于学问之道，便有所缺。又况泰西科学制造，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末由取益，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劣败之忧，甚为可惧。只此四者，已可知注重西文之断不容已，用以教授新学，为便良多。所冀他日吾国学界智术完全，则一切校塾自可用国文传习。而彼时西文，古如希腊、拉丁，今如英、法诸国，但立专科即已逮事矣。

（四）本公学英文班生，于入正斋后，任择法德文一种兼习，已习法文者，另班教授亦任择英德文一种兼习，期于文字应用，得以肆应。

（五）本公学于考取学生时，皆取文笔业已通达者。既入校后，以时日之有限，学业之多门，于讲授国文时间，不能过多。于校中多度中籍，每月杪考试国文一二篇，榜列甲乙，其每学年浏览何书，讨论何学，即由正教指示，用功涂径。庶业以专攻而精，心以致一而逸。不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六）本公学徽章，拟用金制黄玫瑰，以明黄人爱国之义。

第二章 分斋及学级

（一）本公学遵高等学堂定制，正斋（学科分二类：一、政法科、文科、商科大学之预备；一、理科、工科、农科大学

之预备。) 三年毕业。惟我国兴学未遍，程度不齐，故于正斋前另立备斋二年。正斋毕业，欲入中外各大学者听。若仍留校肄业，则入专斋。专斋大别为二、一政法、一实业。课程年限，另行规定。

第三章 学科程度

(一) 本公学正斋学科程度，及授业时间，系遵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并略参东西名校通行章程规定。

(二) 正斋第一部(政法科、文科、商科大学之预备。) 学科程度如左：

伦理学

国文

英、法文

英、法文或德文

历史

地理

数学

论理

心理

理财

法学

簿记学

体操

音乐

拉丁文

(三) 正斋第二部 (理科、工科、农科大学之预备) 学科程度如左

伦理学
国文
英文
法文
英、法文或德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地质
矿物
动物
植物
测量
图画
体操
音乐
拉丁文

(四) 正斋、备斋每星期授业时间表列如左:

第四章 学期 休假

(一) 学期以半年计，自冬假后入班至伏假，又自伏假后入班至冬假，各为一学期，积二学期为一学年。

(二) 每学期开学散学日期如左:

第一学期开学日，正月二十，散学日，小暑日。

第二学期开学日，七月初十；散学日，十二月十八。

(三) 除每星期例假外，其余假日如左：

端节、秋节各一日，国庆日、圣诞日、开校纪念日

(四) 有特别事故，须休假半日或全日者，由校长临时颁贴条示。

第五章 入学程度

(一) 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或中文优而西文差，或西文优而中文差，或于各种科学有专长者，临时亦可酌量取录。惟中文差者，须自认于毕业限内，能加意补习为合格。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

(二) 凡欲入正斋者，应有中学毕业程度，或所学科目稍有欠缺，亦可通融插班，惟须自认于毕业限内，能补习完备为合格。

(三) 凡考取者，各就其所学程度插班，不限先后资格。

(四) 凡已读西文若干年，曾学何种科学，均须于报名时，分别详细注册，以便考试时，就所学程度分班考问。

(五) 凡投考者，均须体格无亏，其品行名誉不良，取入时未及觉察者，随时察看屏斥。

(六) 报名期限、投考日期、及考取额数，均先时登报声布。

(七) 凡考入者，均须一一遵守本校规则，其有违背者，分别轻重规斥。

(八) 投考者年龄，以十五以上二十三以下为最合格。其

年稍长，而中西学术确有门径，精力能赴所定课程者，临时由校长酌定。

第六章 保证书及保证人

(一) 凡投考录取者，于开学三日前，具保证人具名之入学证书，偕同保证人投交校长。

(二) 凡居沪上商界、学界人，为考取者戚友或同乡，皆可为保证人。以能担任在校一切事务（重病、欠费、退学等）为合格。

(附) 凡旧生须一律于丙午二月内，补具保证书存校。

(三) 保证人如迁移居址，或远出者，须随时通告。

(四) 保证书式列下

复旦公学入学书证				
年	岁	省	州府	县籍
今承复旦公学允许入校肄业，一切规则愿服从遵守，如有重疾、欠费等情，概由保证人承认、照料、理楚，此据。				
学 生		住 址		
保 证 人		住 址		
		年	月	日
		刻 缴		

第七章 学额 入学应缴费

(一) 新校未成以前，学生暂不定额，以宿舍、课室能容为度。

(二) 每年学费，住宿者一百二十元，膳费、梳栉、洗衣费及床帐桌椅一切器用费在内。通学生仅在校午膳者，年七十元（另每年缴校友会费二元）。

(三) 学费于每学期到校时缴足，其交纳期限如左：

上学期六十元 交纳定日：正月十八至二十五日

下学期六十元 交纳定日：七月初八至十五日

(四) 凡过交纳定日未交学费者，由校长酌办。逾期一月未交者辞退，仍向保证人收应缴费。

(五) 凡中途自行退学，及犯规休学者，学费概不归还。

(六) 凡书籍纸笔上课必需品，由校购备，各生照原价备款购取。

第八章 考试升班及毕业

(一) 除每月抄考试国文外，每年于上学期之末，考试一次，为学期考试。下学期之末，考试一次，为学年考试（考校不宜过数，盖每考学生例须温业，考后又须稍停，各教员阅卷，皆废业揭时之事）。若届某书或某学科教授完毕时，得由本班教习随时定期考验，为临时考试。

(二) 各科学期考试，以上学期日课分数，与临时考得分数，相并折中合算，为该科之学期分数。

(三) 各科学年考试，以下学期日课分数，与临时考得分数，相并折中合算，为该科之学年分数。

(四) 各科学期分数，并合除算为学期平均分数，学年分数，并合除算为学年平均分数。

(五) 上下学期品行分数，体操分数，分别并入学期、学年平均分数，为学期总分数，学年总分数。

(六) 凡学期考试，除最下等者休学外，余仍俟下学期入原班肄业，学年考试后再定升降。

(七) 凡评定分数，均以一百分为极则，学年总分数在六十分以上者，方得升级（一学年为一级）。

(八) 凡未能升级者，下学年仍重习该学级之学科。

(九) 凡不与学期考试及学年考试者，不给分数，惟实届时有病，或不得已之事故者，得于下学期、下学年开学五日前补考。

(十) 凡卒业，考试总分数以七十分以上为合格。

(十一) 凡备斋修业及格，给与凭单，为升入正斋之据。正斋卒业，另给证书，愿留校者，升入专门。其中途自行辍业者，概不给凭。

(十二) 凡未及卒业，为各省选派出洋，或延充教员，及考入专门学校者，给与相当修业证书。

(十三) 凡卒业优等生，随时体察其材性之所近，介绍游学。俟经费稍充，即由公学酌量备费，分送泰西留学，以期大成。

第九章 告 假

(一) 平时不得告假，有特别事故，无论久暂，必诣校长或校长所委托之校员，陈明事由，掣取假单，以名牌交司门登

簿，归校后取牌销假。

(二) 凡因疾病告假者，其久暂皆须随时取校医允单，呈请登簿。

(三) 星期外出，晚必归校，家近归宿及有特别事故不及回校者，须于翌晨上课前到校声明登簿。

(四) 紧要家事，离校数月复回者。不得仍请更就原班肄业，应由总教习察度位置。

第十章 惩戒 退学 除名

(一) 凡故意违背规则，妨害校内风教者。及怠惰无行，丧失学生之资格者，酌量轻重惩戒。

(二) 惩戒分私戒（屏左右而戒之），公诫（当公众而戒之），除名三等。

(三) 因疾病或他种事故，自愿退学者，须由保证人署名，出具退学愿书存校。

(四) 凡除名者，皆详记其事由备查。校外仍不宣布，以期终悔。

(五) 凡除名及退学者，所借受公用图籍及操衣帽等，均须一律缴还。

(六) 除因品行不良除名外，其他应除名事由如左：

(一) 无端屡次不上课者（病不上课者须呈校医允单于校长）。

(二) 未纳学费至一月以外者。

(三) 逾二学年未能升级者。

(四) 学力劣等，又不能潜心领受者。

(五) 一学年中，学期、学年考试皆规避者。

第十一章 课堂规则

(一) 上下课堂鸣钟为号，先教员入，后教员出，须有秩序。

(二) 教员就座、离座均起立表敬意。

(三) 上课勿淆乱声浪，唾涕不声扬，承以巾。

(四) 上课前，预备应用书物，非应用者，勿携入。

(五) 上课时，不得分心他事，及私语匿笑。

(六) 教员发问，须挨次自答，不得藉他人助力。

(七) 有疑难须解析者，应起立向教员致问，他人不得搀言。

(八) 上课时间内，即有戚友来访，不得出外招待。

(九) 每班公举课长本副各一，掌画到簿及课堂日志、收发讲义课作，每学期一更举。

(十) 教授用具，非教员允许，勿擅动。

(十一) 黑板不得任意涂写。

第十二章 自修室规则

(一) 自修时，无故不离座，不站立他人案前，并无端至他自修室。

(二) 他人书物及桌屉，非特许，勿擅动。

- (三) 自修桌上，书件必以时整理齐楚。
- (四) 勿游戏、谈笑、饮食及吸烟。
- (五) 戚友来访，须至应接室晤谈。

第十三章 宿舍规则

- (一) 每晨六时鸣铃即起（冬至前后一月，六时半鸣铃）。鸣铃后四十分内，不论校内外寄宿生，须一律至自修室。
- (二) 每晚十时，鸣铃归寝，在宿舍勿喧哗。
- (三) 每室酌量置灯，每日轮一人于寝时照料吹熄，不得自行添燃。
- (四) 应用书物，均预检齐备带，日间非有特别事故，勿归舍。
- (五) 衣物卧具，必须整洁，并检点妨害卫生之物。
- (六) 各室自晨至就寝前，皆下键。有要事，须至庶务员处领匙。
- (七) 银钱等物，交会计处代存，以免意外遗失。
- (八) 榻位均预排定，不得任意迁徙。
- (九) 每室公举舍长一人，监视宿舍一切秩序。

第十四章 膳厅规则

- (一) 将食鸣铃，每桌坐满始举箸。
- (二) 当食须从容，以期有益卫生，食毕以次散，勿凌乱。

(三) 食品或烹饪失宜，应暂容忍，一面告庶务员，飭令改良，勿自行添换，及临时喧责。

(四) 当食勿高声谈笑，食弃物委诸承盘。

(五) 校员、校生在堂同食，均自添饭。

(六) 有病不能赴膳厅者，须先通告庶务员，以便飭役送膳。但能赴膳厅者，不在此例。

第十五章 体操场规则

(一) 鸣铃第一次预备操衣操具，第二次入场。

(二) 队长由体操教员指派。

(三) 每日体操，皆由教员统记分数，不得无端旷操。

(四) 患病得免操，必缴验校医凭单于本队长（猝病由舍长验明报告）。

(五) 操时不得谈笑、四顾、擅自出队。

(六) 凡枪件等，皆须随时整理洁净，各有本职，勿怠废。

(七) 操衣靴帽，务一律整齐。

(八) 运动游戏，皆须逐渐练习，可别设体育研究部，规则一切，仍应请校长阅定。

第十六章 演说规则

(一) 每星期或星期六下午开演说会，校长及校员、教员登堂演说。

(二) 非星期日，有特别事应讨论者，于课暇开谈话会。

(三) 中国将行立宪，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皆有聚集会议之事，其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诸生允宜亟讲。故于演说会外，诸生可于暇时随时开议，推举首座书记，其问题古今间立，以凭论决。自会合、举员，至于出占、决胜，勒为成规，以便习练语言，摩厉识力。并由校长、教员及教员分期监视。

第十七章 游息规则

(一) 饭后必游息半小时，余依日替长短定之。

(二) 非时不任意闲游。

(三) 公备游戏器具，须共珍惜。

(四) 禁不规则之游戏，及不应至之地游行。

(五) 列队旅行，须经校长及体操教员定其时期与地界。

第十八章 杂 诫

(一) 公用器具，各有定所，不得任意搬动。

(二) 阅报，不得出阅报室。

(三) 在校梳栉、洗浴、溲便、一切均须格外注意，以重公德。

(四) 平时衣服冠履，必整洁朴雅（倘来时有西装者，须逐渐改换）。

(五) 仆役有过失，应告庶务员，戒饬处置。如有要事差遣出校，亦须先行通告庶务员酌定。

(六) 一切时习不得沾染，由校长、教员、教员随时察视。有所规戒，宜即渐改。

(七) 全堂各宜互相敬爱，不得有猜忌、交恶诸失德。

(八) 光阴可惜，来日大难，来学者均宜各自振奋，沈毅用壮，期任艰巨。

(九) 吾国学子，往往多攻苦而不知卫生。以后，膳毕即伏案，及深夜勤读等习，各宜互戒，务剂其平。

(十) 凡公益事，不得以私意挠阻。

(十一) 诸生有须在校创举之事，须详叙原委，妥定规则，呈交校长阅定，始能举行。

(十二) 校长、教员、教员随时以理规诫，须一律遵守，不得以章程未载，辄生违抗。

(十三) 凡来学者，均有扶助本公学增进荣誉之责任，一切未能即求完善处，亦须相与容忍，共矢改良。

第十九章 余 列

(一) 此章以本年起次第施行，以新校建成为完全实行之期限。有所增改，随时条布。

(二) 校务职任规则、奖励规则、校友会规则、均陆续刊布。

(三) 本公学时当草创，一切章程办法，多未完善。海内外热心教育诸君子，幸乞时时指正规责，俾知修改。

二、一九〇五年《复旦公学考取新生全案》

沈孝儒（仲朴）、孙复民（成伯）、童晏球（洲伯）、李涛、金问洙、何廷秀（文焕）、金问泗、徐佩璜、金问源、郁挺、帅勤、蒋肇英、张文木、陈翼、徐鼎臣、朱鹤皋、陈致谦、龚震盘、陈寿筠、黄锐、金志瀛、吴训腾、沈熊、陆兆鹦、林崧盘、曹承履、钟养斋、吴旭初、卢武、郑键、郭文、舒家鷗、偃迪周、李苏同、张鲁修、黄颐、徐鼎、盛世幹、扬思忍、彭隽士、周振宣、彭魁士（佩青）、伍正钧（特公）、沈鸿照、侯震吉、李方恒、沈文杰、陆汝同、朱鹤翔、蒋恩钧。附白本公校因校外寄宿舍尚未收拾完竣，故展期初六开学。新取诸生请于今日起至本学事务所领取凭单，亲至大马路荣昌祥量度操衣操靴尺寸，并定初四、初五上午八点钟起十点钟止派人在车站招待赴淞，逾期不收。

张园北爱文牛路本公学事务所白

摘自《时报》一九〇五年农历七月念九日（阳历九月八日）

三、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摺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奏为筹拨复旦公学常经费，谨将办理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窃维各种科学，以欧美为至精，游学之士，以能直接听讲为至要。查上海复旦公学，自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开校，系考取中学较深之学生，以英文教授高等普通科学，使能直入欧洲专门大学为宗旨。经前署督臣周馥拨银壹万两以为开办经费。本年二月，该公学干事员叶景莱、张桂辛等禀称，开校以来学者日众。藉收学费，勉力支持。惟各科皆用西文教授，教员薪

水岁需贰万数千圆。伙食杂用，亦近贰万圆之谱。除收膳学费外，尚不敷贰万数千圆。而甲班教习亟须添聘西人尚未列入预算表内，稟请拨给常经费等情。当由臣派江苏候补道夏敬观，会同宁学司所派课员桂植，前往该校逐件详查。兹据覆称连日在该公学参观教授考验所用课本，皆系英文，取径直捷，成就高尚。实为现在言高等教育者惟一之办法。学生共一百七十五人，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班，戊班又分甲乙级。所授科学，有已过高等普通程度者。惟教习未能延聘西人，学科不能极臻完备。又专以英文程度为高下，各班科学，致不能齐。是须详审教科，严定班次，添聘教习，大加整理。膳学两费，每月约收洋壹千七百五十元。绅商捐助无多，经费不敷甚巨。倘蒙岁给官款贰万两，则可增延西员，广招学生。庶成立一完全学校。其校舍系假用提督署，管理卫生皆不合法。前在吴淞口拨给官地，若兴工建筑，约需洋拾万圆等语。伏查往岁各省派遣学生游学欧美，大半先在校外预备英文，耗费财力，殊属可惜。若使英文全通，高等普通毕业，再行送往欧美，直入专门大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该公学开校两年，办理尚为合法，据呈各班教科所用书目，皆系英文课本，若再改良进步，成绩必有可观。查有候选道严复，淹贯中西，学识闳达，已派充该公学监督，管理教授，一切由其主持。现在江南财政，支绌异常，建筑校舍，力有未逮，至于常经费，为养成游学人才起见，不能不勉筹的款，力任其难。已饬财政局每月筹拨银壹千四百两，作正开销。仍当由臣随时督饬，认真办理，以期日起有功，无负圣朝兴学育材之至意。除咨明度支部、学部查照外，所有筹拨复旦公学常经费缘由，谨会同江苏巡抚臣陈夔龙，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四、复旦最早的学生会主席叶景莱

胡 国 枢

复旦最早的学生会主席称为学长。他的名字叫叶景莱，字仲裕，浙江杭州人，生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他先在上海震旦学院读书，深得该院负责人马相伯的器重。震旦学院是借耶稣会名义设在徐家汇老天文台内，所以屡遭天主教的压迫。马相伯领导进步学生进行抵制与斗争。叶景莱、于右任、邵力子等都是这场斗争中的学生积极分子。由于教会当权者有帝国主义作靠山，蛮横霸道，不可理喻，马相伯等只好脱离震旦，于1905年另创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复旦公学在马相伯的领导下，实施“民主管理”，推行“学生自治”。叶景莱被推为学长，是直接参与学校行政管理的学生代表。

复旦公学初办时，虽然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但是经济拮据，财力不足。叶景莱曾代表学校四出呼吁，向人筹款。复旦成立后的第二年，他冒着炎热到南京、扬州、淮阴等地奔走累月，募得一笔款项，才使复旦能够继续维持，度过困难，为我国教育界树立了一面反帝斗争的胜利旗帜。

1906年，叶景莱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积极从事反清活动。他与光复会会员沈颀民等发起组织浙江旅沪学会，后又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国是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他还被推为浙江的国会赴京请愿代表。回到浙江后，他创办了《全浙公报》，还兼任杭州安定中学（杭州最早的中学之一）监督。

1909年，叶景莱投入浙江保路运动的斗争，坚决反对清朝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路权。但是这一群众性的爱国运动，不

久为立宪派所控制，运动不能顺利开展。叶景莱对此十分愤懑，以致积忧成疾。病稍愈后，他由上海去河南郑州探望父亲。途经镇江时，他对船员高谈保路运动发展情形，情绪激昂愤慨。就在这个深夜，他竟投江自尽，以身殉路，年仅二十九岁。

（本文作者为复旦校友）。

摘自1982年2月22日《复旦》，新编66期

五、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记

喻 衡

复旦公学初假吴淞提督行辕为校址，自光绪乙巳（1905）至辛亥革命（1911）共历六年半。辛亥后学校一度中辍，校舍大部毁于兵火。三十年代，同济大学附中曾就其遗址改建为校舍，已非旧貌。由于无原始照片资料，缺乏详尽的文字记述，故吴淞时期校舍面目已罕为人知。1944年西北校友会吴念劬老校友曾在《西北通讯》第一卷第六期上刊登过母校吴淞时期校舍的示意图；1980年《复旦》纪念建校七十五周年特刊上，也曾刊登过笔者根据该图改绘之《初创时期的复旦校舍》，二者虽可给大家提供一点粗略印象，但并未做到准确地再现原貌。

最近，在大举征集校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件与吴淞校舍旧提督行辕有关的具体资料：

一、《复旦公学一九一〇年下学期一览表》，记载了当时“就旧行辕房屋改修”成的房屋间数，计有讲堂8间，寝室大小21间，盥洗室4间，浴室2间，理发室1间，教职员司事仆役寝室大小11间，阅报室1间，理化室大小3间，会客室1间，厨房1间，储藏室2间，调养室1间，厕所4处。据此，可知房屋总数当不少于60间。

二、金通尹：《三十年前之复旦》（1937年5月5日《复旦

大学校友节特刊》），该文第一段《提督衙门》叙述了屋舍规模：

“当时的校舍，是一个提督衙门。门前一通照墙，两个旗杆，东西两辕门。进了仪门，是一个石板甬道，直前拾级而上，为平台，便到大堂，那时用做礼堂，也就是饭堂。两庑有二三十间平屋，遥夹甬道，东西相向，做课堂、宿舍、办公室。大堂里面，前后有三进平屋，正中后进六七间，是校长室、教职员宿舍，其余都是课堂及学生宿舍。有一个化学实验室。另外搭了几间板屋，做浴室、厕所、盥洗处就在各宿舍的前廊”。

据金氏的记述，可估计出当时校舍总数与《复旦公学档案》所载之数字基本相符。而《西北通讯·示意图》作者说当时仅有二、三十间房屋，显然不确。

金氏还简叙了校外租赁民房为学生宿舍的情况，以及卅年后他所见到的吴淞行辕遗迹：

“里面学生宿舍不够住，又跨过照墙前的淞沪铁道租了怀远里的几个石库门三间两厢房屋和几间沿滨市房，做校外宿舍。宿舍东面空地做操场。现在的同济中学就是这个校舍的故址，遗迹存留只有大堂和平台的一部分，及他们用作女生宿舍的几间房屋。

三、毛经学《赴淞摄取校史纪念片记》（1937年5月号《复旦同学会刊》第六卷第七、八期），该文详述1937年4月28日下午记者与金通尹、刘伯年、杨玉成同往吴淞同济附中访问母校吴淞故址情况：

“……淞站下车后，先往南访宿舍，记者与通尹对校外宿舍所在依稀想象，未能确切辨认，……继越轨而北，入同济附中，该校屋宇，盖就母校吴淞故址改建者，……左边旧教室前后两排，为以原校大礼堂（即前清提镇行辕）

中加隔断辟成者，后埭平房，现为该校女生宿舍，乃母校创办时之课室也。……乃由杨君摄影二幅：一幅为礼堂西侧面，一幅为课堂正面，其东首短垣之外，系公共体育场，即旧日之操场也。今皆改观矣。”……“出同济，再往路南，觅校外宿舍故址，记者与通尹追忆宿舍位置，在旧校舍照墙东南，今照墙无有，而同济偏东面南短垣中，尚有大门在焉。仍依此方向由车站南行，入街市，折入东首里巷中，向南转，出协业里，里临小浜，审视之下，……确系当年怀远里之校外宿舍也。……”

上述档案实录、专题回忆、现场勘查材料和照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吴淞时期复旦校舍的风貌。另外，还查到了一份《松江府志·图经》所附《提督署图》，据该书《武备志》：“江苏全省提督军门……同治十年重建官署，仍驻松江城，管全省水陆军务”，可见吴淞行辕乃江苏提督军门设在吴淞要塞附近的下属军务衙门，其规模体制自不及松江督署，但格局当大同小异。上述各项资料，为笔者重绘《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提供了下列各项可靠依据：

第一，各材料中有关总布局的描叙基本一致。

金通尹回忆吴淞行辕的格局如照壁、旗杆、仪门、甬道、平台、大堂、两庑及后堂、内廊等，与松江提督署平面图对照大致相符，唯前者只有“仪门”而无“头门”，也可见规格较低。又据金通尹的回忆后堂为三进，而杨玉成摄影时残存之大堂后檐与川堂前檐相连成双脊结构，据此可以确认此与大堂相连的川堂也可作为一进，故其后面只有二堂与后进了。这样与金氏“大堂后面有三进”之说并不矛盾。

第二，旧行署房屋的总布局是东西两边对称式的。

金氏谓“两庑有二三十间平房，”当系指自仪门至后廊两侧厢房总数而言。细审杨氏《卅年前复旦课堂正面》图片，乃

摄自二堂东侧之耳房，有漏窗花墙将二堂与耳房隔开，别为院落。从画面门窗柱头位置，可推知课堂（耳房）应为四间。按我民族古建筑传统格局，大都是对称均衡的。则二堂之西半侧亦应为耳房四间。

同样根据杨氏图片分析，上述耳房前有一角天井，中间为圆形花坛，周以小径，外镶直角，其东北直角之东边缘与耳房走廊垂直，与花墙平行，画面右角有一掠衣竿状向前撑出，可知面对花墙必有与耳房垂直的厢房。此亦可从杨氏摄影角度及其立足点来衡量，因杨氏立足点当在与耳房走厢等高之偏北位置上，视线适中。故无疑此处有东厢房，照片即在其走廊上所摄。并可推知此厢房当不少于五间。同样理由，二堂西半边之庭院厢房也应和此东半部基本一致。又据毛经学所述：“（课堂）东首短垣之外系公共体育场，即旧之操场也”，则在耳房与东厢两头之间，应有一段短墙相接，有门通往操场。

第三，大堂东西两山墙之下，有短墙与内廊相隔。

按杨氏照片（二），为吴淞时代大礼堂（即行辕大堂）西侧面，有约高二米之院墙与该屋之山墙相接，没有耳房。则大礼堂东侧当然也是相称的格局，同样为短墙。

第四，房屋造型并非大屋顶。

杨氏照片（一）（二）所示，均为普通硬山结构。而旧作“示意图”均画成堆山大屋顶，是不正确的。又照壁应为一字式，无石狮，旧作“示意图”画成八字照壁，石狮一对，也不合实际情况，应予改正。

旧官署祠宇建筑的硬山结构，屋顶正脊和垂脊都很高大，且有兽头鸱吻及砖刻或灰塑装饰，江南官署祠堂的大脊设计尤为丰富多采，而杨氏照片上正脊很简陋，甚至无垂脊，很可能是劫后重建时节省经费面大加简化了。在《复原图》上当然要按应有造型绘制。

总之，根据以上各点的理解所重绘的《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是较为接近实际情况的，基本上可再现公学时期校舍的面貌。在我们热烈庆祝复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展示学校草创时的校舍图景，对于今天生活、学习在高楼摩天、鲜花簇锦的新复旦园中的天之骄子们来说，或者可以启迪他们饮水思源，鼓励他们为祖国四化建设而艰苦学习的进取之心吧？

六、复旦学院(广告)

复旦学院前因讲舍、操场为吴淞民军借用辍课，业经匝月。但分阴宜惜，米日方长，国民负担正多，实学尤应研究。兹幸锡金乡达慨借惠山李公祠及昭忠祠。昭忠祠为课宿之所，地带太湖，距无锡车站六七里许，一苇可杭，风景清幽，尘飞不到。同人等拟仿鹿洞、白鹅之遗轨，推而广之，为哲理、文学、政法、象数、理化各科大学，旁及制造、驾驶等门，惟兹事体大，端赖先达扶翌，同志应求。凡海内高材，愿来讲学者，与之探讨，窃欣慕焉。爰定十月二十四日(抄者按：此为农历)开课。旧生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莅院。新生于二十日后来无锡惠山本院，或上海沪宁车站对门庆祥里东二弄底本院事务所报考。随带报名费五元，新生学膳宿费年内共收十六元，于入院时一律交清。马相伯、胡敦复同启。

摘自《民立报》1911年12月4日、5日、6日广告

七、复旦职员之热忱

复旦公学(现改名学院，以复旧称)前于吴淞光复时，校中全体首表欢迎，即将校舍、操场借与吴淞军政分府驻扎，现因停课日久，有荒学生学业，拟即日迁至无锡惠山李公祠开学。

该校自金陵负隅以来，所有补助经费丝毫不著，现校中各职员均愿尽义务，力任其难，并拟设法扩充，以（不）负当年缔造之艰难云。

摘自《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第十三册第五页）

八、复旦同学公鉴(广告)

国命更新，兴学是亟。复旦为吾辈昔弦诵之地，自遭丧乱，横舍〔按：横应为簧之误〕寂然。同人等不忍坐视沦替，起而谋所以振董之者，已呈请教育部立案，继续开办。现议定假民立报馆二层楼上为复旦筹办事务所，此后一切手续，凡我同学，如有卓见，望惠函示知，或移玉面商，以便共策进行，是所至禱。

复旦筹办事务所谨启

摘自《民立报》1912年3月16、17、18日广告

九、复旦公学招生广告

本公学业经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校舍已奉苏都督令准借徐家汇李公祠开办，兹以该祠尚驻有兵队，暂租定本埠爱而近路第三号，先行开课。学科，先办中学及补习科，俟经费充裕再开大学专科。教员已延请欧美专科毕业诸子胡敦复、沈步洲、陈警康、郑桐生、朱炎之等分科教授，务求各项科目咸臻完善。开学（日）期，订定五月十号。入学程度，以国文清通为合格。考期，自四月念五日至五月五号在本校报名投考。学费，每半年二十四元，入学时须预交，本学期只收半费。膳宿费，本学期收十八元，远地士子不便通学者，可寄宿校中，入校后向寄宿舍帐房接洽可也。校书马相伯启。

原载《民立报》1912年4月20日，21日，22日，
23日，24日，26日，27日，28日，29日。

十、复旦公学始业式志盛

吴淞复旦公学，自去年秋冬之间，其校舍为军士占据，随即散学后，由校长等设法迁往无锡李公祠开校，又以该处接近花市，箫鼓画船不宜建设学校，直至今年四月初，始由复旦旧同学叶君藻庭，邵君仲辉等五六人设立筹办处，著手布置，始在本埠爱而近路赁得民房一所为校舍，报名录取之学生约百人，又订聘复旦旧同学中留学欧美毕业回国分任教科，昨为其开校之期，记者亦与其盛焉。

昨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开会，由叶君藻庭司秩序，先行开校礼，次由校长马相伯先生报告，并演说于民国建立之急须趋重教育，理由阐发无遗。又及此次各军队行动之比较，亦以教育与否而判其文野，尤极痛切。终谓复旦开办已十载，初由震旦更名，即有希望光复之意，今幸达目的，益当名付其实，以为吾民国光华云云。次由校董陈英士君代表汤君济沧及来宾柳君人环演说。继由代理教务长君沈步洲宣布教课大纲，略谓教育有二，一人才教育，一国民教育。复旦即取人材教育主义，但现在仍不更名大学者，因大学二字，国内尚无比较之准绳，必与外国之大学相比较，复旦学期原定六年毕业，一切授课程序，必期毕业后可直接至欧洲各大学听讲，他时课业日进完全为大学之课程，然后改为复旦大学，亦未为迟也。若以近日社会一般好高之心理，急急易以名称，谓足以款来学者之意思，则非本校所敢出此也，后又教员汪君汝舟演说，谓革命未成之先，与革命已成之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皆有不同。革命未成，为学生者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又欲关心国事，故恒不能专一。

革命既成，则专为造就建设人材，为学生者，亦得一心一志向业云云。礼成遂散会。

原载《民立报》1912年5月11日

十一、复旦公学招生(广告)

大学预科授英文、德、法文、史学、数学、理化、政治等科。补习科授国文、英文、数学、地理、历史等科。学费每学期念四元，宿膳三十六元。报考，阳历十五、念三、念八等日，在本公学报名考验。开学，九月四日。详章，向本公学取阅。校址，暂在本埠爱而近路三号，俟开学时移入徐家汇李公祠，再行登报通告。校长马相伯。

原载1912年7月3日《民立报》

十二、丞相祠堂作学堂——本学期之复旦公学

复旦公学自假吴淞前清提辕为校舍，开办有年，成绩卓著。去秋光复军起，校舍改作吴淞军司令部，仓卒腾挪，损失颇多。今岁上学期暂租爱而近路三号房屋开办，光线黑暗，租费昂贵，种种不便，而吴淞旧地仍须改作江防司令部，因于三月间稟准苏都督以徐家汇李公祠拨作校舍，并经苏都督令知上海民政长在案。该祠驻有二十三师某营，现师长黄膺白君自请取消裁并。又知复旦开学在即，飭该营于上月底一律迁移，复旦本学期能在该祠开办，不能不感谢苏都督与黄师长之热心兴学也。惟闻该祠迭经军队驻扎，房屋颇有损坏，所存器具，亦遗失甚多，现由该校庶务长向该营长取有移交清单，并先面陈上海民政长，以保学校信用。日内并雇匠修缮一切，故原定今日开学，

现已展期至八号矣！

摘自1912年9月4日《民立报》第十页

十三、复旦公学开学记

复旦公学稟准苏都督拨徐汇李公祠为校舍，本学期即在该祠开办，仍先办大学预科及补习科。昨午后二时行开学礼，学生已达二百数十人。首由教务长胡敦复君报告该校宗旨及教科概略（校长马君湘伯赴京未归），大旨以循名核实，不汲汲改称大学，及安科分班，务求学生习一科造一科之深邃。并谓预科三年，补习科三年。较前清中学五年，高等三年，其时间短而学科更期精进。胡君前主持清华学校教务，力主按科分班，以权限不专，未行其志。至今清华学生犹追思之。现主持复旦教务，必能发挥此特色也。次校董于右任君演说，叙述复旦前次艰难缔造之历史，并言复旦命名，即含有光复祖国之意。今幸达此目的，益当勉力学问，以发扬祖国之光。终言董事会亟当扩充，其拳拳之意，溢于言外。又次教员沈步洲君演说，以爱公学，爱教师，爱同学为劝勉，而就公德心及学问各方而切实发挥，淋漓尽致。又次来宾邵仲辉君演说，引中山先生在京演词，昔为破坏时代，今为建设时代，破坏需学问少，建设需学问多数语，推阐其义，并自述前此求学困难失败之状况及前清学校腐败诸弊，以证此后求建设学问之不可不刻苦奋勉，时时以新民国为念，语亦深切动人。又次由庶务长叶藻庭君报告捐款及拨借校舍诸君之热心，表示感谢之意，并盼来宾此后益尽力辅助云，礼毕摄影散会。

·原刊《民立报》1912年9月9日第十页。

十四、复旦公学风潮记

窃惟国之兴替，惟学是占；学之盛衰，惟校是视；而校之良否，又胥赖乎职员之优劣焉。嗟乎人之无良，累及全邦；校之不善，学术沦亡。是则敝校庶务叶氏之罪恶有诛不胜诛，而同人等有不得不泣陈于我邦君子左右者也。复旦以公学之性质，抱培植之志愿，虽经费时或竭缺，而士大夫力为维持，校舍之奠，董事会之处心积虑以谋扩充，盖十余年矣。叶氏何人，乃欲败诸一旦耶。彼叶氏藻庭者，旧时校中三年级生耳。蚤贼其心，谗谄其性，年未及壮，无经验之可言；学不入门，何校务之得知？徒以媚颜，致滥斯职。任事以来，擅作威福，藉校长之声援，揽大权于一握。上而教员，下而役夫，无不凌虐及之；内而校务，外而董职，无不参预及之。以教务杨君之不己知也，推而去之；学生吴氏（稼农）之苟同也，引而进之。侵书肆数成之价，实私囊累百之多。从兹而谆谆善诱之良师，蹇裳以去；空空无有之劣辈，连袂而来，而校务遂不堪问矣！而风潮即由是起焉！去岁春间，罢课三日，叶氏被斥去，众怒暂息。孰意彼狡猾其性者，竟敢于开学之先，用校长之名义，诬学生以劣绩，告其父兄曰拘、曰处，而此数十含冤莫白之学生，遂尔革除矣，遂而失学矣。嗟乎，邦人君子是非大背培植之初心耶，是非以庶务而侵及校长之全权耶。幸也得胡君敦复之主持，教务大理，岌岌向学之士子熙攘以来。初不知叶氏之习与性成，而怙恶不悛如故也。今春以来，各校纷开，复旦缺款，几至解散。幸我邦君子悯兹十载艰辛，败将一旦，爰尽义务，共谋重视。而此贪婪无餍之叶氏，又得以安享其成。方其入校之初，同人等犹改过之斯望，修德之斯祝，而孰知其且有更甚者耶。美宿舍商设之名，自渔其利；藉公事外出之说，月不数

来。学生收否，惟权是操。偶遇戒警，惟詈是肆。或梗阻教务，或私送公物。器具之缺腐，置之不理。失慎或传耗，一顾不施。同人等念邦君子之热忱规复，惧叶藻庭之颠复伟业，每思有以详陈于邦君子之前，而尚未发也。庸詎知役夫侮辱学生之事以起，彼罪大恶极之叶氏，既不管理于前，复行放纵于后。当往诘问，则不在校。及其归也，又不加罚。嗟乎邦君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是可留也，孰不可留。嗟乎，邦君子同人等守父兄之诏，为求学之策，韶华易去，转瞬白头。心非木石，孰不知之，因旷课而时光虚度，存愤懑而学识难增。顾出此下策者，诚念邦君子维持复旦之诚意，而欲为邦君子之前驱，以逐此复旦之蠹贼，故宁牺牲目前之利，以求永久之益也。嗟乎，邦君子校之不昌，学将沦亡，学之不讲，累及全邦。校之将昌，先除不良，同人等谨戮力同心，歼兹不良。嗟乎邦君子其有以指导之用，得昌兹复旦，昌及学术，昌及同邦则幸甚！幸甚！

复旦公学全体学生公启

摘自《时报》，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十二月廿六日

十五、复旦之卷土重来

复旦公学创办十年，成绩昭著，去年年底小有风潮，以致暂时停课，闻日前各校董集议办法，金以校务涣散，为董事会未经实行成立之故。惟此会为主持校务重要机关，而会长尤必有洞明中外学术，热心教育前途者方克胜任。即当举定王亮畴（宠惠）先生担任斯席，并议请李登辉先生重主校务，不日即可招生开学矣。

原载《民立报》1913年1月17日。

十六、新复旦之观成

复旦公学昨由董事长王亮畴先生召集第二次董事会议于环球中国学生会。到会者于右任、陈英士、曹成父、虞和甫、郭健霄诸君暨校长李登辉先生。当议决三事：（一）修改校章，由校长起草后送交董事长核定后，再请各董事会决。一面登报招考新生，定于三月一日（旧历正月二十四日）开学。（二）认筹经费于开学前编定预算，不足之数由各董事共同担任，务求学科完美，不因经费竭蹶，致有因陋就简之弊。（三）董事会中推举财政主任一人，凡校中出入总项均由主任负其全责，每月按照预算定额，由校长签字交会计员具领。其余又议定教科分配等事不具录。

原载《民立报》1913年1月24日。

十七、复旦公学招生(广告)

本公学现已议定办法，按照教育部定章，定三月一日（即阴历正月廿四日）赓续开学。先设大学预科一级，中学四级，添招新班。以国文通顺，有相当之学力者，均可分别插入。学费：每半年寄宿生六十元，通学生三十元，入学前预缴，新生即日起先行报名，定于二月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阴历正月十一、十六、二十日）在本校考试。预缴试验费二元，录取者于学费内扣算，不取者发还，旧生留校者另有函通告各生家属。新旧生于入学前一律填具志愿书。开学定三月一日（阴历正月廿四日）校址在徐家汇李公祠内。特此通告。董事长王宠惠，校长李登辉同启。

原载《民立报》1913年1月26日、27日、28日、29日、31日。

十八、复旦公学章程

一九一三年订定

第一章 纲领及宗旨

(一) 本公学以研求学术，造就专科人才为宗旨。

(二) 本公学业经呈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先设大学预备科及中学科。

(三) 大学预备科，学程三年，毕业后入大学。中学科学程四年，毕业后入大学预备科。

第二章 学科程度

(一) 本校各班课程，系按照进步等差，预行编定。学生于入校之时，由教务长及各教员察看程度，分别插班，所编定各学科，学生不得随性所好要请纷更。

中学科教授科目及授业时间表

中学一年级	每周钟点
(1) 国文	八
(2) 英文字母起至读本第一号	五
(3) 习字上学期	
默书下学期	五
(4) 翻释 Translation	五

(5) 算术	五
(6) 体操	三
合计	三一
中学二年级	每周钟点
(1) 国文	八
(2) 读本第 ^二 / _三 Readers { 1st term II 2nd term III	五
(3) 默书 Dictation	三
(4) 翻译 Translation	三
(5) 文法 Newsom's Grammar { 1st term to Voice 2nd term complet	三
(6) 代数 Algebra	五
(7) 世界地理 Geography of the World { 1st term Asia { 2nd term complete	二
(8) 体操	三
合计	三三
中学三年级	每周钟点
(1) 读本 { 1st term Literature Reader no. 4 2nd term Literature Reader no. 5	五
(2) 国文	四
(3) 文法 Mother Tongue { 1st term including relative Pronoun { 2nd term complete	三
(4) 几何平面 Plane Geometry	四
(5) 地文 Physical Geography { 1st term to part IV 2nd term complete	三
(6) 生理卫生学 Physiology and Hygiene	

	{1st term chap. VI {2nd term complete	三
	(7) 历史Renouf's General History	
	{1st term Ancient History including Persia and Greeks {2nd term Ancient Rome and Middle Ages	三
	(8) 缀句 Sentence-making	二
	(9) 体操	三
	合计	三十
中学四年级		每周钟点
	(1) 国文	四
	(2) 英文说部Fiction	五
	(3) 修词学Rhetoric	三
	(4) 历史 {1st term to chap. XXXII {2nd term complete	三
	(5) 几何 (立体) {1st term Solid Geometry 平三角 {2nd term Plane Trigonometry	四
	(6) 物理Physics (general)	四
	(7) 作论Composition (Reproduction)	二
	(8) 体操	三
	合计	二八

大学预科教授科目及授业时间表

预科第一年		每周钟点
	(1) 国文	四
	(2) 英文文学Essay (Selections from standard authors)	三
	(3) 名学Logic {1st term chap. III {2nd term complete	二
	(4) 理财Economics {1st term chap. XVII {2nd term complete	三
	(5) 化学Chemistry	三

(6) 弧三角 高等代数	Spherical Trigonometry and Higher Algebra.	五
(7) 德文或法文	German or French (Grammar and Exercises)	三
(8) 作文	Composition <small>narration exposition</small>	一
(9) 体操		三
合计		二七
预科第二年		每周钟点
(1) 国文		四
(2) 英文诗词	Poetry (Selections from Standard authors)	三
(3) 心理学	Psychology	三
(4) 解析几何	Analytic Geometry	四
(五) 德文或法文	German or French (Easy Reading and grammar)	三
(6) 群学	Sociology	三
(7) 无机化学 (理论与实验)	Inorganic Chemistry (Theoretical & Practical)	三
(8) 体操		三
合计		二六
预科第三年 (每周授课二十六小时)		每周钟点
(1) 国文		四
(2) 英文词曲	Drama	三
(3) 哲学	Philosophy	三
(4) 作文	辩论文 Argumentation	一
(5) 人类学	Anthropology	三

(6) 政治学Science of Politics	三
(7) 实验物理Physics (experimental)	三
(8) 有机化学Organic Chemistry (Theoretical & Practical)	三
(9) 国际公法International Law.	三
(10) 植物学Botany	三
(11) 动物学Zoology	三
(12) 矿物学Mineralogy	三
(13) 拉丁Latin	三
(14) 微积Differential Calculus	三
(15) 官话Mandarin	三
(16) 体操	三

以上各科 (1) (2) (3) (4) 及(16)项, 为必需科, 其
 余可选择四种肄业, 以备入大学专门之用, 惟人数足时, 方可
 开班。

第三章 学 期 休 假

(一) 本校每学年分两学期, 第一学期自八月念五号至正月二
 十号, 第二学期自三月一号至七月一号。

(二) 除星期日例假外其余假日如左

国庆日	孔子诞日	开校纪念日
清明日	端午日	中秋日

(三) 有特别事故, 须休假半日或全日者, 由校长临时颁贴条
 示。

第四章 入学程度

- (一) 凡投考收录以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程度，国文通顺者为合格。学力优长者，考验各科学程度，分别插班。
- (二) 凡欲入大学预科者，必有中学毕业程度。
- (三) 凡已读西文若干年，曾习何种科学，均须于报名时分别详细注册，以便考试时就所学程度，分班考问。
- (四) 凡投考者均须体格无亏，如其品行名誉不良，或曾在其他校因过犯开除，考入时未及觉察者，随时察看屏斥。
- (五) 报名期限、投考日期及考所、额数，均先时登报声布。
- (六) 投考者年龄以十五至二十五为合格。
- (七) 考取入校须具志愿书，式如下：

复旦公学入学志愿书
年 岁 ^{家居}
今承复旦公学允许入校肄业一切规则情愿服从遵守如有违背等情听凭照章开除记过不得有词此具志愿书是实
年 月 日

第五章 保证人及保证书

- (一) 凡投考录取者于开学三日前，具保证人具名之入学证

书，偕同保证人投交监学。

(二) 凡居沪上学界商界中人为考取者戚友或同乡皆可为保证人，以能担任在校一切事务（重病欠费退学等）为合格。

(附) 凡旧生须一律补具保证书存校。

(三) 保证人如迁移居址或远出者，须随时通告。

(四) 保证书式如下

复 旦 公 学 入 学 [保] 证 书			
年	岁	住 寓	居
今承复旦公学允许入校肄业一切规则愿服从遵守如有重疾欠费等情概由保证承认照料理楚此据			
保证人		住址	
年	月	日	刻 缴

第六章 入学应缴费

- (一) 每年缴费膳宿生一百二十元，通学生年六十元，在校午膳者年八十元。
- (二) 书籍纸笔操衣及上课必需品，由学生自备，由校购备者各生照原价购取。
- (三) 每学期纳运动费一元，入校时预缴。
- (四) 学费于每学期到校时，向本校会计处缴足掣取收条，持赴监学处验明，始准入学舍居住，其未行缴清不得入校。
- (五) 凡中途自行退学及犯规休学者，各费概不退还。

第七章 考试升班及毕业

- (一) 每年设学期考试两次，第一次六月二十号，第二次正月十号。
- (二) 考试分数与平日积分，各得总分之半。
- (三) 凡评定分数，均以百分为极则。学期总分须满六十分者方得升级，但英文算学二科须各满六十分，有不及格者仍不得升级。如于放学后自行将不及格各科补习，准其于开学后五日内重请补试。如复试及格亦准升班惟过期概不补考。
- (四) 学生临考时如有与人耳语及挟带等弊，一经查出即停止其考试。
- (五) 凡学期考试及学年考试，学生不得托故规避，如实有婚丧疾病照章准假者，必于下学期下学年开课五日前补考，方予上课，补考合格者方准升班。
- (六) 凡中学修业及格，给与凭单为升入大学预科之据。大学预科另给证书，其中途自行辍业者，概不给凭。
- (七) 凡未及毕业，有特别事故离校，可呈请校长给与相当修业证书。

第八章 告假规则

- (一) 本校学生非先向监学请假者，不得擅自旷课，私行离校。

- (二)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准其出入，惟不得不回校住宿，若实系家在左近，预向监学请假者，须于星期一早上课前到校。
- (三) 学生遇父母丧及完娶等重要事故，须将家信呈请监学察存，由监学分别酌定假日，若遇患病须行回家调治者，应由监学察看情形方准请假，病愈来校。
- (四) 学科修业时间，每星期有五时或六时者准每月请假三时，每星期有四时或三时者，准请假二时，逾此者即将辍业各科扣除分数，但合本规则第三条者，不在此例。
- (五) 学生向监学请假后，所领请假名牌，于离校时执交司阍，始得外出，回校时亦必亲取名牌至监学处销假。若逢星期六课毕及星期日但将宿舍名牌，交司阍即可。
- (六) 学生违背本规则者，停止上课三日，并扣除分数。

第九章 惩戒规则

- (一) 惩戒分训戒、记小过、记大过、除名四种。训戒由各员随时剖切指导，记过由各员考察陈明校长分别记名于簿，每记小过一次，作扣品行分十分，记大过一次，扣三十分，除名由校长以下各员，对众宣布所犯何事，即日除名出校。
应除名事略如下 甲、犯部章禁令各条者；乙、行事不端损坏全校名誉者；丙、侮辱教员及管理員者；丁、记大过三次者。
应记大过各事略如下 甲、假出在校外为不规则之游戏者；乙、冒骂同学好勇斗狠者；丙、未经监学允许，擅

自外出或泊宿者；丁、于校内各处捣乱秩序者。

应记小过各事略如下 甲、未经请假或请假未经允许不上课者；乙、假出逾限者；丙、妄骂夫役，不顾行检者；丁、训戒至三次者。

应训戒各事略如下 甲、于各堂小有犯规事者；乙、对于各教员管理员小有失礼事者；丙、于授课自修时为蹴球游戏者；丁、在校内蹴球游戏者。

(二) 学生记过后，如真能改悔，经全校管理员、教员查察属实，其记大过者准改为小过，记小过者准其消除。

第十章 课堂规则

- (一) 上课下课鸣钟为号，先教员入、后教员出，须有秩序。
- (二) 教员就座离座，均起立表敬意。
- (三) 上课时勿得喧哗，唾涕勿声扬承以巾。
- (四) 上课前预备应用书物，非应用者勿携入。
- (五) 上课时不得分心他事，及私语匿笑。
- (六) 教员发问，须挨次自答，不得藉他人助力。
- (七) 有疑难须解析者，应起立向教员致问，他人不得谗言。
- (八) 上课时间内即有戚友来访，不得出外招待。
- (九) 教授用具，非教员允许勿擅动。
- (十) 黑板不得任意涂写。

第十一章 自修规则

- (一) 本校未建筑前，暂在宿舍自修。
- (二) 自修时无故不离座、不站立他人案前，并不得至他室。
- (三) 自修桌上书件必随时整理齐楚，桌位有一定安置，不得任意迁移。
- (四) 勿游戏、谈笑、饮食、憩卧及吸烟。
- (五) 他人书物及桌屉非经特许，勿得擅动。
- (六) 戚友来访，须至应接室晤谈。

第十二章 宿舍规则

- (一) 每晨六时半鸣铃即起。
- (二) 每晚十时鸣铃就寝，由监学、检察赴宿舍察视。
- (三) 宿舍内不得自行添燃灯烛，每晚以十时半一律熄灯。
- (四) 衣物卧具必须整洁，并检点妨害卫生之物。
- (五) 在宿舍勿喧哗。
- (六) 银钱等物须交会计处代存，否则如有遗失，本校不负责任。
- (七) 榻位均预排定，不得任意迁徙。
- (八) 学生上课或有事出舍，均须下键。校中派有茶房专守宿舍，门匙即交该茶房管理。
- (九) 学生有要事须差遣茶房者，应告明管理员，由管理员拨

派，每日一次。

(十) 伏假冬假期内学生不得留宿校中。

第十三章 膳厅规则

- (一) 每日午前七时半早餐，十二时午餐，六时晚餐，寒暑酌改。
- (二) 食有定时，逾时不补开饭。
- (三) 教员校生在堂同食。
- (四) 将食鸣铃以次各就本位，勿得凌乱迟留，每桌坐齐始举箸。
- (五) 当食须从容，以期有益卫生，食毕依次散勿凌乱。
- (六) 食品或烹饪失宜，应暂容忍，一面告管理员，飭令改良。
- (七) 当食勿高声谈笑，举放碗箸，尤宜肃静。
- (八) 临食时，教员校生均自行照料，校役一概退出。
- (九) 有病不能赴膳者，须先通告管理员以便飭役送膳，但能赴膳厅者，不在此例。
- (十) 伏假冬假期内，本校停办伙食。

第十四章 游息规则

- (一) 上课时、自修时不许任意闲游。
- (二) 公备游戏器具，须共珍惜。

(三) 禁不规则之游戏，及不应至之地游行。

(四) 列队旅行，须经校长许可。

(五) 校内花木，不得任意攀折。

第十五章 杂 议

(一) 公用器具，各有定所，不得任意搬动。

(二) 茶水设有定所，特派公役伺候，茶碗亦不得携往他处。

(三) 学生品格甚高，一切起居必须自重，凡公役住房、厨房等处，不得轻入。

(四) 开会演说等事，非经校长允许，不得任意举行。

第十六章 优 待 生

本校设优待生额十名，学膳费一概免缴。如具有左列资格，得校长认可者，方得补充。

(甲) 经费困难确须补助者。

(乙) 品行纯粹，留校一年以上者。

(丙) 学课平均分数在八十分以上者。

(丁) 具有二人以上之保证书，声明出校之后，如数分期补缴所免之费者。

学生有甲乙丙三项而无(丁)项之证书，自愿任本校教课每日二时，或任他项职务者，亦得免费，授课时间由校长规定。

十九、复旦公学毕业式

昨日徐家汇复旦公学暑假之期，并为中学第四年毕业，行给凭式，本埠如民国法律学校，南洋路矿学堂，南洋大学均有代表莅会。校董如蔡子民、陈英士、温宗尧先生等亦均到校。下午二时入席，先由校长李登辉先生报告本学期大要及此后公学进行之方针，又由庶务长叶藻庭报告本学期出入帐目，并言本校未得公款补助，经费异常困难，深谢董事会热情维持。继请蔡先生演说，大旨勸学生应当以学问为自身之责任，勿为干进之器具，并阐习外国文者，当以吸收他国之文明及输送本国之文明于他国为莫大之志愿，历举周秦诸子、各国学者互相转运，而成学说，与现在各邦学者考求历史人类等学，亦无不取材于东方古代文物，旁及钟鼎绘画。举例因详，演说至四十分钟之久，堂上掌声如雷，皆谓有益学者不浅，继即给凭，计中学四年班共十二人，毕业者九人，姓名等第如下：甲等三人，张度、江苏仪征；陈清华，湖南；阳周述，浙江肖山。乙等四人：陶声庚，浙江绍县；张漪，浙江永嘉；郑德元，江苏甘泉；恽济，江苏武进；丙等二人：徐图，四川重庆；宋仁，浙江平阳。尚有丁乐年、薛庆麟、汤兆均三人，因分数稍差，候下期补考后，补给文凭。

1913年7月1日《民立报》

第三节 私立大学时期

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开始自办大学本科，改校名为复旦

大学。辛亥革命以后，复旦公学向教育部呈请立案时，即批准按大学办理，但因各种条件限制，未能如愿。这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帝国主义各国忙于相互厮杀，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压迫，我国民族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对文化科学知识有了新的需求。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复旦公学遂升格为大学。

从一九一七年一九三七年，是私立大学时期，校长仍为李登辉。但李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三六年两次被迫请假。

复旦大学是爱国师生共同创建的一所大学。学校的建设资金，依靠李登辉校长、全校师生和校友向爱国华侨和社会人士募捐而得；学校的经常费用，依赖学费收入。由于全校师生的团结奋斗，学校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得到较快的发展。

复旦升格为大学以后，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原有李公祠校舍不敷应用。一九一八年，李登辉校长亲赴南洋募捐，向爱国侨胞募得建校资金十五万元，遂在江湾继续购买土地，连前共达七十余亩。可是建筑校舍，经费仍然不够。

李登辉在国内募捐，起初备受冷遇，后得董事长唐少川的协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五万元，中南银行黄奕柱捐款一万余元。^①教务长薛仙舟因公赴美，又向纽约华侨捐得一些款项。^②一九二〇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一九二二年春落成。计有教室楼一座，名简公堂（今200号楼）；办公楼一座，名奕柱堂（一九二九年增添两翼，改作图书馆，今700号楼）；第一学生宿舍（抗日战争中毁于炮火）一座；教师宿舍一幢（已毁）。这几幢房屋建成后，学校初具规模，大学部便由徐家汇李公祠迁至江湾新址（中学部仍在李公祠），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基础。

江湾校舍建成之际，四周尽是田野，出入必经的学校后面小路，属于私人，业主时以收回租要挟。其时，我校毕业生陆达权同学任职淞沪护军使署，经多次磋商，又得闸北巡捐局之

援助，修筑了前门大路，交通始便。③

大学部迁到江湾以后，学生人数增加更快。1922年大学部学生第一学期为316人；1925年增为790人；1930年增至1215人；1935年更增至1550人。在短短十多年间，学生人数由三百多人增至一千五百余人。学校原有设施，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得不逐年添造新校舍。从一九二三年开始到一九三五年为止，复旦陆继建筑了第二至第五宿舍，女生宿舍、科学馆、体育馆、饭厅、卫生院、土木实习工场和印刷所，还收购了燕园，使学校校园扩展到一百多亩，房屋十余幢，建筑面积近一万平方公尺。

新建的建筑物，除第二宿舍和科学馆（名子彬院，今600号楼）为富商郭子彬捐助外，其余均由校董、师生、校友零星募集而来，或则在学校经常费用中支出。例如，学校的体育馆，即在一九二六年由学生自治会倡议，每位同学出钱七元，不足之处，由学校筹足，于一九二八年建成。

江湾校舍，从无到有的逐步扩展，不仅是复旦师生的共同努力，而且和学校的严格财务制度有关。

复旦的财务管理，竭力贯彻节约和效率的原则。

首先，聘用的教职员人数比较少。一九二一年，复旦学生（包括中学部）为432人，教职员为34人，学生与教职员之比为1:0.078；一九二四年，复旦学生为841人，教职员为58人，学生与教职员之比为1:0.068，而当时的清华大学则为1:0.67。这说明复旦使用人力十分节约。

其次，在教师工资上，比国立大学低得多。当时国立大学专任教授的月工资在350元至500元之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的工资，每月才200元，此外别无任何津贴。复旦专任教授的工资，每月亦为二百元，但一年只支十一个月的薪水，另一个月的薪水，以开办暑期学校的收入补足。④

第三，职员的工资也不高，各科处主任每月工资为100元，一般职员工资每月为40元至60元。学校对于增聘职员，十分慎重。在事务日益繁忙的情况下，宁可提高原有职员的工资，也不另添新人。⑤

第四，学校里大宗开支，凡超出300元以上者，都需要学校行政院讨论通过。⑥

虽然这样处处精打细算，但逐年要扩展校园、增建校舍，添置设备，经济仍然困难，往往寅吃卯粮，在学期结束时，向银行贷款，到新学期开学、收到学费后，再行归还。以1932年度为例，当年经常费收入为186098.97元，支出为210674.60元，收支相抵不敷24575.63元。但是在支出中因偿付旧欠债息25643.44元，实际并无新的亏损。⑦外界评论说：“复旦办学成绩了不得，经济情况不得了”。⑧

复旦大学受美国大学制度影响较大，在教学上，有着显著的特色，表现在不断创立新学科、重视教学、努力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风气等方面。

复旦大学在系科设置方面，努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新学科。一九一七年，在升格为大学时，除在文、理两科内设立本科外，还设立了商科，这在我国大学尚属首创。商科先后由蔡竞平、李权时、李炳煥等人主持，学生人数经常处于全校之冠，培养了不少银行金融、对外贸易、工商管理、会计等方面的人才。

一九二三年，金通尹教授倡议在理科设立土木工程系，内部分为道路、桥梁、建筑等。金通尹原系复旦公学理科毕业生，后入北洋大学，毕业后回校任教。他学赅理工、兼长诗文、品德高尚、治事勤勉、深得师生爱戴，在筹建土木系过程中，礼请著名学者，充实教学内容，注重实习，重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

力的培养，使土木系成为复旦的重要系科之一，学生人数仅次于商科，在社会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土木系的学生临近毕业时，有关单位便来预约聘请。这在旧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一九二三年秋，复旦还设立了心理学院，隶属于理科。这是郭任远教授建议成立的。郭任远亦系本校学生，一九一八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他反对心理学中的本能说，认为人类行为是后天获得的，是“有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中所包含的躯体的机运的生理。”^⑤他的这些论点，属于机械唯物论，但比唯心论的本能说进步，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毕业时，获得博士学位，被称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健将。郭回校任教后，在校内外广泛介绍行为主义心理学，将从美国带回的数百种心理学书刊，辟专室供师生阅览。郭又向其同乡富商郭子彬捐得五万元，建筑科学馆，筹设心理学院，创办复旦实验中学，聘请著名学者蔡翹、蔡堡、唐钺、李汝琪等来校任教。心理学院后改为生物学系，学生人数不多，但是学术室气浓厚，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学者，如童第周、冯德培、陈世骧、朱鹤年、蒋天鹤、沈霁春、徐丰彦、胡寄南等人。

在教学上要求严格。对基础课非常重视，特别是国文、英文、数学三科。校章规定：“国文一种，以尊重国学，特设专部教授”，学生“至少须习完本级四年程度，方授与大学文凭”，四年当中，每周上课达七小时，同时规定“凡学生国文、英文、数学三科，须考试及格，方准升级”。^⑥学校对中、英文两门功课采取会考制度，十分严格，一经发现作弊，立将试卷作废，学分取消，并要记过。凡是考试成绩优良者，则给予奖励。对于选修课，注意扩大同学的知识面，规定学生不仅要选本系的专业课，而且要选他系的专业课，并修满一定学分；当时还要求文科的学生选读一门理科的课程，理科的学生

选读一门文科的课程，使学生具有较广博的知识。总之，要求学生坚实的基础上，向广博方向发展。

在培养目标上，注意引导学生走向爱国、进步的道路，特别重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李登辉校长认为，在各种各样思想对学生进行影响的时候，要引导青年走向真正爱国的、积极努力的方向去。^①他还指出，社会里的公民，能够独立思考，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为社会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②根据这一思想，一九二五年制定的复旦校歌中，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的词句，表示不受当时反动政权和外国教会的干涉。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介绍各派学术思想，从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都可以讲，学生可以阅读各种书籍，目的使学生在各种学术观点面前，培养分析问题、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当时，不少师生参加文学革命运动，文字改革运动、进步戏剧活动，刊行报章杂志，翻译出版书籍，都具有相当的成就。^③

正是由于学校领导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引导学生走向进步的道路，复旦学生在每次反帝爱国运动中，都站在斗争的前列。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复旦大学教师邵力子兼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首先接到北京“五四”的专电，立即告知复旦同学，并协同李登辉校长，指导同学联络全市大中学生，成立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支援北京学生运动。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复旦学生在支援北京学生运动，组织上海学联，发动并坚持罢课、罢市等方面，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坚强支柱。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期间，对复旦学生的爱国斗争，十分重视和支持，使复旦学生受到很大的鼓舞。

五四运动以后，复旦的进步力量有了进一步发展。国民

党著名人士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均来校任教。^⑭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陈望道，邵力子也在复旦任教。陈望道是我国《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的译者，曾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邵力子当时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宣传马克思主义，复旦师生中，不少人曾投稿该刊。复旦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宣传马列主义阵地之一。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曾来校演讲。^⑮五四以后，上海各校进步学生纷纷转学来归，在学生中不仅有国民党员，而且有共产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内部虽有分歧，尚未公开爆发。学校里“从右派的国家主义和基督教集团至左派共产党，无所不有。同学中政见虽有不同，而在友谊上是没有冲突的，真是维持我们校歌上所说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信条”。^⑯

五卅运动期间，复旦学生积极投入运动。五月廿九日下午，根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恽代英的布置，工人代表姜维新和另一女工来到复旦。他们敲钟集合同学，讲了顾正红烈士惨遭杀害的经过，市内工人、学生起来斗争的情况，大大激发了复旦同学的反帝激情，从此积极地投入运动。^⑰五月三十日中午，复旦同学集队赴北站宣传，沿途散发传单，继而由四川路至外滩，折入南京路。这时南京路已人山人海，复旦同学汇入人流，高呼口号，此起彼伏。突然帝国主义刽子手开枪扫射，当场杀害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等十三人，重伤数十人。帝国主义的屠杀没有吓倒中国人民，相反，烈士的鲜血更激起了复旦同学的民族仇恨，进一步投入到运动中去。

可是，和“五四运动”相比，复旦所起的作用就小一些。这由多种因素造成：一是校内强烈要求李登辉校长返校。一九二四年春，有人散布流言，诬陷李夫人汤佩琳女士有帐目不清等事（时汤任学校检查员，一说是财务监督）。李校长遂请假南游，与夫人同去南洋，任人查帐，以明心迹。李离校期间，

由郭任远代理校长。这时假期已满，仍未返校，校内多数师生都怀念这位热爱祖国、献身教育、廉洁奉公，诚挚宽厚的老校长，纷纷要他回校。^⑧二是校内国民党右派，在五卅前夕贴出大字报，影射攻击校内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造成部分同学思想混乱。^⑨三是校址远处郊野，交通不便，消息不灵，校内忙于开运动会、英语竞赛等活动，因而对市内的重大政治事件有所忽略，直到工人来校，才积极投入运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李登辉在全校师生欢迎下返校，郭任远任副校长，但实际工作仍由郭负责。郭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压制迫害同学。一九二六年他勒令一批同学退学、转学，引起学生反对，发动签名反郭运动。一九二六年底，郭辞去副校长职务，一九二七年离校。

一九二八年发生济南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疯狂地开枪打死我军民五千余人，野蛮地惨杀我外交人员蔡公时等十七人。复旦同学义愤填膺，自动组织义勇军，聘请军事教练，积极训练，准备投笔从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二九年，李登辉校长接连遭到不幸，子女及妻子相继去世，悲伤过度，他请金通尹先生担任秘书长，总理学校教学、行政等各种事务。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民族民主运动新高涨，复旦在李登辉校长主持下，召集全校师生开声讨大会，并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由化学系主任林继庸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加强对学生军事训练的领导。复旦同学在李校长的支持下，三次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出兵抗日。十一月二十日，复旦一百多同学组织“援马抗日团”，赴东北援助马占山将军抗日。该团到达北平后，受到张学良接见，并赠给粮食和棉大衣。这些同学后来加入河北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复旦同学组织

“义勇军”，参加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抗日，被分配担任后勤、宣传、教育等工作。战争期间，复旦迁至徐家汇附中，继续上课。江湾校舍三次被日军占领，仅房屋破坏，校具损失即达六万元之巨。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吞华北。北平学生发动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复旦同学立即响应，多次到上海市政府请愿，反对华北自治。十二月廿三日，复旦与其他各校同学齐集火车站，准备赴南京请愿。蒋介石为此专门打电报给复旦校长李登辉，要他劝阻学生。^①李登辉被迫前往车站，同学们谢绝了老校长的劝阻，坚持前往南京请愿。国民党当局使尽种种花招来进行破坏；起初不派火车司机，复旦同学自己开火车；继则拆毁铁轨，同学们修复铁轨，开车前进；最后派出大批宪兵到无锡强行阻拦，用武力将同学押解回沪，复旦和各校同学赴京请愿的目的虽然未能达到，但使京沪铁路中断四天，引起国际上的注视，影响极大。

由于复旦同学站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动辄影响全国。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痛恨，不惜使用武力来镇压复旦学生运动，这样就发生了“三·二五”事件。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上海市军警当局出动五、六百名军警和男女便衣侦探，包围复旦大学，并从校外宿舍逮捕学生救国会干部七人。二十五日下午，军警又冲入校内，殴打师生，除打伤学生数十人外，前往劝阻的李校长险遭殴辱，秘书长金通尹、文学院院长余楠秋等人则遭痛殴。学生大怒、奋力抵抗，将军警逐出校外。军警遂在校外开枪，误杀警察一人，反诬学生所为。但此事适为新闻记者与复旦校董叶秉孚的夫人所见，并拍有照片。^②二十六日上午，军警当局借口校内有共产分子、藏有枪支，进校搜捕，结果一无所获。^③但军警仍继续包围学校。对此，李登辉校长强烈抗议国民党的镇压和诬

陷，声称学生救国会始终与学校当局合作，他们主张急起抗战，这点本人亦深以为然。^②在李登辉的要求下，二十九日，复旦校董孙科、钱新之、杜月笙、叶秉孚等开临时校董会，对当局扰乱学府、摧残教育，利用职权，混淆是非的行为，非常不满。会后前往责问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吴见势不妙，承认发布复旦学生枪杀警察的新闻是错误的，保证以后决不派军警入校搜查。^③上海各界救国会也发表宣言，抗议军警围捕复旦学生。^④在各方面的反对和抗议下，国民党不得不将全体被捕学生释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武力镇压失败以后，曾经考虑封闭复旦大学。但因复旦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并为孙中山先生所关注，不得不有所顾虑。于是就采取软的一手，阴谋将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李校长免职，并将复旦迁往外地，来“整饬学风，安定社会”，扑灭抗日救亡运动。^⑤

一九三六年夏，国民党最高当局派复旦前教授、立法院副院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沧来沪，商讨学校改组，解决复旦问题。^⑥八月二十日，复旦大学召开第八次校董会，于右任、钱新之、叶楚沧等十二人出席，作出三条决议：一、加推叶楚沧、吴南轩、金通尹为校董；二、李校长辞职，决议挽留，准予请假休养，在李校长请假期间，推钱新之校董兼代校长，并推吴南轩校董为副校长；三、请政府奖励李校长办学成绩。^⑦

李登辉校长被迫离职，吴南轩来校任副校长，引起师生巨大不满。八月二十五日，李登辉发表告同学书，讲吴南轩为其“入室弟子”，“实与登辉在校无异。”

可是，吴南轩到任后，复旦爱国学生就遭迫害，救亡运动，亦被扼杀。

吴南轩以章益为教务长，殷以文为总务长，取消秘书长一

职。开学前夕，开除爱国学生三十二人，还用种种名义，逼迫爱国学生退学、转学。^⑳

对于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学校更是严加防范。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后，学校宣布戒严，详细规定“九·一八”纪念方式是：“十一时四十五分吹致哀号，同学当就地立正，静默三分钟以资纪念，此外不得集会纪念”。^㉑这种佯作纪念、实为禁止的办法，不能不说是复旦新领导的一个创造。

为了贯彻国民党最高当局把复旦大学迁出上海的意图。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学校董事会召开第九次会议，提出扩充校基案，“拟在太湖流域另觅佳地，为大规模之扩充，并推叶楚沧为扩充校基筹委会负责人。”^㉒

在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期间，叶楚沧与吴稚辉、钮惕生商妥，由吴稚辉出面，授意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出资购买太湖边大雷嘴土地一千余亩，赠给江苏省教育款产管理处，再转赠给复旦大学，以促成复旦迁校。吴稚辉并建议：“将江湾校址出售，可将大雷嘴造成十分舒畅也。”对此，钱新之在溪口曾经报告蒋介石，“介公亦欣赞”，^㉓可见，这是蒋介石的意图。由于抗日战争迅速爆发，这一迁校计划未能实行。

国民党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复旦，决定由行政院每年补助复旦经费十八万元。^㉔这个数字相当于复旦平时的一年收入。

但是，不管怎样加深控制，人民抗日救亡的浪潮，是无法抑制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复旦师生创办《文摘》杂志。这个杂志摘录、翻译国内外报刊的进步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促进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曾最早翻译、刊载斯诺的《毛泽东自传》^㉕以及有关陕北苏区的情况，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不少青年，由于阅读《文摘》而走上了进步的、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七年，复旦大学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四学

院、十六系科的大学。还附设有中学、实验中学各一所，义务小学二所。复旦校友还在广州、重庆等地设立复旦中学，并受大学指导。复旦大学已成为我国东南的重要学府了。

注释

①、③季英伯：《李校长与其建设复旦之略历》，见《复旦同学会会刊》第二卷第四期。

②《复旦大学在美国纽约募捐建筑经费报告》，1922年1月，《复旦》第十三期

④、⑤、⑧见《吴道存先生访问纪录》

⑥见《复旦大学行政院章程》

⑦《1933年校董会会议纪录》，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1899号

⑨《郭任远心理学论丛》第126页

⑩1920年重订《复旦大学章程》第二条、第三十八条

⑪李登辉编《Vital Factors in China problems》序言

⑫李登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见1929年11月4日，《复旦周刊》

⑬陈望道：《复旦大学今昔》，复旦校办档案59年5号

⑭见1920年《复旦年刊》

⑮陈独秀来校演讲，见1924年《复旦大学年鉴》，李大钊来校演讲《史学与哲学》，见1923年《复旦大学年鉴》，又见1923年9月《复旦季刊》第17期

⑯谢德风：《复旦迁到黄桷镇以后》，见1938年10月《复旦同学会会刊》第七卷第三期

⑰《姜维新谈话纪录》

⑱见1925年《复旦大学年鉴》第273页

⑲见《访徐之潮（梦纬）谈话纪录》

⑳《蒋介石致电李登辉嘱代劝各生回校》，见1935年12月23日《复旦校刊》

㉑《母校三·二五事件经过情形》，见《复旦同学会会刊》，1936年五卷七期

⑳ 1936年4月27日《复旦大学校刊》

㉑ 李登辉：《复大救国会主张正确》，见1936年4月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第二号

㉒ 《吴铁城答覆复旦校董，承认中央社新闻错误》，见1939年4月9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第三号

㉓ 见1936年4月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

㉔、㉕、㉖、㉗ 吴南轩：《复旦大学受赠太湖大雷嘴校地文献》，见台湾《复旦通讯》第三十期

㉘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1891号

㉙ 见1936年10月11日《救亡情报》第21期

㉚ 黄任之：《因爱国惨案改组后的复旦》，见1936年10月4日《救亡情报》第20期

㉛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1892号

㉜ 该文载《文摘》第二卷第二期，1937年8月出版

附录：

一、复旦大学章程

一九二〇年重订

第一章 宗旨与编制

第一条 本校以研究学术，造就专科人才为宗旨。

第二条 本校编制分国文、大学、中学三部。中学四年毕业。大学分预科、本科二级，预科二年毕业，升入本科，本科二年毕业，可得学士，再继二年，可得硕士。学制既与美国相同，而与我国教育部所定年限，亦不相背。其国文一科，以尊重国学，故特设专部教授。本级四年，特级四年，凡入本校

者，均須入此部修业。又设专修科，以便志愿研究完全国学者，三年毕业。唯因国文、英文不必同级，故凡欲毕业大学者，至少须经本级及格，始得领受文凭。中学之下，特设补习班，俾来学程度不及者，得按程补习升入中学。

第二章 学期及休假

第三条 本校每学年分两学期，第一学期自八月三十号至次年正月十号，第二学期自二月二十五号至七月十号。

第四条 除年假、暑假、及星期日例假外，其余假日如左
国庆日 孔子诞日 开校纪念日 清明日 端午日 中秋日 冬至日

第五条 有特别事故，须休假半日或全日者，由校长临时宣布。

第三章 入学程度

第六条 凡欲入大学本科者，须具有与本校大学预科毕业相当程度。欲入大学预科者，必具有中学毕业程度。且于下列各科，确有根底，试验及格始得录取。

英文

(甲) 文学 下列诸书或其他程度相等之书，至少须读过一种，由本校考验，须于其文章体裁确有心得，始得及格。Vicar of Wakefield, Auto-

biography of Benjamin, Ivanhoe, Tales of a Traveller.

(乙) 作文 试验作文一篇，以辞句通顺，缀字无讹者合格。

历史 须略具世界史知识。

算学 须曾习过平面、立体几何及平面三角。

物理化学 须略有根底知浅近原理。

文法及修词学 须能分析字句并能知其用法而于修词学之大纲，文学之藻饰，章句之段落，皆有心得并能辨别各种辩论、纪事、叙事、描摹文之体裁。

凡此数种试题，均以百分之六十分为及格。

(附) 凡携有本校所承认之著名大学颁给所读各科目分数单，本校当可按其程度酌量插班。

第七条 凡投考中学，以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或与本校中学补习科相等之程度，且国文通顺者为合格。其学业优长者，考验各科学程度，分别插班。

第四章 投考规则

第八条 投考诸生须向本校监学处或本校指定机关报名，考期、考地临时登报宣布。

第九条 报名时缴报名费洋五元。

第十条 录取诸生开学后三星期不到校者，报名费充公。

第十一条 报名费准在学费内扣除，不取者准其收回。

第十二条 投考者年龄须满十五岁以上为合格，如有不及此年龄而学识优异者，经本校考验特许，亦可录取。

- 第十三条 投考者须体格健全，品行端正。
- 第十四条 凡投考者无论有无他校毕业或转学证书，入校时须受国文考试。
- 第十五条 凡持有他校证书，如所习各科确与本校相同，可按其程度分别插班否则一律考试。
- 第十六条 凡已习过英文及各种科学诸生，欲入何级须在分班前报名登册，听候试验。
- 第十七条 凡报名投考插班诸生欲指定入何年级者，须将前一年级各科学一律试验及格，方准插入指定之级。
- 第十八条 插班诸生除英文、算学二科不准补考外，其余科学有考不及格，或素未肄习者，其数若在二种以下，得暂时插入指定班内，惟须于学年终补考及格，始得正式加入该班。
- 第十九条 凡新生来校投考，已过本校所定招考日期者，须缴考费洋五元。
- 第二十条 不论新旧学生于本校所定开学日期迟到一月者，须缴洋拾元，方准入校。
- 第二十一条 凡学生无故离校，重欲来校肄业者，须缴洋拾元，并须将应入何级所列课目考试及格，方准录入。

第五章 入 校 规 则

- 第二十二条 凡投考录取者，应于开学前三日偕同保证二人，随带印章来校填具入学保证书，投交监学。

第二十三条 考取者之戚友或同乡，如在沪上为学界商学中人皆可为保证人，但须切实依据后列保证书辨理。

(附) 凡旧生须一律补具保证书存于校内。

第二十四条 保证人如迁移居址或长期离沪须随时通告。

第二十五条 本校学费以全年计算，如学生第二学期不来本校继续肄业者，其应缴学费保证人须负缴清之责。

第二十六条 保证书式如左

复旦大学入学志愿书			
学生	年	岁	住所
今承复旦大学允许入校肄业，一切规则情愿服从遵守，如有违背等情，听凭照章开除、记过，特具志愿书是实			
署名		年	月 日

复旦大学入学保证书			
保证人	年	岁	住所
今学生 承复旦大学允许入校肄业，一切规则愿服从遵守，如有重疾欠费等情，概由保证人承认照料理楚，此据			
保证人印			
年		月	日

第六章 缴 费

- 第二十七条 膳宿学生每年应共缴洋一百六十六元，内分学费八十元，电灯、膳费六十元，宿费二十元，运动费四元，阅书费二元，以上各费分两学期缴纳，入校前一律缴清。
- 第二十八条 凡膳宿生不论在校进膳与否，其膳宿等费，须照章缴纳，不准扣除。
- 第二十九条 缴费之法，膳宿生第一学期缴九十三元，第二学期缴七十三元。通学生第一学期缴五十三元，第二学期缴三十三元。通学生在校午膳者，每学期加缴午膳费十元，凡在第二学期时入校者，应缴全年学膳宿等费之半。
- 第三十条 理科学生须预存本校洋十元，以备偿还损坏试验器具之用，如届毕业或离校时，查无损坏，即行给还。
- 第三十一条 新生除学费外，必须购冬夏制服各一套，其价约十二元。
- 第三十二条 书籍纸笔操衣及上课必须品，概由学生自备或向本校商店购取。
- 第三十三条 学生缴费未清者，不得入校住宿。
(注)如遇事故，缴费未清不得分期缴，纳者须得校长特许，方可入校。惟该生须签约为凭，准入校后一月内付清，过期不付即行除名。
- 第三十四条 凡中途无故退学及犯规开除者，其所缴各费概不退还。

第七章 大考规则

- 第三十五条 每学年大考两次，均在学期之终，第一学期为学期考试，第二学期为学年考试。
- 第三十六条 大考分数与平日积分各得总分之半。
- 第三十七条 凡平均分数以百分之六十分为及格。
- 第三十八条 凡学生国文、英文、算学三科须考试及格方准升级，其有不及格或未与考者，非有相当理由经本校升级审查会审定特许者，概不与补考。但其余各科有不及格者，一律准其补考，及格后升级。
- 第三十九条 凡学生于考试时，除疾病外，不得规避。
- 第四十条 凡学生若总分平均及格，而各科中有不及格者，准其于每学期开学时本校预指定之补考日免费补考，过期一月内补考，缴费五元，考期由本校指定。
- 第四十一条 学生非有相当理由，正式告假者，不准补考。
- 第四十二条 如实有婚丧疾病照章准假者，由监学处给与补考凭单，惟须预缴补考费五元，于下学期开课后一月内补考及格，方准升班，考期由本校指定。

第八 授凭规则

- 第四十三条 凡学生在本校大学部或预科及中学部按照规

定课程、肄业完毕、考试及格者，均得领受毕业文凭。其毕业考试于国文、英文、算学有一科不及格者，不得领凭。

第四十四条 本校除给授中文文凭外，并准依学生之请颁发英文证书，将该生所得各科分数，照章填入。以便出洋留学之用。

第四十五条 凡插班学生，至少须留学本校在一年以上，方准授凭。

第十六条 凡未及卒业有特别事故须离本校者，可呈请校长给与相当修业证书，惟各科有中途辍业未完全习毕者不得列入。

第四十七条 凡学生于国文一科，至少须学完本级四年程度，方授与大学文凭。

（注）凡学生于体操一科，无论童子军或兵操历年平均积分不及六十分以上者，一概停给毕业文凭，如或因病验有实据者，不在此例。

第九章 优待生及贷费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校酌设优待生额数名，补助清贫志士，以资奖励。

优待生之资格列左

- 一 经济困难实需补助者。
- 二 品行端正未尝违犯校章者。
- 三 享受优待期内，学课平均分数常在八十分以上者。
- 四 如学生既得优待后，有违上列二、三、四条件或经本

校察得实情能缴费者，本校可即时取消该生优待办法。

五 优待生对于本校应尽义务其职务，由校长派定。

六 学生在校一年以上者，方得优待。

贷费 本校除设优待额外，特拨定一宗款项，专备借给不及优待资格第三条之学生，应付学费之用（其膳宿费须本人自筹）惟须具有的保二人，与本校订约声明，该生出校后，一有职业即必须将本校借款，按照立约分期清偿随，付子金五厘。

校董唐少川先生允给本校文科商科优待额各一名，如自度资格与本校定章相符者准具节略听候递补。

校董聂云台先生允给商科优待额一名，承受者除应具所定资格外，毕业后须为给奖者服务，年限、薪俸由双方临时议定。

校董钱新之先生允给商科优待额一名，毕业后无须服务，余与定章相同。

第十章 奖励规则

本校奖励分为四等

- 一 四学年内总平均分在八十五分以上者，列最优秀等毕业。
- 二 四学年内总平均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列优秀等毕业。
- 三 四学年内总平均分在六十五分以上者，列中等毕业。
- 四 四学年内总平均分在六十分至六十五分内者列寻常毕业。

奖品 本校于学生毕业时颁发奖品如左。

大学毕业全学年总平均在九十分以上者，奖金章。

大学部毕业考试文理商三科第一二三名，各奖书籍等品。

凡国文、英文、科学、算学或他国文字成绩最优者，均奖以本科书籍。

文学辩才最优者由校长特予奖品。

运动会各项运动夺锦标者及网球赛会夺锦标者，各奖银杯。

体操队及童子军队于常年校阅时获胜者，各奖银盾，由得胜队保存，俟下次何队得胜，由代表移交胜队。

复旦同学会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常会议决，凡本校肄业诸生中，如能为社会服务卓著成效者，当由本会奖给金牌一面。其应给何人之权，信任校长酌定并定，该金牌于本校行毕业式时发给。

英文教员会之金银奖牌：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日英文教员会议决，凡获得演说竞争会第一二名者，当由本会奖给金银牌各一面，此演说竞争会并不论年级，凡在本校肄业诸生咸准报名加入。初次竞演定十二月二十七日，最后竞演定五月间之第二星期。

第十一章 告假规则

第四十九条 凡学生因有疾病或有要事不能上课，须报告监学请假，否则不得擅自旷课或私行离校。

第五十条 逢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均照第五条准学生出外，惟必须回校住宿，若家在左近，预向监

学请假者，则可于星期一晨上课前到校。

第五十一条 学生遇父母丧及婚姻等重要事，须将家信呈请监学察存，由监学分别酌定假期。若遇患病须回家调治者，应由监学察看情形，方准请假，病愈回校。

第五十二条 凡各科学每星期修业时间有五时或六时者，准每月请假三小时，每星期有三时或四时者，准每月请假二小时，逾限不到，作无分数。但本章前条不在此例。

第五十三条 学生向监学请假后，所领请假名牌于离校时亲交司阍，始得外出。回校时亦须亲取名牌，至监学处销假。若逢星期六课毕及星期日，只须将宿舍名牌亲交司阍，无庸另行请假。

第四十五条 学生缺课，一月之中有逾三十次，而无充足理由者，即令出校。

第十二章 寄物规则

第五十五条 学生于离校时将随带物件同时携去。

第五十六条 学生随带物件离校时如向监学处声明欲暂置校中者，亦可照允。设有遗失，本校不负责任。

第五十七条 照前条办法学生于开学时须将寄存物件即时取回，倘过三月不来取去，本校得酌量情形任意处置。

第五十八条 寄费每件每月一元。

第五十九条 凡贵重品物及有价证券价值逾二十元者，不

得携至校内否则遇有遗失时，本校概不负责。

第十三章 惩戒规则

- 第六十条 惩戒分训戒、记小过、记大过、开除四种。训戒由各职员或教员随时剴切指导。记过由教职员考察，陈明校长分别记名于过簿内，每记小过一次作扣品行十分，记大过一次扣三十分。开除由校长以下各员对众宣布所犯何事，即日开除出校。
- 第六十一条 应训戒之事如左
- (甲) 于各堂有犯规之事者。
 - (乙) 对于教员职员有失礼之事者。
 - (丙) 对授课自修时为蹴球游戏者。
 - (丁) 在校内蹴球游戏者。
- 第六十二条 应记小过之事如左
- (甲) 未经请假或请假未经允许不上课者。
 - (乙) 假出逾限者。
 - (丙) 妄骂夫役不自约束者。
 - (丁) 训戒至三次者。
- 第六十三条 应记大过之事如左
- (甲) 假出在校外为不规则之游戏者。
 - (乙) 谩骂同学好勇斗狠者。
 - (丙) 未经监学允许擅自外出或外宿者。
 - (丁) 于校内各处乱秩序者。

第六十四条 应开除之事如左

(甲) 犯部章禁令各条者。

(乙) 行为不端损害本校名誉者。

(丙) 侮辱教员及职员者。

(丁) 记大过三次者。

第六十五条 学生记过后如真能改悔，经全体职员及教员查察属实，其记大过准改为小过，记小过者准其消除。

第十四章 课堂规则

第六十六条 上课下课以鸣钟为号，学生先教员入，后教员出，须有秩序。

第六十七条 教员就座离座，学生均起立表敬意。

第六十八条 上课时不得喧哗，唾涕时须用手巾。

第六十九条 上课前预备应用书物，非应用者不得携入。

第七十条 上课时不得分心他事及私语匿笑。

第七十一条 教员发问须挨次自答，不得藉他人助力。

第七十二条 有疑难须解析时应起立向教员致问，他人不得搀言。

第七十三条 上课时间内即有戚友来访，不得出外招待。

第七十四条 教授用具非教员允许不得擅动。

第七十五条 黑板不得任意涂写。

第十五章 自修规则

- 第七十六条 本校舍未建筑前暂在宿舍自修。
- 第七十七条 自修时不得无故离座，不得立他人案前，并不得至他室。
- 第七十八条 自修桌上书件须随时整理，桌位有一定安置，不得任意迁移。
- 第七十九条 不得游戏、谈笑、饮食、憩卧及吸烟。
- 第八十条 他人书物及桌屉，非经允许不得擅动。
- 第八十一条 戚友来访须至应接室晤谈。

第十六章 宿舍规则

- 第八十二条 每晨六时半鸣钟即起。
- 第八十三条 每晚十时半鸣钟就寝，由监学赴宿舍察视。
- 第八十四条 宿舍内不得自行添燃灯烛，每晚于十时半一律熄灯。
- 第八十五条 衣物卧具必须整洁，并检点妨害卫生之物。
- 第八十六条 在宿舍不得喧哗。
- 第八十七条 银钱等物须交会计处代存，否则如有遗失本校不负责任。
- 第八十八条 榻位均预排定不得任意迁徙。
- 第八十九条 学生上课或有事出舍，均须下键，校中派有

- 茶房专守宿舍，门匙即交该茶房管理。
- 第九十条 学生有要事须差遣茶房者，应告明庶务处派拨，每日一次。
- 第九十一条 暑假冬假期内，学生不得留宿校中。

第十七章 膳厅规则

- 第九十二条 每日午前七时半早餐，十二时午餐，六时晚餐。冬夏季酌改时刻。
- 第九十三条 食有定时，逾时不补开饭。
- 第九十四条 教员校生在堂同食。
- 第九十五条 鸣钟将食时，各学生以次就本位勿得凌乱迟留，每桌坐齐始举箸。
- 第九十六条 饮食时不可过速，以免有害卫生，食毕依次而散。
- 第九十七条 品食或烹饪失宜，应暂容忍，一面告管理员飭令改良。
- 第九十八条 饮食时勿高声谈笑，举放碗箸尤宜镇静。
- 第九十九条 临食教员校生均自行照料，校役一概退出。
- 第一百条 有病不能赴膳厅者，须先通告管理员，以便飭役送膳，但能赴膳厅者不在此例。
- 第一百一十一条 暑假冬假期内本校停办伙食。

第十八章 游息规则

- 第一百零二条 上课及自修时不许任意闲游。

- 第一百三条 公备游戏器具须共珍惜。
第一百四条 不规则之游戏一律禁止。
第一百五十五条 列队旅行须经校长许可。
第一百六条 校内花木不得任意攀折。

第十九章 杂 诫

- 第一百七条 公用器具各有定所，不得任意搬动。
第一百八条 茶水设有定所，特派公役伺候，不得将茶碗携往他处。
第一百九条 学生举止必须自重，凡公役住房厨房等处不得轻入。
第一百十条 开会演说等事，非经校长允可，不得任意举行。
第一百十一条 学生宜留意卫生，于校内房舍不得吐痰地上。
第一百十二条 学生年龄在十八岁以下者，不得吸食烟草。

第二十章 藏 书

本校备有各种中文书籍数千卷，西文书籍数百卷，以便学生参考之用。俟经济稍裕，尚拟多增西书，以供研究。

第二十一章 演 说

本校授课之余，乃每月敦请中外各儒来校演讲各种学术，

以饷全校求学之士，俾增智识。

第二十二章 杂 志

本校每学期出杂志一种名曰复旦，全由教员学生合编。其意旨在阐发理想，练习社论及与新旧同学互换智识，出校同学倘承惠稿一律欢迎。

第二十三章 学校自治

本校为令学生遵守校规起见，特设法尽力鼓励自治，使全校学生共受其益。每级由学生中推一级长；每宿舍推一舍长，期于校中秩序、同学品行、宿舍整洁等事，得互相监察劝勉之益，每星期六开讨论会一次又立学生评议部由学生公推评议员若干人，随时就商庶务部，整理校务。凡关于食品卫生问题皆得建议焉。

第二十四章 兵操童子军及技击

本校学生一律须受体育。十五岁至十七岁入童子军，十七岁以上入兵操队或入童子军，准其自择。每星期由兵操教员讲授军事学一次，并练习技击以保国粹。

第二十五章 运动会

运动会者包括网球、足球、棒球及各种操场运动而言，管理一切悉由学生中所推举之会中董事担任。平日设法劝导与各级同学比赛，或与他校学生比赛以求进步。每年春季运动会定阳历五月举行。

第二十六章 演 剧

此部组织之目的有三（一）研究演剧原理；（二）娱乐学生性情；（三）陶成健全体格。所演历史故事及描摹社会状态临时编定。

第二十七章 音乐

此部由本校教员及学生中之性喜音乐者组织之。每月开练习会一次。

第二十八章 英语辩论会

凡本校大学生须入英语辩论会。其宗旨使能以英语对众演

说，并欲使具经营主持公众会议之能力。

二、复旦大学一九二五年年刊

何葆仁先生序

余别母校才四年，而校中进步，则已一日千里。教职员人数增倍；学生人数增一倍而强；前借他人房屋为设教之地，今则自建校舍于江湾；前大学部仅有文、商两科，今则两科之外，又增理工、心理、社会科学三科；吾级（一九二〇年级）毕业时，领学位者仅十有一人，今年毕业生，竟达九十余人之多；呜呼，其进步之速，为何如耶！

余尝以复旦突飞猛进之原因，叩诸同学，类多语焉不详。每思发表意见，又苦无机会。适乙丑同学，将刊年鉴，嘱予为序，予遂欣然任之。惜限于篇幅，仍未能尽所欲言为憾耳。

复旦之进步，原因甚多，然其要点不外以下数端：——

（一）校长之得人也。李登辉先生，自长复旦以来，殚精竭虑，以谋学校之发展，复旦之得有今日，厥功独伟。当吾校之初成立也，几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李先生独能牺牲全部之光阴、精神、毅力、与复旦共甘苦，卒奠吾校于磐石之安。此岂彼藉校长位置以争权夺利之辈，所可同日语哉？况李先生人格之高尚，在今日教育界中；尤属不可多见；复旦得之，其进步之速，亦意中事耳！

（二）教职员之和衷共济也。数年来国内著名学校，多起学潮，而其间莫不见有两派教职员之互相攻讦；此诚教育界最不幸之事也！复旦教职员独能和衷共济，以充分之精神，谋学校之建设；此复旦进步之第二原因也。

（三）旧同学之热心也。学生之爱母校，理所当然；惟自

吾个人眼光观之，吾旧同学之对复旦，实别具一种精神。此种精神，非言语笔墨所能形容：子女之爱其父母，庶几近之！至若张季暹、邵仲辉、邵师舟、毕静谦、叶季纯、叶藻庭诸先生之服务母校，久而不倦，与夫代理校长郭任远先生之改革学校与经营心理学院，其热忱尤足多焉！夫复旦得如许旧同学之热心赞助，其得突飞猛进也，宜矣。

（四）校风之优美也。闲尝考察国内之学校矣。其最优者，或以“训练 Discipline”见称，或以“自由”著名。复旦独兼而有之，故能养成优美之校风。或曰训练自由乃对立名词，有“训练”必无“自由”，有“自由”必无“训练”。子言：“复旦兼而有之，”将何以自圆其说耶？曰：“试见复旦学生之思想何等自由，而其作事又何等有训练；则可知吾言为不诬矣！复旦学生，信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所共知也；独于学生作事之敏捷及遵守校规之精神，则非深悉复旦情形者不能道也，夫复旦学生既重自由，当无机械束缚之弊；既重训练，又免贻放任之讥。有此良好校风，无怪乎负笈前来者之多也！”

（五）复旦学生自治精神之伟大也。犹忆五四运动之时，学生罢课。复旦学生分会，以维持校内治安为己任，设评议、执行、纠察三部，分工办理，同学无敢犯规者。于是学生自治之能力，大为校长所嘉许。翌年，遂有学生自治会之组织，辅助学校管理学生。至今大学不设监学，而学生类皆洁身自好，谨守校规，其成绩之优美，概可想见！不特此也，大学部学生自理膳食，井井有条。大、中两部学生，各办义务小学。经费均由学生筹措，管理教务，亦由学生担任。大学部义务小学，且已建有校舍。此诚五四运动之良果，亦即复旦学生对于社会之建树也。此外如国民合作银行、平民学社以及其他组织，皆为复旦学生服务精神之具体的表现。复旦学生既富于自治精神，离校而后，置身社会，遂能无时不活动，无地不活动。仅就留

美各大学中国学生会而论，一得复旦学生之助力，莫不蓬蓬勃勃，虎虎有生气！吾不敢言复旦学生办事能力，必较他校学生为强；但复旦学生加入其他社会团体，能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努力建设，奋斗到底，盖自有其伟大处！若非平日在校夙经训练，曷克臻此。是亦复旦进步之大原因也。

以上所论，皆为复旦突飞猛进之原因。然则吾人即以目前之进步为满足耶？抑当更进而跻吾母校于世界各著名大学之林耶？凡我同人，果真爱复旦者，必能知所适从，此吾之所敢断言者也！故予希望同学群起努力，继续奋斗，就目前论：已有无数战士，在蓝白校旗之下，呐喊前进。予虽不敏，亦愿追随骥尾，忝列一员；特不知吾全体同学，亦曾秣马厉兵，准备加入作战否耶？敢问！

何葆仁 十四，四，三十于江湾大学部

三、在复旦建校二十五周年时的讲话

李 辉 登

诸位来宾，诸位同学：

关于本校二十五年的历史，每年皆在年鉴上发表，用不着我多讲。现逢纪念盛典，讲一点勉励的话。本校已办了廿五个年头，无论何人的心中，总觉得有说不出的快感。今日有许多来宾说，本校所以有今日的成绩，全是校长为之翼护。但我对于这种话，绝对的不敢当。复旦有如斯的成绩，是全体董事、教职员、同学所造成。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国立大学的校长和教职员，报酬很丰富，但许多教职员，都固辞不就，情愿到复旦来，培植复旦的同学。复旦迄今，可以说成为国内唯一的私立大学，同学人数，凡二千余人。但是，比较美国哈佛大学有学生七千多人，纽约华文德大学有学生万余人，相差很远。可是复旦只

有廿五年的历史，他们俱已逾百年了。复旦锻炼至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说不定突过他们的纪录。所以希望诸位，努力建造，一德一心，使复旦前途万里。复旦现在还有一点危机，就是专靠同学维持，关于这一点，请诸位老同学新同学注意，赶快把学校基金凑起来，最后，今天授博士学位三位，授学士学位者九人，他们俱有绝大的勋绩在本校者。

摘自1930年10月20日《复旦大学校刊》（五日刊）

四、吾人之希望

李 登 辉

复旦大学，开办迄今，已三十寒暑矣。以历史眼光而言，以与著名之大学相较，如美之耶鲁哈佛英之牛津剑桥，则我校尚在幼稚时代；三十年在中国之长久历史中，盖甚微小也。

然而在此短时期中，以我校对于近代教育所作之贡献及所造就之国家领袖人物而言，则成绩不让于较老之大学；此吾人引为自豪，并对我校之将来，抱更大之期望。

复旦大学始创于一九〇五年，初为一高等学堂，目的在训练中国青年学子之近代知识。在初期学生中有现任监察院长于右任氏，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氏，我国驻荷公使金问泗氏，及其他。其时学生仅百余人，校址在吴淞。

辛亥革命后未久，本校始移入徐家汇之李公祠，即今复旦附中地址，其时大事扩充，发展甚速，遂改为大学，大学与中学部学生数约六百人矣。而本校之真发展，始于移入江湾新址，由爱国巨商及华侨捐款建设，遂蔚然可观。初仅有屋宇三座，学生二百五十人，今则建筑物多至十座以上，如课室，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卫生处，及各宿舍等等，学生数目则于十五年之间增至一千四百人（文理法商四院之男女学生总额），而各附

中学生达八百人。

至于实现本校负责人员之计划，欲求使本校为一真正之伟大大学，其困难由于经费之限制，此为诸校友与同学所尽知也。

本校发展计划之前途，非仅赖校长之努力以及政府之若干补助，而实赖乎诸校友之合作与经济协助，其理甚明，吾校友中今日在社会占显要地位者，为数甚伙。现在之问题为校友对于母校发展之兴趣如何，使资助母校之程度如何耳。著名私立大学之成功，如美之耶鲁，哈佛，芝加哥大学，系由樊特北尔（Vanderbilt），洛克斐勒（Rockefeller）辈各校校友之慷慨解囊也。

今日中国资本家之愿资助大学者，似不多见，如陈嘉庚先生之捐款以办厦门大学，可谓凤毛麟角，而复旦前途则甚赖各校友之资助。为数不必巨大，如每校友每年能捐出收入之若干部分，则不知不觉中助我校发展计划之实现矣。

愿三十周年纪念带给复旦前途更光明之希望！

摘自《三十年的复旦》 1935年

五、复旦大学第八次校董会纪录

地点：沧洲饭店

日期：1936年8月20日

出席校董：（以出席先后为序）

于右任、赵晋卿、叶秉孚、李登辉、江一平、奚玉书、郭仲良、王伯元、余井塘（张廷灏代）、周越然、许绍棣、朱仲华（许绍棣代）、钱新之、吴南轩（列席）、金通尹（列席）、叶楚沧、吴铁城（潘公展代）。

主席：钱新之校董

议决案：

一、加推校董案

决议：加推叶楚沧、吴南轩、金通尹三先生为校董。

二、李校长辞职案

决议：辞职挽留，准予请假休养，在李校长请假期间内，推钱校董兼代校长，并推吴南轩校董为副校长。

三、奚校董代表同学会提议请政府奖励李校长办学成绩案

决议：由本会具文呈报中央政府请予奖励。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1891号

六、因爱国惨案改组后的复旦

黄 任 之

一 门禁森严的校长室

九月十三是复旦本学期注册的日子。那天上午我从校长室门前经过时，看见阔别了三日的×君正仰着头，两手撑着墙壁在那里填表格，我走近从他的背上看去，原来是一张“求见校长书”，事由填的是“为请求复学事”。×君回顾看见我时，苦笑了一下。在谈话中，我才知道他也是“言行为当局所不满应即转学，惟若能表示悔过，经学校审查后可准复学”的卅余学生之一。×君说，在开学前悔过书早已遵令写了，但学校的回信是，“果该生虽已表示悔过，但悔过程度尚不够。未便准其入学”。这原因，我想大概是×君在“悔过书”里，未明白承认“三·二五”惨案是复旦学生不赦的犯罪吧。

×君把校长室的门敲了一下，门轻轻地开了一个隙，一个茶房伸出头来兢兢业业地把纸条接了进去门随即又紧紧关上了，这种现象实在是复旦前所未有的。原来那里面的主人，已不是长校卅余年的李老校长，而是曾经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做过一星期的清华大学校长的×博士了。大概近几年来，×博

士在南京曾努力过某种生活运动，所以他奉命来复旦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养成“以下敬上”的——或称之为“服从”的风气。

接着门响了，一支手又把原来的纸条递了出来，在上面把最后一行的“会或不会”的“会”字圈了，另外还附上“问教务长”的字样。

二 教务长的最正确的信念

×君回头踏进教务长的办公室，我在门口等着他，替他捏着一把汗。差不多经过半点钟的时间，×君才出来，脸上表现着一种非常激动和忿懑的神情，拉着我走到草地上去，始终沉默着，经着我的追问，他才说，关于能否复学的问题还未具体谈到，教务长首先就毫不客气地把上学期的爱国运动痛骂了一顿，随后说复旦现在要建立一种新的学风，每个人都必须赶快觉悟起来，把握着现在的“最正确的信念”，即“要救国必须复兴民族，要复兴民族必须求中国之统一，要求中国之统一必须拥护××××”。他要×君去作一篇详细的生活报告，在这报告中并把将来的生活方式明白谈到，又嘱咐×君到什么局去见什么富有学者（？）风态的什么先生（教务长语）同时他又嘱咐×君在将来入学后不能消极，必须来努力这种新学风的完成，他甚至当面暗示×君，他可以在经济上以及各方面援助他，假若×君能使他“愉快”的话。×君说完的话时，捏着拳头向地上重重地唾了一口，坚决表示他再不谈复学的事了。

三 一张志愿书和三张照片

实在这学期的入学手续，每个学生都有许多麻烦，除了每个人均须找一个中委或社会名流或殷实商家作保外，还要重新填写一张志愿书并缴纳最近的照片三张。志愿书上有四条：（一）不作反政府之言论及行动，（二）不参加校外各种活动，（三）

不参加学校禁止之活动，（四）不主张罢课及罢考。逼着学生填写这样的志愿书，简直可说是今日大学教育的一个绝好自供，也是教育贵族及其主人自感命运难保的毕露的丑态。至于每人须缴的三张照片，除一张存训育组，一张粘贴学籍证上外，还有一张则去路不明。然而我们想起今年三月廿四日晚当局“据密报”来复旦捕人，因认识不明在第四宿舍三楼将人捉错，而引起争吵惊动了其他学生的一致奋起拒捕时，那末这张照片到那里去了，也就用不着揣测吧。

四 校车不走正路，校钟进了库房

本期复旦自李校长奉令辞职之后，除由校董会董事长挂名长校及由××××派遣×博士充任副校长外，又添设教务长及总务长各一人，教务长某某是所谓十大“本位教授”之一、而总务长某某又是负有某项职务的，所以今日的复旦已一改昔日较自由较纯洁的面目，而成为“三长”三位一体的“最正确的信念”的王国了。因为贯彻“最正确的信念”，所以总务长的改革就很多。第一个改革是“校车不走正路”。四年来复旦的校车路线本是沿翔殷路转入北四川北路而前进的，因为这条路线实有许多方便，所以四年来一直莫有变动过，但现在校车却改为爬过铁路抄宝山路而去了。这样改变是由于最近的“不幸事件”而来的，因为原来的路线须经过日本的大兵营。从“校车不走正路”也就可看出所谓“最正确的信念”是种什么内容了。第二个改革是“校钟返了库房”托名军事化的管理改为吹号上课，因此校钟即被收缴库房！共有学生约二千入的复旦，校舍教室散在四处，微弱的号声不能作为警号，是谁都感觉到的。但是现在的复旦是不容许任何人说话的，你若去请求恢复敲钟，即有被指为“另有作用”而叫你滚蛋的，因为在现在，校钟已成为这般教育贵族的最大威胁了。此外在各宿舍内又添上生活指

导一人，这个生活指导负的什么使命，自用不着说。为彻底贯彻“最正确的信念”，将来会不准学生住校，或叫学生在宿舍内听收音机代替上课，也是说不定的吧。

五 管理校门原来如此

这般教育贵族竟有这样一个新创见，他们认为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是外界的人鼓动指使的。所以本期复旦的又一改革是管理校门，无学籍证者不得进出。这个制度从九月十六那天开始，布告上说“从九月十六日至廿日为本市戒严期间，本校为防不法份子混入校内，在戒严期中，同学出入校门必须缴验学籍证。此布。”可是在“九·一八”那天，除前后门警察加岗外，操场上随时还可碰见一些面目可憎面绝非学生的大块头，所谓管理校门也者就是如此。

最后我要报告一些“九一八”在复旦的情形，除九月十六日下午校后复盛宿舍无端被搜查外，十七日晚校长室又临时派遣二人坐更，以便随时报告校内消息。“九·一八”那天的布告是“‘九·一八’纪念日本校定十一点四十五分吹致哀号，同学当就地立正，静默三分钟以资纪念，此外不得集会纪念，望各自自重此布。”这张布告作用自在后半页集会纪念即为不自重这又是教育贵族的逻辑之一。

在复旦，“九·一八”是安静渡过了。教育贵族坐在沙发上喷着雪茄烟的烟雾，含着笑靥，说不出内心的愉快，而“最正确的信念”的教育形式大概是已具一个规模了。

摘自1936年10月4日《救亡情报》第二十期

七、复旦大学第九次校董会纪录(摘录)

地点：沧州饭店

日期：1937年1月8日

出席校董，（以出席先后为序）

叶秉孚、王伯元、周越然、郭仲良、叶楚沧、王正廷（刘云舫代）、赵晋卿、钱新之、陈立夫（钱代）、朱仲华（钱代）、李登辉、金通尹、吴南轩、吴铁城（潘公展代）、江一平、奚玉书。

列席：殷以文、孙寒冰、章友三。

讨论：扩充校基案

决议，本校地处都市，将来发展困难，拟在太湖区域另觅佳地，为大规模之扩充。兹推叶楚沧、于右任、邵力子、陈立夫、余井塘、沈伯元、赵棣华诸先生为扩充校基筹备委员会。并推叶楚沧先生为召集人。

以上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1892号

八、复旦大学获赠太湖大雷嘴校地文献原稿

自九一八日本侵犯东北，全国学校为抗日请愿时呈骚动不安之象，尤以沪上诸校为甚；沪上诸校，尤以复旦母校为烈。政府为整饬学风、安定社会，于民国二十五年夏特派母校前教授叶楚沧先生赴沪与李老校长腾飞师及校董钱新之先生等商讨学校改组问题。经再三会商后，腾飞师以年高退休，校长名义由主席校董钱新之先生暂代，添设副校长，负学校实际责任，以余承乏。余以樗材未敢应命。尤以学校经费困难，校址狭隘，前途难以发展为虑。叶先生再三肯定，允余到校后，竭力协助解决此两大难题。后以腾飞师函电迭颁，催促到校，遂勉应命。到校后翌年之春力请叶先生履践前诺，首谋解决学校经费，由彼邀请关心教育之中央委员，联名提请当时三中全会，补助本校经费。全会以本校深具革命历史，遂决议交行政院，酌予补助。嗣由

行政院核定，每年补助国币十八万元。学校经费从此得一初步解决。次谋校址之扩建，由叶先生邀请邵力子先生，商请江苏教育款产管理处钮惕生吴稚晖两先生，以其新购之无锡太湖边大雷嘴地千余亩拨赠本校，钮吴两先生慨然应允。吴先生尤盛称其地风景之佳胜，交通之便利及兴建学校其他条件之美备。学校两大难题解决腾飞师全体校董及全校师生闻讯喜跃。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腾飞师与吴钮叶三先生约定前往无锡察勘该地，同行者腾飞师、钱新之先生及余外，尚有金通尹、叶秉孚。殷以文诸校友，吴钮叶三先生由京先抵锡，邀同当地荣德生先生出为招待，在梅园午膳后同登山看地，盘玩半日几于流连忘返，其后余与腾飞师及校中诸同人商讨如何利用此地。由余建议除商学院及新闻系永久留沪外，其余文理法三院全部迁锡，在锡将逐渐增设农工学院，农如水产、工如纺织诸系因地利尤当首先设置。至于建校计划约分三大步骤：第一，于当年暑假间，由本校土木工程系师生组织测量队，前往测量地势，此事当时确已做到，凡所绘案，均存校中。第二，聘请建筑师设计新校舍图样，此事方始进行。第三，利用政府新补助之款，向四行储蓄会抵借壹百万元为建校经费，此事原则上钱先生曾同意。如此则一二年内，建校计划即可完成。巍峨黉舍，将矗立于太湖之滨，理想之学府，可得实现。不幸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渝，数年中鸠工兴建者，乃在嘉陵江上之北碚，而非无锡太湖之滨，绝非始料所及。……故特检出吴叶诸先生手书及照片等件，统交台湾同学会理事会妥善保存。余君若陶并将各件装璜成册，使此文献得垂永久，爰述梗概，以当并言。

中华民国双十节（五十五年）吴南轩谨记于台湾木栅政治大学

摘自台湾《复旦通讯》第三十期

九、吴敬恒致吴南轩函

南轩先生执事：弟因在再稍受微伤，故赴近郊友人处小住。致赐函及枉存（按：“存”字疑为顾，或驾之误）皆稽答失迎至歉。大雷新收千余亩之地，有详册存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趁未登记划归贵校执业至易也，请大驾莅京时直接向惕生先生接洽可矣。弟于校路有小小贡献，因照弟所献计划直接之公路可以造成（当时湾近者因填土工程较大，且一湾填直将各湾亦直工程尤大矣，我们止填一湾想不成问题）。而全校亦得一与外间相隔之门户，但弟亦随便贡献耳，或更有相宜之法，尤好。弟今日又将下乡，廿三亦未能回京，故飞函奉答，即求

先生于廿三去京，以弟函及图带请惕生先生一阅，钮先生在考试院，江苏教育经费处在内桥北厅后街，处中刘伯禾、陈仲英两先生亦前次同往大雷嘴者，亦可晤谈。无锡则寻荣德生先生，彼处有朱先生则系收地原经手。此后界址等均须烦劳于彼。在溪口，新之先生曾以告介公，介公亦欣赞。大约山水将托贵校而灵矣。敬复，并叩

道安。

弟吴敬恒顿首廿一午（一九三七年三月）

摘自台湾《复旦通讯》第三十期

十、吴敬恒致钱新之函

新之先生执事：敬启者，前日在政会中闻邵力子先生言，因复旦宿舍不敷，难于管理，拟迁校于太湖流域，弟当时闻之，即告

邵先生，无锡太湖边钮惕生先生曾以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余款购得山地千余亩，尚拟继续收购，倘复旦迁校，愿以一两千亩地拨赠，邵先生欣然，弟虽略说其地之美，但未尽所言，今特绘图驰告先生。

倘先生有暇，可先往一观，今先言其地之美与宜。

太湖边上之风景，(除马山西洞庭已在湖中不论外)，三处为最佳。第一宜兴与长兴交界处，曰父子岭，但彼处虽在京杭路上，交通太不便，且乱时常多匪。第二即钮先生买地处，曰大雷嘴。第三则鼇头嘴也，今鼇头嘴已驰誉于东南，独大雷嘴胜过几倍，尚置之荒漠，实则今日之大雷嘴，已大可经营。然非有大规模极多之人迁往，则农场等等(钮先生本想作农场)规模小者，还嫌荒远，而别墅等等，更说不到，其实则此地实一有价值之名胜区也，如复旦肯迁往，不惟太湖第二胜区顿时造成，且于复旦亦大有益，今分述如左：

(一) 今日可以经营者，则锡宜公路适经行其地，离城虽有二十余里，要求江南汽车公司开一区间车，每日走六次至八次，则便利不逊于江湾，且较江湾之离上海，止多出五分之二路途也。

(二) 一切建筑时重笨材料等，皆可由水运直达湖边，较之江湾非车不成者，廉便多矣。

(三) 建设委员会戚墅堰电厂，已放杆至山后湖埭市，由湖埭接线至大雷嘴仅仅三四里路，至为容易，戚厂电力供给甚富。

(四) 既有电矣，用一小小帮浦，打湖水上山，水既清冽，供给大足。

(五) 由山层叠而上只须皆造平房，外视已不啻层楼，武汉大学建筑因山之美，已驰誉于国中，然彼所临者只为东湖山水，今则前临万顷之波，规模更佳。

(六) 大雷嘴各峰，一律向南，造屋极宜。

(七) 大雷嘴左右两湾，皆有平地可收，或有宜造平地之建筑，不患无地。

(八) 环境皆为山水，绝无恶劣状态入目。

(九) 如有土木工程等科，则有湖、有港、有山、有平地、实习测量，无境不备，可称尽善，(如开机械科，利用湖上交通，亦不患笨重设备之运送)。

(十) 夏日鬼水等等，可圈入湖水，用作游泳池，至易设备。

(十一) 既有学校左近自有农场别业等等建造，既不患无邻，且为有小小市场设来，初时则特约远处村庄送给蔬菜，往湖埭查堰桥日用饮食之物，色色全备，则厨房每日则三四五里办菜，亦不算遥远，且蔬菜可以雇工自植。

(十二) 此处本需驻兵，因荒凉难于设备，今既有校请由保安队分派一二连人，分驻该处，则治安可无少虞(此处向不太平)。

若因政府津贴二十四万一年，预借五十万元，可以集事，将徐汇中校仍保留，将江湾校址出售，可将大雷嘴造成十分舒畅也。尚将来要添农校，则山后皆肥饶之田，价尚廉贱，再收一二千亩易也。

基上所言，如先生有考虑之意者，惕生先生已约廿八日星期亲往观看，弟与荣德先生等皆陪往，吴礼卿先生亦愿往观，此皆与复旦无关，不过共赏太湖第二胜区亦已。若先生是日有暇，是日又为晴明者，请乘上海首都车，或特快车赴锡，弟等当于车站相迎(非专迎先生)，已是定十二点取齐，同在锡市便饭，午后一时汽车去，四时必可回来，(到大雷嘴，止需四十分钟，恐盘桓一二小时，故定四时)，五点四十五、七点十分，均可回沪。

如是日有要公，亦可不必急急往观，再俟异日可也，弟等

之往，乃别有目的耳，弟前日在沪，已请石曾先生转告，今适有暇，再续陈，并叩道安。

弟吴敬恒顿首

三月廿四日早

摘自台湾《复旦通讯》第三十期

十一、叶楚沧致吴南轩函

南轩先生道席：顷与吴稚晖先生畅谈湖边（大雷渚）之地，确可赠与复旦（其原收价万余元，钮先生经手）。且约同去一看（钮先生亦去），约二十八日上午到无锡叙会，是一莫大喜信。惟弟届时因回乡恐不能到。甚望先生一行，如李钱两先生有兴一行，更为圆满矣。专上祇颂

道祺。

弟叶楚沧手上

二月廿四日（注）

吴先生详述其交通形胜之佳，实不可多得。

注：按原文如此，实际应为三月二十四日，盖三月二十八日叶、吴、钮等人与李登辉同往太湖滨察看大雷渚地。

摘自台湾《复旦通讯》第三十期

十二、陈望道致荣毅仁函

毅仁先生：

本校无锡大雷嘴土地，原系德生先生价购，赠与吴稚晖先生，经吴稚晖先生转赠本校作建筑校舍之用，兹以土地改革正在进行，该项土地，亟需办理登记手续，用特函恳悉将地契检

交本校，俾便着手进行，无任感幸，即致
敬礼

陈望道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

十三、荣毅仁复陈望道函

望道先生台鉴：前接

大函，下询无锡大雷嘴土地事，曾去函无锡查询，后复奉一函，邮寄贵校。兹悉该函未荷台督，想遭误投矣。查锡函复称，该项土地原系吴、钮二先生发起，由家严出资汇托前朱区长代为经办、过府付清楚。单契由朱区长交与前教育款产处收去。款产处即代大学所请也。闻江吴君当知其详细，并能引看，前李校长亦去看过，且当时同去者亦不少，现款产处由何机关接收、何人执管，不得而知云。用再函达，即请台端设法追查，不难获得该项单契所在也。

此致

敬礼

荣毅仁敬启1951、3、9

以上摘自复旦大学校办档案1951年第24号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伟大史诗。在长达八年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中，复旦大学发扬了爱国主义的传统，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战期间，复旦分为两部，一部迁往重庆北碚，一部留在上海市区赁屋复课。

“八·一三”日寇侵沪战争爆发，正在徐家汇复旦附中上课的复旦大学暑期学校，被迫停办。由于上海军民英勇抵抗，九月初战事呈胶着状态，部份教职员倡议，仿照“一·二八”战时办法，在徐家汇附中开学，但战火纷飞，学生到校极少。^①

不久，南京教育部派人来沪，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所大学，效法平、津，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四校援例申请迁移开办费三十万元，常年补助费每月四万元。教育部则要“各校校董，自筹的款充用”。大同、光华因经费无着而退出。复旦、大夏则按教育部要求，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并遵部令将联大分为二部，第一部迁往江西，第二部迁往贵州。^②

临时联大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由复旦副校长吴南轩负责，大夏吴泽霖任教务长，迁往江西庐山，租赁普仁医院为校舍，何金芳等旅馆为宿舍，分文理法商等学院，实到学生895人，教职员99人，于十一月八日开学。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由大夏副校长欧元怀负责，复旦章益为教务长，迁往贵阳，由贵州省政府指定贵阳讲武堂为校舍，拟于十一月份开学。^③

十一月十二日，国军西退，上海沦陷，日寇分兵三路进逼南京。在庐山避难的要人眷属，纷纷下山西行；而在庐山的中央政治学校，亦有迁移之说。联大第一部决定内迁贵阳，与第二部合并。为此，吴南轩向在庐山的陈立夫借得一万元，并请陈向政府申请调拨差轮。

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委会命令招商局快利轮开到九江，运送中央政治学校师生西迁，但该校准备不及，遂改让联大使用。联大师生随校西迁者，共五百余人，其余散归家乡，少数经武汉去延安，快利轮至宜昌后不能上航，师生在宜昌候船半月，分三批入川，十二月底到达重庆。

重庆有复旦校友百余人，组织了复旦同学会，并创办有复旦中学。一九三六年秋，李登辉校长入川游览，受到校友热情接待，参加重庆复旦中学成立纪念，留下深远影响。联大第一部到达重庆时，受到复旦校友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其时贵阳联大第二部来电挡驾，重庆各界则欢迎复旦留在四川。正巧复旦中学已经放假，临大第一部遂借该校菜园坝校址上课，第一学期到二月中结束。

一九三八年二月，在重庆校友协助下，吴南轩赴嘉陵江三峡一带寻找校址，确定在重庆北边一百五十余里北碚对岸的夏坝（原名下坝，陈望道建议改今名）。夏坝背靠琼玉山、面临嘉陵江，位于黄桷镇与东阳镇之间，有平坦土地一千余亩，与北碚夹江相望，风景秀丽，诚为建校佳地。二月下旬，师生分批到达，暂借黄桷镇河神庙（又名紫阳宫）为办公室，小学余屋为教室，煤炭坪为学生宿舍，王家花园为教师宿舍，荒村茅舍，屋宇简陋，风雨晨昏，江水暴涨，有成泽国之虞。但五百师生，不避艰险，间关万里，来此小镇，均能以抗战自励，精神振奋、教学认真，生活简朴，课余之暇，从事救亡宣传，进行社会调查，颇有一番新兴气象。

临时联合大学自西迁以后，逐渐形成重庆联大第一部即复旦，贵阳联大第二部即大夏，循名责实，已无继续联合之必要。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临时联大在贵州桐梓举行第三次行政会议，决定自一九三七年度第二学期开始，以重庆之第一部为复旦大学，贵阳之第二部为大夏大学，并报经教育部批准。^④原在第二部任教务长之章益，由吴南轩推荐至教育部任总务司长，两校遂脱离关系^⑤。

复旦在夏坝复校，经费十分困难。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复旦经费有二种来源，一为学生学费，一为政府补助每月一万五千元。此时，学生随校西迁，与家中音信不通，不仅无力呈缴

学费，生活零用亦仰学校贷金；而政府补助费因战时关系，只按七折发放。故吴南轩忙于出外筹募经费，校内教学，便请金通尹负责。金通尹见吴南轩推诚相邀，便不避繁剧，代理教务长职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安排好四院十六学系的教学工作，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年暑假，重庆复旦大学有六十多名毕业生。

一九三八年二月，复旦数百留沪学生，眼看其他大学纷纷复课，屡次要求李登辉校长设法上课，解决失学问题。李校长与留沪教师反复讨论，认为：（1）重庆过远，在此战争期间，学生前去非易，且旅费亦太昂贵；（2）借读他校乃不得已办法，学生至感不便；（3）光华、大夏在成都、贵阳与上海同时开学，华东各地大学，如东吴、之江、金陵均迁沪复课。复旦若单独在沪停办，他日恢复，势不可能；（4）沪上租界之内，尚属安全，并无任何干涉。以上好最后一课的精神，维持复旦在沪之根基。如形势突变，则“当散即散”，亦属易事。^⑥于是，在校友协助下，租借英租界北京东路中一信托大楼的四楼、五楼作为临时校舍，二月二十三日正式上课，有教员四十四人，学生四百十人。除新闻、生物两系暂停外，其余四院十一系照常办理，共开出课程九十门，三百学时，^⑦至六月二十五日学期结束。这年暑假，上海复旦大学有五十五名毕业生。^⑧

由于中一信托大楼地处闹市，熙熙攘攘，不宜办学。一九三八年下学期，租借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1726号房屋为校舍。该地环境比较幽静，但是法租界当局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不准复旦在该处上课。不得已，十一月三迁校址至仁记路（今滇池路）中孚大楼三楼上上课。一九三九年四月四迁至赫德路（今常德路）574号上课，学生人数上升至七百人左右。一九三八年八月，金通尹因父病返沪，李校长任命他为上海复旦大学的教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日常教学工作。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吴南轩由渝来沪，商定沪校改称复旦大学补习部。沪校各组，均有周记，每周由文书组汇总寄给渝校，以资联络。⑨

一九三八年秋，重庆复旦中学在化龙桥建成新校舍，菜园坝校址空出。吴南轩因在重庆市区比较容易聘请教师和进行教学实习，将商学院各系及新闻系、经济系迁往菜园坝。不料，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四两日，敌机对重庆市区狂轰滥炸，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于空袭，造成人间惨剧。商学院及新闻、经济两系，只得又迁回北碚黄桷镇。

重庆复旦大学，根据抗战形势需要，自一九三八年秋，陆续增设了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并在一九四〇年秋建立了农学院。其时，又得四川省政府、赈济委员会和各地工商业资本家的捐款，在夏坝逐渐建筑简单校舍，陆续建成的有：相伯图书馆、登辉堂、大礼堂、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教室，男、女宿舍，农场等。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孙寒冰教授由港至渝，回校任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文摘社主编。抗战爆发，孙寒冰生伤寒病在床，未能随校西迁。在病中，他布置汪衡、冯和法、汪宁士等去武汉出版《文摘》战时旬刊。一九三八年三月，孙寒冰病愈，他为了办好《文摘》，前赴香港、广州收集国外资料，一时无法回校，为了维持生活，便应了中山大学之聘，做了中大教授。实际上，中大由于日机轰炸，已经停课。孙寒冰集中精力办好《文摘》，他不仅致力于收集国外资料，翻译稿件，而且利用汉口寄来的纸型，发行《文摘》广州版。不久，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孙寒冰遂经香港、昆明到达重庆，继续在重庆出版《文摘》战时旬刊。孙寒冰“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和改善世界的诚”，他尽可能地站出来为真理讲话，“客观地介绍各方面的言论和我们所生活的今日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使读者够能从事实

的印证找出真理的所在，能够跟着世界的前进而前进”。^⑩对于抗战，《文摘》坚持“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收集敌人必败的各种材料，披露出来，加强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⑪由于《文摘》坚持真理、坚持抗战、坚持讲“老实话”，虽然被国民党宣传部门扣发过稿件，在刊物上大开天窗，但却受到广大读者的爱护，成为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杂志。

一九四〇年五月廿七日，日机轰炸黄桷镇的复旦大学，教师宿舍王家花园被炸毁，孙寒冰教授殉难，死时才三十八岁。同时罹难的有文摘社书记汪兴楷、学生陈钟燧、王茂泉、王文炳、刘晓成、朱锡华等六人。全校师生，同声哀悼。^⑫由于校舍被炸毁，损失惨重，仓促间难以恢复，学校遂宣布本学期暂时告一段落，下学期不放寒假，以补足所缺课程。

一九四〇年，复旦校长有了变动。钱新之多次向校董会提出，辞去代理校长的兼职。这年五月，校董会同意钱新之辞职，任命副校长吴南轩为代理校长。^⑬一九四一年一月又任命江一平为副校长。江一平原为复旦大学学生，同时在东吴法学院学习，毕业后担任律师，和虞洽卿的女儿虞澹涵结婚，当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华董”，抗战期间担任参政员，一九四〇年来校任总务长。负责校舍建筑。江一平任副校长后，介绍其兄弟江万平来校任总务长，继续搞校舍建筑。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五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四一次会议决议：“准将复旦改为国立，由教育部拟具办法及概算呈核”。^⑭从此，复旦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

先是，复旦大学迁至重庆后，吴南轩因经费困难，就想改为国立。一九三八年四月，吴南轩向李登辉校长提出这个想法。李校长不赞同改为国立，他认为改国立以后，学校名称、编制可能变动，而且带来“政治影响、易长纠纷”对学校不利。李校长还指出：“过去国立大学，如浙大、暨大等，屡经变迁，于

学校进行，阻碍至多。”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吴南轩第二次谋求国立，他以复旦校董于右任领衔，分电李登辉校长和在沪校董，表示经济万分困难，“舍国立别无生路”。李登辉等人复电提出：“改组后经费如何保障，校董会是否存在、沪校如何维持、附中地点成为敌人藉口没收如何避免”等问题。吴南轩答称：“国立后经费列入国家预算、自有保障，校董会名义无存在必要……沪校不必冠国立名义”李校长据此表示：沪校“仍沿用私立名义维持现状”、“依教部十七年原案继续办理”，实际上准备渝、沪两部分立。对此，吴南轩及重庆校董复电云：“沪渝两部，如属一体，本无公私之别，若同一名义，而分国立私立、教部断难见准”，以后又云：“改国立事经缜密商讨，为策万全而免流弊，宜以增加补助费为宜”，结果由教育部增加补助费十五万元，连前共三十万元，将国立案暂时搁置。^⑤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吴南轩第三次谋改国立，他在重庆邀集在渝校董开会，决议：“呈请教育部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俟部方决定后，再电留沪校董征求意见”。^⑥实际上是造成既成事实，逼迫李登辉等人承认。改国立后，意味着上海私立复旦大学全部财产将归国民政府所有。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寇占领，这一问题就搁置起来了。

重庆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后，由吴南轩担任校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上海日寇，进驻租界。李登辉校长宣布学校实行“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李登辉匿居深藏、杜门不出，可对学生在政治上仍极关心，他通过为毕业纪念册写序的方式，教育学生：“发挥牺牲与服务的精神，以爱护其国家，抵御不良环境的诱惑。”一九四二年十月，敌伪方面准备将圣约翰、光华、大夏、复旦四校合并为联合大学。学

校根据李校长意见表示，学校“内部组织行政深愿不受干涉”，“倘不获当局谅解，无殊完全令其停办”。^{①7}敌伪无法可施，终于将此案取消。正是在李校长及全校师生的坚持下，拒绝了敌伪的干涉，保持了民族的坚贞。

抗战期间，上海复旦大学补习部学生中，不仅有国民党、三青团等地下组织，而且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任务，开展工作。起先是分散活动、个别联系群众，一九四四年以后，则利用合法形式，组织基督教团契，比较广泛地开展讲座、唱歌、联欢等活动，使处在黑暗和苦闷之中的青年，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任命章益为复旦大学校长。原来教育部拟调吴南轩为中央大学校长，以章益继任复旦校长。中央大学师生以吴南轩资望不高为名，拒其前往。教育部遂改调吴南轩为国立英士大学校长。^{①8}但英士大学远在浙江乡间，吴南轩不愿前往，遂留在复旦任教育系教授。

抗战期间，全国著名文人、学者、科学家，不少都集中重庆，仅北碚就设有中央研究院的下属单位、国立编译馆等学术机构。复旦自改国立以后，经费较前充裕，又注意建筑教授宿舍，聘请了不少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吕振羽、任美锷、陈子展、章靳以、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方令孺、洪深、樊弘、李蕃、张明养、张志让、潘震亚、韦恂、张光禹、李仲珩、邓静华、钱崇澍、秉志、童第周、卢于道、陈维稷、严家显、吴觉农、毛宗良、陈恩凤等人。发展为五院、二十二系科组的综合大学，虽然当时图书、仪器仍嫌不足，但学术地位较前有所提高。

抗战期间，重庆复旦大学是大后方的著名民主堡垒，复旦

的中共地下党员组成的“据点”，团结广大民主教授、进步同学积极开展斗争，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认为是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

一九三七年底，复旦西迁重庆以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漆鲁鱼来校与地下党员沈大经取得联系，逐渐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一九三八年秋，随商学院、新闻系、经济系迁往重庆市区菜园坝，地下党支部也分为二个。在菜园坝，党支部发动同学组织课余读书会，建立妇女慰劳会支会、筹办民众夜校，编辑《复旦新闻》，进行抗日宣传。在黄桷镇，党支部成立抗战文艺习作会，出版《抗战文艺》大型壁报，邀请进步作家来校报告，参观煤矿、调查矿工生活，举办平民夜校，提倡抗日教育，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为避开敌机轰炸，重庆市区的商学院等迁回黄桷镇。党组织又合并为一。

一九三九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校内三青团作过一次尖锐的护校斗争。那年，学校里成立了三青团，有团员二百余人，与校内托派教师相互声援，气势颇为嚣张。一次，历史系教授、托派分子李建芳，在空袭警报中，不遵防空规定，身穿白衣在外边行走，并与值勤士兵争吵致殴。当地驻军已按学校要求，派肇事士兵向李道歉，但李乘机大哭大闹，三青团员则辱骂和殴打前来道歉的士兵，以致地方驻军提出学校要处分为首的三青团学生，否则将撤走军队，不再保护学校安全。同时，又传来大股土匪集结要洗劫复旦的消息，一时人心惶惶。吴南轩副校长束手无策，扬言辞职不干。党的地下组织此时发动校内学生团体，提出“护校”、“反破坏”的口号，责令殴打士兵的三青团员自首，由学校给予处分。同时建议学校，利用“七·七”二周年机会，发起军民联欢，消除隔阂。由于，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使人心安定下来，从而也打下了三青团和托派分子的嚣张气焰。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校内传出要逮捕一批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消息。在中共北碚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我校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二十余人，全部安全撤离，使国民党的阴谋落空。留下的个别党员，暂时也停止任何活动。

但是，学校内的许多进步青年，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希望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力求进步而斗争。一九四三年，中共南方局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在复旦成立了“据点”，这种“据点”，无名称、无章程、不定型，杜栖梧、杨育智（何燕凌）、金铿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酝酿串连，和张增淮（宋铮，女）、张厉冰（康涛），马杰民（马根荣）、张秉寰（张冰浣）等七个共产党员组成“据点”。“据点”成立以后，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直接领导下，在校内组织起一批进步学生团体，出版了《夏坝风》，《文学窗》等壁报，并和其他学校合作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还举办了各种晚会和座谈会。复旦“据点”还组织各种进步学生团体，如十月同盟、系联（各系民主学生联合会）、德社（D社）、菊社、十兄弟、民主青年同盟（U、D、Y）、复旦核心、复旦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北碚地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组织。当时，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的同学有一百二十多人，团结了七百多同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队狼狈溃败、丧地千里。十二月二日，日寇前锋到达贵州独山，重庆震动。复旦“据点”发动全校师生讨论形势，名曰“国是讨论会”，许多同学提出，如果日寇打到重庆，则准备就地打游击。洪深教授提醒大家，“打游击不仅要准备草鞋，而且要多带盐巴”。其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布置青年学生深入四川农村，复旦同学去了一批，并在农村建立起新的“据点”。

一九四五年春，新四军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要求南方局输送干部。复旦“据点”动员同学去中原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的，有一百多人。

在一九四五年，复旦还发生了两起反对特务的斗争。

一起是反对特务迫害费巩教授。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复旦校友、浙大教授费巩，从重庆千厮门码头乘船来复旦途中被特务绑架，复旦师生发表告各界人士宣言，呼吁援救费巩教授，使他早日恢复自由。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绑架，但后来资料表明，国民党特务残绝人寰，早把费巩教授推入硝磺水池中，毁尸灭迹，使救援活动没有结果。

一起是反对特务陈曷德的斗争。复旦三青团头子陈曷德，平时腰挂手枪，在校耀武扬威，他为了牟取暴利，控制复旦渡船、超载覆舟，见死不救，致令束衣人、顾中原、王先民等三同学溺毙。事发以后，章益校长声言辞职。校内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当时教育部长已由陈立夫换为朱家骅，朱与章不同派系，可能乘机撤换章益，派来亲朱的校长，对处理善后不利，决定团结同学、教授、挽留校长，集中力量揭露陈曷德，使校方解除陈的职务，并送法院审理。在进步教授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在追悼会上，揭露了特务分子的横行不法，狠狠打击了反动分子的气焰。

重庆复旦大学的师生，正是在这一场场的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去迎接黎明前的战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又转入了新的一页。

注释：

①⑦顾仲彝：《大学西迁记》，见《复旦同学会会刊》，第六卷第十一、二期，第166页

②③④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五号，案卷2691号

⑤ 林黎元：《行云流水》，见《复旦同学会会刊》，第十三卷第四期。

⑥⑦⑩ 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919卷

⑧⑨ 《校闻·大学部》，见《复旦同学会会刊》，第七卷第一期

⑪ 《文摘》战时旬刊，第68、69号，1527页《编者的话》

⑫ 《孙教务长训话》，见《复旦大学校刊》（复刊号）

⑬ 《复旦大学校刊》第十二期

⑭ 1940年5月31日，重庆《新民报》，第三版

⑮ 《复旦大学校刊》第14、15合期，1942年1月1日出版

⑯ 吴南轩：母校改归国立之校史文献（摘录），见台湾《复旦通讯》第三十期。

⑰ 江泽宏回忆；又见1943年2月20日，国民公报第二版

附录

一、大学西迁记

顾 仲 彝

沪战爆发、复旦正在徐家汇办暑校、上课才两星期、当时人心慌乱、学校当局宣布停课、暑校草草结束、学生遂星散。

九月中一部分教职员提议仿照一二八办法、在徐家汇继续开学、使学校生命不至中断、蒙学校当局同意、拟定办法、通知各同学来沪上课、应者极少、延至九月二十日登记者尚不满三十人、遂决定取消开学。

时教育部派员来沪指导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开学办法、教部主张将复旦大夏光华大同四私立大学合并成一联合大学、虽经多方接洽，且已将内部组织商议定妥，不意大同光华中途退出、由四校联合而改为两校联合。

大夏复旦当局经长时间讨论、并组织一联合行政会议、商

议合并办法、复旦方面参加行政会议者为吴副校长章教务长殷总务长金院长及孙主任、前后开会十次、将两校教职员名单决定。

吴副校长与大夏欧副校长先往内地察看地点、请求部贴、结果蒙部批准每月津贴二万五千元、惟以在贵阳须设第二联大为条件、吴欧二校长看定牯岭临时校址后、遂电告沪上同事、两校聘定同事遂纷纷向牯岭进发。是为第一联大，由吴副校长主持。

牯岭校舍为普仁医院旧址、学生宿舍借设于避暑旅舍、学生人数为九百余人、复旦学生占大半。

十一月中沪战骤变、国军西退。牯岭本为要人家眷避难汇集之处，闻此恶耗、纷纷下山西行至川、中央政校亦决定于必要时西迁、于是校中惶惶不可终日、每日晚间开校务会议、商量迁校问题、教部津贴因迁都关系、二月未发、所剩经费只敷一月开支、此亦为西迁原因之一。

惟学生大半来自江浙、学校西迁、学生家乡有已陷入战区、有已汇兑不通、西去东归、不知适从、惶惶然寝食不安、幸得陈立夫先生惠助万金、且代向政府请求拨差一轮艘、始得成行。

十二月一日差轮永利轮到九江、学生遂于二日下山搭轮、随校西迁者共三百余人、余俱散归家乡、在宜昌候船半月、分三批搭轮入川。

到重庆时已近十二月底、幸复旦中学已放假、遂暂借该校继续开学、学生大半住于复中、一部份住于附近某小学中。

第一学期至二月中结束、承省政府津贴建筑费伍万元、并觅定重庆北之北碚黄角树镇为重庆复大永久地址、于三月初迁至该镇、租屋准备、最近接得来电、谓三月底即可开学。

联大第二校设贵阳、由大夏欧副校长主持、随去者什九为

大夏学生、故自西迁后、名义上虽称重庆为第一联大、贵阳为第二联大、实际上前者即复旦、后者乃大夏、已名合实分、旋即由两校登报宣告、以重庆为复旦所在地、贵阳为大夏所在地、至是联大之名遂废。

上海方面因学校西迁后、数百同学无法随往、借读在外、原非久计、且沪上环境目下尚许教育之独立、于是数百在沪同学联名请求李校长救济、李校长经多时考虑后、觉(一)重庆过远、在此交通阻隔时期、前去甚非易事、且旅费亦过昂贵、(二)借读他校、原系不得已办法、惟学校课程制度及精神多有不同、学生至感不便、实属实情、(三)光华大夏在重庆贵阳与沪校同时开学原为战时暂时办法、复旦当可仿照、而华东各大学、如东吴之江金陵俱迁沪开学、若复旦单独在沪停办、学生势将星散、他日若欲在沪恢复复旦、势不可能、(四)上海租界环境与前无异、当以最后一课精神维持复旦在沪之根基及救济复旦失学之同学。

李校长复商得钱代校长及重庆方面之同意、遂于二月十五日在上海英租界北京路中一信托大楼临时校舍开学、二月廿一廿二两日注册、廿三日正式上课。

现有学生四百十人、教员四十四人、除新闻及生物两系暂停外、余四院各照常开班、计共开三百小时、课目九十余门。

以上摘自《复旦同学会会刊》第六卷
十一、十二期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

二、母校被毁简报

费 珏

沪战再作、江湾陷入战区、战后疮痍满目、到处皆败垣残壁 母校校舍地当要冲、亦未能幸保。战起一月后、曾有人冒

锋鏖回校视察、摄得照片四帧。体育馆已夷成平地、但见一片瓦砾。图书馆屋面被毁、贰层亦毁损无余。第一宿舍屋面损坏虽仅一部分，而屋内则已炸毁无余矣，第四宿舍正面侧面皆毁。兹为铸版刊出、毁损情形有如附图、此犹为六个月前之事。战时才月余、吾军犹扼守淞沪未退、今日校舍所受损失、自远不止此。最近学校当局、曾托人设法回校看视、所得情报、则有不忍言者。简公堂、实中、及第五第七两宿舍已俱焚毁、躯壳且不存、遑论内容。第一宿舍当初与简公堂同时建造、为宿舍中完成最早者、今亦中炮弹至多、仅至一空壳。第四宿舍水泥钢骨、为宿舍中之最精美坚固者、今亦全毁、与毗邻之体育馆同成瓦砾之场。登辉园即燕南园、亦即校园、落成曾几何时、亦已弹痕累累、此后更无胜景可寻。号称东宫之女生宿舍屋顶已经飞去。图书馆东边已毁，西边较好。全校幸尚存在之处、惟卫生处及合作社。他如校外之进步宿舍、同兴村及霞庄学圃等处、亦皆毁于炮火。总之、学校内外、尽成邱墟、无瓦全可言。巍然独存者、惟子彬院。子彬院原本受损较轻、今且已由日人修好、亦异数也。马达间木匠间亦然。母校被毁之情形、大略如此。创业维难、乃蒙浩劫。痛定思痛、岂仅太息。复兴再造之责、吾侪尤不容辞。

以上摘自《复旦同学会会刊》第六卷
第十一、十二期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

三、入川后之本校

吴南轩

我们的学校，由沪滨迁入四川，是不幸，也可说是大幸。巍巍学舍，沦于敌手，三十载经营，废于一旦，逼得我们千里长征，半年颠沛，得喘定息于荒村茅舍之间，这可以说是不幸，

然而在相反的一面，也正唯敌人的炮火，使我们这支文化队伍，得有机会开入夔门。列阵于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四川，能更直接的参与这一次存亡绝续的民族大搏战，这可以说是大幸。至于员生生活上的颠沛困苦，更不妨当作环境对于我们的磨练，时代对于我们的洗礼看。

复旦内迁的历史，第一阶段是在匡庐与大夏合校的历史，庐山这名称，将来会永垂简册，长被后人所纪念的；抗日准备，于此发轫，和战大计，于此商决；而浔阳撤兵以后，又有英勇孤军的守护。我们的学校，得在那民族圣地，留些痕迹，未尝不是一件荣幸的事。但我们在牯岭上课，不过一月，战局剧变，江南师溃。这是抗战以来，民族国家所遭遇的最险恶的一个关头，也是抗战对我们的学校生命的一次最严厉的测验。学校虽未致瓦解，然而也走散了一部分同人同学，当学校再迁的消息颁布以后，同人同学间的彷徨烦闷，悲愤痛苦的情形，以及这以后的流连颠沛的生活对于身处其境的人，印象是够深刻的。

我们的学校与民族国家共运命：随国事之动摇而动摇，随国事之稳定而稳定。员生五百余人，于跋涉一月之后，到达行都。四川原多复旦校友。而前年李校长的入蜀，尤为“吾道西行”打了前站，于是在地方人士热望与赞助之下，学校在重庆菜园坝复旦中学校址继续上课。秋季学期结束之后，经一个月之筹备，与友校大夏分立以后的复旦。又出现在离重庆百五十里之遥的北碚黄桷镇上。

黄桷镇是嘉陵江畔的一个荒镇，人烟稀少，屋宇湫隘，自然没有现成的校舍可资应用。于是以庙宇为办公厅，以煤栈为宿舍。大风雨之夕员生衣被之淋漓，毕业典礼席上瓦片的飞坠，都是我们校舍简陋的最好说明。在物力人力，两俱拮据的种种困难情形之下，我们的学校，居然能撑持下去，并打出了一个相当的局面，为日后的发展，铺就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我

们不得不归功于在李校长领导下的先先后后的复旦同人同学在三十年间所辛苦缔造出来的一种学校资本——复旦精神。

本年暑假，此间各院系毕业了七十位同学。虽值国土日蹙，万方紧缩之秋，就业人数，乃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会计，银行，土木工程，经济学诸系，各方函商徵聘，几有供不应求之观。而暑期中的两次新生招考，其投考人数之踊跃，录取标准之严格，尤为三十年间所仅见。这种种，说明了复旦在川中立校。实在是民族国家，与地方社会的需要。

最近钱校长，杜校董等入川视察，在校史上又写定了划时代的一页。他们肯定了复旦永久留川的主张。肃清了学校在四川或为暂时的观望态度，也即是排除了建设学校的心理阻碍。并各自捐巨金，首先提倡，以推动学校的建设；并决定了学校以后的扩展计划。从此学校将由稳定而向发展之途迈进。

今年春初，上海有同学数百人，以入川不便，请求李校长设法救济。于是遂有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的设立。教授职员，强半为旧人，李校长虽因敌人注视，息影蛰居，实际上仍负有指导的责任。四川方面，又为教授兼课与学生实习方便起见，于本学期将商学院全部、文学院之新闻学系，以及法学院之经济系二年级以上的学生，迁重庆菜园坝复中旧址上课。本学期注册人数，计上海六九五名，重庆二五九名，北碚四三六名合计一三九〇名。

入川以后的学校生活，与江湾时代有什么不同？第一，是学生负担之减轻。本校是私立学校，过去学校开支，大部取资学费。今则仰给于政府按月之补助；学杂各费，已酌量减轻。战区学生之经济来源断绝者，不但免缴学费，而且由学校转呈教部核发每生每月八元之贷款。上学期受此项救济之同学共一五八人，本学期共二四八人。时人所诟病的教育商业化的意味，随之而逐渐减轻。第二是师生生活之平民化。现在我们住的是

陋巷虽未至“曲肱而枕”，而睡的却是叠床。吃的是六元一月的伙食。（由学生自办，教职员大部参加）。穿的是师生一致的用本地土布制成的制服。假定“贵族化”三字是讥讽，那么这种讥讽现在已经给我们洗净了。第三是师生关系的改善。北碚教师以专任者居绝大多数，与学生同样散居镇上；师生之间，关系自然密切。上学期起，又根据部令推行导师制。专任教授与讲师，以每人指导学生五名至十五名为原则；但仍然给予学生以自由择选的机会，从此师生学问切磋，道德磨厉，在江湾时代梦寐以求之的专任教师百分比的提高，以及师生关系之接近，在这里居然成为事实了。第四是社会服务的提倡。社会服务与学术研究，同为大学教育之任务。自北碚建校以来，我校员生，颇能与地方民众打成一片。推行的社会服务事业：有举办民众共乐会，举办民众学校，参加或主持各项纪念，与地方人士合作响应寒衣运动等各项政府号召，襄助三峡实验区署编辑嘉陵江日报，参加区署之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揭刊民众报……以上种种，或为某一学系所主持，或为全校师生所共作。本学期为加强社会活动起见，又创设了“社会教育委员会”，由学校聘请委员七人组织之；并依工作种类，下设八组：（一）民众宣传组；（二）民众家庭访问组；（三）民众训练组；（四）民众学校组；（五）民众副业指导组；（六）民众卫生组；（七）民众法律咨询组；（八）民众娱乐组。各组设组长一人，顾问干事及服务员各若干人，由学生认定组别，参加工作。如宣传组由该组队员分组宣传队，话剧队，歌咏队，去从事抗战救亡的宣传，民众训练组则以襄助本地保甲壮丁之训练为任务……举此二例，可概其余。“深入民间”的口号，在大体上是兑现了。第五是学术空气之浓厚，北碚离重庆百数十里，虽则嘉陵江上，一棹可通，来往究竟不便，同人同学，鲜有在行都流连忘返者。心不外骛，学术空气，自然浓厚。全校共有学生团

体十八单位，以研究学术之各项学会，占绝大多数。虽则图书设备十分简陋，但研究成绩，尚有足称，本年五月五日校友节上举办的成绩展览会，即是全校师生入川以后研究成绩之总检阅，各学会的活动，有编辑刊物，编制书籍图表，举行座谈会，聘请名人演讲等。第六是一般生活之严肃。目前的学校，训育尚严格，管理军事化。清晨广场升旗，临睡宿舍点名，入晚黄桷镇上，深巷吠声断续之外，万籁俱寂，荒村疏落灯火之外，荒凉一片；本期同学自然不得不得于青灯之下，与书卷相亲，本学期起北碚一年级新生，晚间集中自修，由教员担任英文数理指导。施行以来，颇著成效。其迁渝各院系在筹备迁移期间，我们颇多顾虑重庆物质诱惑太多，足以影响学生之修学。但事实表示：每宵点名时，即在周尾请假外宿的亦不甚多。同学夜间的光阴，大都是消磨在图书馆，研究室，教室，实习室中的电灯光下的。对于这点意外的成绩，我们感觉十分欣慰。

假使读者根据前文所叙述，遽以为此间师生生活，除枯燥刻苦以外，他无所有，那就是因为我们描绘有遗漏之故。庇荫我们的屋宇之简陋，有环绕我们的大自然之优美作补偿。北碚有山有水、风景畅丽，春秋佳日，或则濯足嘉陵，听船夫之邪许怒吼，或则岗峦凭眺以嘉陵三峡为园沿。至于周末的温泉沐浴，尤有令人心旷神怡之妙处。

我们的学校，原设四学院十三学系。除工商管理系遭部令分期结束外，上学期文学院增设了史地学系，商学院增设了统计学系，本学期理学院又增设了垦殖专修科。史地为一切社会科学之基础，史地研究与抗战建国的关系，尤为密切。至于统计学之列为专系，在国内大学中，犹为创举。而二年制的垦殖专修科之设立，则所以针对四川地方之需要，为开发四川培植人材。该科自筹备至设立，不过数月，而预拟的计划以及业已实现的事功，已有可为外人报道之处。该科师生半日讲堂研习

半日垄亩操作。知行合一，教学做一致。现有广大农场寓教学设备于生产设备之中；其内容分为四部：

（一）作物部各种稻麦棉豆……之试验，育种，与繁殖。

（二）园艺部（甲）各种果树品种之改良及繁殖，（乙）各种优良菜蔬之栽培，（丙）各种花卉之栽培、树木之育苗（丁）利用温泉天然热源，建造大温室，以作促成栽培及栽培热带植物之用。

（三）畜产部（子目不详举）

（四）农产制造部（子目不详举）

以上各项，将依学校经济情形，逐步推行。现在首先实行者，已有作物之试验，花果蔬菜苗木之栽培，乳羊之饲养，科学酱油之制造，学校的计划，俟农场经营就绪后、添设农学系以为将来设农学院更进一步之准备。本校又鉴于矿冶为一切工业之母。于抗战建国中之过程中，尤为重要。而国内矿务人才，寥若晨星，因有筹设矿冶系的预计。其详细计划在拟具中。又最近社会各方需要，统计人才孔亟，本校拟办二年制之统计专修科。一俟筹备就绪后，即可开办。

以上是我们对于大学教育如何与抗战建国之需要相配合的这一问题之总答覆，也就是我们学校目前办学方针之说明书。

我们的校舍，散处于黄桷镇的每一角落，到处是复旦，但没有一处特别是复旦。这一点颇与举世竞称的牛津剑桥，同其风味。但人数日增，庇阴无地。而且简陋过度，究与员生之日常卫生，研究效率不合，所以已在离黄桷镇不远之东阳镇勘定永久校地，广约千亩，业已呈奉教部、省府准予徵用，建筑计划，将以“相辉堂”之兴建开其端。此次钱校长杜校董入川首先慨捐巨款，倡议建筑此堂，并囑即日动工，期于来春落成，恭迎马李两老校长莅临颐养，一部分也可充学校教学之用。紧随着“相辉堂”之后，将有宿舍，课堂，饭堂之兴建。宿舍取

营房式，以便军事管理之推行。饭堂将兼为礼堂及自修室，可以三用。上述建筑，但求适用，不务美观。这是第一期建筑计划，而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之建筑，则列入第二期计划之内。科学馆是各科综合的。图书馆内将有足容全体同学自修之阅览室，及各院系之分科研究室，以及各教授之个别研究室。第三期计划，包括工程馆，农学馆，社会生活馆。(Social Hall) 在社会科学馆中将有各种研究室，音乐室，游艺室，食堂，合作银行及商店等，举凡师生一切课外活动，休闲生活，将以此为大本营，最后期计划则包括各分科科学馆(如化学馆生物馆)及分科工程馆(如土木工程馆、矿冶工程馆)等，经费方面，目前已有四川省政府拨助的五万元，及教育部拨助的五万元为大宗，其余不敷之数，可以随建设计划之展开而逐步分头筹募。至于校地，除上述千田之地，在徵收中外，另有购置者一二十亩，租用者数十亩(现充农场之用)以及地方人士“献地”两起各十数亩。

我们属笔至此，心里不禁有些害怕起来。害怕的是：有人看了这篇文章，以为在这风雨飘摇之日，居然侈谈建设，大兴土木，何啻痴人之说梦！但我们的种种计划，都建筑在两大假定之上。第一，民族定然有望。第二学校永久留川。诚如民族失败论者的想法，抗战终归失败，建国无可完成，则目前的种种建设，自然是徒劳，但我们对中国的前途，有坚定的信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而本校的种种建设发展在战时所以助成抗战之胜，在战后则谋促进建国之成。第二，我们的学校要在四川生根，在战时，也在战后。依我们的估计在战争结束之日，四川的富源，一定已在抗战建国过程中，有大规模的开发，全国的主要工业，一定已在四川确立其基础，并永远生根于夔门之内。政治文化是跟着经济跑的，四川的政治文化地位之重要将随经济地位重要性之提高而提高。在那时候，我们的学校、

殊无搬回去的必要。我们尽可不忘情于我们的上海发祥地。这种怀旧之情，可以在江湾原址分设若干院系的形式来表现它，但绝对不须整个搬回去。

但我们对学校的前途，也不敢作盲目肤浅的乐观。前面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与波折，正象在“必胜”“必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波折一样。目前人力的不够是显然的。我们虔诚恳祷马李两老校长，于来春“相辉堂”落成之后，翩然飞来。就近指导。马校长天下之大老，民族之至宝；李校长为复旦之保姆。二老之来，对学校是一种绝大的“烟斯披里纯”。一部分旧日同人，暂时离去，不克入川的，我们也切盼他们陆续归来，共同参加工作。新的教职员，也自必络续延聘，以充实我们的阵容。南轩忝佐校务，不胜任重才轻之感。假若这篇报告能获得各地校友、闾校师生，各界人士，对学校更多之同情，爱护，努力或赞助，那就算不虚此作了（完）

以上摘自复旦大学校刊（复刊号）

一九三九年元旦出版

四、李登辉复吴南轩等函

南轩副校长暨通尹弟有道：

函电先后诵悉，弟等率校西迁，千辛万苦，为我复校留一部分元气，近更有北碚大计，具见宏才策划，笃志经营，衰老如辉，闻之亦甚欣慰，来电谓仍用联大名义，拟以复校在重庆开学，大夏在贵阳上课，未识究属如何？如此似合似分，是否有顾此失彼之虑。日前友三来函，述及部意，亦主张各校自立，各谋上课，谅友三亦有专函告及。查去秋我校与大夏联合西迁，组织联大，原是一种临时救济办法，本非远久之计。即以我校而论，同仁同学，刻苦经营，凡四十载，始有今日光明灿烂之

成绩。倘今后舍复旦名义，而以联大为号召，岂不万分可惜。再以弟等西迁情况以观，到处备受热烈欢迎，可见我复旦精神，自可不灭，且更可自信。我等过去办学，功过已在人间。故保存复旦两字，是我全校员生不易之信念。弟等北碚计划，实开复校未来之基，辉当以告老之年，与诸同仁共图复校将来之发展。惟北碚交通如何，对于前途，能无阻碍，尚望诸弟从长计议。至于此次我校在沪复课，是有事实之必须。自沪地各大学纷纷开学后，我留沪同学，即一再前来询问，并迭次请求上课，以免此期失学。辉与留沪同仁，熟商再四，认为沪地暂局，尚属安全，并无任何干涉，且教员学生在一堂作学问上之研究，聚散亦易，抱定“当散即散”之宗旨，谅亦不致有何意外，来函谓“玉石不辨，泾渭同流”，此固仁者之言，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辉一生从事教育，大公无私，为功为罪，后人谅有定评，此间数百青年，余当不忍坐视其长期失学。况我校自西迁后，人数突减，影响前途，至为重大。此亦沪校不得不谋复课，以求补救者。弟等进行北碚计划，谅亦想及沪地是我校根基之所在，非至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放弃。辉意重庆复旦，是整个复旦之一部分，以重庆环境而言，似以办水利、农业、矿产为上策。上海究系人文所在，似仍办文理法商为宜。若他日无锡计划可成，则我复旦前途，发展有自矣。辉年事已高，精力日竭，此种愿望，何日可观厥成，尚在未定之天。但爱我如弟等者，当可有以慰我而竟吾志。现川中情况如何？校舍建筑何时可以完工，尚望随时告知为盼， 崑复并颂

教绥

李登辉启1938年3月13日发出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919号

五、吴南轩、金通尹致李登辉函

腾飞吾师赐鉴：

经时不承教，维杖履清嘉为颂。顷闻大夏大学有进行国立之说，本校自有其历史，此事原无足轻重，惟目前经费已甚困难，万一将来情势推移，或亦有此进行之需要，惟校名必须保存，校董会必须继续存在，以此两事为前提，不知师意如何？谨先请示，以便遵循，肃此敬祝
钧安

受业吴南轩、金通尹敬上1938年4月22日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919号

六、李登辉再复吴南轩、金通尹函

南轩、通尹仁弟如晤：

四月十日、廿二日所发来函，均已诵悉。前寄三月十三日复函，系在联大决议登报取消之先，辉故尚有提出保存复旦名义之议，今我川校于千辛万苦中在北碚正式复课，匆匆间同学来归者已五百人，教职员亦有六、七十人，且开办院系，已复旧观，闻之尤慰，函谓根据实际需要，本学期文学院添设史地学系，商学院添设统计学系，下学期拟增农学系及垦殖班等，更觉切合川省环境。辉意乡村合作事业以及农村经济等问题，亦为需要之课目，在下学期农学系开课时，可作为必修学程，得造成农村健全人才，至于拟添聘康、卢、贺四位先生担任校董，当请新之先生分别函聘。此外高泳修、蒋志澄、颜伯华三位先生可否一并邀致，俾一时川中群彦，尽在我校。又大夏进行国立，内幕如何，来函未能详述，以我校经济状况而论，亦

有进行之必要。但兹事体大，辉亦不便擅专取决，将来可俟校董会考虑决定。然有数点，须慎重注意者：私立改国立，原来学校名称、学校行政，能否一贯继续，校董会组织以及现在学校编制能否保存不变，他若政治影响、易长纠纷，是否可以免去，过去国立学校，如浙大、暨大等，屡经变迁，于学校进行，阻碍至多。此问题辉意可静观大夏进行如何，再加考虑。因我校除经济一项急于请求援助外，其他并不亟亟谋改变也。再今后川沪我校，对内对外最好不用分校名义，而称复旦大学重庆部、上海部为妥。现北碚立基伊始，头绪纷繁，辉原拟到川一行，与诸弟共商大计，惟此间情形不定，远行殊不放心耳。以文弟大、中两处兼顾，亦甚忙碌，且病后体力未便，恐一时尚不能长途跋涉，如吾弟能来沪详谈一切，则更所盼望，余容后告，顺颂

教授

李登辉1938年2月5日启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919号

七、关于改国立的电报文件

1. 于右任等：致李登辉电报

兆熊兄请速译，转霞飞路1886金通尹、殷以文两兄转李校长，本校学生，什九无力缴费，收入锐减、腾挪移借，诿能维持三月，前途困难万状，各私校情形，大致相同，纷谋国立，大夏已准，本校渝港磋商，咸以舍国立别无生路，当局同情，谅可照准，惟复旦名义仍须保留，是否可行，请征询沪校董及校内同人意见裁夺电复。右任、哲生、楚沧、力子、天放、井塘……叩筱（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

2. 李登辉等：复于右任等电

右任先生转诸位先生，筱文电均奉悉。渝校经费困难，请改国立，极佩苦心，惟改组后经费如何保障，校董会是否存在，沪校如何维持，附中地点或为敌人藉口没收，如何避免，筹画所及，均盼电示。登辉、问洙、以文、晓初、一平、玉书马（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一日）

3. 于右任等：复李登辉等电

以文兄转陈李校长暨诸先生：马电诵悉，经与此间校董、校友磋商，国立后经费列入国家预算，自有保障。校董会名义无存在必要，同仁当仍本往日精神为校服务、沪校不必冠国立名，并当速谋补助，时机迫切，祈速裁夺电复。右任等有。（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4. 李登辉等：复于右任等电

沪校决依电示，不称国立，仍沿用私立名义维持现状。惟沪渝既有国立、私立之分，沪校自以依教部十七年原案继续办理为是，如何盼复。李登辉、郭仲良、赵晋卿、江一平、王伯元、金通尹、奚玉书、周越然、叶季纯、朱仲华叩鱼（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

5. 吴南轩：致李登辉电

李校长钧鉴：改国立事，经缜密商讨，为策万全，而免流弊，金以增加补助费为宜，改口问题，决予搁置，此项办法已得当局同意，特此电陈，余容函详。生南轩叩艳（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6. 吴南轩：致李登辉电

李校长暨金通尹、殷以文诸兄，国立决作罢论，补助费年增十五万元，特达，南轩敬（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以上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919号

八、母校改归国立之校史文献

吴南轩

.....

“渝校由二十八年春季继续勉力撑持又两年有半，至三十年秋季，通货益形恶性膨胀，物价如野马之飞腾。学校经济真达山穷水尽之境。不改国立，势必中辍。于是在渝校董及同人又恢复国立前议。于三十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在重庆嘉陵宾馆召开极有历史性之重要会议。到会校董校友有于右任、贺国光、康心之、吴铁城、张道藩、章益、端木恺、程沧波、许绍棣、江一平、吴南轩等，除报告讨论一般校务外，详细研讨改归国立问题，通过决议案如下：‘呈请教育部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俟部方决定后，再电留沪校董征求同意。如留沪校董表示异议时，再行集会讨论’。

此次先呈部、后征求留沪校董意见之决定，虽在手续上不免稍嫌欠妥，然为当时本校所面临万分迫切之危机，争取时间不得不采取最迅速之救急方法。”.....

摘自台湾《复旦通讯》第三十期第二十四页

九、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

倭之沐浴我文化也，殆二千年矣。不谓今日倭寇所至，焚[毁]我文物，破坏我学校，辱戮我师儒，屠杀我子弟，迹其凶谋[恶]行，显欲毁灭我文化，乃至摧绝我创造文化之精神，冀以偿其侵略之大欲。论者以为我国抗倭之战，为文化与反文化之战，理性与反理性之战。呜呼，观于我复旦大学，去岁五月二十七日，师生罹难之惨，以及校舍、图书、仪器之被炸毁，

谓非倭寇之〔反理〕性，蓄意与我文化为敌，而谓之何哉！？是日罹难者，为〔我校〕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先生，文摘社职员汪兴阶先生，同学陈君钟燧、王君茂泉，王君文炳，刘君晚成，朱君锡华，伤者多人未计。呜呼！惨遭寇弹，哀同国殇，全校师生，悲愤无极，将何以淬励我为文化工作之创造精神乎？抑何以益自坚强我为民族生存之战斗意志乎？是则吾辈后死者之责已（矣）。礼葬既毕，幽窆以安，爰为伐石纪事，系之以铭，用诏万世，□□〔不忘〕寇仇，其辞曰：

蠢彼倭奴，侵我上国。蹂若学府，文化之贼。死者七人，师生同扈。巴山以惊，巴水为咽。何寇之酷，而祸不测？易利御寇，诗美薄伐。雪耻除凶，誓报先烈！

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代理校长吴南轩

副校长江一平

中华民国立三十年八月 日立

摘自《复旦大学校刊》第十二期，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是光明的新中国和黑暗的旧中国激烈搏斗的时期，复旦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在这场伟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复员问题。

在敌伪统治时，复旦大学的江湾校舍，被伪上海大学占用。早在日本投降前夕，李登辉料定敌人灭亡在即，派人潜回江湾

校中察看，发现原学生第一、第二宿舍、女生宿舍、体育馆、校外宿舍等建筑物，已全部毁坏无遗，实中宿舍、第五宿舍均减去一层，宫殿式的简公堂已改为平顶，^①损失十分巨大。

蒋介石对复旦大学的复员问题，颇为重视。他示意教育部校址最好设于苏北。教育部即遵照其意旨洽办，初定海州，复改徐州，后因抗战前复旦曾受赠太湖边大雷嘴土地一千零十四亩为建校地基，确定为无锡。^②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重庆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乘飞机赴沪，联系迁校事宜。十月中旬与金通尹赴锡接洽，颇受当地人士欢迎。但无锡校舍尚待建筑，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校舍狭小，渝校师生渴望东返，因此决定先行迁回上海江湾复课，待无锡校舍建筑完成以后，再行搬迁。

江湾校舍，原为私立复旦大学校产。吴南轩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呈请改为国立时，并未征得李校长及在沪校董同意。这时，李登辉仍为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章益校长来沪后，劝说李老校长退休，并告知李校长，已向各地校友募集了一笔颐养金，“购存黄金五十七两，除献捐四成外，当计三十余两，此项存金，应请李校长晒纳”。^③李登辉拂然不悦，曾说：“我是办教育的，不是卖学校的”。^④经过数度协商，章益召开有关人员开会，说明大学部改为国立，复旦附属中学及复旦实验中学仍为私立，附中应改名为复旦中学，推举李登辉为两校董事长及校长，并任命何恭彦为复旦中学主任，朱祖舜为复旦实验中学主任。^⑤以后上海赫德路校舍归复旦实验中学使用，而复旦实验中学所租借中一大楼四楼校址，转归复旦大学《文摘》社使用。

但是，当时沪、渝两校合并，师生员工共计三千余人，江湾校舍根本不敷应用。其时，校外有日本兵营及伪上海大学的农场，于是学校向行政院及敌伪产业处理局要求将该批房屋、土地作为赔偿战争损失，拨归复旦大学使用，获得批准。这样，

学校土地面积扩大至三百三十余亩，接收校外房屋有庐山村（二层楼房二十幢）、徐汇村（平房二十九幢、二层楼房二幢）、淞庄（二层楼房一〇八幢）、德庄（三层楼房一幢）以及嘉陵村、筑庄等，比战前大为扩充，但仍不敷应用。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的土木工程系和化学系师生二百余人，先行迁回江湾上课。可是校房破坏严重，修理费时，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底，才初步修缮完工，其他各系陆续迁回江湾，于四月一日开学上课。

复旦大学重庆部分，一九四五年度下学期提前结束，五月十二日放暑假，分水陆两路复员，以陆路为主，经川陕公路、陇海、津浦、沪宁铁路返回上海，水路则乘轮东下，到九月份复员工作即基本结束。

沪、渝两校合并，学校规模较前扩大。首先是院系有了扩充，计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中文、外语、史地、新闻、教育、数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会计、银行、统计、合作、农艺、园艺等十九个学系、统计、茶叶二个专修科，海洋、司法二个组，史地、社会、茶叶三个研究室，以及统计资料室等。其次是教师阵容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强大，共有教授一百六十八人，副教授三十七人，讲师助教一百零九人。其中拥有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周予同、洪深、方令孺、章靳以、全增嘏、卢于道、胡曲园、漆琪生、张明养、梅汝璈、曲仲湘、李炳煥、薛仲三、陈恩凤、薛芬、钱崇树、秉志、严志弦、张孟闻、孙大雨、严家显、毛宗良、伍蠡甫、葛传棻、赵景深、顾仲彝、肖乾、肖承慎、李仲珩、孙绳曾、施霖、潘震亚、应成一、朱斯煌、张光禹、李蕃等人。

第三是图书设备略有增加，但仍严重不足。私立复旦大学因受经费限制，图书设备历来比较欠缺，改为国立时，正值抗

战后期，物价飞涨，物资缺乏，亦难以添置。一九四七年，学校当局已开始重视图书设备的添置，计新添图书一万七千余册，其中新购7118册，获赠10331册；校具1906件，生物系仪器558件，化学系仪器333件，茶专仪器108件，农院办公室仪器778件，农艺系仪器445件，园艺仪器1568件，其中有一部分是善后救济物资总署拨给的。虽然如此，由于学生人数激增，图书仪器仍然不敷应用。

第四是添建了一些必要的房屋，但用房仍十分紧张。一九四七年在国家拨款和校友资助下，建筑了大礼堂（登辉堂）、金工厂、小学校舍、农场仓库、农产加工厂及牛舍等。其中大礼堂成为学校的主要建筑之一。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对教育根本不重视，因而学校也难望有更大的发展。一九四六年初，学校第十六次校务会议议决筹设工学院，聘请金通尹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是这一计划，根本无法实现。一九四八年，学校向教育部提出增设生物研究所、农业化学系、工商管理系、水利工程系等，不获批准，章益校长曾以去就争。复旦同学会和校友江一平等人去电教育部长朱家骅，“务请大部迅予挽留，并为解除困难”，“必要系所，尤需增加”，朱家骅勉强同意增加生物化学和农业研究所、商业管理系，但要到一九四九年秋季始能开办招生，仍然是一句空话。^⑤

尽管如此，复旦在教育界的地位还是不断提高。一九四六年，投考学生为11616人录取四百余人；一九四七年，考生为12318人，^⑥仅取512人，学生的质量也有所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李登辉老校长提出了“复旦精神”的定义。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是复员以后的第一次毕业典礼，他对毕业生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你们穿过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

”一个大学毕业生，“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还需要团结。全体人民的团结，中国才有希望”。

“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⑥

“服务、牺牲、团结”。是李登辉先生的一生写照。四十多年来，他不做官、不牟利，尽力为祖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服务，为了复旦的生存和发展，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服务、牺牲、团结”，也是李登辉先生对国民党政府的谴责。他愤恨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和平、挑起内战，语重心长地说：“全体人民的团结，中国才有希望。”

“服务、牺牲、团结”，更是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师生、校友的嘱咐。这是一个爱国的老教育家的恳切希望，也是他留给复旦大学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李登辉就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了！

复旦师生没有辜负老校长的希望，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充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复旦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传统的学校，在抗战胜利以前已是一所国内有影响的学校了。它与昆明的西南联大同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派遣了不少特务学生，免考进入学校，妄图进行控制，因此反动势力相当强大，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分子曾多达二百多人。这样，进步师生和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就显得特别激烈。

不仅如此，国民党的各种特务机关都派人潜入学校，搜集情报，蒋介石本人多次干预学校事务，使校内进步师生的斗争十分艰苦。

尽管这样，复旦进步师生，从爱国民主的立场出发，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在地下党具体领导下，始终站在各项斗争的前列。

抗战胜利以后，复旦最初的斗争是环绕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而展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他抽空会晤了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陈望道和周谷城等人。复旦师生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方针。进步师生在夏坝新闻馆（被认为是“夏坝的延安”）收听延安广播、出版各种壁报，还专门组织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讨论会，老舍、陈望道、丰子恺等教授在发言中，强烈抨击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

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冲进昆明西南联大校园，镇压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师生，死四人，伤二十多人。重庆复旦进步师生召开各种座谈会揭露反动派暴行，表示抗议，同时也做好思想、组织准备，应付敌人可能的镇压。上海复旦师生，参加玉佛寺举行的昆明四烈士公祭大会，进一步掀起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重庆复旦三十余学生团体举办“和平建国座谈会”，特务学生则举办“和平建国讨论会”，二个会议同时同地召开，中间只有一板之隔。参加座谈会的有五、六百人，而且愈来愈多，参加讨论会的同学本来就少，由于主持人吹捧国民党的政策，人数愈来愈少，最后只剩下十五、六人。

二月十日，国民党特务制造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多人，复旦教授周谷城、张明养、陈子展、夏炎德、曹亨闻等人去函表示慰问。

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为了转移人民反内战的目标，借口所谓“张莘夫事件”，在重庆策划反苏反共游行。重庆复旦部份师生受蒙骗前往参加。事后，历史系学生蒋当翘在《谷风》壁报上揭露这一游行的内幕。校内特务学生但家瑞把谷风壁报负

责人侨生庄明三拖到校园旗杆下罚跪，引起全校师生公愤。洪深教授仗义执言，怒骂特务学生，挨了右击。特务学生的横行，引起全校教师的愤慨，一致罢教，进步同学支持老师的罢教，迫使训导长芮宝公“引咎辞职”，学校也开除了特务学生但家瑞。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激起重庆公正舆论界的谴责。这就是《谷风事件》。

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上海复旦同学利用英语竞赛的机会，女同学潘仁爱、葛嬉月分别作了我们要和平的英语演说，获得第一、第二名。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马叙伦等人赴南京请愿，上海复旦同学五百余人前往送行。不久，土木系学生会主席姚人杰和政治系同学俞继泽被捕，罪名为参加欢送马叙伦等代表晋京请愿。经群众要求，四天后“交保释放”，但两人均未能再回校读书。国民党还想逮捕丁菊生、王丹心，他们两人也不得不离开学校。李登辉老校长认识丁菊生，他得知此事时说：“丁菊生是好人啊！”

一九四六年八月，重庆复旦大学的师生完成了从重庆到上海的复员任务。两支力量的汇合，并没有带来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暗杀闻一多、李公朴）使当时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暂时出现低潮；同时，中共南方局青委出于安全的考虑下，没有让从重庆来的一些地下党员马上与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双方都有一个相互观察、了解的过程。这就给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的复旦大学带来一种“沉闷”的局面。

抗议驻华美军暴行，是复旦同学参加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夜，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行奸污。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人们的愤怒。复旦校园贴满了揭露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

当时学生会自治会主席是三青团复旦干事兼书记苏长庚，

他连忙布置领取补助费的苏北同学，张贴“反对苏军暴行”的抗议书，还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贴出大幅“召示”，把美军暴行说成是“纯属法律问题”，要同学“以国家、学校、学业为重”，“力求沉着，免生意外”。许多同学指出，苏长庚之流已经“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了。”

十二月三十日晚，由女同学会发起，在女生食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控诉揭露驻华美军暴行。参加大会的有男女同学五百余人。蒋祖培同学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群情激动。当场推出蒋祖培、孟庆远、齐兰贞、蒋镜芳等同学为主席团成员，并募集到经费二十四万多元。

在这个会上，特务学生公开捣乱。新闻系学生韩文公然谎称他是东北人，未婚妻在东北被俄国兵强奸了，提出要抗议苏军暴行。可是，当场有人指出：韩文根本不是东北人，也没有订婚，何来未婚妻？全场哄笑。使反动学生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这时，“学生自治会”理事居然声明：“这个会不合法，不能代表复旦同学。”激起了同学的公愤。

大会决定：从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罢课三天，并且要串连其他大学同学举行游行、发通电和宣言。学校当局同意放假三天。校内贴满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有些三青团分子偷偷撕标语，并准备行凶打人。蒋祖培请训导长何德鹤严惩这种不法行为，何德鹤答应，如发现打人情况，可扭来训导处、照章开除。这样，捣乱分子一时无法施其伎俩。^⑦

卅一日，复旦与其他各校代表开会，组成“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并决定在一九四七年元旦举行全市性抗暴游行大示威。

一九四七年元旦，复旦同学七、八百人由虹口公园经四川北路进行游行示威，沿路高喊：“反对美军暴行”，“美国兵滚回去”等口号。下午，游行队伍在外滩公园与十所大专学校、十

六所中等学校同学一起共一万余人，排列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沿南京路进行示威游行，对社会影响很大。

就在元旦这天，复旦大学的三十七位教授，发表《正告美国政府的意见书》，指出美国政府逐渐抛弃了在战时较为正确的政策，揭露美国视中国为半殖民地的事实，认为中国学生的抗暴行动，“按之正义与政治上之需要，均甚正确，应予声援。”这些教授是方令孺、洪深、张明养、陈子展、沈体兰、楚图南、吴泽、殷葆琛、杨岂深、邱汉生、郭绍虞、漆琪生、吴剑岚、章靳以、郑太朴、余遂辛、盛叙功、赵纪彬、吴文祺、曹亨闻、潘震业、周予同、周谷城、曹未风、张志让、蔡尚思、周伯棣、张孟闻、蔡仪、马寅初、张伯箴、卢于道、马宗融、孙泽瀛、肖乾、胡文淑、张定夫。

这场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持续到三月上旬，成为蒋管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标志。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在北平市实行大逮捕，逮捕市民、教师、学生等二千余人。上海市大学教授抗议非法捕人，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共六十六人，其中有复旦教授张志让等三十九人。

不久，复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竞选活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蒋介石军队占领延安，上海市政府宣布“抗暴联”为非法组织，复旦三青团书记苏长庚狂妄叫嚣，要把复旦变为“反共的堡垒、灭共的基地”。

为了迎接革命高潮，适应形势发展，取得领导群众的合法机构，进步同学在地下党领导下，决定参加学生自治会执委的竞选，争取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从反动分子手中夺过来。

五月九日，复旦进步同学组成“五院联合竞选团”，反动学生组成“不谈政治竞选团”，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

“五院联合竞选团”作了充分的准备，提出的竞选纲领是力谋同学福利、维护复旦光荣，提高学术研究，不作政争工具，促进校内自由，保证经济公开。并且把竞选人的巨幅画象和小传贴出，还编排了歌舞剧、小节目进行宣传。

“不谈政治竞选团”，原想以不谈政治来争取中间同学，可是立即被同学拆穿。人们说：“什么不谈政治，其实是只准他们谈政治，不准我们谈政治罢了”。他们也搞画象，壁报和油印报，还有广播。但从内容到形式都相形见绌。他们用请客、送礼的办法来拉票，这种恶劣行径，恰恰成为人们嘲笑和抨击的资料。

“不谈政治竞选团”为了扭转劣势，竟然不择手段地肆意诬陷“五院联合竞选团”，说他们得到民盟五百万元的津贴。

对此，“五院联合竞选团”公布了募捐得来的全部帐目，使这个谣言不攻自破。

“不谈政治竞选团”使用了更毒辣的一手，他们攻击“五院联合竞选团”的候选人袁永宝同学是“李先念的残部”、是“政治部主任”、“共产党派来的，现已畏罪潜逃”等等。

袁永宝同学立即站出来向同学们说明：“我在重庆时因生病按规定向学校申请休学，后来病好了，我又按规定来上海办理复学手续，这在学校都是有案可查的。现在为了竞选，他们竟如此对我作人身攻击，我要求学校保障我的人身安全。”为了预防不测，袁永宝被迫离校，并发表了《给全校同学的公开信》，说明事情经过，指出：“当今有何道义、民主可言？为免遭不测，只能依依与同学们暂别，想能见谅”。反动学生的这一手，并不能挽救他们的失败，“五院联合竞选团”仍然获得了压倒的胜利，十七名候选人有十六名当选，袁永宝因离校未能选上，也获得不少选票。而“不谈政治竞选团”却只有一人当选。学生自治会从此就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了。

学生自治会竞选一结束，复旦同学立即投入到反饥饿、反

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去。

由于物价飞涨，学生生活困难。五月十二日，南京中央大学提出“吃光运动”，要求增加学生公费。十六日，交大、上海医学院同学来我校介绍中大“吃光运动”情况。十七日上午复旦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同学们对“吃光”的提法认为不妥，提出教育经费至少占国家预算中的百分之十五、改善教授待遇、全体学生享受公费、副食费应按生活指数调整等要求。十八日，系科代表大会决定将“吃光运动”的口号改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并推派了汪汉民、吴承毅、鲍静佩等五位同学代表复旦同学去南京和南京同学一道请愿。

十九日，复旦同学欢送晋京代表，并游行示威，提出“抢救教育危机”、“反内战、争生存”的口号，还持有“向炮口要饭吃”巨幅漫画。

五月二十日上午，京、沪、苏、杭地区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遭到警察、宪兵、特务的殴打，同学重伤八人，被击流血者有五十余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南京“五二〇惨案”。

二十三日晚，晋京代表回校向同学们汇报“五二〇惨案”的情况，特务分子通知军警把会场子彬院包围起来，出去一个就逮捕一个。当晚有五位同学被捕。其他同学遂坚守在会场直到天亮。同学们严正要求校方保障安全，无条件释放被捕同学，并决定罢课三天。

对于国民党军警无理包围学校、逮捕学生，迫使同学罢课一事，复旦教授深表同情。二十四日上午教授们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当场宣布罢教抗议，声援同学。洪深、潘震亚、陈子展等十四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此次学生请愿的意见》，指出学生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要求改善教授待遇，增加学生公费，

并且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不独无法非难，而且能促使问题解决。政府对于赤手空拳的学生加以逮捕、加以殴辱，“正是制造纠纷”，希望能早作合理解决。

五月二十六日，张志让、邱汉生、顾仲彝、孙大雨、卢于道等教授会同交大、暨南等校教授于下午会见吴国桢市长，进行交涉。傍晚，五位被捕同学获释。复旦同学在子彬院（即今600号）101教室开欢迎会。特务学生苏长庚等人指挥军警在国权路埋伏。九时许散会后，在男同学返回宿舍时，突然鸣枪为号冲进同学队伍，并用带着钉子的棍棒进行袭击，打伤三十多人，重伤五人，住院治疗的四人，这就是“国权路血案”。当晚章益校长赶到出事地点，发现苏长庚在场，遂送交司法机关关押。但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

“国权路血案”发生以后，同学罢课、教授罢教，章益校长也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

国民党反动派这时恼羞成怒，露出了狰狞面目，他们不仅封闭了报导复旦学潮的《文汇报》以及《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并于五月卅日凌晨，进行全市性大逮捕，复旦同学被捕去十一人，全市共捕学生五十余人。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倒行逆施，复旦教授强烈反对。五月卅一日，陈望道、周谷城、洪深、陈子展、钱崇澍、张定夫、吴剑岚、夏炎德、吕玉文等教授共九十九人联名发表罢教宣言，按当时法律条文对特务行凶予以指控，声称“同人等悲痛之余，亦无心讲学”，一致罢教，以示抗议。教授们为了营救同学，到处奔波。

复旦校友会江一平、张丰胄、端木恺、奚玉书等人对母校十分关心，奔波调解，会见吴国桢市长，要求早日释放被捕同学。教授会决定静候校友会调解，以期被捕同学早日获释，并准备复课。

六月七日，上海被捕学生家长联合会成立，积极营救被捕同学，复旦被捕同学葛嫫月的父亲葛子卿，更是出了大力。

从七月八日开始，被捕学生陆续释放。

这年暑假，洪深教授被解聘，张志让教授、周谷城教授分别被解除法学院院长和史地系主任的职务。同学被开除者十六名，以各种借口被迫离校者达百余人。

暑假以后，学生运动转入低潮。在这期间，一九四七年冬复旦同学发动并参加过抗议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害事件的活动、劝募寒衣运动、支持同济“一·二九”斗争。一九四八年春去杭州春游悼念于子三烈士、反美扶日等等活动。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深夜，国民党“特刑庭”派警察来校逮捕所谓“匪谍”，开出逮捕学生名单三十四人，被捕去学生刘宗俊、黄光潮等七人，经校方多次交涉，先后交保释放。

从一九四八年秋季开始，国民党军事惨败，经济崩溃、政治紊乱，呈现出全面失败的局势。复旦师生这时密切注视全国形势的发展，在地下党领导下，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首先是反对迁校。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暗中策划复旦迁校台湾，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一千多名师生联合签名反对。这件事，揭开了护校和迎接解放斗争的序幕。^①

其次是组织应变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章益校长邀请教授、副教授八十余人开谈话会，经讨论决定：一、本学期寒假缩短，下学期提早到一月二十四日开学。二、迁校问题不讨论。三、组织全校性应变机构，以协助学校行政人员处理非常问题。

为了建立应变会，分别选举成立了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工友会等组织。二月二十二日，“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成立，除校长章益外，各单位参加人数总计为十八人，即教授会二人，讲师助教会四人，职员会二人，学生各系科

联席会五人，女同学会一人，工友会二人，行政会议二人。由章益担任应变会主席，教授代表陈望道、学生代表程极明为副主席，下设联络、防护、财会等组。

为了做好应变的物资准备。二月二十七日，章益校长与交大、浙大、上医、上商等十四个国立大专学校校长赴南京向李宗仁代总统要求发给应变费，师生员工及眷属每人每月三斗米，共二个月，以及提高师生员工的待遇等，获得批准，取得一笔款项。^⑩统一购买了大批粮食、食油等物资加以储存。

为了做好护校工作，以学生为主建立了防护大队，参加的同学达1200人左右。防护大队下设有救护队，由全校女同学组成。四月初，由学生会主持检阅了防护大队。

第三，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瓦解敌人，开展地区调查等。

为了迎接解放，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好争取人的工作。例如，地下党通过进步教授张志让、章靳以等人，对章益校长做了大量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国民党再次要章益去台湾。学生会主席、地下党员程极明又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动员他留下来迎接解放。章益校长终于留了下来，和师生员工一起保护学校，把复旦大学完整地交给人民，这是有功的。再如，把广大同学组织起来，学习时事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以消除同学的一些顾虑。又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和当过美军翻译官的一般成员，并不歧视，而是跟他们交朋友，讲解政策，鼓励他们进步；对少数真正的顽固分子，则给以警告，不准他们继续作恶。

为了迎接解放，复旦地下党组织还秘密调查了江湾、吴淞、虹口一带的情况，把这些地区内的银行、仓库、工厂、学校、军营、军火库、警察局、碉堡等的位置，绘制成图，交给有关

方面。

四月廿六日深夜，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复旦大学，捕去同学七十七人，工友二人，同时逮捕了周谷城教授，章益校长遂与周谷城教授同去警备司令部，终于把周谷城教授保释回校。廿七日，上海警备司令部限令复旦大学在两天以内迁入市区育才中学，国民党军队随即进入学校。

师生们虽然进入了市区，仍然密切联系，准备随时迎接上海的解放。

五月廿六日，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溃散逃跑，复旦及上海各高校被捕学生，被关在上海商学院内。这时，看管的军警一个个溜掉了。被捕同学便冲出了牢笼，获得了解放。

五月廿七日，上海大部分解放了，复旦同学立即集合起来，把原来的防护大队改名为人民保安大队，配合人民解放军，乘汽车进入复旦校园。六月二十日，学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复旦大学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全校师生员工庆欣新生。

新生的复旦大学，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犹如东升的旭日，正在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注：

①沈磨：《光复复旦、宾主欢叙，公宴来沪校友记盛》，见《复旦同学会会刊》会讯特刊第二期第二页

②同上。

③据校友丁菊生回忆。

④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919号。

⑤见《复旦同学会会刊》第十三卷第三期第6页。

⑥何德鹤：《一代师表李腾飞》，见《现实》第十二期，又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⑦刘国俊：复旦大学学生运动回忆录，第41页。（未刊稿）

⑧见《陈云泛日记》手抄本

⑨刘星汉：复旦师生“应变”记（未刊稿）

⑩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1222——1224页。

附录：

一、修正国立复旦大学组织规程

呈奉教育部卅六年四月四日高字第一八五四七号代电修正

第一条 本大学定名为“国立复旦大学”。

第二条 本大学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第三条 本大学设左列各学院及各学系科：

1. 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史地学系，新闻学系，及教育学系。
2. 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附设海洋组），及土木工程学系。
3. 法学院设法律学系，（附设司法组），政治学系，经济学系，（附设经济学研究所），及社会学系。
4. 商学院设银行学系，会计学系，统计学系，合作学系，及统计专修科。
5. 农学院设农艺学系，园艺学系，及茶业专修科。

第四条 本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

第五条 本大学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分别设教务长，训导长，及总务长各一人，秉承校长分别主持全校教务，训导，及总务事宜。教务长总务长之聘任，由校就专任教授中各呈荐两人，经部分别圈定一人，再由校聘请兼任之。训导长之聘任，由校就专科以上学校

训导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合格者或登记合格者聘任之。

第六条 本大学各学院各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由校长聘任之。经济学研究所设主任一人由校长聘任之。

第七条 本大学各学系科各设主任一人，办理各系科教务，由院长会同教务长商请校长聘任之，但亦得由校长提出徵询教务长院长意见后聘任之。

第八条 本大学各学院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及助教四级，由系主任、院长、教务长商洽后，商请校长聘任之，但亦得由校长提出徵询教务长、院长、系主任意见聘任之。

第九条 本大学教务处分设注册出版两组及图书馆，各组及图书馆各设主任一人，组员及馆员各若干人，均由校长任用之。

第十条 本大学训导处分设生活管理，课外活动，体育卫生等组，各组设主任一人，组员若干人，并分别设训导员，医士，护士，及体育指导员若干人，各组主任，组员，及训导员，医士，护士，体育指导员，均由校长任用之。

第十一条 本大学总务处分设文书，庶务，出纳等组，各组设主任一人及组员若干人，均由校长任用之。

第十二条 本大学设会计室，置会计主任一人，佐理员及雇员若干人，依国民政府主计处设置各机关岁计会计统计人员条例，暨修正教育部所属机关学校会计室组织及办事通则之规定，并依法受校长之指挥，教育部会计长之指挥监督，辩理岁计会计事宜。

第十三条 本大学校长室设秘书一人，由校长聘任之。

第十四条 本大学设校务会议，以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

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科主任，会计室主任及由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之代表若干人组织之，以校长为主席，审议左列事项：

1. 本大学预算。
2. 本大学学院及学系科之设立及废止。
3. 本大学课程。
4. 本大学各种规则。
5. 关于学生试验事项。
6. 关于学生训导事项。
7. 校长交议事项。
8. 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五条 本大学设教务会议由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科主任，及教务处各组馆主任组织之，以教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教务事项。

第十六条 本大学设训育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并由校长选聘专任教授三人至十五人组织之，督导全校训育事项。

第十七条 本大学总务会议，由总务长及总务处各组主任组织之，以总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关于总务事项。

第十八条 本大学各学院设院务会议，以院长及系科主任组织之，以院长为主席，计划各院学术设备事项，审议各院一切进行事宜。

第十九条 本大学各学系科设系（科）务会议，以系科主任，及各该系科教授副教授及讲师组织之，以系科主任为主席，计划各该系科学术设备事项。

第二十条 本大学设左列各种委员会：

1. 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
2. 图书委员会。

3. 出版研究委员会。
4. 招生委员会。
5. 考试委员会。
6. 学生成绩审查委员会。
7. 一年级国文英文教学委员会。
8. 奖学金审核委员会。
9. 公费生审核委员会。
10. 体育委员会。
11. 演说辩论指导委员会。
12. 学生自治会指导委员会。
13. 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
14. 艺术教育推行委员会。
15. 经费稽核委员会。
16. 建筑委员会。
17. 福利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本大学设史地研究室，茶业研究室，及其他有设立必要之研究室。

第二十二条 本大学学则及其他各种规则另定之。

第二十三条 本组织规程得由校务会议议决修正，但应呈部核准之。

第二十四条 本组织规程经校务会议议决后，呈部核准施行。

三、蒋介石代电教育部防止复旦大学学生 收听延安广播案

府军信字第 773 号代电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据报复旦大学奸伪分子利用复旦新闻馆内装设之无线电收音机，近日已用XNCR呼号收听延安广播。此收音机管理系由陈望道指定讲师李光诒、助教杨师曾、指导复兴通讯社杜栖梧应用，故近日凡延安一切广播之荒谬谣言，均能于当日传播全校，等情，希注意防制。中正（卅四）戌有府军信（1945年11月25日）

附：朱家骅致章益函

友三吾兄台鉴：顷奉主席十一月廿五日府军信字第 773 号代电开：“据报复旦大学……希注意防制”，用特密函奉达，务请台端严加注意查办，并予防制，仍盼将处理情形示告为荷。专此即颂

教绥

弟朱家骅 1945 年 11 月

摘自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五宗第1619卷

四、中央调查统计局情报：复旦 奸伪希图控制全校壁报言论

据报：复旦大学奸伪分子近策动组织之壁联，曾私自集会，决建议并拥护由学生自治会指导，检查全校壁报，以代替训导处之统制，其企图乃在进一步由奸伪统制全校言论，用心叵测。现全校大多数团体公认不妥……反对此项违法举动云。

中华民国卅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摘自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五宗第1616卷

五、蒋介石就复旦覆舟事件给教育部的代电

府军（信）字第 1594 号代电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据报复旦大学覆舟事件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晨宣判陈曷德因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判处五万元罚金。一般旁听奸伪分子回校后即作决议：（一）发动宣传攻势，指司法受党派包办及陈曷德以巨款行赂。（二）指斥现自治会负责人不能代表同学利益据理力争等情，希注意。中正（卅五）子元府军信

中华民国卅五年元月十二日发

摘自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五宗第1616卷

六、教育部训委会关于防范张志让的代电

代电（教育部训字第 17499 号密函）

国立复旦大学章校长密鉴：据报：“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张氏亦表示愿继续努力”等情。合承电，仰查明注意防范

教育部

中华民国卅六年三月卅一日发

附：关于“张志让与潘梓年晤谈今后领导学运情形”情报（密）兹抄送“复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与潘梓年晤谈今后领导学运情形”情报一件希查照注意为荷

此致

（附件如文）

赵静涛同志

丁伯诚启 三月 日

中华民国卅六年三月廿日发出

抄件：

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于三月五日晨，曾与上海市委文委潘梓年晤谈甚久。张氏对沪上学生抗暴签名运动甚为热心，此次共方人员离沪后，潘梓年希望张氏仍能继续领导左倾学生发展签名运动，及指导一般活动，张氏亦表示愿继续努力。

摘自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第五宗第1616卷

七、我们对于此次学生请愿的意见

洪深等人

一、我们现在都在大学教书，我们的唯一的责任就是教育青年。近半年来，我们眼看国内战争日益扩大，直接影响教育。为国家百年树人的大计着想，为自己神圣责任着想，我们早应呼吁和平，挽回大学教育厄运。迟迟未有所表示者，盖切盼当局的贤明，或能不至水尽山穷，而先予以妥善的处置也。

二、而近来情势日非，我们正焦虑万分之时，各大学学生感到自己应过的教育生活将被日益扩大的内战摧毁无余，出而请愿。他们要求教育经费，要求改善教授待遇，要求增加学生公费，并且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盖以内战直接厄及大学教育也。目标如此单纯，道理如此明显，而以请愿的方式出之，我们站在教授的地位言，不独无法非难，且认为此或足以刺激贤明的当局，以谋问题之有效解决。

三、而当局竟不出此，对于学生的请愿，认为另有背景。我们认为此实最不足以服人心，且令人疑惑当局毫无解决问题之诚意。至于对赤手空拳的请愿学生加以逮捕，加以毆辱，则不独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且事实上正是制造纠纷。政府果何所为而必出此？我们忍无可忍，望当局诸公深长思之，对严

重的问题，早作合理解决。洪深、潘震亚、陈子展、张定夫、周予同、陈望道、周伯棣、周谷城、马宗融、章靳以、张孟闻、张明养、肖乾、胡文淑。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摘自一九四七年五月廿五日《大公报》第四版

八、章益为国权路血案辞职书

谨呈者，近来本市学潮迭生，本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本校一部分学生为响应他校开始罢课，经剴切劝告，校长并于十九日下午召集学生训话，自二十日起，即正式恢复上课，业经呈报鉴核在案。旋以沪市赴京请愿学生代表返沪，各校学生又有罢课行动，二十三日下午，本校一部分学生亦举行集会，当时会场内曾起纠纷、校长赶往劝导、暂告平息。时警局闻讯，派警散布本校四周，于学生离会外出时，并逮捕五人，校长一面劝导学生尽快复课，一面向地方治安机关接洽，保释被捕学生。二十六日下午，被捕各生返校。詎是晚本校学生不听劝阻，又行集会于十时半许，散会行至校门左近时，又有为人聚殴情事，本校学生受伤者多人。校长及各部分主管人员闻讯立刻赶至，警士先已散布四周。校长遂督率成员立即派车护送各生赴医院治疗，受伤者达二十人，据今所悉，均无大碍。此次学潮波及本校，校长日夜全力处理，劝导学生，原期早日恢复常态，只以意外事件屡起，阻碍横生，深感应付困难，除已于二十七日急电钧部，恳请辞职处理，合再行缕陈，并祈迅赐遴员接替为禱，谨呈

教育部部长朱

校长章益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快电代邮

南京教育部朱部长勋鉴：(特密) 兹检获中共文件内，查有奸伪所写《目前中国青年的实际情况》一件，内容系以复旦学生为例，分析有新民主主义青年与开明民主青年为进步分子，两者合占全校人数百分之三十五，其活动方式，前者着重于地下的教育工作，后者多文化派头(班?)，常开座谈会、办壁报刊物等语，查该类学生，易为奸党接近，特电请转饬注意。重庆行辕(36)辰回令秘印

中华民国卅六年五月廿九日发出

摘自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五宗第1616卷

十、一九四七年五月卅日复旦大逮捕的经过

关于今晨拂晓淞沪警备司令部派队来校逮捕同学事，兹报告经过于后：

一、淞沪警备司令部来文并附名单

复旦大学章校长勋鉴：查贵校学生孟庆远等十六名为共产党分子，阴谋煽动，危害治安，应予依法拘办，请即转知，其余各生，安心上课，毋须惊恐为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辰艳。附拘捕学生名单一纸。

复旦名单：

孟庆远 聂崇彬 沈关兴 江敦熙 孟世材 汪汉民
王和先 张希文 童 飞 鲍静佩 李槐奎 陈虞友 项 霸
蒋昌岳 葛孀月 王 伟

二、校长及在场先生与来员交涉经过

(1) 今日拂晓约四时三刻左右，有身着警备部制服之军官

二人来校长住宅，敲门请见。校长于接见来员，询明来意后，立即约请伍院长蠡甫，李院长炳焕，严院长家显，孙主任绳曾，洪深先生应成一先生芮总务长宝公，到校长住宅商讨如何应付，俟上述各先生到齐，始拆阅警备部来文（原文见前）。

(2) 校长及在座各先生同声请求，暂缓执行。由校负责看管，未获允许。

(3) 警备司令部队长要求校方协助逮捕，当严予拒绝。

(4) 警备司令部队长请求校方，着学生排队集合，以便彼等对照片指认，当严予拒绝。

(5) 据警备部队队长称，于学生项霸床下，搜获手榴弹一枚，并有其他文件（当时均在该队长手中）要求学校协助，务获该生，校长当予拒绝。

(6) 校长于电话中与吴市长恳商，暂缓执行，未获允许。

(7) 是时在场教授向警备司令部队长请求除项生外，名单上其他十五人，可否暂缓执行。当据答称，已陆续执行中，可不讨论。

(8) 警备司令部队长称，闻有名单上同学现藏校长住宅内，请求立即于校长住宅内搜索一周，校长当予同意，并陪同视察一周并无发现。

(9) 警备司令部队长称，闻有同学现藏洪深教授住宅内，请求立即于洪深先生住宅内搜索一周，洪深先生当予同意，结果带去孟庆远、聂崇彬、沈关兴同学三人。

(10) 最后校长与各位先生请求警备部领队员即与被捕诸生一晤，当在警备车上，抄录诸生姓名，并略致慰词。芮总务长并临时购备面包、蛋糕等送往车上，被捕学生姓名如下：

孟庆远 聂崇彬 沈关兴 孟世材 鲍静佩（女生）
李槐奎 陈虞友 蒋昌岳 葛嫻月（女生）

三、吴市长曾于昨晚十时半临时邀请上海市各专科以上学

校校长谈话，当场说明政府对于此次学潮，因有共产党分子阴谋其间，并图谋暴动，故拟采取紧急措施，逮捕各校内共党分子。惟对逮捕学生，经侦查如确属共党分子，即送往烟台。否则即予释放，并称最近一度紧急措施，以后不致再有类似情事。经于各校拟捕人数及名单，则未宣布。当经校长及其他专科以上校长，一致请求吴市长暂缓执行，未获允许。嗣由在座校长中一人，建议请将拟捕学生名单开交各校，由校暂行看管，亦未获准。嗣又有人建议由校召集拟捕学生谈话，劝令自动离校，亦未获允许。校长并根据本校现状及学生自治会已有休止罢课之倾向，请对本校暂缓执行。亦未获吴市长允许，反复商讨至深夜二时半，始散。比及校长返校，时已三时许矣。

四、本校于前次学生罢课时，曾举行校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四项。其中有云“并请教授多方劝导”为忠实执行此项决议。洪深先生及其他教授等曾多次与自治会同学商讨复课之技术、方法。昨晚洪深教授因事赴沪，至晚十二时左右返家，尚有聂崇彬、沈关兴、孟庆远三同学在家坐候。据云今日(卅日)复课布告，自治会已经拟就，惟尚须向校长请示后再行张贴。并云罢课时自治会曾有正式通知致各教员。现既定休止罢课，是否有正式通知之必要，商谈完毕已近午夜二时学生宿舍无法叫门，因请在洪深教授家中假眠片刻，当得洪教授同意，及今晨拂晓洪深先生因校长邀请说话即行离家。

章 益 洪 深 伍蠡甫
严家显 李炳焕 应成一
孙绳曾 芮宝公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1362卷

十一、教育部训委会关于复旦劝募寒衣的密函

国立复旦大学章校长密鉴：兹据有关机关报称：“照叙来文”等情，希注意为荷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
中华民国卅七年二月廿四日封发

附来文：

据报：复旦大学劝募寒衣第二大队，全由左倾分子所组织，以对抗党团方面所组织之第一大队，此次成绩较第一大队为佳，总计募得寒衣五百万余件，现金捌千万元，但现金部分至今迄未来交出，准备留作该校左倾社团及拨助学联之经常费用，该第二大队之主要人物为李立中、梁启东、陈浙、李汉煌、张家英、吴文新、吕佩英、朱佩钰、李敏、顾崇中、顾克俭、张谭耀、韩阜民、陈雯（时代壁报负责人）、陶承先、陈立策、陈先明等十七名等情，相应送请查照参考。查照

此致

赵静涛同志

丁伯诚

中华民国卅七年二月九日

摘自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五宗第1616卷

第二章 学校行政

第一节 行政组织

一、董事会

一九〇五年复旦公学创立时，系公立学校，不仅接受官府监督，而且得到地方士绅赞助，其中著名的有严复、曾铸、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张謇、狄保贤等人，他们虽无董事之名，却有董事之责，负责向外募款，对学校行政则不干预。

辛亥革命后，公费补助截止，学校改为私立。这时建立了董事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一九一三年二月，推选王宠惠为董事长，董事有孙中山、^①陈英士、于右任、曹成父、虞和甫、郭健霄、沈绶云等人。董事会任务，主要是聘请校长、筹集经费。

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升为大学，董事会有所扩充，董事也分为名誉、评议、顾问三种。当时聘请的名誉董事为：唐绍仪、萨镇冰、蔡廷干、陈梦桃、陈嘉庚、杜开来、梁炳农、林文庆、邱燮亮、林秉祥、张耀轩、李兴濂、简照南、简玉阶；评议董事为：聂云台、唐路园、钱新之、凌潜夫、余日章、王正廷、夏敬观、劳敬修、郭仲良、陈炳谦、谢蘅牕；顾问董事为：王宠惠、陈金山、朱莱康、张鹤隐、陆守经、邱心荣、于右任、章锡酥、侯德光、薛中华等人。唐绍仪曾任董事长。

一九二七年以后，校董会组织方式有所变动，一部分校董由校长聘请，一部份校董由同学会（由复旦毕业同学组成）推选。这时的校董有钱新之、于右任、邵力子、张廷灏、王正廷、

江一平、周越然、金国宝、朱承洵、赵晋卿等人，并推唐绍仪、陈嘉庚、王宠惠、郭辅庭、简玉阶、黄奕柱、夏敬观、劳敬修、梁炳农为名誉校董。

一九三三年重订校董会规程。规定校董会由十五人组成，校长为当然董事。翌年，修订为二十一人，同学校董和其他校董各为十人。这时董事长为钱新之、校董有李登辉、于右任、邵力子、朱仲华、周越然、金宝国、张廷灏、江一平、余井塘、程天放、方椒伯、王正廷、孙科、陈立夫、张道藩、吴铁城、赵晋卿、王伯元、杜月笙、郭仲良等人。

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一部分迁往重庆，为了求得地方人士的援助，增聘了卢作孚、贺国光、康心之为校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复旦大学增聘了闻兰亭、袁履登、吴蕴斋、王思方、许晓初、叶季纯、鲍慷志为校董。抗日战争胜利后，董事会取消。

二、校 长

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先后担任复旦校长和代理校长的有马相伯、严复、夏敬观、高凤谦、李登辉、唐路园、郭任远、钱新之、吴南轩、章益等十人。

在这些校长中，主要起作用的是马相伯、严复、李登辉、吴南轩、章益等人。

马相伯是复旦的创始人，曾两度担任校长，他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生，以民主自治训练学生，开创了复旦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

李登辉是复旦的主要建设者，他以毕生精力建设复旦，进一步发扬了复旦的爱国民主的传统，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五·二〇”运动中，他都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爱国学生的热烈拥护。

吴南轩是国民党派来压制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来校一年，抗战爆发，他带领师生西迁重庆，在北碚建校，颇著劳绩，但因能力不强，一九四三年二月调职。

章益也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来的。他颇想把学校办好，在建设校舍，聘请教授等方面做了一些事。在解放前夕，他决定与全校师生一起保护学校，把学校完整地交给了人民。

陈望道在一九二〇年就在复旦任教，多次担任领导职务，解放后连续担任学校负责人和校长达二十八年，今一并列传。

三、行政组织

复旦早期，学生人数较少，行政组织的十分简单，在校长（监督）下设立教务长一人管理教学、安排课程，庶务长兼斋务长一人，管理学校庶务、会计出纳等，并考验学生品行及学生宿舍事务，监学二人考察学生勤惰品行等。

一九一七年升为大学后，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但因经费拮据，行政组织虽相应扩大，但人员相当精干。在校长下设注册组（相当于教务处）、会计组、庶务组、卫生组、图书组等单位，管理学校教学、行政。对于学生的管理，提倡学生自治，五四运动后，一度取消监学，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学生违犯校规，召开特别法庭审理，以后添置训育组。

李登辉校长作风民主，他发动师生共同来管理学校。一九二四年提出在学校内设立“行政院”，统辖全校一切行政事务。行政院以校长、教务主任、各科系主任、中学部主任、大学教授会、中学教员会代表组成，决定学校的教育方针、系科设置、教职员任免、预决算、三百元以上支出、修改学校章程等重大事项。行政院不能解决的问题，则召开全校教职员大会讨论解决之。

为了解决师生间的不同意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学校拟定

师生联席会议组织大纲，会议宗旨为“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会议由校长一人、行政院代表八人，学生代表八人共同组织，以解决师生之间的不同意见。同时规定，行政院开会时，学生会可派代表三人参加，学生代表无表决权，但有发言权、提议权，及请求保留或复议权。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准学生干涉学校行政，师生联席会议并未实行，只吸收学生会代表参加行政会议。复旦招收女生，就是由学生会代表张丰胄等人提出并获得通过的。

一九二九年，学校行政院改名校务会议。校务会议由校长、秘书长、各学系主任、注册、训育、卫生、会计、庶务各处主任、图书馆主任、体育部主任、军事教育训练主任及教职员代表三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讨论决定学校的各项重大事项。校务会议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则由校长召集全校教职员大会讨论决定，只有经济问题，需提请校董会解决。

学校为了发动教职工关心学校，设立各种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由校务会议推任。例如：审计委员会、建筑委员会、招生升级委员会、学生指导委员会、图书委员会、演说委员会、新闻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体育委员会、游艺委员会、暑期学校委员会等，这样，既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能够更好地做好工作，还相应地减少了学校的支出。

由于李登辉校长作风民主，充分尊重学校行政院、校务会议的决定，他往往说：“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校内民主空气浓厚。

一九三六年八月以后，吴南轩来校，学校的校务会议召开不多，民主风气大为削弱。吴南轩主要是依靠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来推行工作。

一九四二年改为国立以后，校长权力增大，学校设立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分别由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领导。

后来教务长、总务长人选须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圈定，训导长还必须经专科以上学校训导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才能聘任。教务处下设注册组、出版组、图书馆；训导处下设生活管理组、课外活动组、体育卫生组；总务处下设文书组、出纳组、庶务组、保管室等单位。

改国立后，特别重视“训育”，学校设立训育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并由校长选聘专任教授三人至十五人为委员，督导全校训育事项。学生自治，学术自由的风气大为削弱。

注释：

①金通尹：《母校大事年表》，见《复旦同学会会刊》，第七卷第三期，1938年10月10日出版。按：1937年5月5日出版之《复旦同学会会刊》第六卷七、八期，文中有“本校前董事长孙总理”一语，确认孙中山先生为我校董事长，今遍查有关文件，未知所据。特别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我校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上，邵力子等人均有发言，并未提及孙先生任复旦董事长之事。金通尹先生在撰写《母校大事年表》时，曾与复旦早期同学叶藻庭、陈仲达、叶季纯、张季量等人商量，改正孙中山先生任复旦董事长的说法，当是。

附录：

一、复旦大学校董会规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重订

一、组织

(1) 本会以校董十五人组织之。本校校长为当然校董，同学校董七人，其他校董七人。

(2) 本会设主席一人，审计一人，书记一人，由本会校董互推之。

(3) 凡热心教育，捐助本校万元以上。或曾尽相当义务于

本校者，得由本会推为名誉校董。

二、职权

- (1) 计划及扶助本校之进行。
- (2) 筹划经费。
- (3) 保管财产。
- (4) 监察财产。
- (5) 审核预算及决算。
- (6) 聘任本校校长。
- (7) 决议本校校务会议所不能解决之各种事项。

三、任期

- (1) 校董任期为三年，连举得连任。
- (2) 校董于开会时缺席三次，而未推代表出席者，得另推新校董补充之。

四、会议

- (1) 常会每学期开会一次，但遇必要时，主席得召集临时会议。
- (2) 校董因事缺席，得推他校董为代表，惟出席者以代表一人有限。
- (3) 本会决议，以校董过半数之出席，及出席半数以上之同意通过之。
- (4) 名誉校董得由本会邀其出席。

五、附则

本规程得经出席校董三分之二之同意修改之。

(按：本规程经 1933 年 2 月 24 日复旦大学校董会通过)

以上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 1896 号

附：修正校董会规程案

决议：规程内组织第一条应修改如下：

“本会以校董二十一人组织之，本校校长为当然校董，同学校董十人，其他校董十人。”

（按：以上经1934年4月19日复旦大学校董会第三次常会通过）

以上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1898号

二、复旦大学行政院章程

一、本院统辖全校一切行政事务。

二、本院以校长，大学部教务主任，各科系主任，中学部主任及大学教授会、中学教员会代表各二人组织之。大学教授会，中学教员会之代表，任期一年，连举得连任，但以二次为限。

三、本院设书记一人，由本院聘任之。

四、本院之职权如下：

1. 议决本校教育方针。
2. 规划全校行政事宜。
3. 议决各科系部及其他各种机关之增设、废止及变更。

更。

4. 议决教职员之进退。

甲、校长进退各科系部主任，须得本院同意。

乙、校长进退教职员，须与各科系部主任协定之。

如彼此意见不同时，得交由本院议决后，再请校长执行之。

5. 议决关于经济之建议。

6. 议决每学期总预算及总决算，大学部、中学部、各科系部之预决算，及各委员之费用，交由董事会审核之。

7. 议决临时费用在三百元以上者。

8. 议决各机关教职员五人以上及学生团体之建议。

9. 解决各机关所不能解决之问题。
10. 审查每学期各机关之报告。
11. 公布每年财政状况。
12. 议决及修改校章，但教职员全体大会章程不在此

内。

13. 通过各机关之章程。

五、

甲、本院为便利行政起见，酌设各项委员会如下：

1. 审计委员会。
2. 建筑委员会。
3. 招生升级委员会。
4. 学生指导委员会。
5. 图书委员会。
6. 演说委员会。
7. 新闻委员会。
8. 出版委员会。
9. 卫生委员会。
10. 体育委员会。
11. 游艺委员会。
12. 暑期学校委员会。

乙、以上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本院推任之。

丙、各委员会办事细则，由各会自定之。

丁、本院遇临时事务发生时，得设临时委员会。

六、本院有不能解决之问题，由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之。

七、本院议事细则另定之。

八、本院章程，经本院院员三人以上或全体教职员三分之一以上之建议，得组织临时委员会修改之，修改后，经教职员全体大会通过，始得执行。

三、修正复旦大学行政院章程草案

- 第一条 本院协同校长管理本大学一切行政事务。
- 第二条 本院以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各科处主任、及教职员每二十人代表各一人组织之。教职员会之代表任期一年，连举得连任，但以二次为限。
- 第三条 本院设书记一人，由文牍兼任之。
- 第四条 本院之职权如下：
- (一) 协同校长决定教育方针及规划行政事宜。
 - (二) 议决各科处及其他各种机关之增设废止及变更。
 - (三) 议决关于经济之建议。
 - (四) 审查及建议每学期总预算及总决算，各科处之预决算及各委员会之费用，交由董事会核定之。
 - (五) 议决临时费用在三百元以上者。
 - (六) 议决教职员十人以上及学生团体之建议。
 - (七) 解决所属各机关所不能解决问题。
 - (八) 审查每学期各机关之报告。
 - (九) 公布每年财政状况。
 - (十) 议决及修改本大学章程，但校董会章程及教员全体大会章程不在此内。
 - (十一) 通过所属各机关之章程。
- 第五条 本院为便利行政起见，得酌设各项委员会，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本院推任之。各委员会办事细则由各会自定之。本院遇临时事务发生时得设临时委员会。

第六条 本院有不能解决之问题，由校长召集教职员大会解决之，但关于经济者，由校长提交董事会解决之。

第七条 本院议事细则另定之。

第八条 本院章程经本院院员三人以上或教职员十人以上之建议得组织临时委员会修改之，修改后由校长召集教职员全体大会通过始得执行。

按：此草案经1926年12月10日大学部全体教职员讨论通过。刊于1926年12月5日《复旦周刊》第十三号

四、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

- 一、本会议定名为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
 - 二、本会议以谋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为宗旨。
 - 三、本会议以校长一人，行政院代表八人，学生代表八人，（学生会代表一人，预科、文科、理工科、商科、社会学科、生物学科、中国文学科，每科代表各一人。）合计十七人组织之；以校长为主席。
 - 四、凡行政院因某问题，师生意见不同，双方争执不下时；经行政院或学生会之请求，本会议即须召集，以图解决之。
 - 五、凡行政院会议之议案，经学生会代表请求保留；或要求复议，而复议结果，学生会仍认为不满意时；行政院或学生会，须提交本会议解决之，经本会议议决后，绝对有效执行；行政院或学生会均不得违抗。但该案在未经本会议讨论前，无论如何，不得遽发生罢教、罢课，或其他剧烈行动。
- 附学生会代表出席行政院条例：

甲、行政院开常会及临时会时，应通知学生会派代表三人出席参加。

乙、学生会代表出席行政院，无表决权；但有发言、提议权，及请求保留或复议权。

丙、凡经学生会代表请求保留之议案，在未经师生代表联席会议解决前，行政院不得执行。

六、本会议开会，(除本会议大纲第八条规定外)以全体代表三分之二到会为法定人数，议决案以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之通过为有效。

七、本会议代表遇不能出席时，得由其请他代表代之。

八、本会议如第一次流会，则继续开第二次会时，即以该次到会人数为足法定人数。

九、凡校内任何个人或团体之请求，均需送达行政院；本会议概不接收。

十、本大纲由行政院与学生会长盖章或签字同意后施行之；其修改权则属本会议。

复旦大学行政院主席李登辉

学生会主席潘楚基

原载《复旦旬刊留别号》，1927年12月25日出版

五、复旦大学校务会议规程

第一条 本会议依据中华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协同校长综理校务。

第二条 本会议以校长、秘书长、各学系主任、注册、训育、卫生、会计、庶务各处主任，图书馆主任、体育部主任、军事教育训练主任及教职员代表三人为委员，校长为主席。教职员代表任期半年，连举得连任。

第三条 本会议审议左列事项：

1. 大学预科
2. 各学院各学系及其他各种机关之增设 废止或更（改）
3. 大学课程
4. 大学内部各种规则
5. 关于学生试验事项
6. 关于学生训育事项
7. 校长交议事项
8. 教职员五人以上及学生团体之建议

第四条 本会议得设各种委员会。各委员会之委员及主席由本会议推任之，其任期均为半年，连举得连任。

第五条 本会议有不能解决之问题，由校长召集教职员大会解决之。但关于经济者，由校长提交董事会解决之。

第六条 本会议议事细则另订之。

第七条 本会议规程，经本会议委员三人以上，或教职员十人以上之建议，得组织临时委员会修改之，修改后由校长召集教职员全体大会通过始得执行。

按：此规程由1929年9月14日教职员全体大会订定，刊载于1929年9月24日出版之《复旦周刊》第十八号。

六、修正复旦大学教职员全体大会规程

一、本会以大学部全体教职员组织之

二、本会之职权如下：

甲、议决关于校务会议章程之订定及修改

乙、议决校务会议所不能解决之重要问题

丙、议决关于行政方面之建议

丁、推举代表出席校务会议

三、本会常会每学期一次，由校长召集之

四、本会以全体教职员五分之一以上提议或以校务会议、董事会或同学会之要求得开临时会议

五、本会以全体人数二分之一以上为出席法定人数，各项议案以出席人数过半数通过之

六、本会开会时，由校长主席，遇校长缺席时，由出席教职员推举临时主席

七、本会开会时，董事会代表及同学会代表得出席发表意见，惟无表决权。

八、本章程有教职员五人以上之提议得于开会时由出席人数四分之三修正之

按：此修正规程，由1929年9月14日教职员全体大会订定，刊载于1929年9月24日出版之《复旦周刊》第十八号。

第二节 爱国老人马相伯传略

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爱国老人马相伯百龄大庆时，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这一崇高的荣誉，说明老人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

马相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祖籍江苏丹阳，一八四〇年三月十七日（清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和米、布店。

马相伯出生时，适逢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从此我国逐渐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整个民族被欺凌、受

侮辱。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是随着时代激流不断进步的一生。

马相伯的父母信奉天主教。他生下不久，便受洗礼，教名“若瑟”，亦名若石。五岁入学，先读天主教经典，后学儒家书籍。他受了天主教影响，认为天子与平民，“同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黄金与泥土并无贵贱之分，而泥土比黄金更有用”。他说：“我后来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皆从这时顺着这种倾向发展出来的”。^①他读书时，对于儒家经典的烦琐考据，不感兴趣，而对天象运行，则喜寻根究底。^②十二岁读毕五经，背着父母私乘民船到上海。其时，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有依纳爵公学（一九二七年改名徐汇公学，即今徐汇中学），经友人介绍，到该校读书，学名“马斯威”。

马相伯在依纳爵公学读书期间，由于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对于自然科学与数学尤感兴趣，受到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的喜爱。十四岁起，他在校内助教国文和四书五经，使他进步更快。十五岁时，开始学习法文和拉丁文，成绩优良，多次受到奖励。十八岁时，法国领事馆请他去当翻译，他毅然回绝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③他继续在校学习，二十岁学希腊文。

一八六二年，耶稣会在上海设立初学院。那年，马相伯二十三岁，进院当修士，接受“神修”训练。一八六四年，初学院学习期满，他继续在耶稣会内研究中国文学、数学，后入大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三十一岁时，得神学博士，并加入耶稣会，授职为司铎（即神父）。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曾经再三考虑，认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应“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而个人是属

于国家民族的，出处行藏不能稍事通融，故“西国官爵富贵不可受，谄西人而挟图本国之富贵，更为可耻，前有洋奴，今有汉奸，君子不为”。④

一八七一年，马相伯奉耶稣会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值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闻闾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所阻。

一八七二年，耶稣会调马相伯任依纳爵公学校长，兼管教务。他在教学之余，继续研究数学和天文，同时，对学生讲解中国经史子集，学生中考取秀才的很多。耶稣会怕他把学生变为异教徒（孔教），一八七五年调他专门研究天文。那时，徐家汇天文台只有一架明末利玛窦用过的旧仪器，无法进行研究，马相伯乃专攻数学，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著有《度数大会》一百二十卷，但教会不予印行，书稿逐渐散失。一八七六年，耶稣会对马仍不放心，调他到南京任数理编撰。他感到在耶稣会中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毅然脱离，但仍信仰天主教，投身于洋务运动。

马相伯的大哥马建勋，原在淮军办理粮台，深受李鸿章的信任。经马建勋介绍，马相伯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充当幕僚，掌理文案。一八七七，余紫垣委任马相伯山东潍县机械局差事。次年，马奉命调查山东矿务。从这些经历中，马相伯深感清廷的腐朽。

一八八一年三月，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马为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马相伯与日本维新要人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相往还，对日本维新政策有较深认识。秋，马因兄病回国，谒李鸿章于南京。李即命其随往天津办事。

一八八二年，马奉李鸿章命，赴朝鲜襄助办理新政。他到朝鲜以后，“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次则整理他们的外交”，同时向朝鲜国王提出全面改革内政的条陈，其中有省刑罚、定刑

典、广取才、恤奴婢、求富庶、慎疾疠、兴工艺、兴学校、正经界等九事，大抵为日本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政策^⑤，但是朝鲜政府封建积习太深，延缓不办。六月，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其弟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往协助“平乱”。马相伯在政变平息以后，仍留在朝鲜，曾建议闵妃派太子去欧美留学，以便回国后担当重任，不果行。^⑥次年，马相伯回国述职，向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府旧习太深、改革难行，并表示不愿再去，建议“即早决定对韩政策”。马相伯从朝鲜政府的腐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深有感慨地说：“中国者放大之高丽（即朝鲜），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我感觉到清政府的寿命已不可能长久”，“于是就决计摆脱官场”。^⑦此后，马相伯在家中过了一段书斋生活。

一八八五年七月，李鸿章派马建忠收回招商局。先是中法战争将爆发时，马建忠据美国律师建议，将招商局的轮船假抵押给美国旗昌洋行，各轮即换美旗，定战后收回，以防轮船为法国兵舰捕获作战利品。现战争结束，故由马建忠前往收回。马相伯当时奉派清查该局账目，他对天津、汉口、上海、烟台、厦门、广州各埠招商局的财产，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发现弊端累累，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⑧

马相伯在广州时，眼看香港为英人占去后，商业发达。他即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把香港对过的九龙辟为商埠，建筑市场，招引中外商人，到彼贸易，修一条铁路直达广州。”这样，可把香港的生意夺取过来。张之洞嘴上说“满好满好，”可是并不采纳。是年冬，马相伯乘轮北返，触礁遇险，滞留厦门。台湾省巡抚刘铭传闻讯招其前往。马相伯劝刘借外款开发台湾经济。刘怕负责，未敢接受。马相伯回到天津，向李鸿章建议开辟九龙商埠。李以非其所辖，无法上报而罢。^⑨

一八八七年八月，李鸿章以无款创办海军，扩充洋务为

忧。马相伯与其弟建忠、盛宣怀、周馥等商谈，建议向美国商人借款，组织银行，发行纸币，整顿金融、开发矿产、建设铁路、整修黄河等，为李鸿章所接受。李鸿章派马相伯赴美接洽。其时，美国资产阶级渴望输出资本，马在美备受欢迎，结果议定：“以五千万（两）为正式借款，以三万万为银行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视中国财政之缓急，以为应用”。^⑩消息传出，其他各国争欲加入，而北京政府中的顽固派，群起弹劾，百端攻击，慈禧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与美商订约合股开华美银行，“此事流弊甚多，断不可行。现交章论劾，众议沸腾。该督如果有与美商订约之事，著即行罢议。迅速复奏，毋再迁延干咎”。^⑪筹办银行事只能作罢，马相伯遂离美赴欧，游览英法，考察商务，参观牛津、剑桥大学，并去罗马觐见教皇宗良十三世，经苏彝士运河回国。嗣后，马又曾出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日本长崎领事等职。

一八九六年，梁启超来沪办《时务报》，曾向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学习拉丁文，一年半之间，几乎无日不见。马相伯同情维新运动，对梁十分重视，劝其学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期同，梁启超报请设立编译学堂，特邀马相伯主持其事，旋因变法失败而罢。是年，马相伯为其弟建忠删定《马氏文通》一书。《马氏文通》系马建忠积十余年辛勤探求而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书，马相伯嫌其举例太多，删去三分之二以上。

一九〇〇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八月，马建忠去世。马相伯从欧美回国以后，就有创办新式大学以救国的想法。这时，他弟弟病故，自己年老力衰，怕不能实现办学愿望，便将属于自己名下的祖遗产——松江、青浦良田三千亩，捐献给天主教耶稣会“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

英俊子弟斧资所不及”。^⑬马相伯把兴学的愿望寄托在教会身上。不料，耶稣会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并不办学。

其后，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两地相近，蔡元培常去向马学习拉丁文。蔡又从南洋公学中介绍一批学生跟马学习，组织译社。^⑭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压迫，二百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⑮退学学生请求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除与中国教育会协助退学学生建立爱国学社外，又介绍部分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学院，定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

马相伯办学目的，在于救国。他反对当时的八股文章，称之为奴隶之学，推崇西方的格物穷理，称之为自主之学。^⑯他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准备者，请归我”。^⑰故震旦学院确定以培养译才为宗旨。^⑱马相伯希望“借拉丁文以沟通泰西学术之源流”，今后出现“炉锤东西两大帝国之文章政治，成一家言，以金碧辉煌我国土”的学者。^⑲

震旦创立之时，一无校舍，二乏师资。马相伯借天主教徐家汇余屋为校舍，聘耶稣会教士为教师；宣布办学信条有三：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并在校内实行学生自治。三载之间，卓有成效。

一九〇五年春，法国天主教中某些人，阴谋夺取震旦学院。他们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任命法国神父、帝国主义分子南从周管理学校。南从周在夺得权力后，“尽改旧章”，妄图改变学校性质。震旦学生见此情形，极为愤慨，决议全体退学。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熊季廉、袁观澜等筹备复

校，又请两江总督周馥协助，拨款借屋。正当此时，法国徐家汇天主堂抢先宣布震旦学院于七八月间开办。马相伯等被迫改校名为复旦公学，以吴淞提镇行辕为临时校址，聘李登辉为教务长，于八月十六日复课，以后发展为复旦大学。

一九〇五年秋，清廷为挽救其政治危机，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七月，慈禧下诏准备“仿行立宪”。两江总督周馥聘马相伯至南京，讲演君主民主政制之得失及宪法精神。这年，马相伯辞去复旦校长职务，由严复继任。

一九〇七年四月的于右任、杨笃生、叶仲裕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马相伯为其题词：“以热心毅力鼓舞国民，恢复我神州二万余里之权利，完成我神州四百兆同胞之责任，扫除三代以降小康之事业，而跻斯世于大同之景运”。

一九〇七年下半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宣称致力于提高国民程度，推动立宪政治实行。因康有为、梁启超不能出面，请马相伯担任该社总务员（相当于干事长），马即应允。十一月，马相伯赴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出席政闻社社员大会。^②次年正月，政闻社本部从日本东京迁往上海，其对内对外文件，均以马相伯名义发表，^③并曾以马良名义呈请清朝政府于三年中召集国会。^④这项申请，不仅为革命党人强烈反对，《民报》上曾发表章太炎文章予以驳斥；而且遭到清廷痛恨，七月下令查禁全国各地政闻社。^⑤

马相伯创办复旦以后，徐家汇天主堂另聘其他人为震旦学院董事。^⑥一九〇七年十月八日为孔子诞辰，震旦学院学生准备举行谒圣礼，被天主教神父阻止，引起同学共愤，全院五班学生一律散学。^⑦一九〇八年，震旦学院拟在法租界建设新校舍，向马相伯募捐，马为震旦购卢家湾地基一百亩（当时地价四百元一亩）共捐现金四万元，又捐英、法租界地基八处，约值现金十余万元。马相伯将全部家产都捐给了震旦。

一九〇九年，复旦公学校长几度易人，严复、夏敬观、高凤谦相继辞职，众推马相伯复任校长。这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咨议局，马相伯当选为江苏省议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马相伯参加江浙诸省联军总司令部工作，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民国成立，任江苏省都督府外交司长。一九一二年八月，马相伯去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②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旋辞去。一九一四年以后，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这期间，马相伯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他与英敛之上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创办大学。他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函夏”一词，出于《汉书·杨雄传》，指全中国；考文苑，类似研究院。目的在网罗全国著名学者，编纂词典、校勘古籍、奖励优秀著作、表扬高尚德行，惜未办成。他赞助英敛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他提携后学，对陈垣所著《元也里可温考》，大为赞赏，为之点定、作序，序中说：“君真吾师也”。^③又在给英敛之的信中说，“吾与汝弗如也”，促使陈垣弃医治史，卒成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一九一五年七月，马相伯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时袁世凯亲自祭天祭孔，提倡“尊孔读经”，袁氏党徒并欲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马相伯大加反对，著有《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等文，并为各区教会代拟五篇请愿书，以信仰自由为理由，驳斥立孔教为国教、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主张。

袁世凯称帝前，派其子袁克定征求严复、马相伯的意见。严受其惑，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马相伯知“非口舌能争”，实行消极抵制。^④一九一八年，马相伯发表《民国民照心镜》一书，系统阐述民主共和思想，提倡人民自主、地方自治，强

烈抨击袁世凯称帝，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断言“百复辟，百自亡”。

一九一九年，马相伯已八十高龄，年老体弱，“厌闻时事”。在这以后，他虽担任过江苏省财产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中国科学社董事、《天民报》总主笔等职，但这些职务，有的属临时性质，有的为挂名闲差。他主要在家中整理旧稿，从事译作，惟对宗教和教育事业仍很关心。

马相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宗教信仰，老而弥笃，一生精心翻译了许多宗教著作。可是他对于某些外国传教士，利用帝国主义特权，进行侵略活动，十分愤慨。他认为中国人并不反对天主教，而是反对外国的殖民政策。^④他希望中国人自己充当司牧，自己传教；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应“改为中国籍”。^⑤马相伯是天主教信徒中，激于爱国热忱、维护祖国利益、奋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

马相伯再次倾产捐资震旦后，法国天主教表面上承认他是创办人，奉为董事长，但不让他过问校务。马相伯对法国教会的一些做法十分反感，他说：“震旦请洋教习，月俸有六百元，合银元八、九百者，聘华教习，虽五十元亦吝之。”^⑥在震旦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马相伯指出，震旦成立较复旦、大同大学为早，而成绩落后于复旦和大同，希望努力赶上。^⑦一九二八年前后，我国有收回租界的传说，法国传教士阴谋将震旦大学迁往安南西贡，事为马相伯家属所闻，请于右任出而干涉，法国传教士才未敢实行。一九三一年，震旦向国民党教育部呈报立案，法国教会居然抹煞马相伯捐产办学事迹，仅云“马相伯捐赠泗泾田租每年一万元”，而“耶稣会教士，捐助薪水十六万元”。马相伯对此十分气愤，指出“查耶稣会教士矢愿服务教育，除供养衣食外，例无薪水；且震旦担任教授之教士，试问其得有博士学位者共有几人，而每年竟有十六万元薪

水捐助震旦，不免失实”。^⑩

马相伯热心祖国教育事业，不仅捐献了全部家产，而且将自己历年所积薪金一万元，捐献给启明女中，晚年一度靠翻译为生，^⑪后在震旦领取生活费。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马相伯已九十二岁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救国有责，于是不顾衰颓，奋力救亡。他发表演说，书写文章，号召团结抗日，呼吁人民自救，被尊为爱国老人，达到他一生的光辉顶点。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马相伯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提出全国人民“自赎自救”“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对内绝对不多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诿称等待国际联盟调查。马相伯著文反驳，指出“国联之为物，本与日本同其臭味，同其实质”。依靠国联，是“与虎谋皮”，“自取其辱”。他号召青年，不必去南京请愿，而要深入农村，“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⑫

马相伯曾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成会》、《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等组织，主张人民自治、抵制日货，并为抗日义勇军募捐，还举行书法义卖，集款援助马玉山、冯玉祥等抗日军队。

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他非常不满，曾经说：“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文化界人士组织救国会。由于马相伯的社会地位和救国热情，被公认为救国领袖，一切通电、文件均由马相伯领衔。以后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一切文件亦均由马相伯领衔。全国各界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就是在马相伯

家中开的。⑤马相伯特别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的对联，送给出席的各委员。

一九三六年，丹阳同乡决建相伯图书馆于丹阳，马相伯捐出中西书籍八千七百余卷。可惜这些珍贵书籍，都被日机掷弹烧焚。

蒋介石政府使用一切手段来破坏救国会的活动。一九三五年冬，天主教成立南京教区，主教于斌与蒋介石政府勾结，表面上请马相伯到南京襄理教务，实质上割断马相伯与救国会的联系。十一月廿三日，蒋介石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马相伯当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⑥十二月十日，马相伯去南京的前夕，曾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他对“国军”已在绥远抗战表示高兴，到南京去“鼓励鼓励他们，要他们坚持到底，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马相伯再次表示救国会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这次赴京，也想同政府里的人说说，放了他们。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⑦十二月十二日，马相伯由于右任陪同到南京。当天，爆发了“西安事变”。马相伯在南京竭力设法营救救国会七君子。一九三七年三月，马相伯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七七”事变爆发后，马相伯作“钢铁政策”的演说。七月卅一日，救国会七君子被释放。八月六日，沈钧儒等七人即去南京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并由沈钧儒题“惟公马首是瞻”六字。⑧

在日军迫近南京时，马应冯玉祥、李宗仁之请，移居广西桂林风洞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于右任请他移居昆明，他在赴昆途中因病留居谅山。一九三九年四月，他一百岁诞辰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各大城市举行遥祝典礼。十月二十九日，马相伯得知“湘北大捷”，异常兴奋，夜不能寐，病势加剧，十一月四日逝世。逝世前犹云“消息……消

息”，^①盼望得到战胜日寇的消息。他的著作有：《马相伯文集》、《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一日一谈》、《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

注：

1. 见马相伯：《一日一谈》第237—138页
2. 见《一日一谈》第109页
3. 见《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第202页
4. 见刘成禺：《相伯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
5. 见《马相伯文集》第1—4页
6. 见《一日一谈》第98页
7. 见《一日一谈》第43页
8. 见《马相伯文集》第8—10页
9. 见《一日一谈》第59—61页
10. 见《一日一谈》第65—67页
11.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二四六卷第九页
12.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页
13. 见《马相伯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4. 见林洲髓等《筹同学善后策》
15. 见《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
16. 见《震旦学院章程》
17. 见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
18. 见《震旦学院章程》
19. 见《马相伯文集》第13页
20.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24—425页
21.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0页
22. 见1908年4月5日《申报》
23. 见1908年6月28《申报》
24. 见震旦大学《节录》
25. 见1907年10月10日、11日《申报》
26. 见《马相伯文集》第428页

27. 见《马相伯文集》第169页
28. 见《一日一谈》第14页
29. 见《马相伯文集》第204—205页
30. 见《马相伯文集》第217页
31. 见《马相伯文集》第282页
32. 见《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第215页
33. 见《马相伯备忘录》
34. 见《马相伯文集》第433页
35. 见《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第8页
36. 见《救国会》第109页
37. 见《救国会》第274页
38. 见《马相伯文集》第403—404页
39. 见1936年12月11日《立报》
40. 见1937年8月7日《立报》
41. 见《马相伯年谱》第131页

附录：

一、中共中央电马翁祝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马相伯先生祝百龄大庆的贺电如下：

桂林新四军办事处探转马相伯先生尊鉴：

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皓

摘自1939年4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三版

二、重庆新华日报短评《马伯相先生百龄庆典》

今天是国府委员马相伯先生的百龄大庆的日子。在重庆和

其他地方，都要有热烈的庆祝。这一百年内，马先生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他在文化上、教育上和政治上都有许多重要的成绩。这是充实而有意义的一百年。

马先生所度过的这一百年，是中国近代历史剧变的时期。这时期里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但同样中国也发动了许许多多次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整个的民族，在这时期内，受了许多折磨，也受了许多锻炼，更得到了很大的进步。马先生随着时代的激流而不断的进步着。

近几年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马先生不辞劳瘁，奔走抗日工作。对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进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古人所说的“老当益壮”的美德，相伯先生真可当之毋愧！

从这一百年来马相伯先生的奋斗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儿女的优秀的特质。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我们恭祝马先生健康长寿！我们恭祝中华民族解放胜利万年无疆！

摘自1939年4月6日《新华日报》第三版

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唁马相伯家属

马相伯先生家属礼鉴：马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月，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庚

摘自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1月10日第二版

四、重庆新华日报《编者按》

（编者按）马相伯先生生于一八四〇年，至今年四月六

月，为百龄大寿之辰，国民政府特明令褒奖，称为“民族之英，国家之瑞”。先生生前于文化教育事业，颇多建树，今之复旦大学及其前身震旦学院，皆为其心血培养灌溉而成。先生桃李满天下，今日国内外知名之士，昔日曾在其门下受业者颇众。先生洞烛日本帝国主义之蓄意侵略，曾南北奔走，积极唤起民众。“九一八”事变起，在沪热烈领导青年，参加救国工作，坚主对内团结，对外抗战。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入京，坚（按，应为翌字之误）年被任为国府委员。抗战后移居桂省及凉山，耳目虽觉迟滞，但每日需人诵读报纸刊物，其爱国热诚与夫少年精神，实堪令人敬佩。先生尝言年事虽高，但非俟抗战日所得胜利，对国事不愿撒手！但先生终于在抗战事业正在紧张进行之日，遽尔逝世，曷胜哀悼！愿全国人民共继先生遗志，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

摘自新华日报1939年11月6日第二版

五、重庆新华日报短评《悼马相伯先生》

马相伯先生在凉山逝世了。忆今年四月间，马相伯百龄大典，各地曾举行热烈的庆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贺电中尊之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曾几何时而哲人凋谢，全国同胞又将在沉痛的心情中追悼百龄翁了。

马先生早岁曾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晚年目睹日寇侵略加紧，民族危机严重，为救国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数年前，马先生以稀有之高龄，在上海那种恶劣环境下，策励青年，为团结抗战而奋斗，其英勇振奋之气概，至今尤历历在人耳目。

马先生是热心爱国家爱民族的，是永远有着青年人奋斗精神的。我们追悼马相伯先生，要学习他这种精神，为中华民族解

放而奋斗到底。

摘自《新华日报》，1939年11月6日第三版

六、拉丁文通序言(摘录)

马相伯

御定《历代纪事年表》载自黄帝甲子迄今七十有七癸卯，适满四千六百年，以西人百年一世纪一大庆典论之，亦不易逢之数也。此四千六百年中，年表同时代，幅员同广袤，政治同开一统，文治又同冠千古于古三大部洲者，非西汉与西罗马欤？汉积春秋战国之文思理想，光芒所瞩，寝由西北凿空，小亚细亚以西，不第如马、班所载已也。……故政教所及，自西北徂东南，经三四万里。惜汉武辈徒事虚声耳！西罗马不然，自罗慕禄（今译罗慕洛）以君主首建议院，由议院而共和，而元帅，而一统，类非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者可比，宜乎兵力所指，直跨地中海南北，斐（今作非）、欧两大洲，又东涉小亚细亚之东，波斯、身毒，悉主悉臣，几与日月共其地平圈，而无多让，而文治之盛烈，尤莫与京。学兼希腊、埃及之格致与几何，犹太、身毒之伦理与宗教，出蓝寒水，岿然为欧族文明之祖。希腊大儒冒禄（MOLO）闻季宰六（Cicero今译西塞罗）之论议，沉吟久之，作而言曰：季君！季君！尔固可奇可颂，而我希腊则大可哀也！理学与文章，此我希腊世守之名誉，今为尔移植罗马矣。罗马三度胜天下：一兵力，二文化，三法律，此之由也。当季氏游学雅典时，年已二十有七矣，卒能用拉丁文，鼓铸欧、亚、斐（今作非）三洲之文明，以光荣其祖国。三五同胞，不远千里，不倭年齿，同力合作，借拉丁文以沟通泰西学术之源流，孰谓季宰六为不可企及者？文化之发皇也，不于其茁芽之地，而于其移植之地；异日者必有炉锤东西两大帝国之文章政治，成一家言，以金碧辉煌我国土者，此编

其胚浑也夫！时距黄帝甲子前三祀四千六百有三年后春分十日，震旦学院叙行。

（按：拉丁文通刊行于震旦学院开学之后，即公元一九〇三年）摘自《马相伯文集》

七、马相伯备忘录(节录)

“至民国十六、七（一九二七、八年）间，租界法权收回，并有收回租界之说，西籍教士乃有将震旦大学迁往西贡之秘密商议，因恐相伯干涉而中止，未敢实行。延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方呈报教育部立案，但将相伯以全部产业创设震旦之根由始末，概未叙及，并乘余病重时组织校董会，聘请校董多未邀我同意，以致所聘任者均非教育界及与震旦素有关系人物；况其呈报教育事项表节要内，尚有所谓“耶稣会教士之捐助薪水每年十六万元”云云。查耶稣会教士矢愿服务教育，除供养衣食外例无薪水；且震旦担任教授之教士，试问其得有博士学位者共有几人，而每年竟有十六万元薪水捐助震旦，不免失实。至余所购之校基与指作经费之地产，除仅于呈报教育部之事项内承认田租一万元外，余皆抹煞不提。故书亲笔记录以资备忘”。

八、为日祸敬告国人书

马相伯

今日举国为日祸志哀，余虽老迈，亦一国民，天责所在，义不容辞，抒己见以勸国人。际此天灾人祸外忧内患迭乘，国人应晓然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即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为今计，最上策，只有自赎自救之一途耳。推求目前种种大不幸，强半自作孽不可活！言财尽耶？财尽于岁费数万万之

军饷；然而国防毫无设备。言民穷耶？民穷犹年耗数千万之鸦片；然而河防绝不计及。由是祸乱猝发，十六省胥成泽国；强邻幸灾乐祸，大举入寇；于是我山海关外领土主权，蹂躏无余矣。鲁难未已，孰为庆父？人心未厌乱，故天祸中国！试静思之，湖北伐湖南，广西征广东；本是同根相煎迫，宁有得失之可言；而二十年内战循环，如出一辙。悲夫！国家贫弱至于此极，政府无紧缩之策，民间有奢侈之风。国民道德，日益堕落。国民生计，日益困苦。况复祸乱当头，追怀已往历史之光荣，先民缔造之文化遗产，授吾侪以大好文明古国，我后世子孙孙，虽不能发扬光大祖业，亦应克绳祖武，不失为一泱泱大国，然后始不愧立国于天地间。今后国民，各抱决心，痛改前非，自赎自救，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则十年生聚教养，终有自强振作之一日。乃若古哲成汤卫武修己自责，亦庶几上回天心，挽救国运；盖非先恢复固有民族道德之精神，决无忠实肯牺牲救国之国民，可断言也。国民如无责任心则已，有则请立即誓从今日起，自赎自救，共赴国难。

抑有进者，日本明治维新以还，民智民德之猛进，令人刮目相看久矣！三岛小民族自负东亚大国民，东攘西夺，已非一日。其处心积虑，以谋占我东三省诸领域，兹近三十年，专家设计，秘密进行，乃我大梦未醒，卧榻任人酣睡，两三年来，始稍注意。（如专设日本研究社诸团体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兵不待决战而成败自定。此次日军强占我辽吉诸名城，直不啻探囊取物；而我实无丝毫抵抗而忍受，又何异束手待毙？山河坐失，无泪可挥！彼日本人发挥其日耳曼第二之凶焰，昭和甘效威廉第二作戎首。前者暗偷私窃，今则乘火打劫。最近之暴行，如抢我银行，劫我民众等，早置国际公法、非战公约于不屑道及之列矣；此种行径，形同国际强盗；实系如曩日之德国，对世界一种威吓。种种暴行，今日可施之于中国东三省；

安知他日不依法炮制，对付英美德法诸国乎？故国际间有不满意于日军暴行之公论，非必见好市惠于我也，抑列国自卫所应采取之政策。国人固宜对主持正义者表示好感，然一味仗人执言之恶习不根本铲除，断无自赎自救，幸加意焉。

嗟我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老迈如余，佇望我父母之邦，永久如磐石之安；故不费口舌，将自赎自救之大义，为我邦人君子剖陈之！惟最令人痛心疾首者，我国今日，尚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忿之状态中耳！希望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多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我国民其猛省，我国民其亟起！

（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
摘自《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

九、泣告青年书

马相伯

迩来全国青年怵于日寇方张，公理沉沦，国家危亡，迫在旦夕，多自动奋起，从事于抗日自救之工作。有发起捐助马占山将军者；有组织抗日援马团赴黑投效者；有成群结队络绎于途，纷赴南京请愿者，亦以断指喷血或更以自杀呼吁国人觉醒者；悲壮激昂，可歌可泣，老夫闻此，诚不胜钦佩仰慕赞叹之至！不过老夫认为今日之事徒凭热血，终无补于国难，救国在于实践奋斗，尤在于有效之实践奋斗，（中略）彼日本则不仅强占我土地，甚且对于男女老幼都视同草芥，以屠杀快意，枪射炮轰，不惜随处演出至极残酷之惨剧；此种强暴行为，而表现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则吾人称日本为国际大盗无不殆当！故我国对此着着迫近升堂入室之国际大盗，问题不在于战与不战；而在于如何战？而在于如何获得实效？盖彼国际大

盗，挟硬强之海陆空军备，以临我民穷财尽之弱国；我国虽决定抵抗，而军备食粮，都仰赖于他国，抵抗岂其易言！换言之，贸然应战，宁为得策；故如何奋斗，如何使奋斗实践而有效，实为吾人目前最迫切最严重急待解答之一大问题。今日我国家自救之唯一方法，不为向国际联盟非战公约求助乞怜乎？然而自九一八以与今日，历时已八旬有余矣；求助与乞怜之结果，果如何者？国联之为物，本与日本同其臭味，同其实质，眼看日本人之攫得我东北半壁山河，大好宝藏，其食指早已怦怦然动，早已有染指于鼎、分一杯羹之打算。我与虎谋皮，问强权以公理安在？是诚为世之大愚，是徒自取屈辱，自贻伊戚！不求自助，而求助于人，欲以此而侥幸立国，此种心理，诚为亡国之象征，诚为极可痛心之现象！青年诸君，今日之所为者，亦不为向南京请愿乎？不为赴黑投效乎？此种工作，又果为实践奋斗，果为有效之实践奋斗乎？青年诸君于此问题，亦曾一次沉着考虑否？国家养兵二百余万，年耗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国币，民国以来，兵连祸结，无日不演闯墙之惨剧，然而外侮骤临，即望风远却，崇朝之间，东北半壁山河，尽沦敌手，对内徒言镇静，高唱不抵抗，对外亦徒乞灵于木偶之国联，陈诉呼吁，捉襟见肘，穷态毕见。学生诸君，赴京请愿，一而再，再而三，络绎而去，络绎而返，除照例听得“中央已有准备，已有最后没（疑为决字之误）心，人民应信任政府，拥护政府之教训”而外，东北失地，固犹是也！日寇猖獗，固犹是也！而国内之分崩角遂，亦仍犹是也！政府无能出兵，无暇出兵，无决心出兵，盖为显然之事实！青年诸君之跋涉请愿，涕泣陈辞，即泪尽继之以血，血尽继之以死，亦为徒然，亦又奚益！次之，马占山将军以绝城孤军抗强不屈，疾风劲草，大义凛然，此尽责之军人，固为我人所应爱戴，所应援救，但吾人今日之责任，不仅为救一马占山，而为救我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故吾人与其徒致钦崇于马占山，不如人人投袂而起，以马占山自期，使人人都为马占山。抑自我沿海沿江，暴日兵舰，早已密布，浪人匪徒，随处尽有，架词栽祸，随时随地都可以爆发九一八之祸变；然则吾人俟其已失而后收复之乎，仰趁其尚未占取而善为保守之乎？故吾人今日应在抗暴自救之一致行动之下，自起团结，各作事先之准备。老夫认为今日最切要之救国方策，惟有仿古遗制，举办保甲之一法，法联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中甲，十中甲为一大甲，十大甲为一团，十团为一大团，以此推广，先造人丁户口册，法军队之编制，使其行动划一，指挥迅速，联络严密，意志坚定；导以对日不合作可，导以对日经济绝交可，而导以对日作殊死战亦无不可。日人批评我国民族性，辄谓为涣散之沙粒；吾人今即应以最大之努力，使涣散之沙粒，凝为坚强之水门汀。老夫言此，固自知其行之艰难；然而今日国危势促，吾人已责无旁贷，但使吾人以赴京请愿之精神，从事于农村去唤起民众；以跋涉长途赴黑援马之决心，从事于组织民众；则集十万家之人力与财力，合千万人为一心，作其有勇知方，则吾人固何有乎日前之国难？何有乎暴日之侵袭？救我国家，新我民族，皆在于此！老夫耄矣！环顾河山，怆感无极！自恨年老力衰，无以报国；故于我青年学生诸君期望倍切！老夫深信国以民为本，无负责之国民，国即将无由而立；同时深信自助乃能自救，惟自助乃能打破当前之艰难，求助于人，乞怜于人，皆为徒然！青年为社会之中坚，为国家将来之柱石，望同心同德，作艰苦而有效之奋斗！

摘自《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

（按：原书未载发表年月，据文中所云“自九一八以与今日，历时已八旬有余矣”，则可断定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中旬所作）

十、新年告青年书

马相伯

东北沦亡，将四阅月矣！东北同胞，被践踏于暴日军铁蹄之下，“死的恐怖”，“生的凌迟”，备受荼毒，亦已将四阅月矣！四阅月来日军之枪炮声与东北同胞之哀号声，常依稀震撼吾人之耳膜，顾我河山，念我同胞，真令人欲哭无泪！现暴（日）军更节节进迫，大举犯我锦州，其欲吞并我整个东北，进而颠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盖已彻底暴露。此实为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最后关键，我人必以全国一致之努力，奋起抗暴，始能自救。而青年诸君，为社会之中坚，国家之生命所托，肩头上所负荷之责任，尤为艰巨。老夫耄矣，无能报国，前曾以仿古制创办保甲之法，为救国方策，为我青年诸君告。兹当一九三二年之始，谨再以三事相勸勉，即当新年之献词。

一曰不买日货。“经济绝交”一语，在今日几已成为口头禅，然此实弱国反抗强国之最要而且最有效之方策。我国向为日货之最大市场。我市场如能杜绝日货，持以十年，则在经济上足以促日本之动摇。此种工作，有固赖乎吾全国同胞之身体力行，而我青年诸君，当为社会之表率，尤应力求朴实，拒用日货，以为倡导，风行草偃，排货工作，庶可彻底坚持。

二曰研究科学，立国于二十世纪科学之世界，必赖科学发达，始足以自存。中国今日之危亡，实根因于科学之落后。不买日货，因（固）为救亡之善策；发展工业，以自国制品代替日货，尤为刻不容缓之要图。是以青年诸君，今日在校求学，必须手脑并用，研究与实验并重。能如是，然后才能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必有“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乃能实际应用，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建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之福利，此则青年诸君所应肩负之责任也。

三曰唤起民众，我中国文化落后，教育未能普及，故文盲特多。东北沦亡，虽已数月，穷乡僻地之民众，恐尚有不知其事，或多不明其真相者。抗暴自救，必须全国一致努力，今民众对暴日之侵袭东北，尚属茫[茫]然，更何能激起其爱国之热忱，以共赴国难。寒假已届，诸君必多返里，际此时会，对于日本问题与东北问题应加意研究，将国内外情势及暴日犯我东北之实况，详为乡民讲述，大声疾呼，使全国民众奋起，共救国家之危亡，此举亦非常切要，万勿等闲视之。

岁时更新，然而吾人之创痛则依旧，而且锦州风云，刻又突告紧急。故吾人虽在今日新年元旦，仍不容有一丝之欢欣。深盼全国各大学、中学，各教育界团体，学生团体，妇女团体等，更以新的决心，新的精神，努力于抗暴自救。老夫发起江苏省国难救济会同人，亦当以加紧之努力，致青年诸君携手共臻于奋斗之大道。

一九三二年一月《申报》

十一、 马相伯与熊希龄、章太炎等

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通电

南京国民政府林主席，孙院长，陈副院长，何部长，奉化蒋介石先生；上海汪精卫先生、冯焕章先生、李德邻先生、太原阎百川先生、广州胡展堂先生、陈伯南先生、白健生先生，北平张汉卿先生钧鉴：最近暴日犯锦，长驱深入，关外义勇军纷起杀敌，美国且严重抗议。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诸公均称党国首领，乃亦散处雍容，视同秦越，亡国现象，一时齐现，夫复何言。然我国民为急公救国，仍不能不进最诚恳之忠告于诸公者。国为四万万人民公器，国民党标榜党治，决非自甘亡国。

事至今日，诸公倘犹认救国全责，可由一党负之，则请诸公捐助一切，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如其尚有难言之隐，形格势禁，竟无如何，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大难临头，万无犹预余地，究竟如何决大计以谢天下，请立即以事实表明，否则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临电迫切，无任待命。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张一麀、朱庆澜……等。元

《申报》1932年1月25日“本埠新闻”

十二、双十节献词

马相伯

今日为我国二十二年国庆纪念日，衰迈余年，每逢此日，万感丛集，喜惧交并。喜者以在艰难之途程中，我国家又添寿一筹，余又得一度与全国人士庆祝国运之无疆；而惧者则以先烈创造民国之艰难，皆所目击，缅怀往事，默察现实，又深感创业难，守成尤不易。吾人于先烈艰难奋斗所遗留之成果，不得不兢兢业业。然而今日国庆才二十二年，政府明令因国难不举行庆祝，则已三次。前途荆棘，国步弥艰，年复一年，岁复一岁，以今日测来兹，宁堪设想。国人如再不奋发，如再不更新，则来年此日，恐将无举杯庆祝之望，而“双十国庆”恐亦将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言念及此，余心滋痛。

曩者国人每逢今日，辄多悔恨过去，希望来兹。而自矢以今日为陈死新生之界石。忽忽廿二载，国犹是，民亦犹是。抑且山河破碎，民生困敝，国势每况而愈下，则复何说，余年衰迈，惟愿国基巩固，民生安乐，他无所望。故在今日，请以至

诚挚之意，陈其最低限度之希望。语出肺腑，窃愿国人一垂听之。

余认为一切祸乱之根源，皆在于私之一字，一切之所以颓废不举，亦由于私。惟私故争，惟争乃乱。二十二年来扰攘不息之内乱，与割据自雄之局势，何莫非自私一念所造成。惟私乃罔恤民生，乃罔恤国脉。文不能廉，武不能死。东北之失，守土长官能慷慨以赴难者，竟无几人。而争权夺利者，则两年以来，复循环相继。人但知有己，莫知有国。正气销沉，纪纲尽废。此又何莫非自私之一念所由致。故余以为今日而言陈死新生，即人人能体天下为公之意，人人能以国家与人民为念，止乱兴国，是即其基，此余之希望一。

余又认为，为政之道，在于以德服人，而不在于以力威人。所谓以德服人者，一言以蔽之，即使民能安其生之意。民不聊生，甚且恶生乐死，威将安施，是理至明，征之中外古今之史迹，莫不如是。固不必旁征博引，侈谈主义。今日我国日谈民生，而民生日困。老弱辗转，少壮流离，黄河以北，大江以南，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然而取诸民者，仍竭泽而渔，毫不顾恤，民困水火，安得不乱。不澄清政治，招安流亡，而又从而威之以力，是何异于抱薪救火，火炎不灭，且助其威。日前报载，某革命伟人纪念塔下，乞丐群集，有碍观瞻。地方警察，严予驱逐。塔高巍巍，而民无所依。观瞻为重，民生为轻。今诚不解此穷苦无告之民，驱逐又将安之。抑且我国今日饥寒之民，随处皆是，茫茫大地，无一片乾淨土。若曰有碍观瞻，则此成千成万困苦不堪之人民，又将驱往何处？余认为负责之政府，对于流离之人民，应善为安抚，而不应予以驱逐。盖驱逐终非所以解决问题也。故今后应严惩贪污，减轻苛税，以解民困，救济农村，使民有所归。民生安定，祸乱自平，国基自强。此余之希望二。

余前曾发表一文，主张政府应培植民力，俾能自治。政府为人民之公仆，而不应塞人民之聪，掩人民之明，而强其视，强其听。能如是，政府乃真为人民之政府，真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乃真能为人民谋福利。而政府乃能博得人民之拥护与爱戴，反之而不能为人民谋福利，是断不为人民自己之政府，而与政府打成一片，是何能得。故今日急应厉行民治，实行民主，俾民能自助自救。此余之希望三。

总之，今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国脉民生，不绝如缕。此一块中华民国之招牌，行且为人所打破。趁此事尚可为，大家急应奋起挽救。若得其打破以后，再谋恢复旧观，则千难万难矣。朝鲜、印度、殷鉴不远，国人其三思之。

九四老人马相伯

原载1933年10月10日《申报》

十三、致复旦大学学生书

马相伯

复旦大学肄业诸君，日来诸君为国难而驰驱，餐风宿露，不遑宁处，余闻而大慰。唯李校长登辉，因而辞职，余为徬徨不安。然李校长劝诸君不必往南京，实为真的名言。盖政府诸公，类为天赋聪明，必能思之熟而筹之审矣（中略）故诸君南京之行，纵成事实，亦属无谓。唯国家柱石，端在人民，今日亡国现象，其根源首在人民之懦弱。试看其他文明国家，有此等情形否？请诸君深长想之。为诸君计，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处也。务使彼等晓于自身之力量与其责任之所在，执干而起，戮力前驱，则诸君之所以尽其天职者，亦即以补政府教育之力所不及。老迈如余，不克与诸君共甘苦，用贡一言，请希为国努力自爱。马相伯启。1935年12月27日。

十四、苏联对中国毫无野心

马相伯

四月十六日上海电：上海英文报纸“新世界”发表一篇该报记者与国民党老前辈九七老人马相伯之谈话如下：

记者问：先生对于苏联政策的意见如何？

马氏答：苏联是拥护世界和平唯一的国家，苏联不仅对于中国毫无帝国主义的野心，即对其他各民族亦无侵略企图。

问：先生对广田三大原则之态度如何？

答：若接受广田三大原则等于中国民族之自杀，所以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至于南京对该三大原则之态度，则完全是模棱两可，不接受亦不拒绝，诚恐表明态度后，中日之紧张关系将更形恶劣。

问：到了必须回答问题时，南京将何以处之？

答：我希望政府回答“否”。不然，则政府必为人民所唾弃。

问：如果南京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那末先生个人对于救亡的意见如何？

答：救亡唯有赖于人民。

问：近来各报纸均异口同声地喊全国力量有联合对外之必要，先生对此取什么态度？

答：须团结一切愿意为救祖国而奋斗之各党派，各团体，一致救亡，这是洗雪国耻唯一的道路。

问：南京政府对“救亡协会”之关系如何？

答：南京政府不承认救亡协会，因为途径不同。我们主张抗日，政府则主张与日妥协。

问：你还记得冯玉祥的谈话吗？他说政府有用爱国分子的必要，应取消摧残他们的一切法令。冯玉祥的谈话是否表示政府将改变政策呢？

答：不是的，那只是冯玉祥个人的意见。摧残爱国分子是极不正常的事情。政府摧残爱国分子为的是向日本讨好，表示他是镇压反日情绪与反日运动的。

摘自《救国时报》第二十五期，
1936年4月20日

十五、马相伯的救国谈话

什么叫国家？国家就是民众所有的。古话说：人为万物之灵，这就是因为人能合群，合群才能抵抗一切。国家就是合土地、人民、政治三者而成的。国家先有土地，有土地然后人民才有饭吃，所以土地是第一，第二才是人民。所谓政治，就是引导人民，利用土地。人民自己决不愿失掉土地，政治更不能丧失掉一寸土地，政治不能引导人〔民〕以利用土地，反把土地丧失了，那还能算政治吗？阿里士多德的时候，那时的国家，以国土为无上之权，然而现在中国的国家，却以土事敌，还有比这个再坏的国家么？这次有人从四川回来说起内地真有人吃人的事，怎么会把中国弄成人吃人的国家呢？

从前，冯玉祥在察哈尔起兵打热河，我并不以为冯玉祥一定就此能打胜日本的。不过冯玉祥这样做，东北的人民，东北的义勇队〔军〕就会起来，决不象现在那样苦了。东北的义勇军已经很有组织，他们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所以站在前面的中国人都散开，我们的枪子就可以打倒日本人了。

阿比西尼亚只有一千万人，只抵得上意大利的五分之一，意大利以五千万的人民，打一千万的人民，这一千万的人民，

竟出头来抵抗，也抵抗了七个月。日本只有八千万人，而中国有四万万，日本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五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自己五分之一的日本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可是缩头做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人民要出头抵抗，政府还要压迫呢！

日本人在天津已经直接压迫人民的爱国运动，我们政府也继续替日本人帮忙，压迫爱国运动，这样的政府，我们没有旁的話可以形容，我们中国政府实在是“帮凶”。

胡展堂没有死之前，写信给我商行止，我告诉他：你要上南京，不如匍伏上东京；否则，就在广东领导人民，实行抗日。

我气量太小了。看到政府尽管不抵抗，就不自禁的说了许多话。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是一定的结果。

中央就好比会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

“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定我们有可伐之道，然后人家才会来伐。孟子说，国家是土地、人民、政治三者而成，而现在的政治却领导人民去丧失土地，这就是没有政治，就是不成国家了。而政府还喧嚷着预备，预备到几时？阿比西尼亚人民并没有预备已起来抵抗了。我们人民决不能再等待，只有起来抵抗。（凌琛记）

《救亡时报》第10期，1936年7月12日

十六、 马相伯先生题赠全救第二次执委会词

“吾国开化最早，而国事日非，其故安在？三代前征诛之

局，今不得而知矣。三代后大都胜者认土地为战利品，认人民为俘虏物，由其宰割而已，倘能首级多，封户多，便如陈平之宰肉，奉为宰天下之极规，试问以此俘虏之民于天地，何能侥幸于万一乎？故今日必用真民治，礼所谓民则君，以自治也。君自治必不用他人领导。若由政府指定，须有万不投票之决心，付之以尔为尔，我为我可也。美国总统威尔逊尚且说民治主义，今当受最后之试验矣，主义纯洁，精神洪大，人人奋斗之日至矣。不奋斗者，当绝之于斯人也。

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

马相老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席上书赠出席诸委员。”〔按：全救第二次执委会在1936年9月18日开会〕

摘自《救国时报》1936年12月20日第三版

十七、致冯焕章将军书

焕章将军勋鉴：寝电垂询晋京时日，何将军爱我之深也！感谢！感谢！老夫须俟行装运毕，旅费与生活费谋定，始克成行。近阅报载沪上沈钧儒等七人，涉有阴谋扰乱治安，及企图颠覆政府嫌疑，当局施以逮捕，解送法院讯办等情，沪众惊骇莫名。况沈钧儒律师首领，其血心爱国，人人敬仰，视东北义军有过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虽得天下，文武不为。今学生爱国，罪以共党；人民爱国，罪以共党；至沈君等数人以民胞物与心则有之，以苏俄为心，窃可以首领保其无也。幸我将军有以体恤之！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专此，即颂勋安

马相伯谨启二十五年（1936年）十一月三十日

摘自《马相伯文集》第四〇三至四〇四页

第三节 李登辉传略

李登辉是爱国华侨，中国近代的伟大教育家。他把毕生的智慧和精力，全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献给了复旦大学。

李登辉，字腾飞，祖籍福建同安。清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公历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日）出生于荷兰殖民地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郊外的红巴村（Parmera）。^[1]父李开元，积财致富，为大地主，后经商失败，产破家贫。^[2]

李登辉幼年在荷兰人办的学校里受初等教育。十四岁时（一八八七年），赴新加坡就读于美以美教会主办的英华书院。在那里，他受到基督教的影响，^[3]以后终身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十九岁时（一八九二年），赴美国入俄亥俄州（Ohio）威斯雷阳（Wesleyan）大学学习，半工半读，五年后（一八九七年）转入耶鲁（Yale）大学学习。二十七岁时（一八九九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得到学士学位。^[4]

李登辉在美期间，刻苦学习，成绩突出，所学文学、外国语、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等科，均获优等。^[5]他努力钻研各种语言文字，不仅精通马来、荷兰、英、法、德诸种现代语言，对于希腊、拉丁等古代文字，亦有深刻研究。所写英文文章，优美简洁，为英美人士所赞佩。

一九〇〇年，他回到槟榔屿，任英华书院英文部主任。^[6]一九〇一年，到巴达维亚创办英文学校，这个学校和康有为的改革运动有关。^[7]

一九〇五年，李登辉满怀救国热情，回到祖国，“力拟唤醒国人，注重教育，以期自救”。¹⁸¹当时，美国发生排华暴行，曾少卿积极提倡上海各界抵制美货。李登辉和曾少卿是同乡，也参加了这一运动。¹⁸²他鉴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美国人所控制，提出由中国人自己办一个学会，特发起成立寰球中国学生会，长期被推为会长。¹⁸³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后，发动会员，抵制美货，力主废除美国限制华工条约。¹⁸⁴该会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东、西洋留学生，谋求祖国政治、实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那时，颜惠庆、伍廷芳、曹雪庚等人均为董事。寰球中国学生会定期举办科学知识、国际形势报告，出版报刊杂志；¹⁸⁵附设寰球中学、小学和各种职业训练班，代办出国留学手续，介绍职业；举办戏剧、音乐、游艺晚会，开展正当的娱乐活动。李登辉认为戏剧有社会教育意义，曾组织公演戏剧多种，其中《十年后之中国》一剧，“剧情为推翻帝制，改建民国”，“其时清帝尚在，胆怯者深为先生忧，但先生为鼓吹革命，其他非所计也”。¹⁸⁶辛亥革命胜利后，李登辉曾两次请孙中山到会演说。¹⁸⁷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一九〇六年），李登辉由颜惠庆、于右任介绍，受聘为复旦公学英文部主任，后为教务长。¹⁸⁸“凡延聘教师、规划课程，均由先生一人主持”。¹⁸⁹当时，他还担任英、法、德文，拉丁文，哲学，政治学多种课程，¹⁹⁰每周上课二十七点钟。¹⁹¹

一九〇七年，李登辉与汤佩琳女士结婚。他回国以后，由于宗教信仰关系，结识上海基督教牧师汤仁熙。汤牧师钦佩他的品格和学问，便把自己妹妹汤佩琳许配给他。汤佩琳受过近代教育，通晓中外文字，善于处理家务，为人精明能干。李登辉长期居留国外，除闽南话外，不会说普通话，也不懂祖国文字。这时得汤夫人帮助，数年之间，不仅能说普通话，而且能

讲上海方言，对古代汉语，亦能窥其门径。

一九〇八年，清廷召试游学毕业生。李登辉本不愿前往，经复旦公学监督夏敬观先生敦促，姑往应试。既试，赐举人，分外务部学习。他不愿做官，仍回复旦教书。^[19]同年八月，浙江省第一次举行考试，选拔派往欧美的留学生，李登辉受聘为“襄校师”，专阅英文、德文试卷。^[20]

一九一一年春，李登辉一度脱离复旦公学，^[21]出任《共和西报》主笔，同时任教中国公学。^[22]一九一二年兼任中华书局英文部主任。

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胡瑛不谙外文，黎元洪电请李登辉前往协助，他辞谢不去，改荐王正廷前往。^[23]民国初建时，陈锦涛任财政部长，请他任次长，他也回复不去。^[24]他认为国家的兴盛，关键在于培养人才，因此他的唯一志愿，在办教育。

李登辉不愿做官，并不是对改革国家政治不关心。为了革新政治，一九一二年，他与唐绍仪、伍廷芳等在上海组织“上海宏济会”，集会数次。为袁世凯侦知，恐不利于己，派专人来沪，劝令解散。^[25]此后，李登辉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组织。

一九一二年年底，复旦公学发生罢课风潮，几乎停办。次年一月，董事会推选王宠惠为董事长，李登辉为校长。从此，李登辉把办好复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再也没有离开过。

李登辉就任校长之际，正是复旦危难之时。首先是经济困难。复旦公学在前清时为公立学校，每月由财政局拨款白银一千四百两，占学校支出的四分之三以上。这时官费停发，学费收入无多，校董原来答应补助经费不足之数。^[26]一学期后，二次革命失败，校董多国民党著名人士，逃亡国外，补助来源断绝。其次是政治险恶。袁世凯在沪爪牙，心知复旦与国民党革命人士关系密切，而邵力子、王宠惠、叶楚沧等国民党人仍在

复旦教书，曾派军警至校，准备逮捕李登辉，被他从容应付过去。^[27] 第三是校址纠纷。复旦原在吴淞，辛亥革命后校址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后由江苏省都督拨借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校舍。此时李氏后人指祠堂为私产，要求收回，逼迫学校搬迁。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底，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托人电请李登辉北上，云“有要事劳公，请即日来京”。想请李登辉担任官职。如果李登辉从个人利害出发，可以借此摆脱在复旦的困境。但他不愿这样做，在北上时表示：“决不愿入政界，彼之唯一目的，在培养真才”。李登辉入京目的，是想与梁启超、董鸿祚、蔡廷干等人商议，请政府拨巨款来扩充复旦。^[28] 在北洋军阀时期，他的这一愿望，当然不可能实现。

面对重重困难，李登辉坚毅沉着、焦思竭虑。在经济上采取增收节支、量入为出的办法。他扩大招生人数，在校学生由一百多人增加到三百多人。提高学费，从每学期二十四元增加到四十元。^[29] 同时紧缩开支、减少工资支出，使学校收支趋于平衡，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学校。

办学校是为了培育人才，李登辉非常喜爱优秀学生，在提高学费以后，害怕家庭清寒而学习优秀的学生失学，在校章中规定：“本校设优待生额十名，学膳费一概免缴。”^[30]

校址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不仅因李鸿章后人引起纠纷，而且李公祠本身地方狭小，也不合应用。当时，原拨复旦校基吴淞官地，又另拨水产学校。李登辉为了学校将来的发展，在经济仍然困难的情况下，于一九一五年起在江湾购卖土地，筹备建设新校址。^[31] 并于一九一七年改名复旦大学。

要在江湾建校，必须有大宗建设基金。李登辉清晨到校，日暮方归，除授课外，大部分时间花在向外募捐上。向人募捐，常遭冷遇。往往给某一认捐者的信件，达八、九次，十余次之多，甚至辗转请托，一再登门拜访，认捐者感其热忱，才乐于

捐助。^[32]

李登辉为了筹集建校基金，很早就和南洋友好联系，动员华侨子弟入学，宣传祖国兴办教育的意义，预作募捐准备。^[33]一九一八年，李登辉亲往南洋各地募捐，爱国侨胞，踊跃捐助，共募得十五万多元。^[34]后又经唐少川的介绍，得归国侨商中南银行黄奕柱、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的资助，在江湾逐步建筑了复旦大学的新校址。

李登辉献身祖国教育事业，为的是挽救祖国危亡。他在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爱国主义精神。一旦有事，他就带领学生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中去。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期间，他以寰球中国学生会名义，致电我国代表，要求对山东和青岛权利“坚持勿让”。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动员复旦学生投入运动，指导复旦同学联络全市学生组成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对上海学联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当时，圣约翰大学附中等教会学校，压制、开除爱国学生。李登辉对被开除的学生，抚慰有加，准予转学复旦大学。约翰校长卜芳济扪心有愧，钦佩李登辉的爱国精神。这年，授予李登辉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35]

一九二三年，李登辉夫人汤佩琳女士在学校担任检查员（一说财务监督）。次年春，校内发生流言。诬指汤有帐目不清等问题。李校长乃请假一年，偕夫人出游南洋，任人查帐，以明心迹。当时只有学生章益一人送行，“舟次惜别，黯然神伤。师但勗为母校前途努力，言不及他。其宽大胸怀，最足为后进楷模。”^[36]

一九二九年，李登辉遭丧妻之痛。二女一子前已相继病逝。孤身一人，终日以泪洗面。他遂委任金通尹为学校秘书长，并对金说，“我惫，汝佐我守。大学之教，百家渊藪，覃思穷理，弗绀弗扭”。^[37]嘱金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登辉召集全校师生开声讨大会号召学生起来抗日。^{〔33〕}他一方面发动同学组织义勇军，搞军事训练，以培养抗日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指派章益、孙寒冰、余楠秋、吴颂皋（吴后当汉奸）等四位教授陪同八百位同学，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39〕}同时又派会计主任袁际唐教授，主管请愿团财务。国民党政府闻讯后，急电京沪铁路局，禁止提供交通工具。袁际唐以赴南京参观为名，购卖团体票，于九月廿七日陪同学生去南京。^{〔40〕}复旦学生请愿团到达南京后，汇合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学生，于九月廿八日冲进外交部，责问外交部长王正廷，王语言支吾，气愤的学生打了王正廷，王跳窗逃脱，便称病“休养”。九月廿九日，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不久，蒋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宣布下野。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民政府召集国难会议，李登辉应邀出席。他著文痛斥当事者之因循误国，有人以为措词过分严峻。他却认为：如果能促使当局者的觉悟，虽然得罪了个别人，我也不管了。^{〔41〕}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策划华北“自治”，国民党政府允许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华北“特殊化”，史称“一二九运动”。十四日，李登辉和上海其他大学校长，访问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领土完整、开放言论，外交公开等要求，支持北平学生运动。二十三日，复旦学生组织“赴京请愿讨逆团”，在北火车站被国民党派军警包围。当天，蒋介石打电报给李登辉，要他去劝阻学生。他被迫前往车站劝说同学回校。同学们知道李校长是被迫前来的，于是高呼口号：“拥护李老校长”，“李老校长健康长寿”，“请李老校长回家休息”。同学们表示热爱李校长，听李校长的话，但要去南京请愿。李登辉见同学们

态度坚决，便回电蒋介石，表示无能为力，同时向校董会辞职。¹⁴²

复旦创办人马相伯听说李登辉辞职，于廿七日写信给复旦学生，指出：“李校长力劝诸君不必往南京，实为真的名言”，“为诸君计，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处也”。¹⁴³这时，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利用寒假下乡宣传抗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复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自己开火车到无锡，被国民党派军队押回上海，也想下乡宣传，可是印刷宣传品的经费无着。于是裔寿岷、史亚璋两同学向李登辉募捐。李登辉当即捐助二百元，金通尹捐助五十元、化学系主任沈梦占捐助五十元，学生得以成行。

当时，复旦成为上海反日救国学生运动的中心，深遭国民党政府的仇视，阴谋逮捕爱国学生，破坏救亡运动。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国民党政府派军警包围复旦，先在校外宿舍陆续逮捕学生、救国会干部七人，又派女探员潜入校内女生宿舍抓人，被女同学发觉后扣留。黎明后，军警借口搜查反动分子，闯进校园，殴打学生，李登辉当即挺身而出，制止军警暴行，险遭殴辱。同学见状，情绪激昂，群起对抗，军警被迫退至校外，与学生隔篱对峙。此时，军警胡乱开枪，打死警察一人。国民党政府大造谣言，诬蔑复旦学生私藏枪支，打死警察。李登辉当即派张志让、余楠秋两教授赴南京教育部报告。¹⁴⁴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律师，自愿为复旦辩解，指出枪弹从死者背后进入，胸前出来，显系军警自伤，与学生无关。

事发以后，李登辉对天津《益世报》记者发表谈话：“救国当然为大家之事，政府要救国、人民亦自然要救国”，“政府对救国运动应表同情”，复旦学生“救国会与学校当局完全

合作”，公开反对逮捕爱国学生，一些报纸也指责国民党政府诬陷、迫害学生。¹⁴⁵ 李登辉还要求校董会开会，由校董孙科、杜月笙、钱新之、叶秉孚等出面营救学生，将被捕学生保释出来。¹⁴⁶

国民党政府在“三、二五”事件中，没有能压服复旦的爱国师生。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驻沪领事急不可待地向上海市政府建议：封闭复旦。国民党政府便进一步地来破坏复旦师生的爱国运动。

国民党政府知道，复旦的学生爱国运动如此高涨，和李登辉校长的支持有关。要破坏复旦的学生运动，必须逼迫李登辉就范。一九三六年夏，国民党政府派前复旦教授、立法院副院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沧到上海来解决复旦问题。国民党政府对李登辉的态度是：要么辞职、要么投降。¹⁴⁷ 李登辉不愿辞职，复旦是他一手建设起来的，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象是他的生命一样，他更不愿投降，他反对国民党的卖国外交，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李登辉有着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性格，宁愿离开复旦，也不向国民党投降。

八月二十日晚，复旦校董会开会，钱新之、许绍棣、潘公展等人和新任校董叶楚沧出席。李登辉提出辞职。校董会多数人认为李登辉在复旦三十年，建校有功，不便同意他辞职，允许他请假一年。¹⁴⁸ 由钱新之董事长代理校长，原复旦学生、国民党 C、C 系骨干吴南轩任付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李登辉离职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他，任命他为立法院委员，寄来月薪六百元，他拒不接受，退了回去。¹⁴⁹

吴南轩担任付校长后，以种种借口，开除爱国学生三十二人，又以学习成绩不好为名，强制一百多名学生退学、转学，还想迁校无锡，使复旦学生爱国运动一蹶不振。

李登辉眼看复旦为国民党所控制，大批爱国学生被开除，

斥退，愤懑不平，他向人说：学生爱国有什么罪？¹⁶⁰十月十七日，为了排遣胸中郁结，他离沪出游，溯江而上，经南京、武汉、至重庆，又折往成都。沿途饱览祖国的壮丽山川，受到复旦毕业学生的热情款待，感到自己多年的心血并未白费，十分愉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内迁。李登辉因年老力衰，滞留沪滨，经留沪师生恳求，他决定给灾难深重的祖国培养急需的人才，在上海租界内继续办理复旦大学（对内称复旦大学补习部），公开宣布办学的原则为“三不主义”，即一不向敌伪注册；二不受敌伪补助；三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宁可停办。¹⁶¹在那种敌伪环伺的险恶环境中，复旦与其他沦陷区学校不同，坚持不教日文。李登辉语重心长地教育学生：要“发挥牺牲与服务的精神，以爱护其国家”，要抵御不良环境的诱惑，将来才能生活于光荣与幸福之中；如果为不良环境所诱惑，则将生活于耻辱与苦痛之中。¹⁶²实际上，是教育学生坚持民族气节，不要去当汉奸。

抗战胜利以后，一般人还沉浸在欢乐之中，李登辉即发现国民党政权更加腐朽，对国事忧心如焚。他在一封信中说：“世风较前更下，人心较前更险，国民道德普遍低落，上下交征以利，寡廉鲜耻，莫此为甚！”¹⁶³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发动内战，曾与钱新之等人商量，共同发表宣言，但钱顾虑很多；一时又找不到观点相同、敢于讲话的人，只能作罢。¹⁶⁴但私下与人讲话，则愤慨之色、溢于言表。这时，他担任复旦中学校长，复中学生金冲及问他对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他说：“国家情况如此之糟，你们学生早该讲话了，你们不出来讲话，谁来讲。”¹⁶⁵李登辉逝世后，邵力子在悼词中说：“他死了，依然期望着和平统一”。¹⁶⁶

李登辉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他的爱国思想，

更多地表现在教育之中。

李登辉非常重视德育。他认为培养学生，应该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其中又以德育最为重要。因为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社会上最可怕的人、最危险的人，是那些没有道德、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他指出，在“五四”时代，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一些身居高位的留学生，被青年打倒；而“五四”时代打倒他人的人，现在又必须他人起来打倒。¹⁶⁷ 国民党中，“有许多号称革命领袖的人物，怕只是投机成功的专家。”¹⁶⁸ 他还认为个人的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都是一句空话。

李登辉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把基督教义中的博爱、无私、忠诚、纯洁作为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教育学生，还把“牺牲、服务、团结”，作为复旦精神的主要内容，他常说：“必肯牺牲乃有为，必乐服务乃有用，必能团结乃有力，而以不自私为纲”。¹⁶⁹ 他教育学生，要把民众的福利，作为永久不移的目标，这样的成功，才能万世不朽，与日月争光。¹⁷⁰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李登辉智育思想的反映。他认为培养学生的智力，不在于把书中所记载的、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一一记牢，而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独创的见解。学生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需要多方面的修养，要有一往直前的决心，吃苦耐劳的毅力，挨受谩骂的勇敢，百折不回的志气。¹⁷¹ 李登辉在教学工作中，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只有对学生要求严格，才能督促学生刻苦学习。要求严格的教师，才是对学生有益的好教师。¹⁷²

对于体育，李登辉也很重视。他认为体育运动，不仅能锻炼出坚强的体魄，而且可养成协作精神。但他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对体育运动员从不在分数上予以照顾，甚至规定：七十

分以下成绩的学生，不能当运动员。

教育要与美育打成一片，这是李登辉的又一教育思想。他认为学校环境，对学生影响很大。环境好，学生心中快乐，书可以读得更好一点，还可以养成乐观的人生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他十分注意校园的美化，精心布置，力求整洁。^[63]

李登辉认为教育是国家的根本，是最崇高的事业，他不但自己终生从事教育，而且要学生从事教育，不要做官。解放前复旦毕业生做教师的约占半数左右。

李登辉在担任校长期间，实行民主治校，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各系由系主任负责，聘任教师、安排课程。学校设立行政院（后改为校务会议），处理校务。他虚怀若谷，作风民主，往往说：“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64]最初，他认为根据中国情况，学校不宜招收女生。在行政会议讨论时，教师和学生代表赞成招收女生。他就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学校的其他重大事项，也都是通过行政会议，共同商讨决定。

李登辉，严以律己、诚以待人。他对自己的缺点能够公开检查、无情解剖，对别人不足之处，则诚恳的予以指出。他态度严肃、心地慈祥，自奉俭朴、乐于助人，公私生活，皎洁光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李登辉因脑溢血逝世，终年七十五岁。陈望道曾对李登辉的一生，作过中肯的评价。他说：李登辉“先生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也是校长的最好典型”，“先生曾以‘服务、牺牲’解释复旦精神，先生自己就是服务的、牺牲的，同时也是民主的、和平的，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65]

李登辉的著作有：《英文实用教科书》、《文化英文读本》、《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语修辞学》及《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Vital Factors in China's Problems》）等。

注：

- 1、6、16、22、59 《李登辉先生行状》，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 2、19 夏敬观：《李腾飞先生传略》，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 3、4、7 《Who's who in China》，转引自《复旦大学1924年年鉴》
- 5、32 季英伯：《我们的李校长》，见《复旦同学会会刊》，六卷六期，1937年3月出版
- 8、10、12、13 季英伯：《我所崇拜的李老校长》，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 9 赵聚钰：《与于右老谈复旦》，见台湾《复旦通讯》第30期
- 11 1905年8月12日《时报》，1905年10月7日《申报》
- 14 孙中山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报告，一次为1912年10月10日；一次为1919年10月10日。
- 15、17、18、26 1910年《江苏省宝山县公立复旦学堂一览表》
- 16 1908年《复旦公学章程》
- 20 沈殿民：《记浙江第一次考选欧美留学生》，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 21 1911年《复旦公学章程》教职员名单中，无李登辉，教务长为胡敦复。
- 23 (美)包华德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王正廷条
- 24 郭稚良：《我所认识的李老校长》，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 25 吴双人：《记李登辉先生》，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 26 1913年1月24日《民立报》
- 27、51、57 章益：《追慕腾飞夫子》，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 28 1913年11月30日《申报》第十版
- 29 学生人数，1913年夏为177人，1914年夏为307人，1915年夏为303人；学费，1912年7月3日《民立报》广告上刊为24元，1915年7月，《复旦公学章程》上载为40元
- 30、31 见1915年7月《复旦公学章程》
- 33 李登辉：《本校的过去》，见1936年5月5日校友节特刊
- 34 见1919年《复旦年鉴》
- 35、53、赵世洵：《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记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博

士》，见台湾《复旦通讯》第30期

36、41 章益：《我所见到的李校长》，见《复旦同学会会刊》第二卷第七期，1933年4月15日出版

37 全通尹：《祭李登辉师文》见《率楼韵文选》。

38、47 张志让：《关于解放前复旦学生运动的一些情况》见复旦大学学校办档案

39 吴幼伊：《赴京请愿的经过》，见《生活周刊》1931年10月17日，第六卷第43期963—966页

40 袁际唐：《李登辉在“九一八”事变后》

42 李登辉致蒋介石电，见1935年12月23日校刊

43 马相伯：致复旦大学学生书，见1936年2月4日《救国时报》第三版

44、46 《母校三、二五事件经过情形》，见《复旦同学会会刊》第五卷第七期，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4月9日，第三版，亦有记载。

45 1936年3月28日，天津《益世报》评论：《上海复旦大学风潮》

48 1937年5月5日，复旦大学校友节特刊

49、50 吴道存先生谈话记录

52 李登辉：《诒三三届毕业同学》，见上海复旦附中三三级商科毕业纪念册

54 章益：《复旦大学故校长李登辉先生事略》

55 金冲及谈话记录

56 《一颗巨星的陨落》，1947年11月22日东南日报特写

58、60 李登辉：《成功的意义——勸毕业同学》见1930年6月10日《复旦五日刊》

61 李登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见1929年11月4日《复旦周刊》

62 李登辉讲话，见1936年12月28日校刊

63 李登辉：《我的兴趣》，见1936年《东方杂志》第一号

64 余楠秋：《我所崇拜的李登辉博士》，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65 陈望道：《悼李老校长登辉先生》，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附录：

一、李登辉主张废除华工禁约

“寰球中国学生会于初十日（九月八日）晚八时开特别大会，到者百余人，由会长李登辉宣布本会对于美约问题之意，略谓：‘抵制美约事起，全球震动，而我国内人士之喧争，不过望其改良工约而已，究竟如何改良，如何要求，至今无人道及。试问美国不与他国订立禁工条约，而独立华工禁约，世间安有此不平等之事乎？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本会意见，必争废约，断非改良工约所能毕事’”。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二、《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序

李登辉著（英文）吴让能译

为了适应大家对于更切合实际教育的现代文献的迫切需求，早在1914年，我就着手准备编纂这样的书了。但直到去年，才真正着手进行，当时中国的许多事件更清楚地指明，对这类文献的需求是适合时代的要求的。

民族主义的精神，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学生界增涨得特别迅猛。由于各种各样思想对青年的影响，就特别需要能引导青年走向真正爱国的、积极的努力方向去的文献。

因此，要对现代教育作出真正的贡献，这类书籍就得除有文献和知识价值外，还必须满足以下的要求：

- （1）它必须能振奋人心，催人进取。
- （2）它必须是积极的和适用的。
- （3）尤其是，它必须切合中国问题的实际。

搜集这样的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和从各种来源中慎重选择。如果这些篇章中有些具有国际意义，那也只是出于这个事实，即为了使学生的爱国具有理性，就必须让他们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的重大世界性运动有清醒的认识。按照现代观点来说，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具有国际主义的精神。

因此，在这卷书中，我打算把这些内容分为五个大类：

- (1) 关于一般的课题，诸如性格的修养，成功秘密等等
- (2) 关于我国的经济问题
- (3) 关于我国的工业问题
- (4) 关于我国的教育问题
- (5) 关于国际问题

虽然这是专为一般英语读者所编纂的书籍，但也可作为一本研究“公民学”和“社会科学”的补充读物。然而，更重要的是，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引导学生走向积极的爱国的途程，但愿这一点不要被教师忽视。

李登辉

复旦大学，上海，1926年12月1日

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

李登辉

教育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名词的拉丁字源里，找出一个很好的回答。教育在英文里是 Education，即从拉丁的 Ex 和 Duco 产生。Ex 的意思是“从出”，Duco 的意思是“引导”，合起来便是说，“引导出来”。畅言之，即是把个人原有的潜伏能力，导之使能充量的（按：的字疑为发字之误）展也。所谓潜伏的能力，是包括身体、智力，社会和道德各方面的。教育的趋势，在理论上虽然是一天天注重在多方面的启发，

在实际上的进步，却是非常缓滞，有时竟与这理论背道而驰。

在过去的教育设施中，尤其中国，太偏重于智育方面，以致把其他方面都忽视了。结果是，一般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虽是智力发达很高，然而或是体质颓弱，形同病夫，或是思想空泛，不切实际，甚至于有文无行，变为腐化的官僚政客，学痞商蠹、更是自邻以下了。这种状况，在闭关自守的时期，已经是流毒社会，在今日国际竞争剧烈的时代，假使一国的教育长此情形，国家自然是要落伍的。

自从满清时代，与外人接触日多，渐知道维新之必要；于是尽力摹仿西方。但是那时只看西方物质文明之可惊，我们的摹仿，亦就着重在物质方面。所以那时大家都只晓得提倡“西艺”。至于西方文明之精神方面，虽是西方文明的精神精髓，却反因未受了解，而遭遗弃。我们改革的结果，只是抄袭了一些西方的皮毛，拾得一些西方的糟粕。今日的情形，尤其不幸。我们因为对于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礼教的怀疑，把这些一古脑儿都打倒推翻，同时却又不能产生新道德的标准。一般青年所受的教育，都只有理智的片面，丝毫谈不到全人的发展。若是与西方比较起来。在西方国家，道德的训练，即使在学校未能完备，他们的家庭社会各种组织里面，尚可补救维持，而在中国，则无论学校以内，或学校以外，竟无一处与道德的训练有关。在先我们虽以精神文明自豪，鄙视外人为太重物质，而在今日，则物质与精神，两均不能如人了。

人类生活，包含德智体三原素，是缺一不可的。三者的发展，贵在乎匀。忽其一，未有不牵及其他之理。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要养成才德兼备的人材，就非重德育不可。我们若以为单靠理知的磨练，就可令学子的志行高洁，那就大大的错了。世间最可怕的凶，不是专恃蛮力的人，而是足智多谋的人。他们逞其鬼蜮

的伎俩，真可以杀人不必血刃；他们的智慧，适足以增长他们的罪恶。至于忽视体育，亦常致悲惨的结局，只须向现在学校一看，其中因体质亏损以致学成而不能用的，比比皆是。即可知轻视体育之害。我们不主张特别注意三育中任何一种，上面已说过，三育是不可偏废的，不过今日奸诈百出贪欲炽张的时代，对于德育，似不能不多加之（按：之疑为注字之刊误）意。

近代教育的思潮，是由个人与社会对抗的观念，进而至于个人与社会调和的观念。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要把个人潜伏的心能，尽量引导使之发展，以替社会谋福利。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个人中最有价值而应启发的心能，亦就是在社会上高贵的德行。这些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有三件，就是独立，忠实，和协作。

独立是不依赖的意思，我们给学生以种种练习，目的不是要他们把书中所载或教师所授的知识，一件件记牢，而是重在养成各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明明是教育的一种主要目的，而往往不为一般教师所懂得。他们只愿把学生的脑子填满，便算尽其能事，实是可叹得很。我们要养成学生的独立，应明瞭独立不是一种单纯的德性，其中包含的心理分子很多。学生如有独立的能力，他必须有一往直前的决心，吃苦耐劳的毅力，挨受谩骂的勇敢，百折不回的志气。但是学生中有几人够得上独立的初步，教师中又有几人能本着这个目的去教导学生呢？

现在的学生，大部分所做的工作，无非把教师指定的功课，很草率地略一涉猎，专为准备次日回答教师考问之用，书中精义，尚且未明，更不能说到独创的见解。至于教师，则因任课繁多，每日亦仅能把书本稍稍咀嚼，预备作为讲演的资料，亦是无暇深思。他们参考书籍，并非旁征博引，做他们学说的左证，实则专如商贩之趸批货物，以备零售而已。假使教师希望学生能够独立，当然应从自己做起。在学校里的独立，就是在

社会里独立的基础。社会里的分子，能够独立，才能成进步的社会，国家里的公民，能够独立，才能有进步的国家。凡是一个教师，倘能引导学生为独立的思想者、独立的劳动者，他真可称为造福于社会了。

忠实是稳固健全的社会不可少[的]条件。其中心理的分
子，是服从、敬重、和爱心。有一句西谚说得好，要指挥别人的人，自己先得练习服从，这话确是不错。我们亦可仿着这句的意思说凡不能敬重别人的人，亦不会受别人的敬重。为办事上的效率起见，牺牲己见，一唯上级人员之命令是从，是有价值的服从，把别人的人格看得如同自己的人格的一般应当维护，是有价值的敬重，把别人的幸福看得如同自己的幸福一般重要，是可宝贵的爱心。三者都是化小我于大我之中，便都是忠实的本质。

无论在一个什么机关，或学校里，倘要进行顺利，忠实是非常重要的。教师能得学生对他忠实，他的贡献才能宏大。反之，若是一个学校里面，由于师生间的关系太机械，于是从生疏而冷淡，从冷淡而隔阂，从隔阂而猜疑，从猜疑种种不忠实之现象起，而至于决裂破坏了。教师应知除了知识传授以外，对于学生性情之陶冶，应当负大部责任。要造成忠实的学生，先就该做忠实的教员。

协作的观念，在教育学说里，还很新。这观念由于解决经济界里的劳资冲突而起，现在一切社会生活里，都有他的应用了。协作的利益、是节省劳力，增进生产，集合力量。在学校里练习协作，最好的地方，自然是运动场。在各种球戏竞赛的时候，每组的球员，都要和谐地一致前进，各人有各人应尽的职务，各人应各尽他的能力，非但不懈力，且亦不可争功。协作是要有同情和牺牲的精神，专以公益为重的。所以运动除去锻炼体魄之外，还有他特殊的功用。

假使把今日的中国社会，解剖了看一看，恐怕最缺乏的就是协作的精神。无论大小团体，其中分子，总是各执一端，争持不下，从不晓得团体的利益应置在任何个人利益之上。因为社会中有这种缺点，更要在学校注重协作的训练。

德育的重要，可说是无可疑义的了。德育的设施，是绝不容缓的。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

现在大家既以我国旧有道德为陈腐，把他推倒，又复轻视西方的精神文明，不肯吸取，岂不是陷于绝境吗？假使我们不管他是新的，或是旧的，是东方的，或是西方的，只要择其善者取之，其不善者去之，集东西之精英，陶铸于一炉，造出更高一等的精神文明。这不是我们所应当大家共同努力的途径吗？（完）

摘自《复旦周刊》第二十四期，1929年11月4日出版

四、成功底意义——勸毕业同学

李登辉

成功的企求，是人类常态生活过程中的原动力。趋向于成功的努力，可说是与理智同时发端。

这种企求，在儿童玩游戏、学习、争闹当中，已经有了表现。儿童的竞争效胜，无非为要得成功。人类原是有“自存”的天然倾向的，这便是努力于成功的基础。及乎想像的能力愈加丰满，人生的活动愈加复杂，成功底愿望，也就愈成为一切生活底重心。

尤其是行将离校的大学青年，在他们投身社会的前夕，精力充富，朝气盎然，正如新发于硎的刀剑，急于一试其锋。瞻望前途，更急于求得其种种理想之实现。

成功，谁不愿意？但是怎样才能成功？多数的人们，只怕都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最好是请命运之神，把胜利送给我们作为礼品。

于是就有无知的男妇，祈仙媚佛、妄作非分之求，而人与人间的阿谀逢迎，亦无非当作成功底捷径。

成功底结果，固属可喜；成功的手段，却须慎重。这一点可说是关系乎世道人心。假如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充其至极，必至于奸诈百出，唯利是图，道德沦亡，指日可待。其恶影响及于国家社会，惨毒尤不忍言。就在今日的中国，有许多号称革命领袖的人物，怕只是投机成功的专家！

真正的成功，只有智勇兼备，不折不挠的人，才能达到。愈是障碍重重，愈是坚苦卓绝。正如古人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又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侥幸成功，虽非绝对不可能，然而无论在个人，在社会，绝对不能有所福利。反之，饱经挫折的成功，非但增强个人底自信，而且造福于人类，或是精神的创作，或是物质的设施，都足以垂之久远。

在许多所谓的成功当中，只有一种成功，真有其底价值。这就是以牺牲，博爱换得的成功。这样的成功，才是万世不朽，这样的成功，可与日月争光。古今中外的贤哲，远如基督、孔子、释迦、近如华盛顿、林肯、孙中山、甘地，以及其他宗教、政治、艺术、文学的山斗，谁不是丢开了自己私人底成功，而肆力于大众底成功？唯其能忘却小我，致力大我，所以才能受万流景仰，百世师宗。

本届毕业诸君，离校在迩，其期望成功之切，自无待言。我对于诸君底前途，亦抱有无限的希望。我向诸君要进的一言，就是向着光明的大道，努力前驱，目前的得失，可以置之不计，

而民众的福利，应作永久不移的目标。如是则最后的成功，可操左券。那却是非徒个人底光荣而已了。

本文系校长为1930年毕业纪念刊而作。编者征得校长同意，并商诸毕业刊编辑者，先在本刊登载。（摘自《复旦》五日刊，1930.6.10）

五、蒋介石致李登辉电报

上海北站两路管理局，转复旦大学李校长，转诸位同学鉴：顷接吴市长电，藉悉诸君爱国表示，出自至诚，中正深为感动，君等意见，中正亦可接收，切盼迅即复校，以释忧念，国难诚极严重，然中正必以爱国青年之心为心，负责匡救，以慰诸君，蒋中正，梗戌印。

六、李登辉复蒋介石电报

南京蒋院长钧鉴：复旦大学（学）生组织赴京请愿团，劝阻无效，群集北站，奉梗戌电示，特向诸生宣读，再三晓谕，迄未听从，登辉诚信未孚，惭惶无似，除向校董会引咎辞职外，谨此电闻。

复大校长李登辉（上）二十四日上午四时

以上摘自《复旦大学校刊》第223期，1935年12月25日出版

七、我的兴趣

李登辉

讲到“兴趣”，不应该以个人为中心，而应该以大众为中心。因为自己高兴，而不能使人高兴，何高兴之有？

我的事业是教育，所以我的兴趣与教育有关系。我欢喜把

我们的校园弄得很好看，美丽。我相信学校环境对于学生思想的影响很大。环境好，学生心中自然快乐，书也可以读得好一点，最重要的，可以养成乐观的人生观。抱乐观的人才能对于社会与国家有所贡献。

我觉得人生离不开道德，道德是精神的美。道德思想在学生时代需要培养。物质环境对于道德思想的培养有密切的关系。因之我竭力求我们校园的美术化，使得学生处身其中，思想清洁，心身愉快，成为发奋有为的青年。他们快乐，我便快乐了，这即是我的兴趣之所在。

我认为教育与美术要打成一片。

摘自《东方杂志》1936年第一号。（33卷第一卷）

八、为毕业纪念刊所作序言

李登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国家之需要人才，无如今日之殷切者。诸生于如此困难情形之下，终获完成其学业，为他日服务国家之准备，此其忻幸，应较在平时之毕业为更大。

教育对于吾人功用大于一切，此一问题，今日较任何时代为显著。诸生今后如各能发挥牺牲与服务之精神，以爱护其国家，则教育才不负于诸生，而亦不负于社令。诸生若仅知藉教育以达其享乐之目的，则教育不啻已告失败。

今日诸生步出复旦之门，终生将留有复旦之符号。诸生与复旦之此种关系，将永继续。诸生一生中如有成就，复旦将蒙其光荣。若有挫折，则亦牵累复旦，同受其害。须知造就学生者为学校，而造就学校者则其学生也。

诸生当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出校以后务须发挥复旦之此种精神。尤要者为人须问心无愧，询如莎士比亚所云，

“对己忠实，则黑暗中自有白昼，对于一切，不可欺罔。”

原载一九四四年一月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

九、诰三三届毕业同学

李登辉

语云：“今日之学生，乃明日之领袖。”是故无论在政治上、实业上、商业上，或教育意义上，学生将为未来之领导者。若然，则国家民族之前途，均惟尔等是赖。胥知国家之伟大及其繁荣，均视乎具有权威者及负责任者之品性如何而定，设国家之领导人物，道德高尚，诚实而不自私，并富有真爱国心，则国家蒙其利，而人民被其福；反之，设国家之领导人物，为腐败而自私者，贪得无厌，只知个人之利禄，而忽视国家与人民之福利，则此民族必日即于衰弱，而人民受其殃矣。

今日中国之贫困，由于曩昔在位者之目光短浅，腐败成习，此固尽人皆知者也；盖彼等常贪不义之财，蔑视大公无我之义，遂致国家日趋衰弱。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凡国家之危亡，其祸机恒由于自召也。

夫集个人而成家，集家而成国，然则国民者，诚立国之基本原子也。是以欲建设一强有力之国家，必先建立国民之道德性，先哲有言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信哉斯言。

常人以为仅凭智育，即足以成为一贤明之领袖，此种见解，实为谬误。盖仅具有广泛之知识，而无道德上之修养为之辅，其为用，或匪特无益而反有害。

今诸生在中学毕业以后，有将继续求学于大学，为将来服务社会之准备者。亦有现时即需就业者。但无论求学抑就业，吾信尔等，必将随时遭遇不良环境之引诱，如在教室中时，惑于

多得分数，致不惜造成虚伪之成绩，作欺骗教师之行为；在就业后，或运用违法及不正当之手段，以满足其个人之私欲而逞其野心，是皆所谓诱于外物者也。

尔等现正徘徊于歧途，如对于不良之环境，能奋斗抵御，不为诱惑，则将来可成为一有用之人才，而生活于光荣及幸福之中，如为不良环境所诱惑，所屈服，则将成为一失败者，而生活于耻辱及苦痛之中。

尔等固均赋有成为未来领导者之特权，故家庭、社会、国家对尔等之期望甚殷，而尔等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之责任亦綦重，尔等应如何不使之失望，慎哉其各勉旃。

1944年7月

摘自上海复旦附中三三级商科毕业纪念刊

十、教育之真谛

李登辉著 严大琨译

教育之目的在乎教人应付人生之现实问题，教育二字之字义来自拉丁语原 Exduco——引出或启发。教育为身、心、精神三者之发展，而此三者又相互依存，任阙其一，其他二者亦难独完。三者之中，以道德或精神之发展最为重要，实为其他二者所由立之基础。人而无德，即沦为粗野之人，以其缺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高尚理想焉。

现代教育率多注意体育智育，而于人格教育中之主要部份即精神教育则不甚措意。此现代文化之破坏多于建设之悲惨现象之所由来。最近残酷之世界战争即造因于物质科学进步而道德与精神不完。知识之获得非即知识之完善之谓。故受教育之人非必为有智慧之人，知识为心智之事，智慧则属良心和精神，故社会中最危险之人物非为目不识丁之莽夫，而为缺乏道德观

念之受教育人士。盖此类人握有强大之武器可以害人。凡行巨骗，出卖国家者决非无知之徒，而多系有学之士。

于是教育乃成阻滞民族复兴之障碍物。虽然，身受高等教育之学子虽须一律经由同一教育阶段，教育非必永为障碍焉。教育可以成为学生生活乃至民族生活中之重要关键，深远之道德变化可由之产生。教育可以成为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间之桥头阵地，师生于此可通力合作以谋应付人生之现实问题。

物质教育必须与道德及精神发展相附而行，吾人理性、公道、正义三者之平衡始可确保，而唯此三者可以系维社会与世界于不坠。吾人需要革心尤甚于益智。革心为吾国社会与民族进步之基本条件。吾人必须履践大仁、大诚、大公、大德四德。吾国之社会与民族复兴之机即系于斯。

使学生对是非善恶，具有真知灼见，其道何由？吾人可以使学生获益之道有四。其一为教师之演讲。吾人所需之教师除稗贩知识外，须于其所授学科中，益之以若干道德教训之提示。教师必须于其学科中推演出道德原则，并以之提示学生，每一学科自可以理智为范围。但教师必须提示学生，在理智范围之外有所谓道德感之存在，而在道德感之后复有广大之上帝（上帝即本体）权能在焉。目前之教育制度局限于理知之范围，此所以学生离校涉世往往一败涂地，盖于人生真谛曾无所窥。故教师于其演讲中应使学生认识上帝，并认识上帝之即为本体。课余得暇，教师可更进一步与学生举行小组座谈或私人谈话，提供劝告，解答问题。现代教育之最缺乏者即为学校之不足以应付每一学生之个别问题，在某些国家，学校中实行荣誉制，即在考试时间，教师并不临场监考，一任学生自行解答。此举显示教师对学生有信仰，能信任。

上述三事皆有用处，但其作用究不敌教师之“身教”。学生每于有意无意之间模拟其师长之言行。此种模仿好坏咸有之。

故教育上之要图在乎教师应有感化学生使之具有健全道德与精神之人格，学府之内教师之雍容风度可以陶铸千百学生之生活，即使彼等于希腊文法扫数遗忘。一幽默者曾作合理之语曰：“君所言者，余未之闻也。盖君之为人，其为声也甚大”。教师对学生应负之重大责任即在服膺上帝，并确保自身之忠诚，大公无私，爱邻如己，以及洁白无疵。

稽诸史乘，教育之最初渊源为宗教。其后教育摒弃宗教而代之以智育。教育理应成为追求本体努力之一部分，但学生离学校，对本体往往无所窥。

在现代教育上之此项缺陷，不难补救——扶助学生发展其道德感，由之而明辨是非。着手之道，在乎训练学生听从崇高智慧而不弄一己之小智。教师应教导学生膺最高道德标准然后学生对本体能有永恒之接触也。

原载《国光英语》1946年一卷四期

十一、适应新环境的新教育

李登辉

我与教育界发生关系，迄今已四十余年。在此长时期中，历任大中小学教职，得目睹中国教育之滋长与发展，深以为幸。

自民国成立以来，在教育方面，力谋训练良好公民的责任，乃舍旧取新，积极推行现代教育制度。

三十年来，其显明之发展有二：

（一）、现代教育之发展，由高级学校进为完全大学，由高等学程进为专门科学。

（二）、发展体育，增进运动兴趣，因之强健学生体格，此我们在今日现代学校中所见到的。

此两种发展之目的，即欲以智体两育之训练，作为良好公

民之基础。如谚语云：“健康精神，必富于健康身体。”然则根据此二原则之现代教育，曾要实现如吾人所希望者耶！三十年来之试验结果如何？社会情形有否改善？政府各机关中贪官污吏有否减少？诚实廉洁之官吏有否增多？贫民之景况有否改良？

三十年来，虽青年学生毕业学校，步入社会者为数甚多，而留学生出洋深造，习得专门智识归国者，亦属不少；但其中除极少数人外，大多之受教育者，徒浪费金钱谋一己之自肥，而有时且以牺牲国家人民之利益换得之。

我国朝野，鉴于道德修养，不能单由智育之发我（疑刊误，当为“达”字）而来，曾在各校设道德课程，培植学生优良之品格。但此种改革，不无困难，盖能担任此种重要职务之教员，不易觅得。道德教育不能与文法地理等课程对待[待]智力者相提并论。教员之资格尤属重要，若教员内心诚挚真实，是为学生模范，则教导学生，满怀热情，富于灵感，潜移默化，庶可有助于学生道德之发展。

数年以前，我校中有一道德课程之教员，众意彼能担任此职。某日，我偶赴饭店，见此教员与一妓女同坐。彼知为我所睹，不免赧然。实则此并非罕见之，事在教育界中迭有所闻。即如教员在晚上不准备明日功课，而遨游舞场或邀友赌博者，亦不乏其人。此种伪善之教员仅能造成伪善之学生！

我身为人师，理应在学生中以身作则，纪律严正，不跳舞，不吸烟，不赌博。学生违反此项规约者受罚，尤以舞赌两者为甚。我从不跳舞，但以前曾任意吸烟赌博，我于其时，岂亦曾念及与彼为同犯校规者乎？

后受上帝之灵，良心觉悟，深感本身有过，不能苛责他人。我自为法利赛人之俦。记得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如我不先训练自己，

则无力训练他人。我乃痛改前非，弃绝烟赌。至今我能管教他人，大有效力。

自我加入新精神动员之重整道德运动以后，深知社会与国家情形之改善，其初步须由个人做起。目前社会上国际间之混乱，无非因组成社会及国际之个人本身自私自利之故，自私自利心为破坏性之社会力量的泉源。吾人违背博施圣训，侵占妄取，唯利是图，而其结果，使人生不能与有生气之加力利海清流相同，而与只进不出之死海中死水无异。

十年以前，我生命犹同死海，“受”多于“出”，此实因自己认为个人高于一切，故凡有所为，辄惟个人之利益是图。

当我开办大学之始，服务精神并不能如为个人竞争心之同样热烈，我希望该校能成为全国最佳之学校，则我个人之荣誉地位，同时并进。

此实为一错误之原则，非立足于磐石，仅奠基于沙土，我后深知之。

我今发觉生命最大之成功，即为获得公忠无私，舍己爱人之最高理想。

我如何能得此理想。我不能以个人之努力奋斗得之，盖人天生自私也。我尝试以自我意志，以达无私，但屡试屡败，盖前之所作所为，自认无私者，实则不免于私，因存希望报酬之心也。

抑又有进者，今日混乱之世界，其所有之困难——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间，互相仇恨，互相竞争，互相猜忌，全因缺少无私精神，贪得无厌，不互相施给于人之故。

吾人需要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之真实和平乎？真实和平之种子，亦即为吾人日常生活之四绝对标准——忠诚、纯洁、无私、博爱。

我正竭力欲达此标准，但此非已达到之谓。要之，我奉献

于上帝者愈多，则我个人之私欲愈少；我为上帝管理者愈多，则我在四标准上之进步亦愈大。

原载《国光英语》半月刊第二

卷第一期1946年8月16日出版

十二、悼李老校长登辉先生

陈望道

先生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也是校长的最好典型。最近去世，至可痛悼。先生曾以服务牺牲解释复旦精神。先生自己就是服务的，牺牲的，同时也是民主的，和平的，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的。先生对于我们的启发无限，我们对于先生的尊敬痛悼也无限，决不是一个追悼会所能宣泄。我想建议以这一年为追悼年，一面追悼先生，也一面追踪先生之对于复旦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建设，期以一年，或可略有进展，略慰先生之灵于天上！校前，介于魏德迈路（按：今邯郸路）与其美路（按：今四平路）之间的一条全校师生每日必由的路，今名国权路，或可建议市政府改名登辉路，以象征我们全校师生同走登辉先生的道路。我们祝望先生的崇高精神永永远远在复旦，永永远远在人间！

摘自《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祭李登辉师文

金通尹

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受业弟子金问洙，谨以清水鲜花，告祭于腾飞夫子大人之灵曰：呜呼！百川朝海，众星拱斗，巍巍大师，为髦士首。德特圭璋，功盛薪樨，言

正准绳，垂三不朽。师自瀛海，养广积厚，归来讲学，博喻善诱。我初就傅，鼓篋问受，既去复来，几杖左右。师得多助，输财孔阜，大启黉宇，拓地百亩。华甍两荣，丹楹四牖，莘莘衿衿，有师有友。师居治事，自辰徂酉，雨零溟溟，风颭飏飏。共苦甘者，懿维嘉偶，奄息无禄，师怀惨愀。师曰我惫，汝佐我守，大学之教，百家渊薮，覃思穷理，弗钳弗扭。国步艰难，士论庞糅。排报异同，嚚然多口。谓杯有蛇，如何饮酒？谓市有虎，相惊唬吼！师曰我行，汝亦敛手。行行入蜀，湍激崖崿，道左逢迎，弟子谁某。或肃之馆，或载以走，归语欣然，家于何有？巨寇凌疆，转徙荷负。师曰我老，我且留后。松高出云，玉洁远垢。自敌之降，匪休惟咎，一善罕成，万恶群狙。师曰我教，道此阳九。克己爱人，合力进取，勿以恒言，鄙如敝帚。既婴未疾，遽殒黄耆，木铎寂响，继声谁叩？愧受知深，念相从久，发诚抒哀，陈词无苟。尚飨！

摘自金通尹：《率楼韵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四节 章益自传

章益，字友三，1901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县一个小康之家。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对下代的教育很关心。我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裕的环境里，可是回顾前半生，我在政治方面是走了一个“之”字形的大弯路，在治学方面，则因精力分散，缺乏刻苦精神，也卒少成就。如今已入老境，常怀着补课、补过之心，这也是促使我继续努力的一点动力。

我在童年，有时是在家塾读书，有时是在公立小学学习。那时恰好废止科举，我幸而未受八股文的毒害。在家塾里开蒙

阶段用的课本是《龙文鞭影》和《幼学琼林》，这两种书都是文言韵文，前一种是四字句的韵文，每句代表一个故事，后一种近于骈体文，内容是当时所认为的常识，也叶韵，念起来顺口，颇能引起兴趣。塾师的讲解也很生动。把我引上求学的道路，这是一个开端。

在公立小学里，有一位教算术的老师患口吃的毛病，说话非常吃力，有时还垫起脚来，挣得面红耳赤才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我看着觉得有趣，就有意模仿他，岂知没有好久，我也口吃了；从十来岁直到十三、四岁，都是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说起话来非常难受。我有一位哥哥，比我年长三岁，他替我着急，力劝我把口吃改掉。这时碰巧看到一本杂志上介绍治疗口吃法，我如法炮制，忍住一个星期不开口说话，然后少说话，慢慢说，特别不和别人抢先，经过大约半年时间居然把这毛病克服掉了。（虽然后来有时要犯，只要克制自己，不紧张，不急躁，保持平静，就能避免。）

我的这位哥哥，对我学习的影响很大。在小学和家塾里，我同他始终在一起。他的学习成绩好，一直处于班上的前列。我为了跟他相比，也力争上游。又因我们的祖父和父亲在科举时代当秀才时，岁试、科试，总是名列优等，家里有个重视名次的传统，所以我也养成不甘居人后的习性。

我16岁去上海考进圣约翰大学附中一年级。这所学校有个风气，旧生瞧不起新生，高年级学生瞧不起低年级学生，说上海话的人瞧不起说内地话的人。我恰好是个一年级新生，又不会说上海话，三项不利条件集于一身，受到同学们的歧视。这样就促使我在学业上取得优良成绩来争回这口气。果然在不久以后赢得了教师的赞扬，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的时候，我已升入四年级。按当时的旧制，中学修学四年，我是在应届毕业生班，再有一两个月

就可以毕业。我那时正争取以优等毕业，可以免试升入本校大学部。在报纸上读到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报道，我深为激动。我在饭厅里向同学们倡议投入运动，随即受到学校当局开除学籍的处分。同学们为我不平，集众要求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学校不允，附中百数同学就自动离校以表示抗议。

这时面临一个升学的问题。我们向几所高等学校询问，都因我们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不准报考。后来听说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最同情学生爱国运动，我就冒昧去求见，果然立刻受到他老人家的许可和勉励，我们数十位同学都考进了复旦，入学时还受到老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此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上海学联，担负起被推定的任务。从这时起，我对复旦有了深厚的感情，对李校长更怀有无限崇敬。

我于1922年从复旦文科毕业，留校在附中当教员二年，于1924年自费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我所筹的留学经费很少，原打算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利用假期做点临时工作维持生活，后因学习成绩优良，院长和教授们对我都很器重，颁给我一份研究生奖学金，同时我又凭成绩，获得清华大学的半官费，因此留学费用问题完全解决。中间还曾在一个暑期中，去芝加哥大学读了一个暑期。据老师们告诉我，得到那份奖学金的，在外籍学生中，我是第二人，在我之前只有一个俄籍犹太人得过此项奖学金。

我的房东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师，为人开明。由她介绍，我认识了斯特朗博士，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在第一次欧战期间曾因反对帝国主义混战而下狱。他的女儿就是曾将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介绍给世人的斯特朗女士。可惜她那时不在美国，我未能见到她。1925年我国国内发生“五卅”运动，我得到斯特朗博士的介绍，认识了工人夜大学的负责人肯尼迪和《工人日报》主编哈斯。肯尼迪邀我到夜

大学向工人们报告中国“五卅”惨案的情况，哈斯为我安排在街头作宣传演讲，博得了一部分美国公民的了解和同情。

我在美求学期间接触到的另一位进步人士是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被解聘的司各特·尼林教授，他当时写过一本《美元外交》和一本《苏维埃教育》。他来到西雅图市，华大学生请他演讲，学校当局不准借用礼堂，同学们只得在大学青年会的地下室举行集会。我去参加了。尼林演讲后和同学们聚餐，我得到同他面谈的机会，后来还读了他的两本著作和其它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我只是为了好奇求新，并未接触思想。

西雅图市有一批对中国做买卖的美国商人组织了一个“中国俱乐部”，每年秋季大批中国学生赴美经过西雅图时，中国俱乐部总要设宴招待。照例邀请本地的中国学生代表参加，也请华大历史系东方史专家高文教授参加。一次宴会上，高文在演讲中为日帝大事吹捧，下一个发言轮到我，我就当场给以驳斥，当然措词是委婉的，结果倒受到那位主持宴会的东道主的赞扬。

回想自己青少年时期所参加的活动，固然爱国之心是有的，但也有些争强好胜的杂念掺杂在内，只凭一时的虚火，缺乏稳固的方向信念。学习方面，一味追求成绩也使目光受到局限。

我出国之前对于学习哪门学科没有定见。承李登辉校长的指点，才决定以教育学为第一专业，以心理学为第二专业。1926年毕业取得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李校长就叫我回复旦，除在大学任课外，还让我担任预科主任，后来担任教育系主任。我原想安下心来，专心教学，不料“九·一八”事变突起，我的心情又激动起来。同学们赴南京请愿，要求蒋政权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我曾参预其事。同时我也参加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的活动。

1937年抗战军兴，复旦大学同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从上海迁到四川和贵州两地，我随校到了贵阳。复旦大部分师生则由副校长吴南轩率领到重庆。第二年春天，吴南轩由重庆打来长途电话，说复旦在上海时原靠学生们缴纳的学费作为学校行政开支，现在同学们流落在外，不能要求他们照旧交费，学校即将搁浅，唯一出路是谋取教育部的津贴补助。他已和余井塘商定（余是新任教育部次长），安排我到教育部当总务司长，这样在教育部分配私立大学补助费时，我可以从中出力，对复旦多加照顾，因为总务司是主管经费的。我在他怂恿之下，也考虑到复旦的实际困难，只得答应此举了。我原先自命为清白自由之身，从此却甘心堕入尘网，虽然自己解说是为了母校，又自以为只要为国家办事，不是附和私人，似亦无妨，其实这只能说是强自解嘲而已。

后来我在担任复旦校长期间处境尤为尴尬。在重庆北碚夏坝时期，没有发生重大为难的事，我的时间与精力主要用于筹建校舍，罗聘教师。只在一次反苏游行后发生《谷风》壁报主编同学受到反动学生污辱一事，全校师生愤怒不平，我当众宣布将为首的反动学生一名开除学籍，风潮随即平静下来。及至胜利以后，复旦迁回上海江湾，正值国民党反动政府撕毁政协协议，阴谋酝酿内战，学运迭起，我作为学校行政负责人就感到动辄得咎之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自己知道是坐在火山口上，就不顾一切，采取疯狂镇压的手段，一是逮捕学生；二是解聘进步教授。对1947年的一次大逮捕，教授们决定以罢教来抗议，我表示同意。南京方面得到情报，由伪教育部传达蒋介石命令叫我去南京听候处分，后来大概有人向蒋建议不能操之过急，才改变主意没拿我查办，被捕学生后来由我保释出来。关于解聘教授，我以辞职抵制，伪教育部也是色厉内荏，松了下来；我商请两

位最著名的民主人士辞去院长、系主任名义，专任教授，事情算是应付过去。我此时的思想是以维护学校的存在为前提，不免行动软弱。进步师生们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则是但求瓦全，当然对师生们是愧对的。于此同时，校内三青团还对我施加压力。有一次我保出被捕同学一同回校，校内同学们热烈欢呼迎接被捕同学，却有一批三青团学生到我办公室咆哮，说是下了他们的面子。还有一次，伪教育部派参事但××到上海，想将复旦改组，但犹豫未敢下手。他为显示威风，故意当着一部分教师的面指责我说：“总裁（指蒋）最讨厌的就是你章某某这种人。”现在回想这种话当然不值一笑，但我当时顾虑过多，不能明白表态，实是内疚于心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反动政府密令我迁校到华南，又催我离开上海。这一次我比较坚决，拒不迁校，本人也决定不走，终算将复旦保存下来，归还人民，我也获得了新生。后来听说国民党反动派因我拒不逃跑，开除了我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承他们把这件肮脏的湿布衫替我脱掉，倒是该谢谢他们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受命负责保管学校等待接收，随后复旦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接管，我受陈毅同志委任为复旦校务委员之一，并担任外文系教授，兼授教育学课程。1951年秋季，我参加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半年，1952年春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任教。

我初到山东就受到从省委到院党委各级领导的信任和优待。我于1954年被特邀为山东省政协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撤销常务委员，保留委员，61年摘帽，79年改正，80年再被选为常委。1954年我还受到中国心理学会的委托，筹建山东分会。我也常受山东省科协和科普的邀请作过若干次的公开学术演讲。1955年，我曾参加中国心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80年

以来我被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和山东分会的名誉理事长。我在山东师院主要工作是教心理学，也曾多次兼任外文的教学。这三十年来是我一生中最平静、最幸福的一个阶段，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受到较大的冲击，但我只把它当作一场噩梦，精神上并未留下创伤。²

在学术工作方面，上面已说过，由于半生精力分散，没啥成就可言，也没有什么经验值得介绍。我素来有一个习性，要求自己首先把本职工作做好。我作为一个教师，首要的任务是搞好教学。在这一点上，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可以说，我都还能做到。我自少年时期改正了口吃以后，在参加学生运动中，不断地登台演说，经此锻炼，对于口语的运用尚能灵活自如。在讲课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必须考虑听众的接受能力，以深入浅出为主，既要明白生动，启发兴趣，又不得损害科学的准确性。至于写作，我都是在课余或假期中才动笔。

我的治学方法并没有什么创见，只对两句老话却是拳拳服膺，那两句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王夫之对这两句话解释得最好。他说：“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我虽未能做到他所说的“博”、“远”、“勤”，但“思”与“学”的结合，我还是时刻在心的。我的写作，尽管内容肤浅，见解很不成熟，但不肯食唾余。例如，解放前写的教育理论文章对于当时的现实都多少具有针对性。在《教育与国家》一文中主张国家有责任兴办教育，但不应硬性规定教育目的或限制其内容。在《教育与社会》一文中，³不赞成杜威“社会即学校”的凌空说法，而主张针对现实情况，不让社会的恶影响侵入学校，反过来学校教育则应起改革社会的作用。在《教育与文化》一文中，则强调文化具有不断发展的特点，教育的作用，不只是为了继承文化，适应文化，还应承担推动文化继续向前发展的任务，尤其

不要使学生思想定型化。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一文中，初步提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中等教育应负之使命》一文中，提出中等教育不只有培养学生升学的任务，还应面对地方，为所在的地方造就各项建设人材。这些都只是一些摸索方面的尝试，在当时说来是没有沿袭前人的窠臼，但教育理论是应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时过境迁，那些见解就不过是一些明日黄花罢了。

在消极方面，我倒有一些反面经验可供旁人借鉴。主要的毛病在于用心不专。譬如只有一小杯水，用来浇灌几株花木，当然容易枯竭。相传达尔文曾有这样一段轶事：他青年时期除热爱科学以外，还爱好文学，尤爱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后来他致力于生物进化资料的收集，对莎士比亚就割爱了。他的专心致志，可说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我恰恰同他相反，往往是“见猎心喜”，“浅尝辄止”，无怪乎成为一个庸人。每想起荀子说的：“梧鼠五技而穷”，不禁哑然自笑。

附录：

李正文论章益

“（张）志让同志为了复旦大学完整地保留在大陆，不接受蒋介石将其撤退到台湾的命令，曾对校长章益做了大量工作。章益先生不仅自己留在大陆，而且完整无缺地把复旦交给了人民，这是有功的。章益先生应算起义爱国人士。章益先生对祖国的这一贡献，是和志让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摘自李正文：《党的亲密战友——张志让同志》，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第143页。

第五节 陈望道传略

陈望道，原名参一，又名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清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生，浙江义乌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一九二〇年五月至八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他在上海和陈独秀等人秘密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又共同发起组织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一九二一年底，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建立，陈望道当选为书记。他的一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战斗的一生。

陈望道早年曾留学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以及日本物理夜校等校，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许多专业的修习，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在课余，他“与留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及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1〕}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他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后又在他们的影响下，“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2〕}

一九一九年六月初，“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他便从日本回国。是年秋季，受聘于浙江一师任语文教员，因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其他三位语文教员积极提倡新文化，改革国文教授等活动，曾被誉为“四大金刚”，并因此受到浙江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浙江省教育厅还以所谓“非孝、废孔、共

产、公妻”等罪名，将陈望道等四人撤职查办。“一师”新派校长经亨颐对这一反动措施进行坚决抵制，反动当局竟出动军警予以镇压，从而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流血事件。“一师风潮”使陈望道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3]于是他就在事件结束后，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研究新思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他应邀来上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同年五月至八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所译《共产党宣言》，亦在此时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这是我国《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十二月，陈独秀赴广东任职，便由他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参与将《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时，还不得不因此同胡适等人开展激烈的论争。与此同时，他还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平民女学、职工补习夜校等处授课或演讲，并参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主编另一副刊《妇女评论》，以及协助出版工人刊物《劳动界》，先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倡导妇女解放和主张社会革命的文章，对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过十分积极的影响。在当时，他还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同工人群众运动相结合，并协助筹建了纺织、印刷、邮电等第一批工会组织。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他启发和引导青年学生和工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一年，党的“一大”召开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组织，陈望道当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

任书记。不久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离党的组织。离开组织后，他并未因此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继续投入党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进步的语文运动，以及其他文化教育工作。

一九二〇年秋天，陈望道在参与早期的建党活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的同时，应聘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在复旦任教期间，他热情“鼓动学生走向社会，参加革命，”¹⁴并着手对旧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由于他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注重运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他坚决反对那种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传统的教学方法。他是我国最早在刊物上明确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为了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自一九二〇年九月起，他在复旦国文部开设了文法、修辞的课程，并开始对中国语文的各个领域进行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总结汉语规律。一九二三年，他的《修辞学发凡》的最早油印本问世，同年，又发表了《作文法讲义》，接着又出版了《美学概论》和《因明学》等著作。这一系列著作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是该会的早期会员，以后又成为《小说月报》的基本撰稿人之一。一九二三年秋天，他接受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委托，出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五卅运动前后，邓中夏、恽代英等相继调离上海大学，他又接任上大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的职务。此后，他在党的领导下，率领全校师生继续投入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为止。

一九二三年十月，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同柳亚子、邵力子等发起组织“新南社”，在社内任编辑主任。一九二四年，

他又与刘大白等编辑《黎明周刊》。此外，他还是立达学会的会员。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被国民党查封，他开始就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又兼任了复旦实验中学主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仍然坚持进步的活动。为了有阵地作战，他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与友人筹建了大江书铺，专事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科学的文艺理论，成为推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一九二九年冬天，他接受地下党组织的邀请，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与鲁迅的交往十分密切，在上述各项工作中都曾得到鲁迅的热情支持。自一九二七年至三〇年，鲁迅曾多次应他的邀请前往复旦中文系、复旦实验中学以及中华艺术大学演讲。一九三〇年冬天，左联在中华艺大召开成立大会，鲁迅出席了会议并发表演说。同年大江书铺在鲁迅的支持下出版了由他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以后又发行了鲁迅编辑的《文艺研究》季刊。在《文艺研究》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普列哈诺夫《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和陈望道译的《自然主义底文学底理论体系》（平林初之辅作）。但是季刊仅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查禁了。

在这段时间内，陈望道自己还翻译了《艺术简论》（青野季吉作），《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平林初之辅作）以及与施存统合译的《社会意识学大纲》（波格达诺夫作）、《苏俄文艺理论》（片上伸作）、《艺术社会学》等，其中除《社会意识学大纲》在开明书店出版外，其余均在大江书铺出版。

一九三一年七月，因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保护左派学生，南京国民党政府密令加以暗害，原《民国日报》主编叶楚沧获悉后，连夜派人从南京赶来上海报信，陈望道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离开学校后，他蛰居在上海寓所专心致志地从事《修辞学

发凡》一书的写作。他将过去编的讲稿加以修改整理，成书后由大江书铺于一九三二年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修辞学发凡》是作者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的产物，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该书的出版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境界。

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应聘到安徽大学任教“文艺理论”，半年后又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而离职，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回到上海。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在白区也加紧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提出了“尊孔读经”、“文言复兴”等反动语文政策。为了坚决反对和冲破敌人的这种“围剿”，陈望道与叶圣陶、胡愈之、陈子展、乐嗣炳等在鲁迅的支持下，于这年六月发起了大众语运动。这一运动不仅反对提倡文言文，而且对当时白语文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进行了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围绕这些问题开展了一场极其热烈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他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议》、《建立大众语文学》等多篇论文，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了许多科学的建设性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九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又创办了《太白》半月刊，专与林语堂之流为迎合保守反动势力而提倡的消磨志气、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幽默”，鼓吹“只谈风月”的“帮闲文学”的刊物——《论语》与《人间世》等相抗衡，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和批判当时的黑暗的现实。《太白》不仅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还开辟了“掂斤簸两”新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并首倡采用民间的“手头字”。这在当时都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太白》仅战斗了一年，就被迫停刊了。

《太白》终刊后，他便应邀赴广西桂林良丰师专及中山大

学任中文科主任。在良丰师专，他主持了《月芽》刊物的编辑，并积极提倡和赞助话剧这一新兴剧种。

一九三七年六月，抗日战争前夜，他从广西回到上海，参加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这以后，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组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等抗日群众性文字改革组织，并在地下党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课，主编地下党办的《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等。一九三九年，抗战进入第三年，敌伪恶势力入侵租界，日伪特务机关已将他列入黑名单，但他还坚持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份，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发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文字改革。他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与此同时，他还在上海语文学术界发起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次讨论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历时四年之久。讨论的总的倾向就是要革新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研究不从中国语文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的传统习气。在讨论过程中，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从分歧到统一》等十余篇论文。讨论结束后，他又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由重庆文聿出版社印行，为汉语文法学史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文献。

一九三九年秋天，陈望道为避免汪伪特务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在该系开设了逻辑学和修辞学等课程。在中断了若干年后，他又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工作，从这以后，再也没有离开复旦，直到一九七七年病逝。

一九四一年九月，陈望道曾出任训导长。他对这事颇为踌躇，那时地下党的同志曾示意他可以出任。他就任后，提出训导工作应该“导多于训”，尽力保护进步同学。半年后辞职，去进步同学较多的新闻系担任主任。一九四二年八月，他还一度代理过教务长和文学院长的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和地下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给予进步学生支持和帮助，积极营救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青年学生。在他主持新闻系工作期间，坚持民主办学，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民主办系的一个指导原则。在加强新闻教学中，他强调要有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并把这四个字作为新闻系的系铭。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亲自在重庆募捐筹建了一座“新闻馆”。“新闻馆”内设：图书资料室、印刷室、会议室以及收音广播室。这所新闻馆座落在校园的西北角，成为当时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场所。馆内收音室每天收录延安广播，新华社的重要消息一经收录下来，立即传遍复旦校园，因而这里又被复旦师生誉为“夏坝的延安。”复旦新闻系是全国较早的一个新闻教育机构，陈望道是复旦新闻系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复旦新闻系先后担任了八年的系主任，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期间，陈望道始终处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下，但他仍然坚持为党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政治上他一直是受压抑的，没有行动自由。他一度想去延安，但由于国民党严密控制，无法通过重庆北郊的青木关（向北方必经的关口），于是他就把精力集中在支持当时正在形成并日趋激烈的民主运动上。他曾亲自对指定同他联系的地下党同志说：“请把你们的意图告诉我，我会知道怎样行事的。”鉴于陈望道一贯的政治立场，地下党组织对他持完全信任的态度。在重庆北碚期间，他在学校西北面的东阳镇一个名为“潜庐”的院子里

租住了两间平房，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在这个院子里，除了他和夫人蔡葵的住房外，其余的房间就是地下党同志的会议室以及党所领导的外围刊物《中国学生导报》的编辑部，由此可见陈望道与地下党组织之间的亲密无隙的关系了。

抗战胜利后，他随同复旦大学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回到上海。迁回上海的复旦新闻系，仍然是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一个系，在学校开展的各项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新闻系的师生总是站在最前列。新闻系的学生除了主办《复旦新闻》、《嘉陵风》、《记者报》外，还与其他系的进步同学一起联合办起了《大学生活》、《世纪风》等二、三十种壁报、社团，配合当时形势开展争民主、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宣传。这些工作都得到了系主任陈望道的有力支持，他还积极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工作。为此，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不断对他恐吓与威胁，并策划把他赶走。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复旦新新闻社”（这是由三青团控制专与《复旦新闻》唱对台戏的组织，出版《复旦新新闻》），在复旦校门口张贴了一份致新闻系主任陈望道的万言书，还将另一份抄件直接送至陈望道的家中，对他进行公开的威胁和侮辱。这份长达万余字的公开信，历数了新闻系种种所谓“赤化”情况，并叫嚷“新闻系的赤化，除新闻系全体教师应负责外，系主任陈望道应对此负总的责任。”当时校内外敌我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和残酷，“新新闻社”的这一行径，十分阴险，它不仅起到了公开打击和威胁陈望道的作用，也为以后进一步对他迫害制造借口。面对反动派的这一挑衅，他毫不畏惧与退缩，继续与这些邪恶势力开展斗争。

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和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并起草了《缘起》，指出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他在《缘起》中说：“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

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希望社会生活逐渐进步，趋向光明，不能不竭力追求正确和适当。”这里不仅正确地阐明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而且也表明他研究语言文字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光明。他的这些重要意见，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九四九年一月，学校成立应变机构。陈望道被推为教授会的召集人，并担任应变机构的副主席，积极保护学校，准备迎接解放。

为庆贺陈望道执教三十周年暨五十九岁诞辰以及由他创建的“新闻馆”成立五周年，复旦新闻系师生在一九四九年的四月五日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庆祝活动。出席这次盛会的除本系师生外，尚有其他系的教师代表和进步人士，与会者分别向他赠送了花篮、寿联等礼品以示庆贺，还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颂词，表彰他三十年来在党的革命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最后由陈望道致答辞。他在答辞中除了由衷地感谢来宾和师生对他的盛情厚意外，还谦逊地把自己从“五四”以来所作的伟绩说成是“不过呐喊了几声而已。”他说：“五四以后，看到时代正在变，而且‘变’的劲头很大，就学着先进人物的步子跟着人家，加快步伐走几步，提高嗓门呐喊几声，”又说：“这种呐喊不过是催促生命早点降生。不过是听从时代的召唤呐喊了几声，实在谈不上什么贡献。”^[1]在上海临近解放时，复旦新闻系师生为陈望道先生举办这一隆重的庆祝活动，起到了团结同志和打击敌人的作用，也是学校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较量的一次示威活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深夜，反动派对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陈望道把国民党要抓的一个学生藏在家里，特务彻夜在窗外来去照手电，他不予置理。这夜，复旦被捕同学七十七人，

第二天，躲在他家的这个学生总算转移出去了。不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陈望道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到市区的一所钱庄里隐蔽了起来，临走前，他还十分关心同志的安全，亲自到郭绍虞先生家中通知他立刻转移。后来由于上海迅速解放，反动派的阴谋才未得逞。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前一天，大教联改选理事会，一致推选陈望道任理事会主席。六月初，大教联在南京路金门饭店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与讲助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大学教育工作联合会，”又推选陈望道为会长。^⑧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诞生后，他由衷地感到欣慰，从这以后，他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去。新中国刚成立，他就作为华东地区的一位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开了将近一个月，在归途中，南京《新华日报》已报导了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正主任张志让早已调往北京，因而始终未能到任。陈望道实际上担负着主任委员的职务。他率领全体校务委员在军代表的支持下，实现了对旧复旦大学的接管。同年十二月，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会委员。一九五〇年四月，他开始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文化部部长。一九五二年九月，他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直至一九七七年十月，先后在复旦就任了二十五年校长，是复旦历任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一九五三年以后，他还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高教局局长。二十五年中，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为建设一所第一流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呕心沥血，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一九五一年，他由史良、沈志远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盟内担任了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一

九四九年以来，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

建国以后，他继续钻研马列主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辩证法，并努力把它贯彻到日常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去。他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原则，服从党的决议，尊重党的各级领导，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置身于组织之中。组织观念强是他一个很突出的优点，这是与他共事多年的党的负责同志都有深切感受的。平时，他作风严谨，踏实认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极尽全力完成党给予的各项任务。

建国以后，他认真贯彻执行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在主持复旦校政领导工作的几十年中，注意充分发挥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他还严格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在政协和民盟的活动中，他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促进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从不深居简出，而是经常深入基层，在百忙中抽空登门到教授家中拜访，同他们亲切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他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做得对方心悦诚服，所以许多老教师都愿意同他谈心，交流思想。他十分爱才，只要一技之长的教师，他都非常尊敬，动员他们出来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此外，他还始终不渝地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全国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曾多次撰文向台湾广播，直到晚年还在病榻上向海外同胞呼吁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

建国以后，陈望道曾先后两次出国访问，第一次在一九五六年秋天，由他率领的我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应邀赴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考察访问，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莱爱夫斯代尔脱”大学建校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第二次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他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赴越南考察访问。通过这些访问，加强了同被访问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

一九五七年六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由上海市委报请党中央批准，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重又回到了党内，实现了他长期的愿望。他重新入党时，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的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十大召开前夕，才正式公开，并被选为十大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虽然担负着繁忙的行政领导和社会工作，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活动。一九五二年以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新文字工作协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二十多年中，他为革新语言学的研究，为繁荣和发展语言科学，为继续促进和实践语文改革运动不辞劳苦。一九五五年，他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贡献。他还努力贯彻和实践党的语文政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亲切邀见了。席间，毛主席非常关心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对他说：“我最近读了你的《修辞学发凡》，很好，听说你在研究文法，希望研究下去，”并说“现在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鼓舞。正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在市委

和校党委领导同志支持下，他在复旦大学成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又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这个室的工作。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他十分强调要建立一个高度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相统一的学风。他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很重视理论研究，非常强调理论对学术研究的指导作用，自始至终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到语言科学研究的实际中去；但他又很注重实践的作用，强调要尊重事实，重视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不但是个理论家，同时还是个实践家。他从事了一辈子语文学术研究，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改革运动，他的研究几乎都是结合语文改革的实际的。此外，他还十分注重方法论的研究，语言学家方光焘尊他为方法论专家。在培养优良的学风方面，他不仅身体力行，带头实践，还在校内积极提倡。他曾于一九六一、六二、六三年三年中多次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九六三年校庆五十八周年及第九届科学报告讨论会的开幕式上，他就有关学风的培养问题作了专门和详尽的论述。通过这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对学风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复旦大学优良学风的建设。

六十年代初，针对我国语言学的研究不注重汉语事实这个现象，他又在周恩来总理的勉励下，提出了“语言学研究必须中国化”这一具有方向性的口号。接着他又把这一口号具体化为：要站在中国的今天，同时伸出两只手来，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进步语文运动的逻辑发展和升华。口号提出后随即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于是他一面亲自指导研究室的中青年同志开展深入的研究；一面又不顾年迈与事务的繁忙，先后于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两年赴南京、杭州、北京等地讲学，旨在推动广泛的学术交流，以便团结更多的学术界同行们进行

深入探讨。

原《辞海》总主编舒新城于一九六一年逝世后，陈望道接替了这一职务。对待毛主席亲自下达的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辞书修订任务，他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在他主持这一工作期间，努力纠正“左”的思想在辞书编纂工作中的干扰，改变了先前人海战术的编写方式，确定了分科主编的责任制度，在与副主编罗竹风等同志的紧密合作下，经过四年多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辞海》（未定稿）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发行了。成书时，他还为书名题字。

“十年内乱”一开始，他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也未能幸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权威”、“学阀”等许多诬陷不实之辞被强加到他的头上。他被迫拄着拐杖一天三段时间参加所谓“抗大清队学习班”学习。一天，他终因体力不支在老教学楼前滑倒，得了轻度中风，从此再也不能单独远行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设置在他住房楼下的语言研究室被下令撤销了，研究室改成了清队隔离室。对他的迫害只是在有关方面及时制止后才未继续蔓延下去。但是就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因为停止他的学术研究，就等于停止他的生命。

直到一九七二年，他才重新出任复旦大学革委会主任职务。此时，他虽已八十多岁高龄，又患有多种疾病，但他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工作。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语言研究室始得以部分恢复。在这以后，他接连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论文，并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一书。一九七三年，他为复旦大学团委、学生会举办的书法展览会题了笔力苍劲的“又红又专”四个大字，不仅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同时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抗议。虽然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时常要住院治疗，但他仍然抱病参加了党的“十大”。一九

七五年，又带病出席了四届全国人大，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激动人心的讲话，并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的喜讯传来后，他受到很大鼓舞。在这股东风的推动下，他终于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精神。《文法简论》是他在继《修辞学发凡》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起来的又一个语文革新体系，是他数十年来刻苦钻研结出的果实，虽然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最后出版的是一本《简论》，不是原先计划的《新论》，但他终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新的体系。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陈望道因肺部感染，病情突然恶化，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时不幸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令人感动的是，他在垂危弥留之际，尚且热情关怀着复旦教职员工及家属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当市委负责同志前去探望他时，他对组织的唯一要求就是改善复旦周围的环境设施，改进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条件。

根据陈望道生前遗言，他的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中央组织部通知精神，在龙华革命公墓为陈望道同志举行骨灰盒复盖党旗仪式。

注①②④陈望道自述。

③陈望道：《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收入《陈望道语文论集》。

⑤漆琪生：《大教联民主斗争概略》，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9年第四辑。

⑥葛克雄：《茶馆的盛会——陈望道先生执教三十周年庆祝会的回忆》未刊稿。

第三章 系科设置及教学特点

第一节 概况

复旦公学前身是震旦学院。一九〇五年成立时，复旦公学是一所按清朝学制建立的高等学堂，仅设文、理二科。

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扩充为复旦大学，开始设大学本科。二十年代，除文、理二科外，陆续增设商科、社会科学科、中国文学科、生物学科，至一九二八年秋，共有十三个系科。

一九二九年，复旦大学根据部颁大学规程进行系科改组，增设新闻系、市政系、法律系、教育系，其时全校共有十七个系，分属文、理、法、商四个学院。

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大部师生迁至重庆，留沪部分设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一九四二年，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九年期间，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增设：史地学系、垦殖专修科、统计学系、统计专修科、园艺学系、农艺学系、茶叶专修科、银行专修科、数理系、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商科研究所。一九四〇年，在园艺学系、农艺学系、茶叶专修科、茶叶研究室及附属农场的基础上，设立农学院。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十月，复旦大学合渝沪二部于上海江湾原址。开学后师生员工四千余人，⁵分设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共二十一系科（组），并增设合作系。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复旦大学。从此，复旦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同年十月，增设农业化学系。

一九〇二年春至一九四九年秋，复旦大学各个发展时期系科设置概况如表：

年代起迄	学校名称	系 科 设 置
1902年 ~ 1904年	震旦学院	文学科，学制二年；科学科，学制四年；以广延通儒，培成译才为宗旨。
1905年 ~1911年	公立 复旦公学	高等正科三年制， ⁽¹⁾ 设文、理两科，附设中学部。
1912年春 ~1917年春	私立 复旦公学	大学预科三年制 ⁽²⁾ 设文、理两科，附设中学部。
1917年秋 ~ 1929年春	私立 复旦大学	文科，四年制大学本科，设：外国文学系、史学系、经济学系； 理工科，四年制大学本科，设：土木工程系、化学系； 商科，四年制大学本科，设：普通商业系、银行学系、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国际贸易系； 社会科学科，四年制大学本科，设：政治学系、社会学系； 生物学科，四年制大学本科，设：心理学系、生物学系； 中国文学科，四年制大学本科，设：中国文学系； 附设：中学部、实验中学。

<p>1929年秋 ~ 1937年9月</p>	<p>私立 复旦大学</p>	<p>文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 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 新闻学系、教育学系、社会学系、 史学系；</p> <p>理学院，大学本科四年制， 设：土木工程系、化学系、生物 学系；</p> <p>商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 设：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 会计学系、国内外贸易系；</p> <p>法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 设：政治学系、市政学系、经济 学系、法律学系；</p> <p>研究院招收硕士研究生。</p>
<p>1938年2月 ~ 1942年春</p>	<p>私立 复旦大学 〔校址：四 川重庆北碚〕</p>	<p>文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 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 新闻学系、教育学系、史地学系；</p> <p>理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 设：土木工程系、化学系、生物 学系；</p> <p>商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 设：银行金融系、会计学系、统 计学系；二年制专科，设：银行 专修科、统计专修科；</p> <p>法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 有：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p>

		<p>学系、社会学系；</p> <p>农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有：农艺系、园艺系；二年制专修科设有：垦殖专修科、茶叶专修科；还设有：茶叶研究室。</p>
<p>1938年2月 ~ 1946年10月</p>	<p>私立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 [校址：上海中一大楼——中孚大楼——常德路574号]</p>	<p>文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新闻学系、教育学系、社会学系</p> <p>理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土木工程系、化学系；</p> <p>商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p> <p>法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p>
<p>1942年春 ~ 1949年秋</p>	<p>国立复旦大学 [1946年10月合渝沪二部于上海江湾]</p>	<p>文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新闻学系、教育学系、史地系；</p> <p>理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土木工程系、化学系、生物系、数理系，还设有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p> <p>商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有：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国际贸易系、统计学</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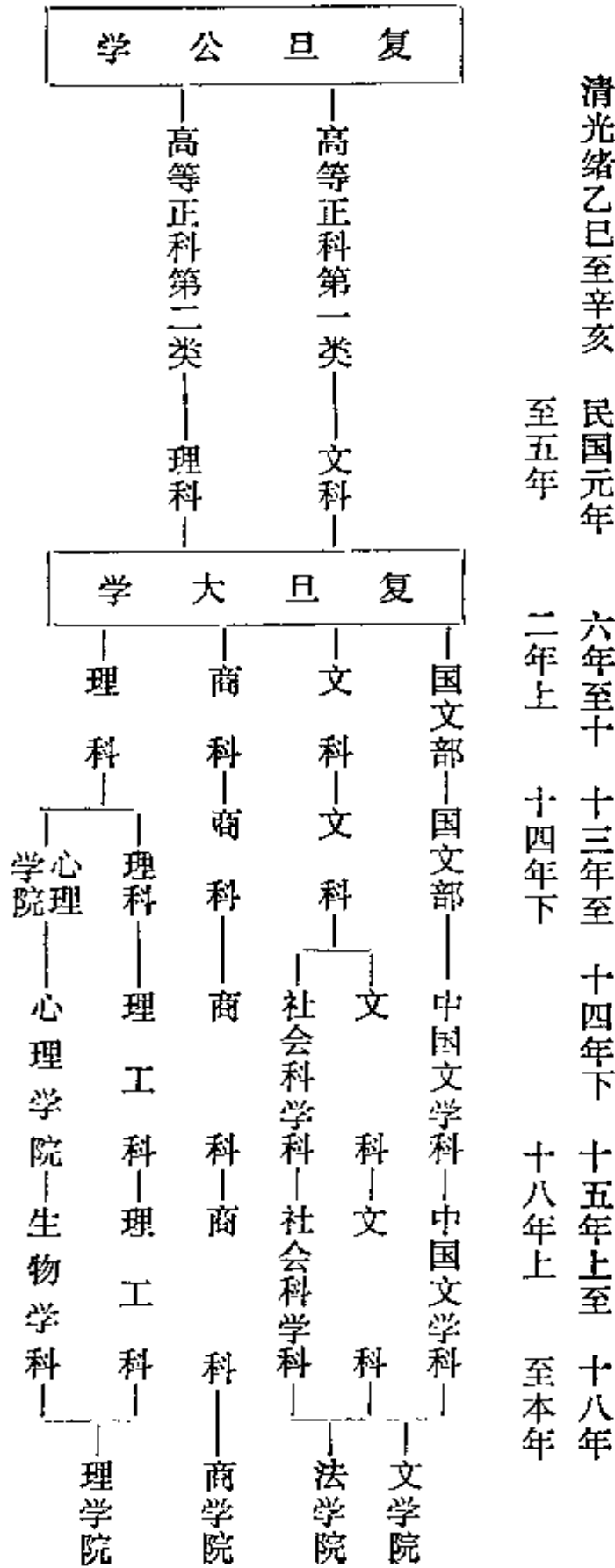
		<p>系、合作学系，二年制专科设有：银行专修科、统计专修科；</p> <p>法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有：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系、社会学系，二年制专科设有：监狱官专修科；另设：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p> <p>农学院，四年制大学本科设有：农艺系、园艺系、农业化学系，二年制专科设；茶叶专修科。</p>
--	--	--

注：(1) 一九〇三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设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每日功课六点钟，三年毕业。”

(2) 一九一二年十月《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设预科，其学生入学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

“大学各科学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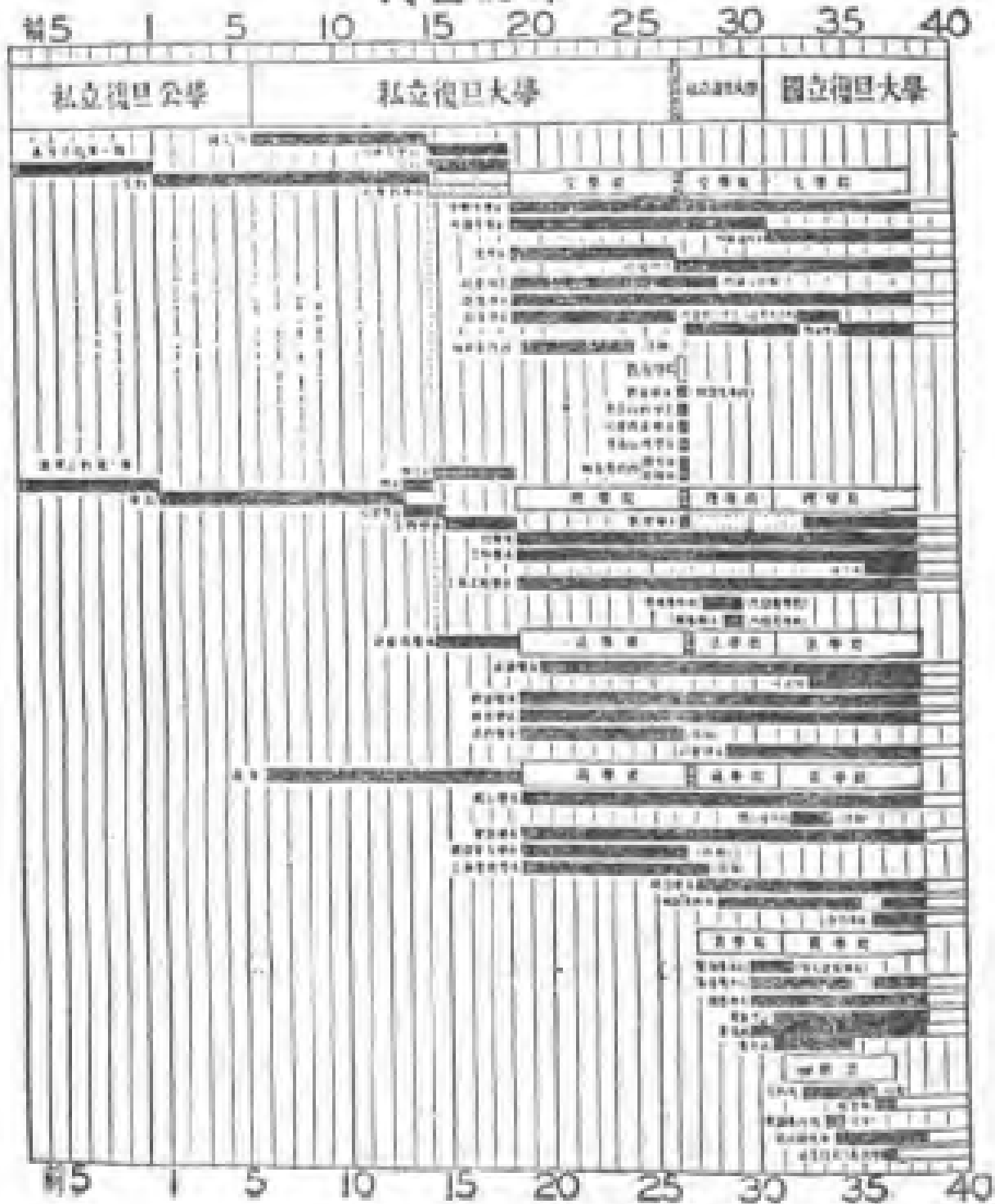
一、编制沿革图



摘自一九三七年春《复旦大学一览》

二 本校編制之沿革

民國紀年



三、

一九〇八年—一九二九年复旦公学及复旦初期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科 别	年 度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九〇〇平	一九一一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合 计
高等正科		8	16	21	12									57
大学预科					7	8	7							22
大学正科文科					7	11	8	16	12	20	15	26	29	236
大学正科商科						15	25	20	41	52	96	77	104	517
大学正科理工科									8	11	11	14	42	86
大学正科心理学系									4					4
大学正科社会科学科									9	17	38	27	44	135
大学正科生物学科										8	6	5	1	20
大学正科中国文学科												3	11	14
总 计		8	16	21	12	7	11	23	41	32	61	88	158	1091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 教务46—5卷

第二节 文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一、文学院系科概况

一九〇五年开设的高等正科文科，是复旦历史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为入“政法科、文科、商科大学之预备”^{〔1〕}，设有：伦理、国文、法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论理心理、理财、法学、簿记学、体操、音乐、拉丁文等课程。一九一七年，复旦扩充为大学后，“学生日众，研求异趣，分科渐多”，而文科“得于文学及艺术上之增进”^{〔2〕}，一九一九年设普通文学系（即外国文学系），一九二二年增设经济学系，一九二五年又增设史学系。复旦历来十分重视国文教育，“向来使国文部独立于各科院之外，而把教授学生国文的责任，完全托国文部担负着”，“本部没有直辖的学生。”^{〔3〕}一九二四年夏，国文部主任邵力子先生以为“近年来，一般青年被外来的东西洋文艺思潮所激荡，一面引起研求文艺的冲动，一面以中国文学底比较落后为可耻，而抱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弘愿的，颇有其人，本大学正应该给予他们以一种整理创造的机会”^{〔4〕}；于是向校行行政院提议改部为科，一九二五年，中国文学科正式成立。

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原文科的外国文学系、史学系，中国文学科的中国文学系，社会学科的社会学系，组成了复旦大学文学院，并增设新闻学系、教育学系。在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九的二十年间，文学院没有增设过其他系科，其间史学系一度改名为史地学系，教育学系一度改为职业教育系。一九三九年，社会学系改隶法学院。一九二九年，“鉴于许多大学学生因家庭

经济种种困难，需将求学年限缩短，提早结束学业，乃参照部令，向校务会议提议设立二年制师范专修科”⁽⁶⁾，师范专修科至一九三七年停办。一九四九年八月，同济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文学院奉命停办，并入复旦。至一九四九年秋，复旦大学文学院辖有：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新闻学系、教育学系、史学系等五个系。

文学院历任院长是：余楠秋（1930~1937）、伍蠡甫（1932~1948）、陈望道（1949）。

二、中国文学系

中国文学系的前身是复旦大学国文部。一九二五年，由于新文艺思潮的推动，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设中国文学系。

当时设系的宗旨有三：一是整理研究中国文学，二是应青年学生学习文学之需求，三是使全校学生除学习一般应用课程外，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精修博选的机会。课程设置“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为研究基础”，“更设立若干专门课程，以便学子作精深之研究”。⁽⁶⁾

一九三七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确定：中国文学系的宗旨是“研究历代文学及创造新文学”；“养成学生有探讨整理本国文学之能力，养成文艺创作之技能”；“注意语文之实际应用”⁽⁷⁾。设置的专业必修课程有：文学概论、文艺思潮、历代文选、诗词小说选、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历代诗选曲选、文字学、修辞学、写作练习、教育通论、文法研究等。一九四九年八月，同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奉命停办并入复旦，中国文学系开始分为文学组和典籍组。

中国文学系历任系主任是：陈望道（1927~1930）、孙俚工（1931）、谢六逸（1932~1937）、陈子展（1938~1948）、应功九

(上海补习部)、郭绍虞(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邵力子、叶楚沧、于秋墨、陆冠春、陈望道、殷章瑞、葛豫夫、刘大白、陈传德、夏丏尊、应业伦、姚伯谦、任中毓、徐中舒、吴剑岚、傅东华、饶孟侃、郑振铎、杨正宇、田汉、方欣、冯沅君、孙俪工、陆侃如、叶圣陶、白之蕃、赵景深、曹聚仁、乐嗣炳、陈竺同、方光焘、王玉章、陈子展、刘大杰、汪馥泉、郑权中、张世禄、卢冀野、陈仲达、李青崖、郑业建、应功九、方令儒、张默生、朱锦江、汪旭初、蒋天枢、章靳以，连声海，赵宋庆、胡文淑、杨文达、张遵骝、吴文祺、郭绍虞、汪静之、许杰、黄芝冈、马宗融、卢前、顾实、胡风、汪同尘、张洪城、鲁实先、姚蓬子、余遂辛等。

三、外国文学系

震旦学院宗旨是：“广延通儒，培成译才”^[8]。复旦公学初创时，仍沿用旧旨，开设英文、法文二班。创始人马相伯先生自教法文班；英文分四班，每班一位教员，他们是：李登辉、张汝楫、王培元、沙善余，著名翻译家严复任翻译课。“本校自开办以来，即有外国文学之研究”。^[9]因此，外国语言文学的课程是复旦历史上最古老的课程之一。一九一九年，学校扩充分科时，设普通文学系，它在文科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九二九年秋，复旦大学系科改组，改普通文学系为外国文学系隶属于文学院，其时分为三个组：(一)普通文学组，(二)近世方言组，(三)戏剧组，开设课程近三十种。

一九三七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确定：外国文学系以“使学生能通晓外国语言，进而研究其文学，寻其源流，明其旨趣及其应用”^[10]为目的。主要专业课程有：西洋文学通论、英语发音学、英小说研究、英文散文、英国文学史、英语演说、西洋戏

剧、英短篇小说、英诗研究、西洋比较文学、西洋文学批评、文学时代研究、文学作家研究。1949年8月，同济大学文学院德文系并入复旦，外国文学系开始设英文组、德文组两个组。

外国文学系历任系主任是：余楠秋（1931~1937）、伍蠡甫（1938~1940）、梁宗岱（1941~1944）、顾仲彝（上海补习部）全增嘏（1945~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甘夫人、瞿宣颖、克兰奇、汤姆生、余楠秋、薛尔登、侯金、李勒、洪深、吴子敬、李永昌、童逊瑗、谢冠生、严恩椿、伍蠡甫、郑季宣、梁实秋、徐仲恩、余上沅、蒋载华、章植、龚质彬、郭任华、刘云程、毛文龄、钱龙生、顾仲彝、张圣、陈麟瑞、丰子恺、郑若谷、文曾世谷、袁文彰、但荫荪、严菊生、全增嘏、季泽恒、李迪华、徐宗铎、盛澄华、张肖松、殷葆琛、孙大雨、陈钦仁、杨岂深、朱复、张其春、索天章、李振麟、伍况甫、孙逢祯、张云谷、廖尚果、左任侠、韩惠连、payne、释天慧、黄有恒、麻健、张沅长、栾珍珠、初大告、梁宗岱、叶君健、蒋碧薇等。

四、新闻学系

新闻学系的前身是一九二六年设于中国文学科的新闻学组，办理几年，颇有声誉。一九二九年九月，系科改组时，正式扩建为新闻学系，属文学院。

其时，新闻系主旨在于养成新闻界需要的记者、编辑和经营人才。开设的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就其性质可分为四类：一是基本工具的训练，有：国文、英文、第二外语、心理学、统计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二是专门知识课，有：报学概论、编辑采访、报馆组织管理、广告发行、照相绘画、印刷；三是辅助知识课，有：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外交；四是写作技术训练，有：评论练习、通讯写作、速记术、

校对术等。一、二年级学基础知识与辅助知识，三、四年级注重专门知识与写作技能的训练。

新闻系在教学方面注意与社会多接触，高年级课堂听讲时间减少，侧重实习与考察。高年级学生主持本校校刊，分采访与编辑两部。校内设有复新通讯社，作为学生实习机关，内分：设计、编辑、采访、交际、校对五部，每日发稿两次，各大报馆多乐于采用。为扩大学生视野，新闻系每学期必组织数次报社参观实习，间亦有组织考察团到国外考察新闻事业。

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江南独树一帜，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院并称瑜亮”。^[11] 办理不到三年，成绩斐然，刊物有：徐叔明主编的《新闻世界》、半月刊《明日的新闻》。学术著作有：谢六逸著《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新闻学总论》，黄天鹏教授著《新闻学研究概况》，郭步陶先生著《评论津梁》。学生著作有：陶良鹤著《最新应用新闻学》、杜超彬著《新闻政策》郭葳女士著《上海报纸改革论》。一九三一年，因为复旦新闻系办学成绩突出，教育部请谢六逸教授编订大学新闻系课程及设备标准，作为国内各大学新闻系的准绳。

一九三七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新闻系以“灌输新闻学知识、培养编辑采访技能”，“养成本国报馆的编辑和经营人才”^[12] 为宗旨。专业必修课有：新闻编辑与采访、报馆管理、本国新闻事业、印刷研究、评论练习、通讯练习、实习、修辞学、统计学、近世欧洲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国际政治、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法学通论、学生还须以政治学系或经济学系为辅系，在这些系修满十二个学分的课程。

抗战时期，新闻系随校本部迁至重庆北碚。一九四四年，在系主任陈望道的主持下，在嘉陵江畔建造了一个新闻馆，内设编辑室、印刷所、教员休息室、阅览室十余间，这是新闻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新闻系学生异常活跃，每周由学生轮流举

办新闻晚会，研讨时事、学术，经常吸引了很多外系学生。《风马牛》、《嘉陵风》、《流火》、《时事论坛》、《学校新闻》、《复旦导报》、《文学窗》、《旦声》等社团和刊物均由新闻系学生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人材辈出。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并入新闻系。

新闻系历任系主任是：谢六逸（1930~1937）、程沧波（1938~1941）、陈望道（1942~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陈望道、陈布雷、潘公弼、谢六逸、赵君豪、周孝庵、钱伯涵、夏奇峰、郭鸣九、郭步陶、黄天鹏、王莲魂、杨炳勋、樊仲云、章先梅、陈万里、郭文鹤、萨孟武、陶希圣、沈颂芬、陆诒、曹亨闻、萧乾、王研石、杜绍文、赵敏恒、舒宗侨、程沧波、傅襄谟、刘光炎、葛乔、陈钦仁、金长佑、缪钟彝等。

五、教育学系

复旦大学教育学类课程的开设，始于一九二〇年。最早的课程是汤寿松先生主讲的“教育史简编”。一九二一年，社会学者陈定谟先生开始讲授“教育原理”。以后，教育原理、教学管理、特殊儿童等均有开设，但未有一个贯串的顺序。

李登辉校长对于教育学极为重视，二十年代亲自教授与教育学有密切关系的“心理学”与“哲学”这两门课程。他认为：“复旦大学里面必须有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专科。”章益赴美留学时，李校长建议其专攻教育学，以作筹设教育专科的准备。一九二七年夏，章益返校开设历史教学法、小学各科心理等课。一九二九年学校系科改组，在文学院中正式设立教育学系。

教育学系成立之初，以培养普通师资，造就教育行政人员和专门研究人材为目标。课程除校、院规定的必修课外，规定的本系专业必修课有：普通心理学、普通生物学、哲学大纲、

西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社会学、教育通论、中等教育、普通教学法、教育心理学、心理与教育测验、教育行政、心理卫生、乡村教育、比较教育、统计学。此外，学生还可以以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及理、法、商学院中任一系为辅系，在其中修满二十学分，使专攻教育者，于普通学科方面，亦有所专长。为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教育学系与实验中学合办实验班，学生须在该班试教至少一个学期。教育学系曾在一九四三年改为职业教育系，培养职业教育的师资和行政人员。一九四五年又恢复为教育学系。一九四九年八月，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并入复旦，教育系师资阵容更为壮大。

教育系历任系主任是：章益(1930~1937)、熊之溶(1938~1940)、吴南轩(1941~1943)、陈科美(上海补习部)、萧承慎(1944~1948)、萧孝嵘(1949)。

一九二九年冬~一九三四年，鉴于许多学生家庭种种困难，要求缩短学习年限，决定举办二年制师范专修科，培养初中师资。该专修科共办了五届，毕业生四十二人。在教育学系和师范专修科先后任教的教授有：汤寿松、陈定谟、杜定友，邬志坚、蔡乐生、黄梁就明、章益、郑若谷、陈科美、熊之溶、鲁继曾、刘天子、舒新城、黄敬思、曾作忠、邵爽秋、谢循初、毛彦文、徐仲年、萧承慎、张耀翔、沈子善、萧自强、胡寄南、袁哲、吴南轩、曹孚、沈灌群、赵祥麟、萧孝嵘、莫仲义、张文郁、胡守棻、秦仲实、许桂英、邵鹤亭、许逢熙。

六、史学系

关于历史学的有关课程，复旦公学高等正科文科即已开设。一九一九年学校分科，历史学类课程仍属文科。一九二五年史学系正式成立。初时，学生很少，但都勤奋好学。一九二

九年，复旦系科改组，史学系属文学院、是时课程有：近代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外语、哲学大纲。史学系学生须以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为辅系。

一九三三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确定：史学系目的在于“予读者以史学之专门知识，养成史学之通才。”^[13] 主要专业必修课程有：中国近百年史、近世欧洲史、美国史、英国史、哲学大纲。抗战期间，史学系大部随校本部迁至重庆，一九三八年春改为史地学系。

史地学系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校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基本史地知识”。^[14] 史地学系课程分史地两部，历史课程兼有本国史与外国史，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及近代民族发展史，尤为注重。地理课程则自然与人文并重，对于本国地理及乡土地理研究最为注重。史地系合为一系，原来已有互为辅系的意思，因此，本系的学生不再以他系为辅系，注重历史者，除必修历史课外，必须修习地理三十一学分，注重地理者，除修习地理课程外，必须修习历史二十二学分。史地系主要专业课程有：中国通史、资本主义发达史、各国革命史、中国地理、气候学、西洋文化史，史学概论、社会形式发展史、西洋通史、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中国文化史、历史哲学、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

一九四九年，同济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史学组，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奉命停办并入复旦。由于地理教学力量较弱，大部分学校史、地分开设系，遂议决改史地系为史学系，至此，史学系的名称又予恢复。

史学系及史地学系的历任系主任是：余楠秋（1930～1937）、沙学浚（1938～1940）、陈望道（1941～1943）、任美镔（1944～1945）、周谷城（1946～1947）、朱激（1948）、周予同（1949）。先

后担任该系教授的有：余楠秋、汤姆生、张天方、左舜生、蔡尚思、杨宪武、谢澄萍、姚名达、熊梦飞、黄维立、谢海岩、周谷城、朱漱、周予同、陶绍渊、温雄飞、胡厚宣、陈述、叶粟如、章丹枫、赵书文、陈守实、毛起、方豪、沙学浚、李建芳、张鸣韶、傅角今、李玉林、谢德风、李晋芳、许德佑、翁达藻、徐家骥、顾颉刚、潘谔基、邓广铭。

注：

- (1) 见1905年复旦公学章程。
- (2) 见复旦历史档案1887卷《一九二四年复旦文科章程》
- (3) 见刘大白《中国文科底过去未来》。
- (4) 见刘大白《中国文科底过去未来》。
- (5) 见章益《教育学系简史》。
- (6) 见《三十年的复旦》中国文学系部分。
- (7) 见《二十六年春复旦大学一览》第59页。
- (8) 见梁启超《祝震旦学院之前途》。
- (9) 见余楠秋《外国文学系概况》。
- (10) 见《二十六年春复旦大学一览》第67页。
- (11) 见1931年11月15日复旦校刊。
- (12) 见《二十六年春复旦大学一览》第99页。
- (13) 见《二十二年春复旦大学一览》第15页。
- (14)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51卷。

附录：

一、一九二五年文科经过之报告

主任 余楠秋

本科为本校开办最早之一。初兼文法心理诸科，其后分科渐多，乃得专于文学及艺术上之增进。民八以后所定课程，皆含有专门之研究，且与以实地练习，务使学生于畅晓学理之外，

兼解应用，得其所以曲合社会需求之道。今春因学生来者益多，设教行政，颇难普及，特将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划分，另组成社会科学科，其余诸系仍属本科。综计现有学科为：教育学系、经济学系、普通文学系、史学系、近世方言学系。而史学及近世方言两系，乃系最近添设。现因新闻事业日益发达，虽经列入本科学系，而分门实授，迄今尚付阙如，学者不免舐望，明春拟再加设此系，添授各种新闻科目。其他诸如哲学、图书、法律三系，容随时察看学生需求之缓急以及人数之多寡，酌予次第添设。至发达状况，则自社会、政治两系划分后，本期学生更复增多。春季上期原只一百三十六人，本期则已增至一百六十二人，毕业生本期约为二十三人，其名额亦较往年为大。教授方法，愈取严厉，中英并重，若讲演、若问答、均同时参用。总期学生能得实益，根本了解。照目下学生增加比例及学系推广程度言之，则今后本科之发达，固可拭目以俟也。其他详见本科章程，此不另赘。

十五，元，一

摘自一九二六年复旦年鉴

二、中国文学科底过去未来

刘大白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是1925年秋季才产生的。她底母亲——复旦大学，产生她的时候，恰值二十岁的满年；而她现在的年龄，还不过周岁，所以她是母亲新生的最幼稚的小女儿。当这幼稚的时期，她的发育，自然远不及她底姐姐们——文科、理工科、商科、心理学院、社会科学科。并且因为产生不久，社会上还不很知名，供给她以滋养料，作她发育底助力的，也不很多，所以她还不过是一个天天希望母亲增加乳汁的婴孩，

而现在短期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说得。然而她却有着她底过去，她更有她底未来。

她底过去，就是她底胚胎时期。她在胚胎中，本来为国文部。因为校长李登辉先生重视国文的缘故，向来使国文部独立于各科院之外，而把教授学生国文的责任，完全托国文部担负着。她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不同的，是本部没有直辖的学生，没有给专攻国文者特设的学程。1924年夏间，前国文部主任邵仲辉先生以为“国文部独立，虽足以表示本大学底重视国文，但本大学学生人数，差不多将近千人，而没有给他们一个专攻中国文学的机会、还不能说充分地重视国文。本大学各科院学生，多有爱好纯文艺，而有志研求中国文学的；可是国文部因为便利一般学生计，偏重于普通应用方面，而不能多设纯文艺的学程，以供他们底需求，也是一种缺陷。况且近来一般青年，被外来的东西洋文艺思潮所激荡，一而引起研求文艺的冲动，一而以中国文学底比较落后为可耻，而抱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弘愿的，颇有其人；本大学正应该给予他们以一种整理创造的机会。”因此，向本大学行政院提议，主张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那时候行改院也认为改部为科的必要，有于是年秋季实行的决议。但后来因为宿舍不敷，只好从缓。到了1925年秋季，新宿舍告成，才实行改部为科；于是她便有了自己底生命，由胚胎而产生了。

至于她底将来，发育的程度如何，虽然此时还不能作十分有把握的预测；但是如果她母亲底乳汁充足，社会所供给她的滋养料，又比较丰富，她底逐渐长成，也未始不可以预期的。我们给她预计的生活历程中，本来打算分设三个专系：一、文艺系，是养成纯文学的创作者的；二、文艺教育系，是养成中等或专门学校底文艺的国文教师的；三、新闻系，是养成文艺的新闻记者的。但是在这三个专系之外，将来还预备增设两个

专系：一，设历史系以养成中国史学的专门人才；二，设哲学系以养成中国哲学底专门研究者。因为历史和哲学，虽不是纯文学，而他们和纯文学的关系，却是比较密切的。不过这却要看她母亲的乳汁量如何，和社会供给她的滋养量如何而定的。

本来理论上，中国文学，应该是世界文学底一部分。然而因为整理和创造者底缺乏，这一点能否做到，而被世界承认，现在还成为一个疑问。这整理和创造的功夫，当然应该由咱们中华民族，自己负起责任来，努力做去。我们对于她底生活历程的预期，正是希望她能负起这个责任来。

1926年4月1日，在江湾

三、中国文学系概况

陈望道

中国文学系底前身，是改组前为文科之一的中国文学科；中国文学科底前身，是本校国文部。倘由国文部算起，中国文学系底历史，实与本校底历史同其久长。在这久长的中间，学科，组织，固然有了好多的变更；教授，主持者，也颇有了若干的出入。就学科组织而论，最重大的变更是由国文部改为中国文学科；就人而论，最重大的变动也有主持本系前身国文部及中国文学科最久的邵力子先生因事他去，及主持中国文学科最力的刘大白先生因事他去等。但其间仍有始终一贯的几点：

1. 课程逐渐地加多；
2. 课程与课程之间逐渐地系统化；
3. 各课程自身逐渐具有近代科学的风貌；
4. 各门教授逐渐地专门化。

这几点是邵力子先生在此时便开始发展，现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文学系已经不是一个，在

中国文学系这个名称之下所最常见的，课程杂凑教授杂凑的中国文学系了。而学生方面，也有几个特点：

1. 发表能力发达；
2. 都有现代的文艺意识，能以此意识去鉴赏批评我国文艺。

我觉得这都是本系健全的特征，希望本系能够循此发展上去。

—摘自一九三〇年毕业纪念刊

四、外国文学系概况

余楠秋

本校自开办以来，即有外国文学之研究，但系的名称，成立在民八学校分科时，是时称为普通文学系，实占文科所设三系中之最重要地位。去年秋季，本校改组，始称为外国文学系，隶属于文学院。本系现分三组，即（一）普通文学组，（二）近世方言组，（三）戏剧学组是。开设课程，近三十种，另设有外国文学研究室。在总图书馆楼上，内藏书报杂志甚多，以便学生参考研究用。现有学生，男生五十一人，女生七人。以前毕业学生，为数曾已不少。

—摘自一九三〇年毕业纪念刊

五、新闻学系概况

谢六逸

新闻学系成立于十八年秋季，惟探溯源流，盖亦甚远。本校旧中国文学科，原有新闻学系之设立，办理方针，尝载诸校章，略谓“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

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干涉。本系之设，即在矫正斯弊，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系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故本系之设，实就原有规模，扩充张大。一年以来，赖诸位教授匡扶，同学之协力，幸免陨越，惟困于财力，设备容有未周。今后更当努力精进，期与国外大学新闻学科媲美。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毕业生纪念刊

六、教育学系概况

章 益

本校教育课程之设，始于民九。是年，汤寿松先生来校，主讲教育学，其内容实为教育史。汤先生去职游欧，继之者为陈定谟先生。其时全校教育课程，仅有一种，故不能延聘专门研究教育之教员。汤先生为经济学者，陈先生则为社会学者；然皆循循善诱，校中弟子，对于教育学之兴味，于兹发端。民十四，黄梁就明先生就聘，专主教育学讲席。教育课程，增列二门，逐斯递换，内容益充。民十六，愚回至母校，民十七，聘张耀翔先生，民十八，陈科美先生，教育课程，又稍增加。学生中渐有以教育学为主课者。然教育课程，仍隶文科。直至民十八之秋季，全校组织变更，各系分设，教育学系，遂以成立，及今才周晷耳。系中分普通、心理、行政三组。民十九春，又附设师范专科。本年度计有课程十四，教授九、学生四十。其课程名称，师生姓字，见本校一览，兹不赘。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毕业生纪念刊

七、史学系概况

余楠秋

关于历史一类课程，本校开办以来，即行设立；最初隶属于高等正科第一类。自民八学校分科后，乃纳入文科学程，仍未设系。自民十四秋季起，史学系始正式成立。去年秋季，学校改组，本系以之隶属于文学院。现在学生人数虽少，然皆勤奋好学，成绩斐然，颇解此中兴趣。方今史学日趋重要，将来学生自必发达。查此类课程，有数科为各系所必修，因而人数甚形拥挤；希望稍迟可以分组教授，使学生多得讨论机会。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毕业生纪念刊

八、中国文学系系史

本系之设，以本校国文部为始基。考本校之有国文部也久矣！国文不分隶于各科，而独立为一部，盖寓有重视国文之意焉。民国十三年夏，邵力子、叶楚沧、刘大白先生等默察时代趋向，社会之需求，与夫本校之现状，知设立专科之不容缓，乃建议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经行政会议议决，于十四年秋季成立，于是本科之设，遂得实现。

本校设立本系（十八年改科为系）之旨，盖有三焉。方今世界棣通，文学诚无国界之可言；然以民族、地域、语言、文字、历史、风习之不同，而各国文学，仍各自有其固有之特质。故现代各国文学家皆各努力从事于其特质之发挥，以期自进于世界文学之林。中国文学之特质何在？整理而研究之，发扬而光大之，以贡献于世界，斯固国人之责，而亦即本校所愿引为已任者也。此本校本系之设，思有以顺时代之趋向者一也。五

四以后，青年学子，受东西洋文艺思潮之激动，有志于文艺之研求者日众，其于世界各国文学之输入，亦既为狂热之欢迎矣。乃由新知之涵养，倍思旧学之商量。见夫中国文学之相形见绌，瞠乎其后者，则群思有以振起之，俾无貽落伍之讥焉。然环顾国内各大学，特设专科，以现代眼光研究历代文学；以世界眼光，创造本国文学者，当属寥寥，是宜辟此津梁，以弥缺憾，此本校本系之设，思有以应社会之需求者二也。本校注重国文，实为开校以来一贯之主张，然大学国文之教学，与中等学校异，必使学生有精修博选之机会；除注重普通应用而外，又须有饜笃嗜文学者之望，故全校学生国文之训练，如何始能收宏大之效果，实由本系专负其责，此本校本系之设，思有以改进本校国文教学之状况者是也。

据上述宗旨，本系教学方针，约可规定如次：（一）文艺创作，事属专门，纵使天才，亦兼赖有相当之素养，比来文坛作者，接踵并肩，第或邻于肤浅，或流于颓废，或偏于欧化，或陷于守旧，均无当于文艺价值之提高也。必也植其根本，示之轨则，庶能途径不谬，制作有成。故本系课程，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为研究之基础。（二）文艺涵濡之力，感人之伟，欲谋普及，教育为先。中等学校或感国文教师乏才之苦，然则于文艺树其基，于教育谋其用，一以收普及之效，一以应师资之求，又今日当务之急也。故本系课程除注重基础研究之外，更设立若干专门课程，以便学子作精深之研究。

—摘自《三十年的复旦》

九、新闻学系系史

本校新闻系之正式成立，时在民国十八年秋。但十五年度已有新闻组附设于中国文学科下，其主旨乃在养成从事新闻之

人材，主任为谢六逸先生，教授有郭步陶先生（新闻报编辑）章先梅先生（新闻报馆印刷部主任）陈万里先生（民报编辑中央通讯社记者）均名重一时之报界先辈。至若远在俄京之报界鼻祖戈公振先生，工部局华人情报处主任钱伯涵先生，主持外交部情报之夏奇峰先生，文化建设月刊主编樊仲云先生，北大教授陶希圣先生，以及时事新报编辑黄天鹏与周孝庵两先生，本系同学均曾受其教益。新开设课程，则理论与实验并重。就其性质可别为四类，首为基本工具之训练，本国文学，英文，第二外国语、心理学、统计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在必选之例。次为专门知识之灌输，包括理论与实验两方面，举凡报学概论、编辑、采访、报馆组织、管理、广告发行、照相绘画、印刷等。再次为辅导知识之旁助，此项包有新闻记者应有的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外交等知识。末为写作技术之训练，如评论练习、通讯写作、速记术，校对术等。课程之选习，有一定之顺序，一二年级学生，以攻读基础知识与辅导知识为主。三年级注重专门知识与写作技能。最高年级则课堂听讲时间减少，侧重实习与考察，俾得与社会多接触。实习方面，有高级主持之校刊社，采轮编制，分采访与编辑两部，由教授指导之。每星期出版一次，盖所以沟通校内消息者也。编排新颖悦目，内容亦极充实。固俨然一小范围报纸也。通讯社亦为实习机关之一，内分：设计、编辑、采访、交际、校对五部，每日发稿两次，各大报馆多乐于采用。为存储参考材料计，又有研究室之设置，室内蒐藏国内外报纸杂志，并教授上需要之模型。印刷所系本校与师生合力投资为股份有限公司，既利实习，又便供需。校外参观每学期必举行数次，由教授率领至完备之报馆，或通讯社，当场释说，学生笔录，收获颇宏。为明瞭各国新闻事业之状况，间亦有国外考察团之组织。本系规模既广，声誉又著，自开办迄今，毕业同学

已十届，服务各大报馆者，有陈鹏（中央社报馆）王德亮，冯志翔（中央通讯社）等三十人。主办地方报纸，独当一面者有邓友德（北平觉今报）邵鸿达（力报）等，服务出版界者有王伊慰（女声社主笔）郑瑞梅（商务印书馆）等。张吾素等三人留学海外，以求深造，学成归来，定有一番贡献，为母校争光也。

.....

新闻教育为发展新闻事业之基础，欧美各报，多托学校代办新闻科，故人材辈出，报业日兴。今欲图发展我国新闻事业，必培专门人才，而我国地方报纸，尤属不堪，现本系与报馆当局切实合作借收实效。

—摘自《三十年的复旦》

十、教育学系简史

章 益

“复旦大学里面必须有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专科。”这是李校长多年的愿望。在作者自母校毕业以后，准备赴美留学的时期，校长就敦劝他专攻教育，以作筹设教育专科的准备。作者对于教员的业务，原有相当兴味，加以校长的劝勉，就决定以教育学和心理学为专习学科。在留学期间，校长又常有书信寄去，仍以前意相督促。这样酝酿了数年之久，后来这个愿望才得着实现，可说完全是校长先生坚决的意志所促成的结果。

设在复旦里最早的教育科目，是民国八九年间的教育学一门。每周授课三小时，这是全校中绝无仅有的教育学科。最初担任者为汤寿松先生。汤先生为著名经济学者，从湖南因为反对督军张敬尧而亡命在上海，就应了复旦之聘。汤先生所任科目，主要者是经济学，兼及教育学，为三年级文科必修科。所用教

本，是孟禄氏教育史简篇，所以虽名为教育学，实际是一门教育史。这一门学科，可称为复旦教育学的研究中开宗明义第一章了。

次年，社会学者陈定谟先生来校，担任文科四年级教育学讲座，其内容为教育原理，用书是桑代克氏教育学诸论。这是教育原理学程的开始。陈先生亦是正式采用国语讲演为教学法的第一人。（其时沪上各大学授课，通用英语，且注重问答，陈先生实开讲演法之先河。）

此外与教育学密切联系的心理学与哲学两门，为李校长亲自任教，在课程中的历史比较悠久。

民国十三四年以后，汤先生赴欧考察，陈先生应厦门大学之聘，先后离去上海。复旦教授改聘黄梁就明先生担任。每学期开二学程，学科逐期更换，如教育原理，教学管理，特殊儿童等，均曾开设。变换的范围很广，还未计划到一个贯串的顺序。作者于十六年夏返国，秋间回母校任课，在教育方面所任之课，为历史教学法，小学各种心理等学程，亦都是属于选科性质。因为这时的教育学科，设于文科之中，所以还谈不到一个师资训练的完整计划。不过同学中已有侧重教育学科选为主科的人，如潘谔基，蒋载华、严济宽、侃承楹诸君，均在教育学系正式成立以前就已倾向于教育研究。至今他们几位，还是继续于这门研究的。

这时还有一件有利于教育学研究的事，就是心理学科的发达。经过郭任远先生的渗淡经管，心理实验室有了相当的基础，这对于爱好心理学及教育心理学的人，当然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民国十八年秋，本校遵部令改科为院，内再分系。以前的文学和中国文学科合并，改称文学院，内设教育系。于是本系才得正式成立。当时校长先生命作者担任主任之职，虽属推却

不了，然而对于这付重担，实恐力不胜任的。

本系成立以后，即以培养普通师资，造就教育行政人员，和专门研究人材为目标，但是偏重第一项。在课程方面，于全校共同必修学程之外，规定本系必修及选修学程，又规定辅系办法，使专攻教育者于普通学科方面，亦有所特长，作为将来担任教师时教材方面的准备。同时取得义务小学之同意，本系同学升入高年级时，得往该小学实习教学，于是本系组织，才算粗粗就绪。

同年冬天，鉴于许多大学学生因家庭经济种种困难，需将求学年限缩短，提早结束学业，乃参照部令，向校务会议提请设立二年的师范专修科，既可适合上述学生的需要，又可以造就初中师资。当即着通过开办，附设于教育学系之下，一时颇为同学所欢迎。直至去岁教部对于本校组织认为分系太繁，嘱加裁减，师范专修科亦在被裁之列，只得分期结束。师范专修科成立至今，已有五年半的历史，现尚有询问该科可否招生者，可见二年师范确能适合需要今竟不能续办，未免可惜也。

—摘自《三十年的复旦》

十一、教育部指令

高字 33965 号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令国立复旦大学。

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校五字第二二四二号呈一件为呈请自下学年度起将本校教育系改为职业教育系或职业师资系并准理学院增设数理学系由。

呈悉，该校教育学系准暂改为职业教育学系请自三十二年学年度起增设数理学系一节应予照准仰即知照。此令。

部长 陈立夫

第三节 理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一、理学院系科概况

复旦公学一九〇五年初创时，即设有高等正科理科，学制定三年毕业，因此理科也是复旦历史上最早的学科之一。高等正科理科为入“理科、工科、农科大学之预备”。^[1]主要课程有：伦理学、国文、法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动物植物、测量、图画、体操、音乐、拉丁文。

一九一七年，复旦扩建成为大学，但理科仍未有重大发展，高等正科毕业生仍转学他校。一九二三年秋，“外察社会之需材，内应诸生之志学”，^[2]设土木工程系，理科也因之改为理工科。理工科学生一、二年级学数、理、化基础课程，三、四年级转入专业学习，一九二六年理工科设化学班。

一九二三年秋，理工科添设心理学系。一九二四年春，郭任远博士回校执教，将心理学系扩建为心理学院，脱离理工科。一九二六年心理学院改为生物学科，设生物学系。

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理工科和生物学科合并为理学院。土木工程系属理学院理所不当，但工学院未能成立，设理工学院教育部又不予以批准，只得暂且属之。因此，一九二九年理学院辖有：土木工程系、生物学系、化学系。

三十年代理学院系科维持不变。一九四二年，根据科学发展和校内教学的需要，数学系和物理系由辅系扩建为数理系。一九四七年，数理系分为物理组和数学组。至一九四九年底，理学院辖有：数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土木工程系，共四

个系。

理学院历任院长是：林继庸(1930~1934)、金通尹(1935~1938)、孙百亮(1939~1942)、李仲珩(1943~1947)、余徵(1948)、卢于道(1949)。

二、土木工程系

一九二三年之前，复旦大学理科仅有二年级，学生毕业后转学他校。二三年秋，设三年级，是为土木工程系，学生仅十人。

土木工程系一、二年级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测量，三年级学力学、建筑学、材料学、铁筋混合土学、砖石工学、营造学，四年级分：卫生工程、水利工程、市政工程、铁路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建筑工程，按各人兴趣不同修习之。

一九三七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土木工程系培养“从事敷设公路铁路、规划水利市政、建筑桥梁房屋的土木工程人才”。主要必修课有：微积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图形几何、工程画、初级测量、应用力学、材料力学、建筑材料及试验、地形测量、水力及实验、路线测量、钢筋混凝土、基础学、道路学、房屋建筑、铁路建筑、结构力学、结构计划、都市给水、天文学、土地测量、沟渠学、路线计划、市政计划、桥梁计划、机械工学、河工学、港口工程学、闸坝工程学、水利工程计划、工程研究、工程契约规范、工程管理及估价。土木工程系课程繁多，学生须修满一百七十学分方准毕业。理学院历届学生，读土木工程的最多。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九年，土木工程系共有毕业生七百五十人。在教学的过程中，土木工程系十分重视野外实习，测量实验，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后，“出则荷经纬仪，跋涉山河，跨越田野，测度其高深广袤，入则

持画具，定图案，考工辨材”。^[8] 复旦土木工程的毕业生受到主持建设者之好评，毕业生常常供不应求。

土木工程系历任系主任是：金通尹（1930~1939）、王光钊（1939~1940）、白季眉（1941~1943）、施成熙（1944）、余徵（1945~1946）、孙绳曾（上海补习部）、孙绳曾（1947~1948）、金通尹（1949）。先后在该系担任教授的有：金通尹、金镜青、卢平长、徐世大、吕彦直、康时振、曾昭恒、余明德、顾康乐、李泽民、戴居正、王云澹、裴冠西、竺家骝、胡钊、孙祥萌、崔九卿、沈宾颜、孙绳曾、马地泰、白季眉、李叔和、陈克诚、曹敬康、董钟林、巢庆临、冯寅、金肖宗、刘博如、李善道、许心武、陈孚华、徐以枋、李新民、俞徵、李秉成、朱宝华、哈雄文、沈百先、王师羲、王光钊、丁观海、李文邦、熊正璇、杨天祥、刘勋略、王达时、张书农、吴睿、陈训烜、戴竞。

三、化学系

复旦高等正科时已设有化学课程。一九一九年以后化学课程陆续增加，为各系学生所必修，但未设系。一九二六年设化学班，开始招生，属理工科。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化学独立成系，属理学院。

化学系设立的目的有三：一是授以化学理论及实验，造就化学专门人才，使得用其所学，以为研究发明、创造及应用于工业之助；二是养成大学、专科及中学化学教员；三是灌输相当化学知识于其他各系学生。一九三九年规定开设的课程有：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物理化学、毒瓦斯、爆发药、化学通论、高等有机化学、工业分析化学、化学工程大意、冶金学、矿物学、地质学、生理化学、化学史。一九三七年的课程设置大纲还规定：化学系的学生应以物理系、生物系、数学系、教育学系、工商管理系为辅系，在其中修满十八

学分。

化学系历任系主任是：林继庸(1930~1934)、沈梦占(1935~1938)、林一民(1939~1947)、戴岂心(上海补习部)、戴岂心(1948)、严志弦(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李钜元、于基泰、卢景肇、林继庸、李运华、韩祖康、贺闾、何庆曾、邵家麟、沈熊庆、陈维稷、黄兆鸿、沈梦占、王子瑜、陈景琪、严梅和、林一民、戴岂心、严志弦、陈松茂、徐墨耕、赵汉威、赵廷炳、程延庆、王子荫、严演存、王应梧、徐日新、吴荣熙、李诗长。

四、生物学系

生物学系的前身是心理学系和心理学院。

心理学系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三年春，复旦毕业生郭任远留美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来校执教，逐步将心理学系扩充为心理学院。其设备有心理实验室、生理实验室、形态学实验室、动物饲养室、声室、暗室、研究室、照相室、消毒室、占子彬院三、四楼全部及二楼半部；仪器标本五百六十具，动植物、人体模型、胎儿标本一千九百余种，心理书籍万册。一九三五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其成绩昭著，拨补助金万元，辅助发展生物科学。当时，教授除郭任远外，还有蔡翘、蔡堡、唐钺、孔宪武、李汝祺、刘清风、江上峰诸博士，教授阵容整齐。一九二六年，心理学院改为生物学科。一九二七年夏，郭任远博士辞职离校。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时，生物学科改为生物学系，隶理学院。这时期，复旦心理学院和生物学科吸引了不少优秀学生，知名学者童弟周、冯德培、胡寄南、陈世骧、沈霁春、徐丰彦、蒋天鹤、朱鹤年都是这时期复旦心理学院和生物学科的学生。

一九三七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生物学系以“为愿习

医农等专门技艺者之预备”“训练生物科学专门人才”为目的。必修专业课程有：无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有机化学、动物组织学、动物胚胎学、动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及解剖学、种子植物分类学、生物学技术、植物生理学、细胞及遗传。生物系学生应以心理学系、化学系或教育学系为辅系，至少修满该系的十八学分。

生物学系历任系主任是：蔡翘（1927）、刘清风、江上峰（1928）、江上峰（1929）、许逢熙（1930~1931）、徐人极（1932~1940）、卢于道（1941）、薛芬（1942~1947）、胡寄南（1948）、卢于道（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郭任远、姚传法、孔宪武、蔡翘、蔡堡、李汝祺、葛成慧、秦拱、江上峰、康兴卫、许逢熙、冯德培、汤觉之、黎国昌、徐人极、蔡无忌、叶秋原、周士礼、牛沛江、董世魁、薛芬、卢于道、钱崇澍、曲仲湘、张孟闻、王敏、秉农山、伍献文、路顺奎、胡寄南、郝象吾、王志稼、叶振钧、熊大仁、裴鉴。

五、数理系

数学、物理类的课程，早在复旦公学高等正科时期即已开设。一九一七年复旦大学扩充为大学后，设有数学系、物理系，但均只是辅系，无直属的学生，开两学期的课程，供外系学生修读。

一九四二年数理系正式设系。数理系设立目的是为了适应科学发展的需求，加强理工科的基本理论教育和培养数学、物理方面的专门人材。一九四七年数理系分为数学组和物理组。

数学组的主要专业课程有：微积分、物理、化学、初等方程式论、射影几何、微分方程、高等分析、高等解析几何、高等代数、无穷级数、复变函数论、微分几何、理论力学、高等

几何、实变函数、近世代数、拓扑学、数论。

物理组的主要专业课程有：微积分、物理、化学、初等方程式、几何射影、高等分析、微分方程式、理论力学、电磁学、热学、光学、物性学、复变函数论、无线电学、近代物理。

数理系历任系主任是：李仲珩（1944~1945）、陈传璋（1946）、邓静华（1947~1948）、陈传璋（1949）。主要教授有：朱文鑫、陈石英、孙兆熙、沈星五、汤彦颐、邓静华、陈传璋、周慕溪、孙振宪、束世杰、范际平、谭同坤、叶蕴理、李锐夫、张宏慈、朱应铄、董钟林、周怀衡、黄缘芬、江仁寿、王恒寿。

注：

- (1) 见一九〇五年复旦公学章程。
- (2) 见金问洙《复旦理科之现状及将来》。
- (3) 见金通尹《土木工程系系况》

附录：

一、复旦理科之现状及将来

金问洙

复旦理科之有三年级，自民国十二年始。其先仅有预科二年。毕业则转而之他校。至十二年秋，废预科名，外察社会之需材，内应诸生之志学，设土木工程学系，肄业者十人。是为理科三年级。习力学、建筑学、材料学、铁筋混合土学、砖石土学、营造学诸科。而一二年级习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测量如故，以立之基。基固则层楼杰构可载，而无颠复之患矣。仪器图书不能逐尔全备，月累岁增，期于完善。今学者少，所有物理、化学及测量仪器仅足供用。来日之当扩充，已预计之矣。今年之秋，设建筑材料试验室，置四年级，仍为工程学系。以诸学科分隶铁路、市政、营造三类，使学者择焉。而三年级

于工程学系外更立数学、物理学系及化学系。穷理致用，各得其宜。自今以往，学者在一、二年级所习皆为必须之科，入三、四年级则三系鼎立，从所愿学之。择业务约，成功乃多，造端之艰，冀收效宏也。若夫本之不立，德之不修，智足以格物穷理而不洁其名，才足以成器利用而不淑其身，斯自弃为机械而已，使人藉口以为讲求物质文明之过。非吾校设科教人之旨也。

—摘自1924年复旦年鉴第228页

二、心理学系成立记事

胡寄南

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以前，要是有人说：我们校内将设立心理学专系，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就是依平素本校对于普通科学的态度上推论起来，心理学专系之成立，简直是空中楼阁了。但是复旦大学心理学专系毕竟在一九二三年秋季萌芽而滋育，由梦想而成实现了。这样浪漫式的成立史，不独在校史里面辟一新纪元，即以全国学校面论，亦不多见。

在一九二三年春，李校长接得一位留美同学金君的信，大致说是他在美国遇见不少复旦同学，其中尤以郭任远君最为特色，又说了些郭君不久将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话。隔不几月，郭先生归国的确期知悉了。在他未动身以前，许多热心为校的留美同学早已运动，请他为母校尽力，所以这消息一传到校中，那时的二年级生（校中向例二年级起始教授心理学）立刻派了十二位代表到上海青年会——郭先生的暂住所——见他，表示十二分欢迎的诚意。那时候郭先生的“朝向”是对着北京大学方面的。可巧那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因蒿目时艰，愤而辞职，局面顿时变了，这适当的刺激，遂启发了郭先生朝向复旦的动机。郭先生所以有这样“延宕的反应”，也坐是故。同时东南大

学，虽也设法延聘，但是这刺激的太低，不能有何效力，毕竟复旦胜了。

郭先生来到复旦，不独他一个人。他是和几百个朋友——心理学书籍杂志——同来的。这在我们心理学系史中也占一很重要的位置，心理学图书馆的祖先，就是那几百位朋友呢？那时立志专攻心理学的人，恐怕除了记者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有坚决的表示的了。

民国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郭任远先生经手募捐，郭辅庭先生捐了二千元，郭子彬先生捐了一千元。有了这三千元做开办费，试验的仪器，动物，和需用的书籍杂志，一天一天的增多了。到十二年暑假招生终了，北京大学阮永钊君，商务印书馆编辑杨贤江君，金陵大学蔡乐生君，复旦毕业生吴颂皋君及本校学生黄维荣君，方邃君、冯德培君等一共有十余人，复旦大学心理学系这才正式成立。

此外留美同学蔡翹先生，把他自己所有的百余本有价值的书籍，借存在心理学图书室里面。留美复旦同学中又有十几位很热心地捐助了一百几十元美金。吴颂皋君向苏维卿先生处募得了好几十部心理学的书籍。在今年四月间，郭辅庭先生又慨捐了二千元。其余美国德国各科学社及出版界捐赠书籍，又有好几处。到现在心理学阅书室里面共有中外书籍二千余册，杂志五十余种，都是关于心理学、生理学及生物学方面的。

今年春季起，本系又添聘了唐钺先生教授心理学史，蔡乐生先生为应用心理学助教。照这样看来，复旦心理学系之所以日益著名决不是偶然的。³

刹那的人生，至虚且幻。但是我们若将一生精力用在研究科学造福社会方面，那末，虚幻的人生里面，至少也可寻些意味出来。罗素说得好：“当我发愿恨不把人类给在飞行着的慧星扫杀尽净的时候，我一想起科学的知识 and 艺术来，觉得这两件

东西，还能使我们的生活不完全无用。”

我们以前的梦想，已经有一半实现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梦想，能有实现之一日吗？那唯在于我们的努力。末了，我要借一句梁任公先生的话，作为此篇的结语：“吾觉有极灿烂壮严之将来横于吾前。”

摘自1924年复旦年鉴第137页

三、心理学院之将来

郭任远

本院之进行计划分为三时期

第一期为过去期，即自心理学系成立至改办心理学院。本期为试办期，即试办一心理学系，为创设心理学院之准备是也。试办之目的在购置书籍及一部分仪器。此期之目的可谓已达。而我侪之所以能达此目的者，实郭君辅庭及其尊翁郭子彬先生等所赐也。

第二期为现在期，亦即心理学院正式成立期。本期计划在建筑心理学第一院，以供实验及研究之用。并筹基本金为常年设备及研究等用。现第一院已于本年二月间动工，不久将落成，基本金亦在积极募捐中，自下学期起已聘定蔡翹博士为生理心理学教授，孔宪武博士为解剖学教授，李汝祺先生为生物学教授，其他如仪器书籍及其他设备也将于下学期大加扩充，此现在期之大概也。

第三期为将来期，亦可称为扩充期。此期中将依社会之需要，分别缓急，逐渐增设下列各学院：

(一) 精神病医院，以医疗病狂及其他各种精神病。

(二) 盲哑及残废学校，专以研究教育盲哑者，及残废者多种办法。

(三) 试验学校，专作教育心理学之试验所。

(四) 婴儿教养院，专作研究婴儿及儿童之心理及其教养方法之用。

(五) 生理学及解剖学院，专以研究与心理学有关之生理及解剖诸问题。

(六) 铁工厂及木工厂，专以制造各种应用器具及仪器。

此吾侪对于心理学院将来发展之计划也。惟吾侪于第三期计划之实现，及其实现之次序，将来或因时势之要求而有多少变更：(一) 吾侪拟于最近之将来首先创办试验学校其次序将首设中学次及小学再次及幼稚园。(二) 吾侪如能于最近之将来得充分之经济援助，则将心理学院之范围扩充而改为生物科学院，为此，则本院将来所欲设施者又不止上面所述者而已。

摘自一九二五年复旦年鉴

四、今年之复旦理工科

金 问 洙

吾于前年之复旦年鉴述复旦理科之沿革。于时始分为三系，数学物理学系、化学系、土木工程学系是也。工程学属理科名未当，是以更名为理工科。前年之春，肄业工程学系者十人，其七人已于去年夏毕业以去，效微劳于国，而继起习工程今在三四年级者二十三人，日夜讲求桥梁道路营造诸法，材料之良窳，务裨实用。其中当于今夏毕业者十一人。冀上下悔祸，贤智奋起，为国家创清平盛业，而吾校出人才为之用，此十一人者，怀璞求励，何患不得所。若天未厌乱，人习于苟且，百事隳废，使新造之青年浮沉其中，消磨志气，吾甚惧焉。一二年级诸生之十余人，所习与前年无异，他日分系研究化学物理工程，如吾所期，诸所习学程详见理工科章程，不具录。今年子

彬院落成，辟数室为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及仪器储藏室，陈设适宜，秩然可观。其图在此年鉴中，阅者审焉。而仪器之数，两年以来，益倍于昔。其他测量材料，试验器具亦颇有增益。以今视昔，要为胜之，亦逆知来者之胜于今也。

摘自一九二六年复旦年鉴

五、生物学科之成立及其将来

蔡 翹

生物学科由心理学院发展扩大而成，草创伊始，没有甚么历史可言。我想在这里叙述的，只是我们设立生物学科的动机、目的和计划。

吾们设立生物学科最初的动机是为着心理学学生；不过后来以为生物学在科学的位置可算是极重要的，而同时又觉得吾国这种人材太鲜，有造成之必要，故决将心理学院扩充为生物学科。惟以经费未着，筹备不周，所以迟到这学期得了美国庚子赔款教育基金团的补助，始得成立。

本科除原有的心理学院附属在内外，将添设动物、生理解剖、及细菌卫生三系。各系之进行及教程虽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共同目的：第一为造成专门人才，使其择生物科学中之一种作高深的研究；第二，为训练中学校及师范学校之生物学教师。第三，与本校学生之不专门研究生物者以生物学常识；第四，预备学习实用科学如医、农、教育等。本科卫生系尚希望能造成实用人材，将来在政府及社会各种公众卫生机关服务。

本科进行计划，除心理学院仍照原定步骤做去外，其余三系的计划拟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为购置仪器及添聘专门教授期。自今年秋季起已聘定李汝祺及蔡堡两君为教授。生理解剖学系既由郟人及冯君

德培办理，明季拟聘闻君亦传专任解剖及组织学教授。细菌卫生系除孔宪武先生专任外，今年秋季决聘德国著名病理解剖学家R·Haeppli为教授。以上所言不过就十五至十六年而论，将来经费充裕当添聘教席。我们仪器现极不完备，不过吾们希望在此两年内总须将所要用的—律购齐。同时吾们除教书及研究外，尚希望能预备大宗标本及图型以作授课，研究及陈列之用。

第二期，除添设教席及增购仪器外，拟建筑一博物院，专供陈列吾们及学生工作成绩之用。

生物学科种类极多。吾们所以仅设此四系者，第一，因为有的在国内别的大学已经有了基础，为分工计，吾们不能不暂设其他大学未发达的生物科学；第二，为经济及人材的关系，吾们断不能把本科的范围扩得太广。将来为筹得充分款项，自然要再设生物化学，植物，人类及病理等系的。

摘自一九二六年复旦年鉴

六、土木工程学系系况

金通尹

复旦土木工程学系本属理工科。民国十八年八月，学校依大学组织法改组，土木工程学系当属工学院，顾工学院需费大，力所未逮，其成立犹有待，故理工科与生物科学合为一院，院当以理工称，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工指工程，名与实符，乃不见许于教育部，故土木工程学系与化学系生物学合为理学院。

复旦土木工程学系自民国十四年始有毕业生。十六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努力建设，省有厅，县有局或科，建都市、修道路、敷桥梁、兴水利，需材孔殷。吾复旦工程学生乃得从国内外工科大学毕业生后，出则荷经纬仪，跋涉山河，跨越田野，测度其高深广袤，入则持画具，定图案，考工辨材，难易

良窳强弱贵贱，数计而无遗，比核以求是。三年以还，当世主持建设者于是稍稍知有复旦工程学生，而复旦工程学生益勤奋自勉，惟恐贻当世羞。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大学毕业生纪念刊

七、化学系史

林 继 庸

本校开设化学学程，已十余年于兹。初仅为各系同学必修学程之一，故所设学程只有化学概论，定性分析及普通有机化学数种。十五年秋始成立化学班，属理工科，十八年秋改称化学系属理学院。四年以来，设备日臻完备，科目亦有增加，凡为潮流所趋及社会所需之学程及设备，均尽力添设，如工业化学分析、高等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史、工业化学制造、食物化学、电化学、化学工业计算、香精品制造、军事化学实习等是也。最近为养成国防及实业人才计，更着手筹办国防化学专科及化学工业制造厂，系务日益忙矣。本系本学期计人数有同学十七名，教授四名，助教二名；课程方面有授课钟点二十，实习钟点二十九，设备方面有实验室三间，仪器药材室一间，图书室一间。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毕业生纪念刊

第四节 法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一、法学院系科概况

有关社会学、法学的课程，在复旦公学时期已开设。一九

二三年设立政治学系，附属于文科。

一九二五年春，“习政治专科者骤增”，^①遂添设社会科学科，下设政治学系和社会学二个系。一九二七年，政治学系分为：政治、市政、法律三组。

一九二九年春，复旦大学系科改组，改社会学科为法学院，辖有：政治学系、市政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原属文科）。一九三九年，社会学系又由文学院改隶法学院。一九四三年春，法律系添设司法组。一九四八年秋设监狱官专修科。

一九四九年八月，同济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司法组、行政组，暨南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律系，英士大学法学院奉命停办，并入复旦法学院。复旦法律系开设司法组、行政组二个组。一九四九年底，法学院辖有：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

法学院历任院长是：吴颂皋（1930）、孙寒冰（1931~1934）、张志让（1935~1938）、孙寒冰（1939~1942）、张志让（1943~1947）、应成一（1948）、潘振亚（1949）。

二、政治学系

政治学系设于一九二三年，原附属于文科之下。一九二四年春，设社会学科后，政治学系改属之。一九二七年，政治学系内又分为“政治”、“法律”、“市政”三组。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法律、市政单独设系，政治学系仍然设立，隶属于法学院。

一九三七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政治系的目的是：“培植政治外交之专门人才，造就国家行政人才”。^②主要专业课程有：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理、近世欧洲史、中国近百年史、统计学、财政学、欧洲政治思想史、各国政治制

度、国际公法、法学通论、宪法原理、现代国际政治、中国政治制度、行政学、欧洲外交史。

政治系历任系主任是：吴颂皋(1930~1931)、孙寒冰(1932~1935)、温崇信(1935)、程德潏(1936)、孙寒冰(1937)、但荫荪(1938~1940)、胡继纯(1941~1946)、耿淡如(上海补习部)、耿淡如(1947~1948)、张明养(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盛柯、戴维斯、林齐恩、莫介福、刘庐隐、何葆仁、朗醒石、姚永励、孙寒冰、魏良声、吴颂皋、温崇信、程德潏、端木恺、熊梦飞、樊仲云、萧远、吴士栋、袁道丰、耿佐军(淡如)、费玗、沈家诒、方焕如、马杰豪、宋启文、徐家枢、黄中莖、郑学稼、李建芳、许性初、胡继纯、林同济、张明养、梅汝璈、储安平、葛受元、刘百闵、赵泉天、但荫荪、凌乃锐、张明养、叶法无、叶元龙、张今铎、林穆光。

三、市政学系

市政学系的前身是设立于一九二七年的政治学系市政组。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市政组独立为市政学系。

一九二九年公布的市政学系课程设置大纲规定：市政学系设立的目的是“研究市政组织、市政管理和方法，培植市政专门人才。”^[3]主要专业课程有：市政学大纲，美国市政组织、欧州市政组织、市公安、市公用、市财政、市卫生、市教育、都市设计、中国市政沿革、中国地方政制、簿记、会计学、中国近百年史、欧州近代政治、中国社会问题、统计学。一九三七年市政系奉命停办。

市政系系主任是：温崇信(1930~1937)。先后任教的教授有：温崇信、朱异元、徐志禹、赵恩钜、顾康乐、董修甲、吴利国、韩潮初、陈俊德、庄秉权、陆咏樊、胡继纯。

四、法律学系

法律学系的前身是成立于一九二七年的政治学系法律组。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法律系独立成系，属法学院。

一九三七年公布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法律学系设立的目的是：“培植国家司法及司法行政人才，造就法学专门人材”。⁴¹主要专业课程有：法学通论、民法总则、法院组织法、宪法原理、行政法、债权、物权、刑法总论、劳动法、监狱法、亲属法、继承法、公司法、票据法、刑法各论、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英美法、国际私法、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土地法、中国法制史、法理学、法律哲学、公文程式、诉讼实习。教学过程中，法律系经常组织参观、实习，还在校内开设假法庭，模拟审判程序，进行审判实习。

一九四三年，为培养“司法实务人才”，法律学系增设司法组。一九四九年同济大学法学院法律系、金华英士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奉命停办，并入复旦，法律系又增设行政组。

法律系历任系主任是：裴复恒（1930~1931）、张志让（1932~1938）、潘振亚（1938~1941）、戴修瓚（1942~1946）、施霖（上海补习部）、施霖（1947~1948）、张定夫（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陶希圣、金兰荪、袁锦昌、李剑华、何滨孙、张元枚、裴复恒、施霖、张志让、江镇三、瞿曾泽、宋维恭、俞承修、胡汉瑞、王效文、韦维清、潘振亚、洪孟博、王孝通、宗维恭、周新民、宁柏清、许鹏飞、张定夫、陈顾远、张隽青、赵琛、何任清、高其迈、卢峻、王哲夫、吴荣林、梅尔如、王绍唐、王仲桓、郭云观、吴荣林、陈文彬、吴岐、胡元义、丘日庆、范杨、刘笃、邓子峻、洪钧培、林鼎章、梁传愈、杜彬、何颖孙、戴修瓚、费青。

五、社会学系

社会学系设立于一九二五年，属社会学科。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社会学系改隶文学院，一九三九年又改属法学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是私立大学中最早成立的。

一九三七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社会学系“注重理论上之探讨，使学生有认识社会之眼光及解剖社会之能力”；“使学生明瞭近代社会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及补救方面的专门技术”；“使学生熟习各种应用于分析社会现象之科学方法”，以研究培养“社会”、“社会工作”及“社会调查”⁽¹⁾方面的人才。主要专业课程有：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中国近百年史、近世欧洲史、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通论、教育通论、统计学、社会进化史、社会思想史、劳工问题、农村社会、现代社会问题、世界经济史、犯罪学、中国社会组织。学生还须在文学院、法学院及生物系、心理学系、工商管理系中任择一系为辅系，在其中学满十八学分。

一九四九年同济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哲学系并入复旦，社会学系遂扩大为哲学组和社会学组两组。

社会学系历任系主任是：应成一（1930~1935）、言心哲（1938~1947）、应成一（上海补习部）、应成一（1948）、胡曲园（1949）。主要教授有：陈定谟、郑觉民、侯金、季新德、陈宣、应成一、王人麟、孙本文、陶希圣、陈钦仁、钱慰宗、傅若愚、萨孟武、萧远、郭美德、温崇信、郑若谷、李剑华、范定九、钱慰宗、仇子同、严恩柞、言心哲、何德鹤、胡曲园、喻兆明、刘咸、王养冲、徐蕴辉、梁绍文、张镜子、卫惠林、高迈。

六、经济学系

经济学系设立于一九二二年，原属文科。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经济系改隶于法学院。

一九三七年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经济系以“灌输现代经济学识、养成搜集经济事实、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人才”⁶¹为宗旨。主要专业课程有：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社会学原理、统计学、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合作主义、国际商业政策、世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簿记、会计学。本系学生须以社会学系、政治学系或商学院中任一系为辅系，在其中至少修满二十二学分。一九四九年，英士大学经济系奉命停办，并入经济系。

经济系历任系主任是：李权时（1930~1932）、李炳焕（1933~1938）、卫挺生（1944~1945）、樊弘（1946）、王恭谋（上海补习部）、漆琪生（1947~1948）、朱伯康（1949）。主要教授：有王祖廉、洪锡麒、陈绍平、陈振华、贺良、李炳焕、袁问不、范定九、朱斯煌、朱通九、袁锦昌、冯和法、漆琪生、王恭谋、戴搗文、林一心、夏炎德、吴国隽、武培干、陈清华、李立中、褚葆一、唐庆增、李权时、卫挺生、樊弘、朱伯康、陈观烈、李铁民、贾开基、叶元龙、林穆光、霍明奇、陈彪如、刘絮敖、吴斐丹、郑学稼、陈绍武、许涤新。

七、经济研究所

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复旦商科研究所，一九四四年创办于重庆。一九四七年商科研究所迁沪后，改名为经济研究所，隶属于法学院经济系。经济研究所培养研究生为宗旨，分经

济理论门、经济史门、财政金融门、经济统计门、每门设导师一至二人。主要课程有：经济理论、货币学说、经济统计、经济制度、经济思想研究、经济史研究、财政研究、金融研究、数理经济、土地经济、德国经济学说、德文、毕业论文。

注：

(1) 见刘芦隐《社会科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2) 见《三十六年春复旦大学一览》第151页。

(3) 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复旦校刊。

(4) 见《二十六年春复旦大学一览》第141页。

(5) 见《二十六年春复旦大学一览》第79页。

(6) 见《二十六年春复旦大学一览》第159页。

附录：

一、社会科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刘芦隐

本校社会科学，初始于三年前本校文科之政治学系。当时以规模尚小，政治学系附属于文科而已足。民国十三年秋季，余与何葆仁先生俱来斯校，始重为增订课程，而政治学系成为一专门学系之规模乃备。至十四年春季，学生习政治专科者骤增，遂由行政院议决，于文、理、商、心理，四科外，添设社会科学，内分政治学社会学两系，推何葆仁先生为主任。是议既定，即于是年春成立政治学系；同年秋增设社会学系；而两系又各设研究院及大学两部，此为本科规模粗具之始。

本年春，何先生因事赴南洋群岛，本校命余承之主任职权，于本科教员及课程二者，均略有增设；凡关于政治学社会学两系之课程及教授上之设备，又稍见完备。同时，本校关于生物学及心理学方面之课程与设置，亦大为扩充，于是本科学生所

必需之基本科目皆备矣。

学生之在本科者，三年前不过数十人。而去年夏季毕业于政治学系者不过九人。去年本科全体学生增至一百零一人；本学期增至一百零七人，将于本年夏毕业者十六人，至下学期全体学生总数，则又将不仅于此。

学生人数方面之增加，与本校设备方面进步，俱使本科有日益发展之势。目前正在进行中者，首为图书之增置，并拟以后每年逐渐添募的款，为购备图书之经费。其次，属于社会科学范围以内之各学系，除现有之政治社会两学系外，皆有从速设置之必要。如历史、经济、法律、人类学等，皆须以次设置，而后本科之内容，方为充实。入手之法，拟先增聘此数科之专门教授，并增加其课程。关于此点，现已添聘程学愉君为本科教授，程君留美，夏间将得博士学位、下学期可来校授课。以后努力发展者，则在因学生人数之增加，与经济能力之活动，从课程图书教授三者著力而已。

摘自一九二六年复旦年鉴

二、社会学系概况

应成一

复旦之有社会学系，在民国十四年春季。其时隶于社会科，……，虽有系之实，而无系之名。今年本校遵教育部规程，设立各院，社会学于名义上成为文学院中独立之系；注册者已有七十余人之多，在同时各校之社会系中，人数最多，盖首屈一指矣，按复旦之社会系，在国人自办学校中，成立最早。历年以来教授为严思柞先生，孙本文先生，杨开道先生，均已于无形之中，为本系建立巨大之基础。而历届毕业及现在留校同学，又皆和衷共济，兴奋自勉，精神之佳，一时无两，引领

前途，致堪乐慰。成一承乏本系，前后五载，得追随群众，自效手足，亦与有其荣。适本届同学有纪念册之刊，嘱述概况，爰墨以志欣幸。

摘自一九三〇年毕业纪念刊

三、政治学系概况

吴颂皋

政治学系本附设于文科。民国十四年，添设社会科学科，分“政治”与“社会”两系，政治学系内又分设“政治”、“市政”及“法律”三组。迨十九年秋，学校当局遵照部令改组，将社会科学科改为法学院，而于法学院内，分设各系，即“政治”、“经济”、“市政”与“法律”四系是也。当时前主任马绍良先生因事繁不克兼顾，学校当局准其辞职，乃命余承之政治学系主任之职，并由各主任推为法学院院长。任职以来，忽忽经年，因于经费，遂致预定计划，未能充分实现。但青年学子闻风自各方转入本系者，纷至沓来。统计本届全院同学，共三百十六人，而政治学系同学几占三分之二，共一百九十二人，不但为法学院之主体，且驾乎全校各系而上之。于此可见各方青年对于本校政治学系注意之切，而本系前途希望之大，于是益可徵信。

今者同学二十一人，又将毕业矣。毕业之后，或服务社会，以图实际的贡献，或游学他邦，以求学问之深造，志趋不同，而怀抱之远大则一，余敢信诸同学必能知行合一、努力以求个性之发展，并有以促全社会之发展焉。虽然，今之青年，一入社会，每易为环境同化，甚至不择手段，学非所用，此则余期期以为不可，而望诸同学有以自勉者。须知吾人处世，虽志趣

各别，而态度光明，目光远大，要为青年应具之觉悟。况诸同学志在研究政治科学以改造中国之实际政治，则际此同事蝼螻，四方多难之时，如何奋发，以挽回狂澜于既倒，尤非笃学力行不为功。余虽无似，愿与诸君共勉之也。

四、市政学系概况

温崇信

本校鉴于国内市政人才之缺乏，于民国十四年即有市政组之设立，但当时所开科目甚少。十八年秋季，本校改组，市政学系始正式成立为法学院之一系。于是增聘教授，加开科目，在能力范围内，力谋扩充。现必修学程计有市政学大纲，欧美市政组织、市公交、市公用、市财政、中国市政沿革、中国市政问题、都市设计等十三种，选修课程计有指纹学、市公债、市预算、地方选举、直接民权探究等十种。学生人数，十八年秋季共五十四人，十九年春季共六十五人。毕业生人数第一期五人，第二期九人。学生研究学术团体则有市政学会。出版物则有市政季刊。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大学毕业生纪念刊

五、呈请增设司法组由

敬启者，窃查各学院法律学系增设司法组一案，前经钧部与教育部商定办法四项，并指定三十一学年增设司法组之学院各在案，仰见

钧部高瞻远瞩，宏育人才之玉意，钦佩莫已。惟敝校设立法律学系已逾十载，颇著成绩，客岁又蒙改为国立，与指定之各大学无异。且地处北碚，所有法学关系机关如：

钧部司法院、最高法院、立法院、国立编译馆等均在邻近，诚可谓全国法学人才萃汇之区矣。于实务训练及比较理论等特殊科目，不但容易延聘教才，且可广事观摩，此种特点为全国大学法律学系所不及。若以办理司法组造就司法实务人才，在全国各大学中，更较为适宜。即就敝校法律学系原有教才而论，颇多法学知名之士，较诸中央、西南、武汉、四川各国立及私立朝阳学院，固无逊色，而较诸其他边远国立大学尤敢自诩过之。今国立大学凡设有法律学系者，殆均蒙指定。其中并有甫经设立该学系者，而独遗复旦一校，想当时改国立不久未蒙

鉴及耳。敝校以设备教才未获为国利用，深滋愧惜，且中美、中英之新约同时成立，领事裁判权全已撤废，储备法官人才尤为今日之急务，目前

总裁告军民书中，有“对于我们的国民只有激发其义务感而加重其责任心”之告诫仰体

斯旨更不敢放弃责任，拟请

钧部会商教育部，补行指定自三十一学年度下学期起在敝校法律学系增设司法组，俾敝校得略尽其应尽之任务，所有拟请指定增设司法组各缘由，除分呈教育部外，应即函请

钧部鉴察，俯赐核准，以便遵行，实为公便。此上
司法行政部

校长 吴南轩

中华民国卅二年一月廿日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93卷

六、教育部指令

令国立复旦大学

卅二年一月廿日法二字第二〇五一号，呈一件为请指定本

校法律系增设司法组由

呈悉，准该校法律学系自卅二学年度起增设司法组一班，所需经费应俟呈奉行政院核定后，再由国库迳拨，仰即知照！此令

部长 陈立夫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93卷

第五节 商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一、商学院系科概况

一九一七年，复旦大学增设商科，与原有的文、理两科鼎峙而三。“其时国内各大学之设立商科者，尚属绝无仅有，可谓得风气之先矣”。^[1]商科设立的目的是：“灌输近代商业管理与经验，造就适于实用之商业专门人材”。^[2]商科初成立时，仅设普通商业系，一九二〇年分为银行系与工商管理系两个系。二十年代，国际上商业竞争激烈，上海是中国的通商大埠，商业人材需求激增，促使商科迅速发展。

一九二四年，年轻的商科学生人数达三百〇一人，占全校学生总数三分之二。一九二六年增设会计学系、国内外贸易系。一九二九年系科改组，商科改组为商学院，辖：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国内外贸易系四系。

复旦商科“为全国最先设立而最发达者”，^[3]课程完善。全部课程分四类：大学必修课、商科必修课、专系必修课、各系选修课。一九三七年春教学计划规定的商学院各专业必修课有：经济学、会计学、银行学、货币学、统计学、保险学、商业英文、商业历史、商业地理、民法总则、公司法、票据法、铁路

运输，共四十八学分。

商科和商学院的教学注意理论与实践并重，使“学生毕业后，不做书呆子，能够在商界活动”。^[4]为此，商学院设有会计室、统计室、商业图书室、收集国内外商品标本，创办商业博物馆，组织合作银行，使学生“均得实地练习之机会”。^[5]

一九三八年秋，商学院在重庆增设统计学系。一九三九年春设统计专修科，一九四二年设银行专修科，一九四六年设合作学系。

一九四九年，暨南大学商学院奉命停办，并入复旦。复旦恢复了三十年代停办的工商管理系和国际贸易系。是时，商学院共辖有：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国际贸易系、统计学系、合作学系及银行专修科、统计专修科。

。商学院历任院长是：李权时（1930~1938）、李炳煊（1939~1949）。

二、银行金融系及银行专修科

银行学系设立于一九二〇年，后改名为银行金融系。

一九三一年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银行金融系的宗旨是：“灌输现代银行学识、养成现代银行人才”。^[6]主要专业课程有：财政学、投资学、商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金融组织、商业信用、交易所、信托公司、国内外汇兑、银行会计。

银行金融系历任系主任是：杨兆熊（1930~1934）、周德熙（1935~1937）、李炳煊（1932~1940）、吴其祥（1941~1943）、陈啸江（1944~1945）、刘泽林（1946）、朱斯煌（上海补习部）、朱斯煌（1947~1948）、周伯棣（1949）。

“为培植银行之技术人才及业务人员”，^[7]复旦大学与交通银行合约办银行专修科，由交通银行提供经费，复旦大学负教

学责任。“学生免交学费，但入学时须填具志愿书，声明毕业后，有在交通银行任职之义务，‘银行有尽先任用之权’。”^{〔8〕} 银行专修科学制二年。一九四二年秋，开始招生一班，共五十名。一九四四年银行专修科停办。

银行专修科主要课程有：国文、英文、经济学、货币银行、统计学、会计学、数学、财政学、公司理财、财产保险、金融市场、银行会计、银行法规、银行制度、银行实务、国际汇兑、信托事业、农业金融、仓库学。此外还有选修课：打字、珠算、计算机实习。

银行专修科历任科主任是：奚玉书(1942)、刘泽林(1943)。

在银行金融系和银行专修科先后任教的教授有：杨兆熊、樊绍良、许继廉、袁力侗、吴德培、吴其祥、蔡渊、谢霖、崔晓岑、朱斯煌、周德熙、戚其章、周伯棣、钟兆璿、彭信威、朱伯康、陈啸江、王振寰、许炳汉、李炳焕、刘泽霖、朱广心、吴骐、王师复。

三、工商管理系

工商管理系设立于一九二〇年。一九三四年奉命停办。一九四九年九月，暨南大学商学院并入复旦，工商管理系又得以次复。

一九三三年课程设置大纲规定：工商管理系以“养成工商界建设人才，灌输现代工商界管理学识与技术，培植现代劳资纠纷问题之仲裁人才”为宗旨。^{〔9〕} 主要专系必修课有：公司理财、工业管理、劳工问题、铁路管理、职工问题、财政学、中国金融组织、商业信用、成本会计、商业统计、投资学、商业循环、广告学、销售管理、海运学等。

工商管理系历任系主任是：李权时(1930~1934)、贺治仁

(1949)。主要教授有：何华德、王振汉、李权时、汤武杰、寿松园、姚永励、郑惠祥、付德润、朱通九、萧达、程守中、丁馨伯、金兰荪、汤心济、孙鹤年、赵村人、沈筱宗、贺治仁。

四、会计学系

会计学系设立于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三年的课程设置大纲规定：会计系以“造就会计专门人才为宗旨”。专系必修课有：高级会计、成本会计、商业数学、审计学、会计制度、会计法规、银行会计、铁路会计、会计报告分析、官厅会计。

会计学系历任系主任是：钱祖龄（1930~1935）、金国宝（1935~1936）、谢霖（1936~1940）、张光禹（1941~1948）、袁际唐（上海补习部）、雍家源（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陆荣光、陈德恒、戴麟书、傅耀诚、安绍芸、钱祖龄、龙起大、黄日新、邝凯华、范定九、沈学钧、褚凤仪、林襟宇、李安、刘孔贵、张光禹、袁际唐、陈德荣、刘溥仁、何土芳、汪礼彰、许本怡、金国宝、谢霖、卢怀道、江万平、雍家源、钱素君、傅德润、施伯珩、赵卫、蒋一贯、谢霖甫。

五、国际贸易系

国际贸易系设立于一九二六年，三十年代曾改名为国内外贸易系，一九三七年停办。一九四九年暨南大学商学院并入复旦，国际贸易系遂又恢复。

一九三三年课程设置大纲规定国际贸易系的目的是：“造就国内外贸易专门人才，灌输现代国内外贸易之学识和技能。”^{〔10〕}主要专系必修课有：国际贸易原理及实践、市场学、广告学、销售管理、进货学、商品学。本系学生可以会计学系、银行金融系或工商管理系为辅系。

国际贸易系历任系主任是：邱正伦（1930~1933）、李权时（1934~1937）、张毓珊（1949）。主要教授有：俞希稷、蔡渊、邱正伦、刘庭冕、吴其祥、孙珊、张毓珊、钟兆璠。

六、统计学系及统计专修科

统计学系设立于一九三八年，“开我国大学制中有统计学系的先例”。^{〔11〕}

统计学系以“训练统计专门人才为宗旨”。^{〔12〕}统计系在四年学习过程中，每年有一中心课程：第一年为普通统计学及统计应用数学；第二年为高等统计学及二年级统计应用数学；第三年为数理统计及经济统计学；第四年为统计专题研究。前二年为普通技术掌握，后二年为理论深入研究。其主要课程有：统计应用数学、制图学、高级统计学、社会统计、数理统计、生物统计、经济统计、保险数学、统计行政、统计实务、基本国势调查、商业循环、统计论文。统计系学生须以商学院或法学院任一系为辅系，在其中修满十二学分。

统计系历任系主任是：李蕃（1939~1948）、薛仲三（1949）。一九三九年一月，为“救济廿七年度投考大学未经录取或因故未能投考之失学青年并推广专科教育起见”，^{〔13〕}当时教育部决定举办二十种专修科，指定复旦大学办统计专修科。

统计专修科“以教授统计应用科学，养成统计技术人才为宗旨”。^{〔14〕}主要课程有：会计学、货币学、银行学、国文、英文、经济学、工商管理、经济地理、民法总则、统计学、高级统计学、统计制图、社会调查与统计、统计应用数学、经济统计、统计实务、实习。统计专修科学生必须在寒假或暑假到机关、工厂、商场实习、并取得实习证明书，否则不准毕业。

统计专修科历任科主任是：李蕃（1939）、吴大钧（1940）、

邹本仁（1941~1943）、芮宝公（1944~1948）、金国宝（1949）。

统计学系和统计专修科主要教授有：金国宝、芮宝公、邹本仁、李蕃、姚庆三、沈学钧、薛仲三、崔明奇、褚凤仪、唐启贤、褚一飞、吴大钧、汪龙、李成谟、朱祖晦、邹依仁、姚健、邵尚文。

七、合作学系

“复旦是中国合作运动的摇篮”。^[15]远在一九一四年，薛仙舟教授在复旦任教时，就开始倡导“合作主义”。一九一九年，薛先生在复旦创设国民合作储蓄银行，这是中国最早的信用合作社。一九二〇年，薛先生创办《平民周刊》，宣传合作思想，推动合作事业，这个刊物办了四年之久，成为中国合作界最早的刊物。一九四六年成立复旦合作系。

合作学系以“培养合作经济的研究与实务人才”为目的，分供合组，农合组、工合组。四年课程第一年由经济学入手，从事合作原理研究，辅以各种基本理论。第二年转入业务经营，集中于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辅以会计学、经济思想史、合作运动史、高等合作、经济学等课。第三学年以金融为中心，研究农业金融与银行合作、保险合作、公用合作，辅以经济政策、各国合作制度、农业仓库等课。第四学年为综合实务研究，分别为：合作行政、合作法规、合作会计、中国合作问题研究。

合作学系系主任是：陈仲明（1947~1949），主要教授有：陈仲明、罗虔英、唐巽泽、罗俊。

注：

（1）见李权时《复旦商科历年概况及今后计划》。

（2）见李权时《复旦商科历年概况及今后计划》。

- (3) 见《江湾复旦大学》第21页。
- (4) 见李炳煥《国际贸易系概况》。
- (5) 见《江湾复旦大学》第21页。
- (6) 见《一九三一年复旦大学一览》第99页。
- (7) 见《国立复旦大学、交通银行合办银行专修科计划纲要》。
- (8) 见《国立复旦大学、交通银行合办银行专修科计划纲要》。
- (9) 见《一九三三年复旦大学一览》第109页。
- (10) 见《一九三三年复旦大学一览》第103页。
- (11) 见一九五〇毕业纪念刊第8页
- (12)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九十五卷《商学院统计系科》
- (13)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九十五卷《商学院统计系科》
- (14)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九十五卷《商学院统计系科》
- (15)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1242卷《复旦合作》

附录：

一、复旦商科之实况

李 权 时

吾国大学之最早设立商科者，其惟复旦乎？欲知复旦商科之现状，请先述其过去之历史。复旦初办商科之年，为民国六年。至十年，毕业生十五人；十一年二十三人；十二年，十九人；均普通商业毕业生，而未分系也。分系盖自今年之毕业生始。

过去历史之可述者，如此而已，至于现在之状况，请以表式略述之如次：

一、教员人数：教授八人，助教一人。（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教授不在其内）

二、学生人数之分配：四年级四十二人；三年级五十八人；二年级一百另九人；一年级九十二人。共计三百另一人，占全

校学生人数百分之六十许也。

三、学程与专系：商科学程，分为四种：即（一）大学必修科，（二）商科必修科，（三）专系必修科及（四）各系选修科是也。专系之已开设者有五：即（一）银行金融系，（二）工商管理系，（三）会计系，（四）国内外贸易系及（五）普通商业系是也。未开设者有二：即（一）交通运输系与（二）保险系是也。学程数目为：（一）属商科必修科者十七种；（二）属各系必修或选修科者四十七种，共计六十四种。

至于将来之计划如何，则权时不欲于未实行以前，妄有所雌黄，惟既观现在之状况，则将来之如何发展，阅者当不难按图索骥也。总其大端，发展之图不外四五种：即添聘教授，添招生，添设学系学程，扩充商业图书，添办暑期学校是也。

—摘自1924年复旦年鉴

二、复旦商科历年概况及今后计划

李 权 时

沿革 复旦创于民国纪元前七年，向重文理两科。民国六年，应社会之需要，乃创立商科，与文理两科鼎峙而三。其时国内各大学之设立商科者，尚属绝无仅有，可谓得风气之先矣。民国十年，商科学生日多，事务益繁，乃设商科学长一职，专司其事。商科修业年限定为四年。以灌输近代商业学理与经验，造就适于实用之商业专门人才为宗旨。

历年毕业生人数，由本科毕业得商学士学位者，已有五级：即（一）民十级，十五人；（二）民十一级，二十三人；（三）民十二级，十九人；（四）民十三级，四十一人；（五）民十四级，四十九人。前三级，皆习普通商业，而未分系也。分系盖自民十三级始。计民十三级毕业者，银行金融系二十六人，工商管理系

十五人；民十四级毕业者，银行金融系四十二人，工商管理七人。

历来商科实授学程之增添 民国六年度，商科实授学程四种而已。七年度，增添至八种。八年度，增添至十四种。九年度，增添至十八种。十年度，为十七种。十一年度，增添至二十五种。十二年度，为二十四种。十三年度增添至三十四种。至十四年度（即现年度），增添至四十七种。

现在学程及专系 商科学程，分为四种：即（一）大学必修科，（二）商科必修科，（三）专系必修科，及（四）各系选修科者也。专系之已开设者有五：即（一）银行金融系，（二）工商管理系，（三）会计系，（四）国内外贸易系，及（五）普通商业系是也。尚未开设者有二：即（一）交通运输系，及（二）保险系是也。学程数目：如（一）属大学必修科者，六种（内国文十六学分仅算一种）；（二）属商科必修科者，十七种；（三）属各系必修或选修者，五十种；共计七十三种。

现在商科教员人数 现在商科教员人数：计（一）专任商科学程之教授或与商科有关之教授二十五人；（二）助教二人。

现在商科学生人数之分配 今年商科学生人数之分配如下：（一）四年级，九十一人；（二）三年级八十八人；（三）二年级，九十人；（四）一年级一百十二人，共计三百八十九人，约占全校学生人数百分之五十也。

商业博物馆 商业博物馆，为今年所特创。主其事者，为童逊璦硕士。现暂分为二部：即（一）商品陈列部，及（二）商业图书部是也。图书部设管理员一人，另以免费生数人襄助之，图书搜罗，虽尚未富，然慰情聊胜于无。商品陈列部，已由童君搜罗中外商品数百种。将来一有机会，尚拟另筑精舍，大事扩充该二部也。

—摘自一九二六年复旦年鉴

三、银行学系概况

本校商科，创于民国六年，较国内各大学为早。第一任主任为蔡竞平硕士，在该时尚未分系，有之自民国十三年级学生始，银行学乃应运而生，其宗旨在灌输现代银行学识与贯彻造就现代之银行人材也。课程完备，在国内称绝无仅有，设备亦极完全，除商业博物馆、会计统计学练习室外，尚有为该系学生练习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以冀理论与实验并重；一时教授皆蜚然有声，民国十八年系主任，为李权时博士，现任主任为杨兆熊硕士。先后毕业该系者，有贰百余人，均极为社会欢迎，现在肄业尚有百念余人之多云。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

四、会计学系概况

本校商科创始于民六，其时国内各大学之设立商科学程者尚属寥寥。迨至民国十年，本科学生臻臻日上，益形发达，事务较繁，乃设商科主任一职，以司其事。现任主任钱祖龄硕士，以本系应社会之需要灌输近代会计学理论与经验，造就适于实用之会计专门人才为宗旨。开办迄今，历届毕业学生服务国府各机关及银行或公司中会计职务者、执行会计师事务者，比比皆是，足证社会需要本系人才之急。本系有鉴于此，对于各学程课本采选新颖，设备力图扩充，务求实用。在本校已经设备之会计统计练习室及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内实地练习务使学生肄业期满之后，得有丰富之学识和经验以应社会之需求也。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

五、国际贸易学系概况

李炳煥

国际贸易学系一向属商科，民国十八年秋，遵照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商科改为商学院，为便利行政起见，才有系主任负责。本系目的为造就国内外贸易专门人才。施教方针不特灌输学理，使学生毕业后不做书呆子，能够在商界活动。本系学生人数在商学院里面算最少，但他们所负的使命非常重大。我国国际贸易历年入超，金价愈涨，汇兑愈吃亏，而国防支付的债务也愈重。现在金涨银跌，进出口商受汇价不稳定的影响，牵连倒闭，时有所闻。英国虽然进口超于出口，但是他的无形出口——国外投资所得的利息、保险费、转运费——已够相抵。我国历年入超只靠借债弥补，势必破产。救济方法要从研究国际贸易着手。盼望本系师生本合作的精神，努力向前。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

六、工商管理学系概况

本校商科之设，始于民国六年，其时国内各大学设立商科学程者，尚属罕有，该科第一任主任为蔡竟平硕士，在该时尚未分系，及民国九年该科学生日多，于是有本系及银行金融学系之分。本系之设，其目的在养成工商界建设人材，灌输现代工商管理之学识与技术及培植现代劳资纠纷问题之仲裁人材，此等人材实吾国最近所急需者，故自本系成立以来，历届毕业生，大有供不应求之慨，统计前后已毕业者，共百八十余人。至本系设备上，完全与商科其他各系合办合用，有会计统计练习室、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及商业博物馆等，以便学生之实地练

习。自去年秋季本校改组分为文理法商四学院后，本系为商学院四系之一。

—摘自一九三〇年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

七、复旦大学统计学系旨要

近世以来，科学进步一日千里，生产方式根本变更。国家组织，社会形态，经济机构以及人类与各方面诸种关系均有绝大之变动。在此种变动过程中，统计关系一国之盛衰尤鉅，故各国均聚精会神，努力迈进，尽量运用科学规律，形成今日经济统制之世界。我国科学进步较迟，生产事业落后，以致经济枯竭，国难频仍。兹值全面抗战，群策复兴，培植青年，尤当根据本国国情及现时环境，俾能建立一适用于中国需要之人才。故本校设立一统计学系以期养成统计专门人才，俾对于中国之统计数字予以确切之搜集及整个之检讨，以作全国事业发展计划之初步准备或基础。

我民族正谋出路而跻复兴之途，其需要精密而有效之建设计划，当较任何国家为尤亟。然精密而有效之建设计划绝非建筑于想象及空论上者，必须运用科学规律而得之，精密数字以宏观事实作根据，故本校视统计与国家治乱息息相关，应养成专门技能与经验之统计人才以为国用。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715卷《课务类》

八、交通银行、国立复旦大学合办银行专修科合约

交通银行（以下简称甲方）及国立复旦大学（以下简称乙方）鉴于培植银行技术人才及业务人员之重要，双方议定合办银行专修科（以下称本科）订定合作办法如左：

一、在乙方内设立本科，其办法依照本约附件一之规定，由乙方负教育全责。

二、本科之课程由双方商定后呈报教育部备案。

三、本科第一年所需之开办费全部由甲方负担（共计贰拾陆万四千元）

第二年以后之经常费，于每学年开始前由乙方依照增加班次及物价指数之比例商得甲方同意，增加数额，并由甲方负担。

四、甲方所负担之经常费每年两次，于每学期开始前一个月拨付乙方，乙方于收到第一次拨付之经常费后，随即进行筹备开办，依照本约附件一规定之时期招生。

五、甲方自建学生宿舍一栋，宿舍内一切布置，设备全由甲方负责。

六、本科所需之教室、办公室及其他设备均由乙方供给。

七、乙方于每学年结束时，将一年间本科之经过情形（暨本年度决算）报告甲方。

八、本约有效期间暂定为两年，期满时经双方同意再延长之。

九、本约缮具两份，各存一份，自呈奉双方主管机关核准之日施行。

交通银行代表 钱永铭

国立复旦大学代表 吴南轩

附件一。

交通银行、国立复旦大学合办银行专修科计划纲要

宗旨 以培植银行之技术人才及业务人员为宗旨

经费 由交通银行与国立复旦大学订立合约，交通银行负担经费，复旦大学负担教育责任。其经费预算另订之。

招生 于三十一年度第一学期招收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生一班，计五十名，以后每年增加班次及名额，由双方于学年开始前商定之。

修业年限 招收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生。肄业二年，其课程另定之。

学生待遇 本科学生免收学宿杂费，但入学时须填具志愿书，声明毕业后有在交通银行任职之义务，银行有尽先任用之权。

附件二。

国立复旦大学、交通银行合办银行专修科科目表

甲 大纲

一、本专修科以培植银行之技术人才为宗旨。

二、本专修科招考新生以高中毕业生为限。

三、本专修科修业期定为二年，造就专才以适应银行界之急迫需求。

四、本专修科学生须修完本专科必修科目。

五、本专修科学生于必修科目之外，得选读本校银行学系之其他科目，惟每学期以二科目为限。

六、本专修科学生须修满九十学分方得毕业。

乙 银行专修科科目表

科目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国文	三	三		
英文	三	三		
经济学	三	三		
货币银行学		三	三	
统计学	三	三		
会计学	四	四		

普通数学	三	三		
财政学			三	
公司理财			三	
财产保险			三	
金融市场				三
银行会计			三	
银行法规			三	
银行制度				三
银行实务				三
国际汇兑				三
信托事业				三
农业金融				三
仓库学			三	
修选	五	二	三	六
打字（中文、英文）	不给学分			
珠算	不给学分			
计算机实习	不给学分			
共计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94卷《银行专修科目》

九、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附设统计专修科章程草案

第一条 本科定名为复旦大学商学院附设统计专修科。

第二条 本科以教授统计应用科学，养成统计技术人才为宗旨。

第三条 本科修业期限定为二年，须习完八十六学分方得毕业。

第四条 本科学额规定五十名，招收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等学校毕业生或具有高级中学毕业同等学力之学生，经入学试验及格者取录之。但同等学力取录人数不得超过总额百分之二十。

第五条 本科以三民主义、军事训练为共同必修学程。

第六条 除共同必修学程外，本科学生须习完下列必修学程七十四学分及选修学程十二学分。

(一) 必修学程七十四学分如下

应用国文	六学分
英文	六学分
会计学	六学分
经济学	六学分
货币银行学	六学分
工商管理	三学分
经济地理	三学分
民法总则	三学分
统计学	六学分
高级统计学	六学分
统计制图	四学分
社会调查与统计	三学分
统计应用数学	四学分
经济统计	六学分
统计实务	三学分
实习	三学分

(二) 选修学程于下列学程中选修十二学分

审计学	三学分
成本会计	三学分
财政学	三学分

国际汇兑	三学分
国际贸易	三学分
社会学	三学分
行政学	三学分
社会问题	三学分
国势调查	三学分
生命统计	三学分
生物统计	三学分
农业经济	三学分
保险学	三学分

第八条 本科分年课程表如左：

.....

第九条 本科学生必须于暑假或寒假往机关或工商场所实习并取得实习证明书，否则不得毕业。

第十条 本科力求与同性质之事业机关密切合作，其办法另订之。

第十一条 本科学生修业期满，考核品行优良，体格健全，学业成绩及格者，由本校给予毕业证书。

第十二条 本科学生经考取后，所有学宿杂费一概免收。膳费，制服费自备。

第十三条 本章程未经规定事项，均照大学规程第五章专修科规程办理之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九十五卷《商学院统计系科》

十、解放前复旦大学商学院概况

焦雨亭 沈承熔

复旦大学在1917年命名。当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欧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忙于战争，国外进口大量减少，英国减少了一半左右，法国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德国则陷于停止出口状态，虽然日本和美国乘机扩大对华贸易，但总的说来，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相对地有所减弱，从而减轻了对我国民族资本的压力，使民族工商业在这一时期内有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

上海地区是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当时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均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此外金融银行业，以及对外贸易、铁路、航运、采矿等也都有较快的发展。近代工业的兴起，必然要求有一批相应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理财贸易的专家，而这在当时国内是相当缺乏的。作为高等学校的复旦大学有鉴于此，及时注意到这方面的人才需求，积极致力于学科的改革，在原设综合性的文科、理科之外，增设了专业性的商科，为培育近代工商企业急需的管理人才创造了条件。这是当时国内高等学校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一般传统的办校方针，开设社会急需的应用学科专业，这确是高等学校发展史上一项重大的改革。

第一任商科主任为蔡竞平。1919年为了进一步把课堂教学与实习结合起来，由薛仙舟倡议，在校内筹建了当时欧美已有百年历史的合作事业——“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在校内和校外（江湾镇上）开设了营业部，由商科学生从事各项业务工作，使学到的课本知识用于实处，锻炼了学生实际业务能力。当时“国民合作储蓄银行”董事长由校长李登辉兼任，杜德荃、徐树声任顾问。第一任行长为薛仙舟，以后由李权时任代理行长，历任行长的有袁际唐等人。此外，还办起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全校的膳食，此亦为国内各大学的首创。既节约了食堂的管理费用，降低膳食成本，又做到主食和副食的搭配，花色品种繁多，适应来自各地同学的口味。李登辉校长对此颇为欣赏，常亲自与各桌同学轮流共餐，乘此机会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改善学校行政工作。李校长深入群众的办学精神，更足为全校

师生所敬佩!

1920年商科设国际贸易、工商管理二系。实授学程由1917年的四种扩充为十八种。1922年改设理财、商业二系，学程增设为二十五种，商业系学生仅13人，为全校人数最少的班级。商科师生虽然人数较少，但他们积极开展了社会活动，于同年5月1日创刊了《平民周刊》。遵照薛仙舟的建议，周刊的部分内容着重宣传研究合作事业。1923年后《平民周刊》改组为平民学社，在江湾新校舍附近创办了义务学校，帮助邻近居民学习文化，由商科学生尽义务教学。芮宝公、焦雨亭在学生时代曾担任过正副校长职务。这是一种为广大群众服务的爱国革命义举。

1921年商科发起成立了学术研究组织——“银行经济研究会”，翌年改称为“经济研究会”，吸收有志趣的学生在课余从事经济研究活动。这样，商科除了日常的课堂教学外，课余既有“合作储蓄银行”，又有《平民周刊》与“经济研究会”，使学生的课余活动丰富多采，做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经过各种活动，使学习进一步深化。

1923年李权时担任商科学长，对设系调整为银行金融系与商业管理系。二个系专业性较强的课程设置有会计学、高等会计、成本会计、铁道会计、审计学、统计学、投资学、保险学、工商心理学、公司理财、商业地理、商法、国外汇兑、财政学、商业文件、商业英文等。商业英文由余楠秋执教。是年商科学生共为389人，约为全校学生总数的50%。

1924年李校长离国去南洋休养，由郭任远任代理校长。商科继分系与设置比较完整的专业课程二项重大教学改革后，在李权时的建设性建议下，将原来的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学生修毕132学分毕业。全部课程分为大学必修课程、商科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各系选修课程。商科学生在入学二年中修完基

础课后，可根据个人志愿任选系别，攻读专业课程，提高教学水平。商科调整为五个系即会计系、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国际贸易系、商业系、实授学程增设为34种学科。

1926年由于商科的专业系符合社会的人才需求，商科入学的人数激增，当年人数最少的班级——商业管理系，是年入学者达71人，不得不分两个班就读。

1925年李校长回校，郭任远任副校长主持校政。是年因社会培训人才的需要，商科附设了“特商班”。

1928年10月复旦大学正式立案。

1929年秋，校部分设文、理、法、商四个学院成为综合性大学。李权时任商学院院长。商学院设三个系：会计系、银行系、工商管理系。1929年——1937年间，会计系由安绍芸、钱祖龄、谢霖、袁际唐等先后担任主任、代理主任，银行系主任为周德熙，工商管理系主任杨兆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江湾校舍大部毁于日本侵略军之炮火，学校与大夏大学一同迁至庐山，上课约两个月。其时校长吴南轩，商学院院长李炳煥，会计系主任钱祖龄，银行系主任李炳煥（兼）。

南京沦陷后，学校由庐山迁四川，先在重庆菜园坝借中学校址上课，时为1937年年底，一学期后迁重庆郊区北碚的嘉陵江对岸黄桷树镇上课。

1940年日军轰炸黄桷树镇，教务长兼《文摘社》社长孙寒冰惨遭炸毙。学校办公处迁至下坝，该地原系学生宿舍，有四栋平房，取名“博学斋”、“笃志斋”、“切问斋”、“近思斋”，改为教学主舍。四斋之间设一大礼堂，可容500人。

1942年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于右任题书校牌“国立复旦大学”，当时设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以商学院学生最多。商学院院长李炳煥，会计系主任张光禹，教师刘溥仁、

何士芳、钱素君、洪寿凌，助教桑士俊、高治宇，全增禧等，银行系主任吴其祥，统计系主任李藩，统计专修科主任邹依仁、芮宝公。

1943年章益任校长，教务长林一民，训导长陈望道，总务长芮宝公、江万平。在学校教室前两楼的“登辉堂”为学校的办公大楼，后又建“相伯图书馆”，下坝由陈望道命名为“夏坝”，意含华夏，音谐下坝。

学校内迁期间，滞沪学生大多转入其他院校借读学习。半年后鉴于留沪学生占全校1600人的大部份，遂在北京路中一大楼开课，因市尘嚣杂，又在淮海路西首找到临时校舍，并招收新生入学。嗣因当时法租界当局的阻挠，三迁至公共租界内的仁记路中孚银行大楼复课，最后在常德路觅定校址。这一阶段商学院的会计、银行二个系分别由袁际唐、朱斯煌主持。

1945年日本投降，举校欢庆胜利。

1946年春开始复员，全校陆续迁回上海江湾。秋季开学时，沪渝两地并校上课。商学院设置五个系两个专修科。院长为李炳煊。张光禹任会计系主任，周伯棣任银行系主任，陈仲明任合作系主任，沈筱忠任工商管理系主任，武育幹任国际贸易系主任。银行专修科主任为陈观烈，统计专修科主任为金国宝。

复旦大学自1917年创设商科至1929年改为商学院，教育逐步系统化。迄上海解放前后经历了三十二年，为民族工商金融经济事业，培育了大量理财经营管理人才，在民族经济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成了国内著名的理财专家，有一部份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复旦大学早在1917年就有鉴于民族经济事业的发展，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在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开始着手培育自己的商学专业人才，跟上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这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体现教育与生产建设相结合的先例。复旦商学院能根据国

内的需要，使教育紧密服务于经济事业的发展，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教育改革，同时在教学中贯彻学用结合的方针，始终注意课堂教学与课外实习研究紧密联系，丰富充实了教学内容，使学生毕业离校后就能在实践中熟练地施展才能，因而在工作中能积极地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适应经济事业发展的需要。历史事实证明，这是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一条极为重要经验。在今天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教育改革中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应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第六节 农学院各系科的形成和发展

一、农学院系科概况

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大部内迁至重庆，少部分师生留沪组成上海补习部。当时，四川由于大批人员涌入，加之战争的破坏，粮食、蔬菜、副食品供应极端困难。为解决粮食、农副产品生产供应问题，开垦边疆，一九三八年秋，复旦大学在重庆设立垦殖专修科，并附设农场。

一九三九年秋设立园艺学系，一九四〇年在垦殖专修科，园艺学系及农场的基础上，设立复旦大学农学院。

一九四〇年，为研究茶叶外销和产制技术，中国茶叶公司和复旦大学组成茶叶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由中茶公司和复旦大学各推代表二人组成，复旦大学校长为当然主席。双方协议设立茶叶组、茶叶专修科和茶叶研究室。一九四二年，茶叶组与垦殖专修科合并组成为农艺学系。

一九四六年，复旦大学农学院复员返沪，成为上海唯一的一所农业科学高等学府。一九四九年秋，在解放后的第一学期，

设立了农业化学系。一九四九年底，复旦大学农学院设：农艺学系、园艺学系、茶叶专修科、农业化学系及附属农场。农场分：作物部、园艺部、农产品制造部和畜产部四个部分。

农学院历任院长是：唐启宇(1940)、严家显(1941)、唐启宇(1942~1945)、严家显(1946~1948)、钱崇澍(1949)。

二、农艺学系

农艺学系设立于一九四二年。它的前身是设立于一九三八年的垦殖专修科和设立于一九四〇年的茶叶组。一九四四年茶叶组和垦殖专修科停止招生，农艺学系才开始转入研究农作物为主。

垦殖专修科目的目的是“训练垦殖之实用人才”^①。主要课程有：作物学、地质土壤学、农业经济、农业推广、肥料学、园艺学、植物病虫害学、垦殖学、作物学、畜牧学、森林学、测量学、农田水利、农业气象、农业合作及农企、农企调查及统计会计、农产检验及贸易、农产制造学、农具学、乡村卫生、乡村建设、边疆史地、英文、藏文或傣语、垦专半天上课，半天田间劳动，农忙全日劳动，无寒暑假，学生毕业后，按成绩派往各边疆垦殖区。

茶叶组的目的，“除造就茶叶技术上与业务上之专门人材”外，还要“促进茶叶之学术研究”^②。一、二年级修习农业基本学科，三、四年级除加习工商学科外，则致力于茶叶之实际研习，分制造与贸易两门，并从事茶场、茶厂业务实习。

农艺系一九四四年后，转为研究农作物为主，养成“适合各项改良与推广及建设新农村的高等技术人员”^③。主要课程有：植物学、动物学、农业概论、经济学及农业经济、植物生理学、气象学、土壤学、普通作物学、肥料学、遗传学、田间

技术、生物统计、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作物育种学、麦作学、经济昆虫学、稻作学、棉作学、农具学、特用作物、农场管理。

垦殖专修科历任科主任及农艺学系历任系主任是：李亮恭(1938~1940)、唐启宇(1941)、蒋涤旧(1942)、冯肇阳(1943)、蒋涤旧(1944~1945)、陈恩凤(1946~1949)。先后任教的教授有：李亮恭、唐启宇、蒋涤旧、冯肇阳、陈恩凤、苗雨膏、曹诚英、赵仁谔、龚畿道、马途周、蒋震同、徐天锡、张季高、姚传法、严家显、陈国荣、秦含章、王泽农、卢纯鉴、孙本志、孙章鼎、韩德章、孙祥复。

三、园艺学系

园艺学系设立于一九三九年。

园艺学系“设立之目的，在造就园艺经营与学理上之专门人材”^[4]。一、二年级学农业基本学科，并注意园艺基本知识及技术的学习，三、四年级除加园艺专门学科外，特别注意园艺特种问题的研究。主要课程有：植物学、动物学、农业概论、地质学、经济学及农业经济、植物生理学、气象学、土壤学、肥料学、蔬菜园艺、遗传学、园艺概论、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经济昆虫学、果树园艺学、花卉园艺学、园艺育种、观赏树木、园艺利用、造园学、农场管理。

园艺学历任系主任是：陈国荣(1940)、毛宗良(1941)、唐启宇(1942~1943)、毛宗良(1944~1949)。主要教授有：陈国荣、毛宗良、唐启宇、奚铭已、杨衍晋、钟俊麟、谭其猛、陈俊愉、周士礼、章守玉。

四、茶叶专科修和茶叶研究室

茶叶专修科是要“培养茶叶技术及业务上之专门人才，以

应国膏茶叶贸易及茶叶研究机关之需要”^⑤。茶专定制二年毕业，从一九四〇年开始招生，逐年加一班，至一九四六年结束。主要课程有：茶叶概论、经济学、作物通论、化学、土壤学、肥料学、植物生理、茶树栽培、茶叶制造、茶叶化学、茶叶贸易、茶叶检验、茶叶病虫害防治、遗传育种、茶厂实习。

茶叶专修科历任科主任是：吴觉农、胡浩川(1942~1943)、姚传法(1944)、王泽农(1946)、陈椽(1949)

茶叶研究室是研究茶叶产销的组织，研究员由茶叶组科教授及对茶叶素有造诣的人员充任。内分三部：一为生产部，从事茶叶产制之实验与研究。二为化验部，从事茶叶之分析与实验研究。三为经济部，从事茶叶经济行政及政策的调查研究。研究室附设实验茶场、茶叶化验室及茶叶资料室。

五、农业化学系

农业化学系是农学院最年轻的系科，成立于一九四九年秋。

农业化学系分三组：土壤组培养“能掌握土壤调查研究技术与理论，以谋土壤的改良及合理利用的工作人员”^⑥。主要课程有：作物通论、作物各论、森林学、农田水利、土壤物理、土壤化学、水土保持、测量学、植物化学、土壤地理、田间技术、土壤调查、土壤分类。

农产品加工组培养“能掌握农产品检验及加工之实际生产技术与理论的工作人员”。^⑦主要课程有：作物通论、畜产学、园艺通论、森林学、农产制造工程、农产加工通论、营养化学、农产品分析、农产品加工各论、农产酿造、畜产加工、林产加工、食品化学。

营养组培养“能掌握分析研究技术与理论，以谋合理保存和利用农产品的工作人员”。主要课程有：作物通论、植物化学、

园艺通论、畜产学、生理学、病理学、农产品分析、动物化学、营养化学、食品化学、维生素化学、饲料化学、酵素化学。主要教授：王泽农、吴钧和。

农业化学系系主任是：王泽农(1949)。

注释：

- (1) 见《复旦大学垦殖专修科章程》。
- (2) 见陈国荣《农学院成立经过及现状》。
- (3) 见《农学系设立旨趣及进行计划》。
- (4) 见陈国荣《农学院成立经过及现状》。
- (5)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九十七卷《茶专》。
- (6) 见一九五〇年毕业纪念刊《各系特点介绍》。
- (7) 见一九五〇年毕业纪念刊《各系特点介绍》。
- (8) 见一九五〇年毕业纪念刊《各系特点介绍》。

附录：

一、复旦大学垦殖专修科章程草案

第一条 本科定名为复旦大学垦殖专修科。

第二条 本科以训练垦殖之实用人才，从事垦区实地调查研究并计划经营垦殖事业之发展为宗旨。

第三条 本科暂设北碚，俟在川康边区觅得相当地点移设之，以便就地研究并开垦。

第四条 本科设主任一人，由本校聘任，承校长之命综理全科事务。

第五条 本科暂设专任教授二人兼任教授及讲师助理员等各若干人。

第六条 本科修业期限定为二年，每天半日上课，半日田间工作，遇农忙时并得停止上课，全日田间工作，无寒暑假。

第七条 本科所授科目如左表：

课程表

第一年	全年小时数
党义	二〇
国文	四四
作物学（附作物育种学）	一三〇
地质土壤学	五五
肥料学	三三
园艺学	八八
植物病虫害学	五五
农业经济	六八
农业推广	二四
家蚕及野蚕学	八八
英文或法文	四四
藏语或傣语	五五
总计	七九二
第二年	全年小时数
作物学	一三〇
园艺学	四四
畜牧学（家畜家禽养蜂养鱼）	八八
森林学	八八
测量学	四四
农田水利	四四
农业气象学	一〇
农业合作及农仓	四四
农业调查及统计会计	六四
农产检验及贸易	二〇
农产制造学	四四
农具学	一〇

乡村卫生	二〇
乡村建设	二〇
公文体式	一〇
英文或法文	四四
藏语或傣语	四四
边疆史地	二四
总计	七九二

第八条 本科学额暂定三十名，由本科就农科高中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或普通高中毕业而具有坚实体魄曾受军事训练者考取之。

第九条 本校各院系一年级学生如有志垦殖事业，经校长，教务长及主任之核准者，亦得转学，但以本科第一年级第一学期为限。

第十条 本科学生经考取或核准后，所有学习、实验、膳宿等费由本科供给，其他一切概归学生自备。

第十一条 本科学生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及格者，经本校呈报教育部后，发给毕业证书。

第十二条 本科为积极传播垦殖方法及推进垦区建设起见，得在川康各相当地点设立垦殖实验区。

第十三条 本科学生毕业后，按照成绩，得由本校派往或介绍边地垦殖实验区或其他垦殖农场服务或由本校设法辅助其直接实地经营垦殖事业。

第十四条 本校各院系毕业生如有志垦殖事业，经校长、教务长及主任核准者，将派往各垦殖实验区研究。

第十五条 本科除特定章程外，其他一切事项均依照本校章则办理之。

第十六条 本科各项办理细则另订之。

第十七条 本章程由校长核准公布施行并分别函呈教育部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及川康省政府备案。

二、国立复旦大学茶叶组及茶叶专修科办理概略

一、缘起：中国茶叶公司及本大学鉴于培植茶叶专门人才，改进国茶产制技术及扩展其国内外贸易之重要，于二十九年双方议定于本大学内合办茶叶组及茶叶专修科。

二、办理经过：二十九年秋季开始招生各一班，嗣后每年各增招一班。上年秋季双方同意暂停招生一年。

三、经费：双方约定第二年以后，该组科应需经常费用，应依照班数比例增加，除设备费及研究消耗部分全部由中茶公司负担外，其他各项由中茶公司负担三分之二，本大学负担三分之一，三十三年秋季各该系科费用，曾由中国茶叶公司拨付四二〇，〇〇〇元。

四、毕业生：茶叶专修科已有毕业生三班，茶叶组有毕业生一班，均由中国茶叶公司尽先选派工作。

五、现状：茶叶组现有二、三、四年级学生各一班，茶叶专修科现有二年级学生一班。

六、附设研究部分：双方约定成立有茶叶研究室一所，设有主任一人，研究员五人，研究助理四人，应需经费由中国茶叶公司负担。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97卷《茶专》

三、农学院成立经过及现状

陈国荣

在本院成立之前，关于农科方面，原有垦殖专修科及园艺系，附设于本校理学院。此外尚设有农场，供学生实习之用。

垦殖专修科创立于廿七年秋季，园艺系创立于廿八年秋季，农场与垦殖专修科，同时设立。去岁春间，本校代校长吴南轩，故教务长孙寒冰，前代总务长李亮恭，贸易委员会茶叶处长吴觉农、中国茶叶公司前总经理寿毅成诸先生，以中国茶叶学术之专门研究与专门人材之急需培植，拟在本校训练茶叶人材并创设茶叶研究室，旋经教部陈部长之赞许，及中国茶叶公司之资助，于本校创立农艺系，茶叶组及茶叶专修科，并以东西各国，茶叶研究，迄今尚未臻至善之境，且中国茶之栽培制作贸易诸端，尚无改进，故同时创设茶叶研究室作进一步探讨。

自此以后本校内农科方面，计有二系及二专修科，茶叶研究室及农场，农学院之规模渐次形式。至去年九月，学校遂准教部，设立农学院，兹就本院各科系之现状，约略说明于后：

（一）农艺系茶叶组

本组之目的，除造就茶叶技术上与业务上之专门人材并促进茶叶之学术研究。

一二年级修习农业基本学科，三四年级除加习工商科学外则致力于茶叶之实际研习，分制造与贸易两门，并从事于茶场茶厂业务之实习。本组现有一年级学生一班，共计三十六人。

（二）园艺系

本系设立之目的，在造就园艺经营上与学理上之专门人材。一二年级修习农业基本学科外，并注意园艺基本知识及技术之学习，三四年级除加园艺专门学科外，并特别注意园艺特种问题之研究，本系现有一年级及二年级学生两班，一年级十人，二年级八人，共计十八人。

（三）垦殖专修科

本科以造就理论与实际并重之垦殖人材为宗旨。二年毕业。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注重实际工作，每日上午学课，下午实习。其课程第一学年特别注重农业基本学科之学习，后一学

年则加习垦殖有关之农业、经济以及社会、政治诸学科。本科第一班已于去年毕业，计二十人，现均服务于各垦殖及农业机关。第二班将于今夏毕业，计廿五人，第三班为一年级学生，计十一人。

（四）茶叶专修科

本科在急应当前茶叶经营上之需要而设。两年毕业，目的在学习一般茶叶之知识与技术，俾先从事技术上之工作，本科现有一年级学生卅人。

（五）茶叶研究室

本室为研究茶叶之组织。研究员以茶叶组科教授及与茶叶素有造诣之人员充任。内分三部：一、为生产部，从事茶叶产制之实验与研究。二、为化验部，从事茶叶之化学的分析与实验研究。三、为经济部，从事茶叶经济行政及政策之调查研究。研究室并附设实验茶场，茶叶化验室与茶叶资料室。

（六）农场

本院农场之设立，其目的在：一、供农学研究与栽培试验；二、供同学之实习；三、为提倡生产，养成同学劳动精神。本场分四部：一、作物部，从事各种作物之研究与栽培。二、园艺部，从事蔬菜果树苗圃花卉之研究与栽培。三、农产制造部，从事各项农产品加工之研究与制造。四、畜产部，从事畜产之研究与经营。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1764卷

《复旦大学校友节特刊》

四、复旦大学农学院十四年

复旦大学农学院正式成立时间是1940年秋，但在此之前两年，即1933年秋，就创设了农垦专修科，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

整，农学院离开复旦大学（农艺、园艺、农化三系迁往沈阳成立沈阳农学院，茶叶专修科去安徽农学院），其间历时整整十四年。在复旦大学的八十年历史中，农学院的十四年是短暂的。但这十四年，正是我们祖国“五洲震荡风雷急、天翻地复慨而慷”的历史时代。回顾这十四年历史，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1938~1940年的筹建阶段，1941~1946年的成长阶段和1946~1952年的发展阶段。毕业生人数根据现有材料从1942年算起，至1952年共毕业学生421名（缺垦专一班），随院迁至沈阳的农艺、园艺、农化三系1952届学生共117名，历任教师共99名（据1942~1950年6月历届复旦大学毕业同学录、通讯录统计，实际人数有出入）。

一、筹创初始（1938~1940）

抗战开始后，复旦大学先迁至江西庐山，不久又辗转至重庆北碚黄桷镇。当时，国民党政府退避西南，后方人口骤增，粮食问题严重。国民党官僚在加重对农民剥削之余，就想出委托大学短期培训农垦人员垦殖边疆增产粮食的办法，于是学校在1938年下半年聘请原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院长李亮恭来校，筹建二年制垦殖专修科，这是复旦农艺系，也是农学院的最前身。垦专第一班招学生20余人，实行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的半工半读制。与此同时，学校在下坝（后改名夏坝）购买农田、荒坡约200余亩，通过学生劳动，开辟成复旦大学农场。后来复旦新建校舍，就是建立在这个基地上的。

在李亮恭的主持下，陆续聘请王泽农、陈国荣、秦含章、何家泌、曾昭明等教授到校执教，并兼任农场各部领导工作。1939年秋垦专招第二班学生近20名。经过艰苦建设，农场分设农产品制造、畜牧、作物等部，兴建了一批房舍，陈国荣兼农场主任。农场产品除粮、菜、瓜果之外，还有酱油、羊奶等。酱油是采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旧法酿制的，称“复旦白酱油”，

品质特佳，产量迅增，在重庆一带颇负盛名。

1939年秋，又创办了园艺系，陈国荣首任系主任，首届招收学生15名。这时，因为系科尚少，还不能正式成立农学院，园艺系和垦专暂隶属理学院。

1939年末，当时的中国茶叶公司协理吴觉农，与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洽谈在复旦设立茶叶系事。当时复旦仍为私立，办事比较迅速，孙教务长也极为赞同，积极推动筹备工作。不幸，孙教务长于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复旦时罹难。此后于1940年9月，决定由中国茶叶公司拨款9万元作为开办费，委托我校办茶叶系及茶叶专修科。但国民党教育部对茶叶教育认识不足，认为茶叶只是一种作物，没有设系的必要，只允许成立茶叶组，由吴觉农教授任主任，并由胡浩川教授主其事。

至此，复旦大学共设立了垦殖专修科，园艺系及茶叶组本科和专科，遂合并这些系、科正式宣告成立复旦大学农学院，由李亮恭首任农学院院长，复旦由原来的四院发展为文、理、法、商、农五院并列。

从1938年至1940年这个复旦农学院筹创初期，物质条件是很差的，茶业组的建立为农学院以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当时中茶公司的投资较多。茶业组规模较大，除四年制本科和二年制专科外，还设立了茶业研究室，由姚传法教授主持，内分栽培、化验、茶叶经济和茶叶历史四个组，以及一个茶叶资料室。在夏坝北端、滨临嘉陵江建造了一批房屋，与文摘社相邻。这是当年复旦一批质量较高的建筑。

二、艰苦成长（1941—1946）

农学院于1940年正式成立后，系、组有些变动，1941年成立四年制农垦组，垦专停办。1943年农垦、茶叶两组联合成农艺系；1944年农垦、茶叶两组停止招生，改以农作物为主的农艺系招收新生。茶叶专修科招了四届学生，以后就停办了

(1946年回沪后恢复招生)。园艺系从1942年起,茶叶组从1943年起就有了首届毕业生。因为有些垦专学生后来又转入本科,所以毕业期提早了。这六年,各系科的学生都相当少,最多的一班是茶业组1944级共30人,其余各班级仅数人或一、二十人。

李亮恭院长任职至1941年9月,后由唐启宇教授继任。

1943年春唐离任,由毛宗良教授代理院长职务;曾拟聘冯肇传教授接任院长。但冯未莅任即病逝。1945年秋由严家显教授接任院长。

这几年中,学生人数虽少,院长又数易其人,但各系科主任比较稳定,教师不断增加。园艺系首任主任陈国荣教授,1942年毛宗良教授接任系主任职,直至1952迁院。园艺系茶叶组先是吴觉农、胡浩川教授主持,1943年起由蒋涤旧教授任农艺系主任;1946年秋复员回上海后,由陈恩凤教授任系主任职,直至迁院去沈阳。农场主任职务于1941年由奚铭已教授接任,至复员上海,农场有技士蒋泗生、冯菊恩,技佐杨念慈等。各门基础课及部分专业基础课由文、理学院担任,农学院各系科还陆续聘请到许多专业教师,除上面提到过的教师外,主要还有钱崇澍、曹诚英、杨衍晋、汪发、毕相辉、刘庆云、范和钧、韩德章、孙祥复、李积薪、李象元、柯象寅、苗雨膏、叶知水、钟俊麟、谭其猛、陈俊愉、龚畿道、罗绳武、王肃雍、张志澄、朱克贵、马世均、张敬熙、朱世泽、郭颂仁、章祥官、朱乃洪、王方维等。当时,北碚已成为一个不小的文化区,除一些学校外,还有不少研究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地理研究所、中央农业试验所等。这些研究所的许多著名研究人员,都到复旦理、农学院兼课,如钱崇澍、曲仲湘、童弟周、伍献文、裴整、张孟闻等教授,都在农学院开出不少重要课程。所以当时农学院的专任教师虽还较少,兼任教师却很多,这对农学院的成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农学院建院初期，师生中虽多数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但参加政治活动不多。不过师生中已有一些我党组织派来的地下工作者，如毕相辉、朱克贵老师，方长茂（地下党员）、左纪谷、于学业等同志，进行了一些隐蔽活动。1941年我党动员许振球（现名许练沙）同志考入茶叶组。后在班内组织了《农友读书会》，并逐渐扩大到下面两个班级，除读业务书作读书报告外，还组织报告会、讨论会。

1943年秋，袁永宝同志考入园艺系，他的到来在农学院进一步撒播了革命种子，学运工作有了发展。他到校后先后结识了顾金德、袁识先等同志，在他们的启发、帮助下，一些同学逐渐提高了思想觉悟，关心时事。他们还常与校内一些民主进步教授接触，如钱崇澍、裴鉴、方令孺、章靳以、杨銜晋、张孟闻等。

这期间，农艺系有农友读书会，园艺系尚无组织，他们就利用园艺系系会的《绿园》壁报（“壁联会”成员），在学术性动态报告中，适当加入了一些有政治倾向的文章，借以与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展开辩论，揭发批判。他们遵照周恩来同志“勤于学、勤于业、勤于交友”的教导，在系内开展交友活动，系外参加“系联会”、“青年民主同盟”等进步组织，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获得了良好效果。

1944年秋冬日寇接连攻陷桂林、柳州、直抵独山，贵阳危急，重庆震动。蒋介石惊惶失措，企图继续西逃。重庆各界哗然，纷起反对，我校进步社团、师生积极反对西逃。洪琛教授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打游击的动员报告，在农学院也进行了一次进步与反动势力的交锋。当时国民党借此到各大学征集学生参加青年军。为反对并揭露这个阴谋，在农学院有袁永宝、顾金德等同志联络平时接近的师生进行各种形式的座谈，提出

如果日寇到重庆，大家就上山打游击，不应再逃亡，他们还为打游击做了一些具体准备。1945年初夏，袁永宝、顾金德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暂时离开复旦奔赴中原解放区。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我国八年抗战至此胜利结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展开了新的更尖锐的一页。1946年春国民党利用张莘夫事件煽起反苏游行，农学院也有些同学上当受骗去参加了。游行回来，学校进步社团《谷风社》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诡计，特务学生恼羞成怒，揪住谷风负责人农艺系学生庄明三，到校门前旗杆下罚跪。进步同学愤怒抗议，洪琛教授正义干涉遭石击，农学院陈恩凤教授卫护洪琛也遭袭击，这就是有名的谷风事件。

1946年5月，为复员上海，学校提早放假，全校师生陆续分批东返。先是严家显院长和院办秘书程服静赴沪系联迁院事宜。当时曾有将文、农两院迁无锡大雷咀太湖之滨新建之议。后未果。

三、发展壮大（1946—1952）

抗战胜利复旦回到上海，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农学院离开复旦大学，这是复旦农学院发展壮大阶段。这六个年头，还应以上海解放为界分成两个时期。解放前，复旦农学院的教师队伍和民主进步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愈益残酷。农学院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不仅得不到改善，还受着反动派的进一步摧残。当时农学院只能以旧校园北端隔开一条小河，原为日本人贮粮养马的破院舍作为院址，拨来的一点美国战争剩余物资成了农学院的宝贵财产。反动派不顾民生，疯狂发动内战，根本谈不上发展教育事业。学生毕业没有出路。学无所用，入学学生年年减少。如农艺系1949届（1945年入学）有学生33人，1950届为17人，1951届进一步减为14人；园艺系49届为27人，50届为12人，51届仅7人；茶专1950届（1948年

入学) 仅有 5 人。解放后, 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 首先迁移了院址——搬进了原女生宿舍二层楼房, 逐渐建设了各种实验室, 新创办农化系, 师生人数迅速增加。如农艺系的专任教师从原来的 9 位, 至 1951 年增至 17 位, 学生数也比解放前多了三倍以上。解放前后对比十分鲜明。

从复旦回上海至 1949 年解放, 农学院院长是严家显教授。解放后, 1949 年 8 月 1 日复旦成立校务委员会, 并宣布五院解放后的首任院长, 农学院院长是钱崇澍教授。1950 年 10 月钱老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院长职务由钟俊麟教授接任, 直到院系调整。1946 年秋茶叶专修科恢复招生, 由王泽农教授兼科主任, 并聘了陈椽副教授。农艺系主任为陈恩凤教授, 回沪后聘请赵仁谔教授及陈兆驹、张学信、陈新和等老师; 解放后又增聘徐天锡、吴友三、蒋震同、张季高、吴华宝、蔡无忌教授及钱德杞、张伯泉、韦石泉、陆欣来、戴宗廉等老师。园艺系主任为毛宗良教授, 陈俊愉副教授 1946 年赴丹麦留学后, 聘请周士礼教授授花卉园艺学, 1948 年冬周教授离校参加革命, 聘章守玉教授继授花卉、并聘请宗维城、李志澄、刘昉勋等老师来系, 解放后又增添洪建源、朱有钰、邓明琴、王缺、陈守良、林福娥等老师。农场办公室主任为严宙耕, 新增技士袁祖培、蒋希岳、袁识先、吕玉澄等; 农场分设作物、果树、蔬菜、加工、畜牧等组, 还有一大花卉温室。1949 年解放后, 农学院增设农业化学系, 分农产加工、土壤农化、生物化学三个组(专业), 王泽农教授调任农化系主任, 教师有吴钧和、徐宗稼、姚归耕、唐耀先、计显焜、冯贻燕、周维、马麟祥等。茶专主任由陈椽副教授继任, 并聘来庄晚芳教授及菅永真、周海龄、王明渊等老师。

农学院复员上海后师资队伍的强大加强, 一方面是在重庆时原为兼任的教师, 这时相率转为专任; 另一方面上海学术研究

机构多，也就有条件聘请到更多的教师。回沪后讲师、助教级教师也不断增多。这些正是复旦农学院逐渐发展壮大、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了不少人才的重要保证。至此农学院的师资队伍已经基本完整。学术水平还是不错的，反映在毕业生富有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今天大都成为各部门、单位的骨干或领导。当然这些成就也与复旦的传统精神及历次学运密切分不开的。

在重庆的最后阶段，农学院的进步骨干已有增加。回到上海后革命力量迅速增强，并建立了地下党组织，这与袁永宝、顾金德等同志回校复学关系密切。这时期许多学运活动都是全校性的，农学院都参加了。如1946年底全国性的抗议美军暴行，1947年红五月暴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抢救教育危机”、“九龙事件”的反帝游行，全市地下学联发起的捐募寒衣运动，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1949年的“护校储粮应变”等运动，学校的各次抗暴罢课斗争，声援南京“五二〇血案”，抗议反动派残害浙大于子三事件，支持同济大学进京请愿的“同济事件”以及各次援救被捕同学的斗争等等。其中，1947年春学校开展的学生自治会竞选斗争，与农学院关系更为密切。这次斗争非常激烈，我校核心组织决定联合全校各进步社团公开成立“五院联合竞选团”，与三青团等反动社团联合的“不谈政治竞选团”相对抗。联合竞选团的候选人是预先经各进步社团协商并由校核心确定的，农学院参加候选人有园艺系袁永宝、农艺系洪传珏、茶专卢妙英三同学。由于进步社团的群众基础雄厚，核心组的宣传组织工作充分，选举的第一天全校大部中间学生都投了联合竞选团候选人的票。敌人见势不妙，第二天一早就在大草坪贴出醒目大标语，说袁永宝是“李先念残部，想控制学生会，已畏罪潜逃”等等，进行破坏。校核心为揭穿敌人阴谋，不使竞选横生枝节，决定让袁永宝公开

出来辟谣。永宝同志勇敢地登上广播台大声说：“你们不要造谣，我袁永宝在学校”。之后为防止敌人加害于他，即由顾金德同志掩护撤离了学校，后来去了东北解放区。这就是学生自治会竞选中的“袁永宝事件”。

到1948年夏，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农学院团结在党周围的师生队伍不断壮大，党员也增加到六、七人。尽管有些党员和骨干已暴露不得不先后撤退去解放区，如金雪南、鲁在玉、钟在雍、金皓等，但农学院的队伍在党领导的学运中得到了锻炼成长，不仅党员人数增加，骨干队伍也成倍地扩大，在全校的学运中成为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1947年11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成立《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以便通过学术研究，举办展览、文娱联谊等活动，在农业界广泛团结进步和中间力量。经复旦农学院地下党小组顾金德、施宗仁等同志联系、决定成立中农社复旦分社。1948年元旦开中农社复旦分社成立大会，有社员近60人，约占农学院学生的1/3。会上选出七名同学组成理事会，决议出版“社讯”，办专业图书馆。成立农经、农机、花卉、蔬菜等科学教研组，请有关教授当顾问，并组织剧团、舞蹈、球队等组织。在活动中有意识地穿插政治内容，工作开展极为活跃，颇得人心。1948年4~5月，为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造成农村凋蔽等罪行，批判其反动农业政策，中农社在复兴公园举办了大型农业展览会，复旦分社积极响应参加，还每天派约30名同学担任讲解。由于设计周密，有关政治内容大都巧妙分散结合在各展品部分，故反动当局虽感觉政治气氛浓厚，也无法大加删削了。10月复旦分社再次参加了总社在复兴公园组织的菊花展览会。解放后，中农社在新形势下开展了新内容的工作，1950年春在原跑马厅旧址举办了上海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业展览会，复旦农学院几乎全部师生都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为宣传新中国社会

主义农业前景作了贡献。

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提高了全校、全院师生职工的思想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潮，更积极自觉地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和教改工作。解放前，农学院的多数同学看不到中国农业建设的前景，学习上情绪比较混乱；解放后全院师生在教和学的情绪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教学观点和方法得到了改进，都以高度的热情进行教学，创造着先进的教学经验，并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而迈进。

全院师生积极参加了解放后的各项政治运动。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高教处派农学院教师袁识先同志（经章益校长留任农场工作）任复旦大学军代表的联络员。农学院还有陶希镛、史幼珠等同学学习后赴某些单位任联络员。参加随军南下的农学院党员有尉学温、周雄韬、陈翊善同学。参干运动一开始，就在我院农艺系树立了全上海青年学生的光荣榜样——陈豹略同学解决家庭问题的典型事迹，农艺系响应和报名参干的人数百分比是全校第一。实际被批准出发的共22位同学，占全系人数的百分比也是全校第一。园艺系报名参干的同学29位，茶叶专修科有13位。在其后的镇反、三反、五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反轰炸、宝山抗灾救灾等活动中，全院师生更不断提高了思想觉悟，尤其是1952春的思想改造运动，全院师生受到深刻教育，为最后的院系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

解放后，全院师生还参加了许多专业业务活动，如1951年春茶专师生去浙江平水地区参加绿茶改造红茶的工作；1951年暑假农学院大部师生参加了规模宏大的山东省农村经济调查，与兄弟院校师生并肩战斗两个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52年9月，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决定，复旦农学院除茶专并入安徽大学农学院外，农艺、园艺、农化三系师生全部迁至沈阳成立沈阳农学院。先是东北人民

政府农业部副部长张克威同志亲至上海,介绍情况,进行动员。在已有的思想改造基础上,绝大部分师生群情昂扬,意气风发,决心为开发祖国东北宝库、发展东北的农业建设事业而贡献力量。经过紧张的准备之后,三系师生员工家属,携同有关图书、仪器、设备,于1952年9月19日傍晚登上专车,告别大上海,飞渡长江、黄河、华北大平原,20日越出山海关,于21日清晨抵达沈阳。从此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下,浑河之滨,建立了新的沈阳农学院,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迁皖部分,先是到芜湖并入安徽大学农学院,后来农学院又迁合肥独立建院,茶专改建为四年制的茶叶系。自1940年复旦创设茶叶组、茶专起,延续至今,成为全国历史上最老的茶叶专业之一,对于我国茶业教育和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经验体会

复旦大学创办农学院,先由办农场和垦殖专修科开始,逐步从小到大,后经院系调整,为了充实东北地区农业教育,主体调到沈阳,创办沈阳农学院,一所独立的高等农业大学,目前成为这个地区的重点高等农业院校。

复旦大学办农学院,从1938年办农场和垦专算起,到1952年9月调离上海,共14年;再从创办沈阳农学院到1985年,将近33年,这使我们有可能,也是一种应负的责任,比较一下在复旦大学时的情况和单独建院后的情况,然后提出一些今后办学应当遵循的道路,是很必要的。

综合性大学办农学院有什么好处呢?一是有利于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主要是通过结合实践而达到的。例如搞遗传科学的教师要和育种结合,搞地理科学的教师要和土壤、农业经济结合,搞经济科学的教师要和农业生产、加工、运销结合等,以利接触实际,广开思路,理论密切结合实际,从而收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二是有利于改善和美化生活环境。复旦大

学搬到四川北碚夏坝，为了建设需要，先辟农场，开办农垦专科，接着办茶叶、园艺、农艺系，还搞农产品加工。其中茶叶是至今全国七个专业中最早成立的一个，当时就为发展我国优良饮料的生产，外贸作出了贡献。还有美味的“复旦酱油”，在夏坝时期，也颇为人所称道，首先服务于本校师生。美化生产环境的需要，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园林绿化，更是农学院师生的专长。三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师资、图书、设备的潜力。其中特别是师资潜力的发挥，对农学院产生很大的作用，将于下面述及。

另一方面，农学院单独办理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俗语说得好，“宁为鸡首，勿为牛后”，单独成立农学院，确有不少好处。由于经费独立，独自办理，在发展上比较方便，比较快，能够较多地培养高等农业科技人才，在我国农业科技人员缺乏的今天，确有需要。但正由于我国各种科技人员普遍缺乏，合格而水平较高的师资更加缺乏，其中基础课程的师资，必须由综合性大学输送，更感不足，至于骨干教师那就奇缺了，以致农学院基础课程的教学水平远远不及综合性大学。正由于基础课水平差，一步差步步差，影响整个教学质量。在国内除极少数几所老的农学院，成立时间较长，基础课教师稍强外，其它新成立的农学院都是这样，成为不可克服的困难！

不仅如此，访师问友，广闻博证，进行多学科的学术交流，能够达到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目的。对于专业教师来说。在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通过多方面接触，耳濡目染，大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不然的话，长期处在孤陋寡闻的环境，耳目闭塞，终必落后。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主要系之于教师的学术水平，所以独办农学院的缺点是根本性的，又是不能克服的。至于图书设备在经费可能的情况下，还可充实而缩小差距，但也不可能达到和综合性大学相等的地步。

因而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办学经验，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农学院应当尽量办在综合性大学内，而综合性大学也以能办农学院较为有利。

复旦大学农学院院史编辑组：

鍾俊麟 陈恩凤 王泽农 章守玉（下按笔划为序）
王方维 方长茂 邓明琴 左纪谷 冯菊恩 朱世泽
刘昉勋 何耀曾 陈广福 李志澄 张敬熙 张伯泉
周久钊 周雄韬 杨念慈 洪传珏（姚敬） 洪建源
陆欣来 袁永宝 袁识先 袁祖培 顾金德 许济川
许振球（许练沙） 章祥官 程服静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

第七节 教学特点

一. 致力培植经济发展和社会亟需的实用专门人才，创设一批应用学科专业

一九一七年，复旦扩充为大学后，密切注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注重应用学科建设。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商业发展以及国际“商战”时代上海民族工商业对商业人才的需求，在国内首创商科。二十年代，商科迅速发展，一九二四年商科学生人数占全校学生总人数三分之二，系科扩充为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国际贸易系四个系。此外，二十年代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复旦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学系、法律学系、市政学系、教育学系、土木工程系。

三十年代，复旦大学提出：“提倡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认为“纯科学的研究，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研究，在大学中诚然也占有一个位置，然而，我们学校将特别重视国家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以后当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实际的问题，而不专崇尚经院式的理论研究”。^[1]统计系、统计专修科、茶叶专修科相继成立。四十年代又建合作学系、银行专修科、农艺学系、农业化学系。这些系科中，商科、市政学系、统计学系、统计专修科、合作学系、茶叶专修科属国内首创。至一九四九年，茶叶专修科还是国内培养茶叶方面人才的唯一高等学府。

创设经济发展和社会亟需的应用学科专业，使复旦受到了工商实业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得到许多捐助和投资用以延聘高水平的教授、建筑校舍、添置仪器及图书设备。象茶叶专修科、银行专修科则主要由实业部门投资兴办。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民生凋蔽、生产落后、科学不发达，许多理论学科的学生“毕业即失业”，在社会上没有出路。但是，应用学科由于经济部门需才殷切，复旦大学土木建筑、会计学、银行金融等系科的毕业生往往“供不应求”。^[2]这样，复旦的应用学科专业吸引了一大批学生。一九三八年，投考复旦的学生与被录取的学生为九与一之比，超过国立大学统一招生的标准。由于学生投考人数比较多，一批高质量的学生被挑选进入这些系科。

复旦的应用学科专业由于吸引了实业界的捐助和投资，有一批较高质量的教授和学生，加之创办较早仪器设备比较齐全，短期内这批专业就享誉国内。这就使复旦大学在当时国内公、私立大学中能独树一帜，形成自己办学的特色。

二、重视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教学，扩大学生知识面，努力使学生做到“博大精深”。

复旦公学时期就十分强调国文、英文、数学的教学。扩建为大学以后，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二、三十年代又把国文、英文、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课列为全校各系科的必修课。国文课不仅要求学生要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而且规定每周须阅读课外读物，作报告两篇，每篇五千字以上。每星期作文一次，教授逐字逐句批改，务求通顺，较差者给予个别指导，较佳者则存图书馆，介绍各报副刊。学校出版《复旦》期刊，登载同学佳作。学校认为“英文为精究西方文化之必需工具，如不能融会贯通，则在治学上发生极大困难”。每个复旦学生均须经严格英文训练，成绩及格，方准毕业。学校规定，凡国文、英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课有特长者，可获得奖状或奖章。除全校必修课外，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均规定有本院的必修课，各系有各系的必修课。所有这些课程，学校都严格组织考核，精选知名教授讲课，使学生在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以“筑强固不拔之基”。³¹

一九二四年复旦大学实行“学分制”，鼓励学生自由选课，以扩大知识面。学校充分尊重学生的选课自由，提供选课机会。一九三〇年选读教育哲学者仅五人，选读高等数学、组织学者仅六人，选读法国革命史者仅四人，选读市预算者仅八人，学校都照常准予开班。一九三〇年，全校开出的课程“共有二百六十余种，课程之多，为上海各大学之冠”。³²三十年代，复旦大学实行主修辅修制，规定学生除主修系外，须在辅修系修满一定学分方准毕业。如规定市政学系须以土木工程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或社会学系为辅系，在其中修满二十学分。这样，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二十年代，复旦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考核就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凡考试作弊者均应开除学籍。三十年代以后，规定考试分期中考试，学期大考、毕业总考及临时考试四种。期中考试，学期大考、毕业总考由教务处定期集中举行。《嘉陵江日报》在《复旦考试种种》一文中，描述了复旦的考试：

“复旦的考试在国内各大学里，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凡是来复旦参加过入学考试的，没有一个不说：‘复旦的考试真严厉’。

复旦每学期考试分为两次，一次是期中考，一次是期终考，或称大考，两次考试都是采集中制，全校两千余同学都集中在大礼堂参予考试，不准夹带不准偷看，违者记大过一次，扣三学分。所以在复旦，莫说研究、商量，就是头稍微一转动，当时就记你一大过，扣三学分，所以复旦同学进了‘考场’，绝大多数能遵守考试纪律。

考试的时候，教务长那一幅铁也似的面孔，真是令人骇怕，上课号一吹，象狮子吼‘不要说话’，从他喉头里发出来的声音，响彻全场，闹轰轰的声音马上静下来。

考场中的严肃，并不把同学们的生活弄得严肃刻板，相反地，他们一出考场，仍然象生龙活虎一样。复旦考场内外，贴着三、二张令人怵目惊心的标语；‘复旦、复旦，过去的光荣，未来的灿烂，同学们，在今天尊重自己，爱护复旦’。逢考试的时候，它便映进了同学的眼帘。……。”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复旦的校训之一，它代表了复旦提倡的治学精神。由于复旦注意基础理论教学，同时允许学生自由选课，并且进行严格的考核，使学生能较牢固掌握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有较宽的知识面；因而二十年代开始，复旦学生即以成绩甚优、享誉国内外。二十年代，复旦学生进入美国“加尔福尼亚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士丹佛大学、伊利诺大学、哥林比亚大学等都不须怎样考试……。入了学都和其他大学学生一样，不见得有所不如。由此，许多大学便承认了复旦的地位，凡复旦的学分一律可以承认”。¹¹三十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利物

浦等五所大学就“以复旦在东南极有声望，学生程度甚佳”，“准予优待免试入学”。^[6]在上海及重庆各高校国文、英文演说竞赛中，复旦的学生也多次夺魁。

三、注意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复旦大学的另一校训。长期以来，李登辉校长多次阐明和维护了这一校训，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把个人原有潜伏能力导之，使之能充分地发展”。^[7]“独立是不依赖的意思，我们给学生以种种练习，目的不是要他们把书中所载的或教师所授的知识，一件件记牢，而是重在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8]他还认为：“在学校里的独立，就是在社会里独立的基础，社会里分子能够独立，才能有进步的国家。凡一个教师，倘能引导学生为独立的思想者，独立的劳动者，他可真正称为造福于社会了”。^[9]这些二十年代末的论述里，李登辉校长就把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意义、办法及对教师、学生的要求阐述得十分清楚了。

章益校长在三十年代解释办学方针时也说：“复旦向来的办学方针，就是没有方针的方针，换句话说，就是听任同学自然发展、自由研究、学校不过供给一个优良的环境，让各人尽量发挥各人的天才，所以往往在商学院的学生，会变成一个制造家，而成为文学家的，却不一定来自文学系。”^[10]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新生指导会的演说中，他还说：“学校当局认为你们已经是一个成人，一个成人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否则如终日督促着你，那么四年之中，必造成大批奴隶；然而我们复旦大学当局希望的是造就大批‘自由人’”。^[11]

为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复旦大学于一九二四年实行学分制。学分制规定：“每学期中，每星期授课一

小时，作一学分，又或实习一小时或二小时，亦作为一学分。每星期每生至少须授课十六小时，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一小时。”“每生除国文及体育外，须习满一百廿八学分方准毕业”。^{〔12〕}学校认为：“此制最符合教育之原理，盖学生对于本科必修学分读完之后，得随意选择他科课程，各随所好、求合所宜。”^{〔13〕}

教学过程中，学校十分重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重视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一九二六级心理学院学生在谈对学校教学体会时说：“我们修学方式，可以说完全与众不同，试看我们修学手续，不是在课堂里数讲义的页数，却是在图书馆里念参考书，不是讲坛下做背诵的工夫，却是在讲坛上作报告。除了这些文的学问之外，还有些武的学问，试验室是我们演艺馆，试验器是我们的双锋剑”。^{〔14〕}早在二十年代，商科就注意到“为使学生毕业后不做书呆子，能够在商界活动”，^{〔15〕}就在商科设立了会计室、统计室、组织合作银行，供学生实习。三十年代，新闻系设通讯社，建新闻馆，使学生有实践机会。统计专修科规定：“本科学生必须于暑假或寒假往机关或工商场所实习，并取得实习证明书，否则不得毕业”。^{〔16〕}农艺系规定：“学生须在派定地点作二暑假之农场习作，其成绩不及格者，不得毕业。”^{〔17〕}此外，学校理工各系均设有实验室，经常安排参观、实习，野外采集标本等活动。文科还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办义务小学，进行法律咨询活动，使学生有机会理论联系实际，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社团和学生的课外学术活动，由于学校提倡，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学校学生课外学术团体非常活跃。各系的课外学术团体有：土木工程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学会、社会学学会、法律学学会、政治学会、市政学会、经济学会等。跨系科的业余学术团体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司法研究会、南洋学会、自由法学研究会、

复旦文艺研究会、复旦铁笔艺术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国际问题研究会等。这些学会均由学生自由组织，自行管理。学会中办有图书室、出版部、出版各种学术刊物，举行专题讨论会、辩论会，请名人专家演讲。这些活动活跃了学校的学术空气，也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活动和研究能力。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洪琛说：“我爱复旦，因为复旦有点象哈佛，每个学生都各管各的，都有独立研究的精神，每个学生都有骄傲的自信心。”^[18]不少复旦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就崭露头角，许多学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和学术成果。新闻系二年级学生吴彦宗，“感新闻实习之重要，故由彼个人独立办周报一种”^[19]。政治系学生任道远，译述《美国民主政体》，全书十万字。张宗汲、金耀辉发明无线电控制术。新闻系学生杜绍文著《新闻政策》一书。会计系张忠竟与李鸿寿译《会计学原理及实务》一书，计有三十万字。政治学系何伯诚著有《美国宪政发达史》，计有十万字。此外，复旦大学学生在校外兴办义务小学和其他事业，也都表现了独立活动、独立创造和独立研究的能力。

注：

(1) 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校刊，吴南轩《第一次扩大纪念周校务报告》。

(2) 见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复旦五日刊

(3) 见一九二五年复旦年鉴第118页。

(4) 见一九三〇年毕业纪念刊第189页。

(5) 见李登辉先生哀思录第15页。

(6) 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复旦校刊。

(7) 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复旦校刊，李登辉《我们所需要的教育》。

(8) 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复旦校刊，李登辉《我们所需要的教育》。

(9) 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复旦校刊，李登辉《我们所需要的教育》。

(10) 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复旦校刊，

(11) 见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复旦校刊。章益《认识复旦》。

(12) 见一九二四年《复旦年鉴》第223页。

(13) 见一九二五年《复旦年鉴》第273页。

(14) 见一九二五年《复旦年鉴》第151页。

(15) 见李炳煊《国际贸易系概况》。

(16)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七一五卷，《统专》第105页。

(17) 见复旦大学历史档案，《农垦组》第106页。

(18) 见一九四〇年毕业纪念刊。

(19) 见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复旦五日刊。

附录。

一、理工科

徐文台

本校理工科，在国内外大学中，为一种特别之组织，外间人士，多未明瞭。本校同学，亦有不审吾科设科之旨者。际此丙寅年鉴出版之期，请拉杂陈之。

本科之组织，如下表：

理工科	{	数学物理系	{	道路工程门
		化学系		市政工程门
		土木工程系		营造工程门

本科鉴于国内时势之需求，竭其全力办理土木工程系，而于道路营造二门，尤三致意焉。化学数学物理之课程，盖以植工科学问之基础，亦如金师（通尹）所云“格物穷理，得有所凭藉”者也。

工程教育，在吾国今日，以土木为首要，建国之始，百废待举，“修治道路（铁路马路），以利民行，建筑屋舍，以乐民居”，诸事莫非土木之才是赖、本科即应此时代之使命而起。故于道路营造二门，视为今日急切之需要，特加注意。市政工程，亦亟欲于最近之将来，充分发展。未臻方长，是在吾人之努力耳！

工程教育之目的，在于“学成致用”，是以强性不近于工程事业之人学习工程，实为社会上极大之损失，盖其人至多仅能任机械性之工作，无何重大之建树也。惟以吾国今日大学之组织，青年学子，仅与一次择业之机会，过此即“木已成舟”，无可回首者矣！益以近年高中设之职业科之学制，尤易使学者择业过早。基本之学问未固，关于文哲社会之知识未充，工程方面，尤属茫然，仅以“切于实用”“易于谋生”之单纯见解，遂选习工程以为其毕生之所业，是实受今日学制之所误，而非青年自误者也。

本科深欲免此错误，误我青年，乃以数种方法救济之：

（一）工程为科学之应用，二者相通之点极多。学者择业之际，常将此二者相混。有自审为宜习科学，实则性近工程，迨习数年，乃自知之，然已噬脐莫及矣！本科将理工各科，前二年除数种特殊之学程外，理工学生，均当习之。经此二年之学习，于纯粹科学及工程均获详尽之了解，至三年级乃编系分班，是实与学者以第二次择业之机会，二年之考虑，虽不中，亦不远矣！较之粗心用事，以择业为儿戏，或听诸武断执言之择业指导者之训诲，当胜过千千也！若在此二年中，即已有志于工程，可多习关于工程之学程，一旦意图改系，亦尚游刃有余，于事无损也！记者深望本科学长金先生，于前二年，加一学程，叙述土木工程事业之大要，足使学者多得择业之臂助，习工程者在三四二级亦较知所适从也。此课每周二时即足，可

请三四年级各门之教授分授，如遇道路则请道路学教授任数星期，授完后改请建筑工程教授担任是也。以与学者以关于土木工程之大要，注重发挥各门工程与吾国今日社会之现状及将来宜若何发展，及各门工程师所必具之智识及品性之训练。大体既明，分门之专攻自易着手，不致学之数月尚不知所事为何。此课于较难懂处不妨略去，材料并选有兴趣者，故学者虽未习材料力学、砖瓦工学、测量等基本学程，亦得领略无碍。遇假时，并邀外间工程师演讲国内工程界现状及工程师之训练等，学者获益必较多也。

(二) 本校为一大规模之大学，文理工商政治各科峙立。工科学生，需要文学、政治、经济之学问者至烈，土木工程，于事尤然。而通于此又多缺乏。故思想流褊狭，工程学生，半系井蛙高唱，不明户外之现状，即工程设计，非具充分之政治及经济上发展之远大眼光不可。本科同学，日与他科学学生周旋，每得之于不觉间。他科学程，亦得有选习之机会，是则较之纯粹之工程大学，处境为优也！

(三) 本科默察国内工程界之现状，专攻一门之土木工程师，需要尚非十分急切。工程上建设甚少，实习之机会非可多得，且处兹军事混乱之际，各地关于交通市政之建设，规模甚小，都非为长治久安之计者，是则“普通化”之土木工程师，已足为用。即政治清明之时，发轫伊始，工程之胚胎初成，亦需要多数之“普通化”之土木工程师。缘是之故，本系课程乃有“普通化”之倾向，虽三门分立，盖示“着重”之意，而各门共同必修之学程，仍须学习者也。

以上三者，为今日本科设科之旨。至化学数理二系，现尚未有重大之发展，其详细之报告，留待后于吾之同学！

摘自1926年复旦年鉴第155页

二、从沪江转学本校的几点感想

石 濡

一个学校的学生，有一个学校学生的风气；甲校的学生，转到乙校，对于甲乙之间的不同处，随时随地可以发生感触，我现在把我从沪江转学本校后的几点感想，拉杂写在下面：

一、男女同学的优劣观。沪江因为男女同学，无论甚么人进去，总多少受点异性的 Attraction，所以衣服不但求整洁，且求漂亮，面孔不但用肥皂洗得很光润，且敷了一层厚厚的雪花膏；遇到做礼拜或其他聚会时，没有不含着醉翁之意，争先恐后进会场，以表示热烈态度的；至于在本校则适得其反，同学于服饰上，均不甚讲究，甚至有不修边幅，故作名士派者，遇到开会，则非重大事故，更不轻易降临了！男女同学，优点多，还是缺点多？我殊不敢回答，请阅者多想一想！

二、国文程度的高下。沪江学生对国文，多不注意，所以出的甚么招贴广告，文句不通的与满纸别字的几乎无日无之，有时真令人喷饭！至于本校呢？则不通和有别字的招告，我在这半年内还没有看见过，而且因为大多数同学国文太好的原故，几千字的洋洋大文，常常在招贴板上发现，这岂不是本校与沪江不同的一点现象么？

三、班级色彩的浓淡，沪江班级色彩很浓，不独高班生对低班生声势喧赫，不可响迓，即同班甲组对乙组，亦多表示鄙视的态度，至本校则八百同学尚能本平等原则相互待遇，这也要算本校一种与人不同的精神罢！

我的感想，本来不止这几点，因篇幅关系，下次再说罢！

摘自1926年复旦年鉴

第四章 学 生

第一节 学生概况

在解放前的四十四年中，复旦大学培养了大学毕业生7245人，研究生17人，复旦公学培养了高等正科、大学预科毕业生79人，此外尚有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读完公学、大学的学生，总计当在万人以上。复旦附属中学、预科、高中部、复旦实验中学、复旦义务小学，也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

复旦大学是伟大反帝斗争的产物。在近半个世纪当中，她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青年、革命志士、无产阶级战士。

二十世纪一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革命浪潮一个接着一个，斗争不断深入。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由于懂得世界各国情况，明瞭历史发展趋向，目睹政府腐败，心忧祖国危亡，往往成为各次革命运动的先锋。复旦大学学生在爱国教育家马相伯、李登辉等人的培育下，历来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具有爱国民主的革命传统。

在复旦早期学生中，出现了一批反清志士，如马君武、刘成禺（两人为早期震旦学院学生）、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马君武是我国最早翻译国外社会主义学说的作者之一。于右任、叶仲裕、邵力子等人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为同盟会在沪机关刊物，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不少同学都投身革命。

辛亥革命果实为袁世凯篡夺以后，复旦学生不断进行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五四运动期间，复旦学生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先锋和支柱。1919年9月，复旦学生金昌琴(国宝)在我国首次译出列宁著作。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复旦同学多投稿其上，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复旦同学受到党的教育，更加自觉地投入革命斗争。五卅运动爆发后，复旦大学和附中同学积极参加。北伐战争时，复旦少数同学奔赴广州，参加革命。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复旦同学组织学生军，积极参加训练，准备抗日。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同学站在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的前列。“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复旦同学投笔从戎。“一二·九”运动时，复旦学生表现更为突出，自开火车赴南京要求政府抗日，被阻后又深入工农宣传抗日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同学奔赴抗日前线、深入敌后，为驱逐敌寇而战。解放战争时期，复旦学生为推倒三座大山，活跃在战场上和秘密工作中。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激烈斗争中，复旦同学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创建光明幸福的新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不少同学为此流尽了鲜血、贡献出生命，牺牲在战场上和刑场上，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民族的骄傲、学校的光荣，他们的事迹理应永垂复旦史册，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复旦大学在教学中，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规定学生要选读较多的选修课，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因而在学生中(包括早期震旦)出现一批知名人士，其中有：马君武、于右任、叶仲裕、邵力子、胡敦复、曹梁厦、郑蕃(桐荪)、李青崖、陈寅恪、竺可桢、梅光迪、金问洙(通尹)、金问泗、郭云观、朱和翔、吴士恩、俞颂华、张志让、孙越崎、金国宝、罗家伦、

何葆仁、章益、孙锡麒（寒冰）、李炳焕、伍蠡甫、胡汝鼎、陈维稷、冯德培、童第周、朱鹤年、徐丰彦、蔡乐生、费福熊（巩）、王传爵、董霖、张丰胃、陈鸣鼎、徐以枋、黄逸峰、章植、章方叙（靳以）、孙绳曾、夏征农、孙祥荫、陈世骧、程午嘉、朱端钧、沈霁春、马彦祥、李秉成、温济泽、李庆逵、吴承禧、许涤新、陈传纲、郭维城、封季壬（凤子）、项志邈（胡绳）、曹宏勋、裔寿民（伊扬）、蒋文蒸（宗鲁）、方子勤、陈其五、刘焱（放）、倪海曙、李光治、朱颐龄、司徒汉、邹荻帆等等。

复旦大学从创办开始，就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学生在校内组织自治会、成立民主法庭，参加学校行政会议；自办食堂、合作社、国民合作银行；出版壁报、校刊、年鉴、杂志和各系科学报；翻译外文书刊；创作小说诗歌；演出进步戏剧；开展学术讨论、举行演说比赛；组织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等等。复旦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培养了组织管理、文字表达、社交活动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而绝大多数复旦学生进入社会以后，能比较快地适应工作需要。

在解放以前，复旦同学由于生长在旧社会，多数出身在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又为旧社会服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旧社会的种种不良影响。但是就大多数同学来说，他们是爱国的、民主的、有正义感的。他们当中，有的从事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工作；有的从事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工作；有的从事财政、金融工作；有的从事农业技术工作；有的从事商业工作等等。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高民族文化水平、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促进生产发展、改进企业管理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成绩。全国解放后，复旦同学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解放以前的复旦毕业生中，有少数人在国民党政府部门任职，各人情况不同；但大多数人在全国解放以后，都能跟随时代前进，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有少数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跑到台湾或国外，仍然怀念祖国和母校，愿意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总之，在解放前的近半个世纪当中，复旦大学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复旦人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节 革命烈士传略*

一、黄君珏烈士传略

黄君珏，女，原名黄维祐，湖南湘潭人，1912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她自幼随父母在湖南念书，受亲友影响，思想进步，于1927年参加共青团，在长沙做妇女工作。“马日事变”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她迅即离开长沙，夜渡洞庭湖，只身来到上海，考进启秀女中学习。半年后，转入上海中学学习，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中学毕业后，她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30年前后，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黄君珏满腔热诚地参加学生抗日救国活动，被推选为复旦大学学生会委员。为了动员和组织全校同学参加抗日活动，她不顾疲劳，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她和复旦学生会的努力下，复旦广大师生曾三次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还有一次，北

* 编者按：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全，这里仅是部分烈士传略。

方南下学生代表被国民党秘密逮捕，黄君珏和复旦同学闻讯后，和其他学校一起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迫使张群市长释放了被捕学生，使复旦走在上海学生运动的前列。

1933年6月，她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会计司科员。一九三四年秋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院工作，同时在复旦附中任教。^①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经刘思慕同志介绍，参加远东情报局工作。远东情报局是第三国际派设在上海的秘密情报机构，主要搜集国民党政府以至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各种机密绝密情报，并将其转给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很有作用。黄君珏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持重可靠，工作卓有成效，对革命作出很多贡献，受到情报局领导人华尔顿的信任和器重。

后来，刘思慕同志奉命打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工作，她就担任了远东情报局与刘思慕同志之间的联络工作。她的父亲黄友郢，当时任南京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她的几个舅父，都是政界比较重要的人物。她常以回南京探亲为名，与刘联系。她还利用亲属关系，搜集一些有关“剿匪”的情报，供组织上参考。

一九三五年，刘思慕同志调往武昌“剿匪行营”工作。这时，仍由黄君珏负责和他联系。这年四月，华尔顿派陆海防（又名吴申如）去武汉与刘思慕联系。陆违反组织纪律，擅自派其弟陆独步前去。陆独步到武汉后被捕，成为叛徒。刘思慕前往旅馆接头时，适陆不在，留言要刘在旅馆等候。刘思慕感到情况不对，立即退出旅馆，并打电报到上海询问。情报局发觉问题严重，立即派黄君珏前往武汉。她采取紧急措施，果断地安排刘思慕夫妇迅速撤离武汉，分道来到上海，约定在东亚旅馆会合。不料，刘思慕夫人曾苑及其子女在武汉登船时，已被特务

发觉，随船跟踪而来。曾苑住进东亚旅馆后，特务即在其隔壁住下，准备“钓鱼”。当天，陆海防去东亚旅馆向曾苑打听刘思慕的行踪，即被特务认为是刘思慕，秘密加以逮捕。陆海防被捕后，立即叛变，主动带领特务去抓准备和他会面的远东情报局负责人立陶宛籍的华尔顿，接着又出卖了不少同志。

对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黄君珏并不知情，只是凭着高度的警惕性，担心曾苑同志的行踪可能被敌人发觉，遂以请她出外吃饭为名，把曾苑及其子女转移到沧洲饭店。刘思慕到上海后，通过黄君珏，才与家人见面。两天后，黄君珏了解到发生的重大变故，便将陆海防被捕叛变的消息告诉了刘思慕和曾苑，认为他们不能在上海逗留，帮助他们一家逃离上海。然后，她自己离开上海，回到南京家里。

由于两个叛徒的出卖，黄君珏、蒋浚瑜等同志也被捕入狱，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就是1935年8月申报刊载的曾轰动一时的“神秘怪西人”案件的部分情况。

1935年8月，敌人为了证实他们所逮捕的蒋浚瑜也是情报局人员，将黄君珏带到武汉法庭和蒋浚瑜对质，并让叛徒在旁，施加压力。蒋浚瑜系黄君珏在启秀女中和复旦大学的同学，由黄介绍参加远东情报局工作。面对这个严峻的场面，黄君珏胸有成竹，镇静自若，她尽力为蒋浚瑜开脱，矢口否认蒋浚瑜的政治身份，只承认是她利用蒋的通讯地址，传送文件，致被牵连。当时，地下党实行单线联系，叛徒不知道具体情况，对此也无可奈何。蒋浚瑜因此获释，黄君珏则被判处七年徒刑。她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尽力维护革命事业和同志安全的精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黄君珏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保释出狱。她担任湖南妇女难民工厂经理，成绩斐然。^②不久，和因远东情报局案一起坐牢的王默磐同志

结婚。一九三八年，他们夫妇俩奉命一起到山东石友三部队做政治工作。一九三九年又奉党组织指派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黄君珏先后担任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新华日报社总会计和经理部秘书，并兼任华北新华书店会计室主任等职。她在经济管理方面颇有研究，曾为华北新华书店起草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深受领导器重和群众拥护。王默磐工作也很出色，他们被誉为“战地模范夫妇”。黄君珏出狱后，曾多方寻找原组织关系，未获结果。华北新华日报社党组织经过政治审查，于一九四〇年前后，批准她重新入党。

1942年是抗战时期最艰难的岁月，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出“咬紧牙关，渡过难关，黎明曙光，就在眼前”的战斗号召，鼓励大家艰苦奋斗，战胜困难。当时，她刚生了孩子，为了便于工作，忍痛将出生才三天的独生儿子，寄养在老乡家里。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亲生孩子。

1942年5月，日寇对我太行山根据地辽县（今改名左权县）岭南村一带，发动残酷的“五月大扫荡”。三万多敌人实行所谓“铁壁合围”的战术，并用数架飞机配合，作梳篦式的扫荡，妄图消灭太行山根据地。黄君珏和华北新华书店同志在转移途中，与敌遭遇，经过战斗后，就化整为零，分散隐蔽。24日以后，敌人搜山日益频繁，形势更加严重，她带领十几个男女同志潜伏在庄子岭一带，白天隐蔽在山上，夜里设法下山找食物。当时枪支弹药十分缺乏，他们又是文化战士，一般没有武器，她虽有一支手枪，但仅有三粒子弹，她对和她一起活动的程庆丰同志说，“我有一支枪，三发子弹，起码打死两个鬼子”。6月2日清晨，她在敌人来回扫荡中，带领同志们登上辽县南庄子岭笔架山，分散隐蔽在树丛和山洞中。不幸，其中有四、五人被敌人发现，全部牺牲。中午，百余敌人又来搜山，由于敌众我寡，又缺乏武器，有的同志壮烈牺牲，有的利用树林和

草丛作隐蔽，滚下山崖，逃出包围圈。黄君珏等隐蔽于山顶上的一个山洞里，被敌包围。凶残而狡猾的敌人，不敢进洞搜索，却在洞口架柴放火，进行烟薰，浓烟滚滚，顿时弥漫山洞，另一同志当即窒息昏倒。黄君珏冲出山洞口，举枪打死了两个敌人，实现了她的诺言。其时敌人一惊，她便飞步冲到悬崖边，跳崖身亡，表现了她的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当时，她的丈夫王默磐身负重伤，与几个重伤号隐蔽在另一山上，与黄君珏所隐蔽的山洞仅隔一山谷，敌人的暴行和黄君珏英勇斗争就义的情景，均历历在目。他心急如焚，无奈自己身负重伤，流血过多，无法救援。

黄君珏同志的英勇牺牲，以身殉国，在当地广为传颂。华北新华日报、新华书店于7月8日于驻地举行追悼会，陈克寒同志在会上号召同志们为烈士们报仇，“向死难的同志学习坚强的党性，不怕牺牲，临难不苟，视死如归的斗争意志和品格”。④1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为祖国流血，悼黄君珏女士殉国》的短评，指出黄君珏同志“发扬了我大中华民族的正气，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英雄气概！”“属民族无上光荣”。⑤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黄君珏革命烈士证明书，上写：“黄君珏同志在山西辽县庄子岭反扫荡战争中跳崖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

黄君珏生于1912年阴历4月19日，亡于1942年阴历4月19日，她的生辰又是忌日。她在人世间仅仅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但她那英勇奋斗、光辉灿烂的一生，将永垂史册！

注：

1. 1934年10月《复旦同学会会刊》第四卷第一期
2. 1942年1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
3. 同上

4. 1942年7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

5. 1942年1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费巩烈士传略

费巩，原名福熊，字寒铁，后字香曾。1905年9月16日（农历8月18日）出生于苏州长庆里（混堂巷）。费家是江苏吴江县名门望族。祖父费延厘，同治乙丑进士，曾任河南督学，盛年引退，有“吴中高士”之称。父亲费仲深，少年英俊，才识并茂，曾任清朝尚书的吴大澂奇其才，以小女吴本静妻之。辛亥革命后，费仲深曾入幕府，为肃政厅肃政史。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费仲深虽与袁有亲戚关系，却直言极谏，不被采纳，遂退隐苏州，为当地著名的文人绅士。

费巩天资聪颖，又受家庭的严格教育，因而才华出众。1917年，他十二岁时，父亲就叫他去上海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后入复旦附中学习，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复旦形成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校风。费巩深受这种校风影响。有人说：“费巩的一生，他的生与死，都与复旦紧紧地联在一起”。^①

费巩在学校成绩很是出色。他读书过目不忘，学习时提纲挈领、临考则处之泰然。他课余之暇喜欢赛跑和踢小足球，担任过田径队队长、足球管理。在球场上，他长驱直入，左右开弓，颇有点儒将风度。费巩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急公好义、好打抱不平，类似包公，人称“费公”。由于他德智体三者兼备，在同学中颇有威望。

1924年，费巩被同学推选为学生自治会评议委员会主席。他当选后，倡议学生自治会可以发表各种议论，畅谈国事，抨击

时弊。提出自治会要办壁报、校刊、义务小学等。学生自治会当即推举他任义务小学董事长。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费巩和全校同学一起，在上海和江湾一带游行示威，作演讲、贴标语，有力地配合了市区的“三罢”运动。

1925年，费巩看到国内政治腐败，决心攻读政治，从文科转到社会科学科。这年冬天，费巩和袁慧泉女士结婚。袁慧泉原名袁家第，是袁世凯的孙女，袁克定的女儿。她的母亲吴本娴，是费巩妈妈吴本静的姐姐，两姐妹商定给儿女们定了亲。吴本娴只生了一个女儿，在袁慧泉结婚时，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给了女儿作嫁妆。据说费巩结婚那天，新娘的嫁妆和贺喜的人群，竟从苏州桃花坞一直排到拙政园，有几里路长。袁慧泉聪颖贤淑，体贴入微。费巩得此内助，受益非浅。

1927年夏，费巩以三年半时间，修完了大学全部学分，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系。

费巩在大学毕业以后，在上海学习了一个时期的法语，于1928年秋天自费赴法国留学。费巩留学的费用，是袁慧泉张罗的，为数毕竟有限。他到了法国以后，不能不精打细算。他出外时穿一套西装，回寓后立即换下，改着长衫马夹，抽由国内带去的旱烟。他看不惯法国巴黎的奢侈生活，又觉得在法国学不到想学的东西。因此，他以两个月时间作准备，报考英国牛津大学。

费巩考取牛津大学后，读一年的经济学的学科。他的目的在研究英国的文官制度，作为改革我国当时腐败政治的借鉴，于是请英国唯一研究“民仆制度”的学者方讷为导师。他在牛津发奋学习，成为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常客。为了准备写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和《比较宪法》，他收集了大量资料。一九三一年六月，费巩取得了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荣誉毕业

生的文凭。他的导师方纳教授根据他的素质和学习基础，动员他在牛津继续考博士学位，但是费巩却考虑秋天回国。

在英国牛津大学的这几年，费巩特别欣赏英国的自由民主空气。他认为马克思的祖国容纳不了马克思，而英国却容许马克思的存在，使他得以写成《资本论》。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他的一生。

费巩急于回国，主要是他父亲面临破产、重病不起。当时他的哥哥费福焘去瑞士工读，弟弟费福煦在美国留学，妹妹费令宜也去美国留学，三个人出外留学，费用很大，使他父亲负了一大笔债。加上农业收成不好，所办农工银行亏空，这样要债的人日多，使他父亲重病不起。

费巩回国，取道苏联，为的是看看俄国的实际情况。回国后，他谈了对苏联的印象。他说：“总的印象还不错，有不少新鲜的东西。但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把思想也标准化。我希望把道理给人民讲清楚，由人民自由来比较和选择。”“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

费巩在回国途中，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从海参威乘外轮经日本海、黄海返回天津的途中，看到在海上横行的日本船只，义愤填膺，把自己唯一的一套西装抛入大海，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费巩。

1931年9月，费巩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出版了。他认为英国经过多年实践，否定了根据门第权势任用官吏的做法，采取经过考试录取的办法是一个进步。他特别赞赏和推荐英国的“民仆”制度，指出官吏为“民仆”，人民可以责备“民仆”，官吏也是职业的一种，并不比工、商各业有什么特别“显耀尊荣”。他认为英国政府中的事务官，无党派色彩，由考试出身，恃真才录用，能奉公守法，则终身任用的制度，

是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的好办法。费巩指出中国旧时的官吏“俨然以民之父母自居。进而剥削之鱼肉之。虽曰习俗不同，名称既异，心理上亦自不同。民国以来，号称维新，而政界之恶浊腐败，甚于往昔”。他认为要澄清中国的“吏治”，要从“考试入手”；而要确立考试制度，“以真才取士”，必须真正实行宪政。

费巩回国以后，他的大哥和亲戚，为他在上海政界和经济界找到了职位，但他决心献身教育，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后由陈望道介绍他到中国公学任教。1932年秋，他又兼复旦大学教员，讲授英国政治制度，并兼任复旦大学同学会的会刊主编。这时，他认识了邹韬奋，成为《生活周报》的热心作者。

一九三三年，费巩出版《比较宪法》一书，他以英、美、德、法、瑞士五国宪法为主，兼及日本、挪威、比利时、捷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中国的宪政，加以比较，进行评述，明其利弊、衡其优劣，以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作为制定宪法的参考。这本书以内容丰富、条理清楚、涉及面广、分析深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年秋季，他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

费巩到浙大，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并兼任注册课主任，浙大的注册制度，就是他一手奠定的。

浙大校长郭任远，原系复旦学生，1918年赴美国学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副校长。他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属国家主义派，迫害进步学生，被学生联名轰走。1928到29年，郭在浙大任心理学教授。1932年，郭继程天放任浙大校长后，在学校设立军事管理处，自兼处长，实行法西斯统治，任意开除学生，久为学生所不满。

费巩到浙大工作，和浙大校长郭任远有关。但是他却不同意郭任远的所作所为。1935年夏，胡鼎新(乔木)在浙大读书，

出版壁报《沙泉》，上面转载了一幅苏联青年的照片。此事为郭任远所知，郭即以“成绩不及格”为理由，开除胡乔木。费巩是注册课主任，知道学生的分数，胡乔木成绩明明为八十多分，怎能说不及格，于是和郭任远争吵起来。事后，费巩还把胡乔木约到自己家里，谈了半个小时的话，指出学校已作出决定，他也无能为力。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浙大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组织全市学生赴京请愿。国民党派出特务军警逮捕学生，包围火车站，学生在轨道上坚持不走，要求路局派车。国民党浙江省当局无计可施，和学生谈判，接受学生提出的所有条件：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省党部省政府向学生公开道歉；承认杭州学生联合会为合法团体；实行新闻自由，不再封锁抗日爱国新闻。学生的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是，浙大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却发现校长郭任远贴出的开除学生会主席施尔宜（施平）、副主席扬国华学籍的布告，同学们再一次被激怒了，于是展开了“驱郭”斗争。费巩和大部分教职工一起，热情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学生们组织了纠察队，占领了学校，编印浙大校刊，发表《驱郭（任远）宣言》。郭任远在群起反对、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孤身一人悄悄地从后门离开学校，从此就不敢再到学校。

1936年1月21日，蒋介石带领大批军警来到浙大，企图压服学生。他先找教师谈话，再召集学生代表“听训”。他声色俱厉地要学生会主席施尔宜下令停止“闹风潮”，未获结果。蒋介石走后，学校继续罢课一个多月，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免去郭任远的浙大校长职务，同意学生“要学者、不要党棍”的要求，委派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教授任浙大校长。

驱郭斗争的胜利，是和全校教职员的支持分不开的，也有费巩的一分功劳。当年的浙大学生主席施尔宜（施平）在1979

年10月30日举行的《费巩烈士纪念会》上说：“我应该代表我们‘一二·九’时代的学生来证实费先生他的崇高品质，同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并向他致敬”。②

抗战爆发，浙大西迁。费巩携眷随校西迁至西天目山任课。1937年11月，浙大再西迁建德。费巩送母亲和孩子回到上海，又送夫人北返，在船上跌伤了臂骨，迁延至1938年11月，才从上海到香港，经广州湾到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

费巩到校后，看到宜山气候恶劣、条件很差，学生患病者甚多，于是向竺可桢校长提出五点书面意见：一、改善物质条件、维护学生健康；二、酌情减轻学生功课负担；三、扩大学生贷金范围和贷金数额；四、改进行政措施；五、开会要自由讨论，不要“寻章摘句”，以便上下通气。这些建议受到竺校长的采纳和师生的拥护。

1940年7月，浙大学生把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了台，学校一时没有训导长。竺校长深知费巩最孚众望，便“三顾茅庐”来请费巩出任。全校师生也都欢迎他出任。

费巩当时不肯答应，他想：“做教授何等清高，何必办这吃力不讨好的事，还要叫人误会我热中，岂不冤枉。”可是，他在竺校长的恳切要求下，转而想到“出仕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仕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救何日？”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思考，他向竺校长提出二个先决条件，即：一、不参加国民党；二、不领取训导长薪俸，把这笔钱移作为学生谋福利用。竺可桢满足了费巩的条件，他决定就职。

8月12日，浙大举行费巩教授就职典礼。费巩在会上发表《就职宣言》，他说：“为政不在多言，但亦不能空言”。他表示要切实改进同学的生活，在精神方面，推行导师制；在物质方面，包括衣、食、住、行、请医生、除臭虫等六大项。讲到

训导方针时，他说：“我要以德服人，不以为力服人，用感力，不用压力”，“吾是个自由主义者，不统制干涉但并非放任不管，想给你们的是领导，而不是压迫。”他接着说：“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做警察厅长或者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他希望和同学们多多接触，宣布训导处从今天起改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同学有事尽可进来谈话等等。那天，几乎浙大所有的人都参加会议，掌声持久不息，盛况空前。

费巩就职后，积极着手改善同学生活条件。首先，利用暑假，扑灭臭虫。他亲自动手，腾出学生床铺，用沸水轮流冲洗，继之烈日曝晒，以达到消灭臭虫的目的。

其次，创制植物油灯。当时学生晚上学习，用旧式桐油灯，不仅灯光微弱，影响视力，而且浓烟熏人。费巩利用旧香烟罐反复试验，又与白铁匠商量，搞出了有玻璃罩的新式桐油灯，光度与煤油灯相仿，订制850只分发给同学使用，同学们便称之为“费巩灯”。

第三，为贫困同学争取贷金。当时，学生贷金突然紧缩，只能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享受，未被批准得到贷金的同学，整日围住费巩，向他陈述困难，恳求批准贷金或缓交膳费。他解释慰谕，唇敝舌焦，甚至心跳手冷。他对于确有困难的同学，则通知勿催缴膳费，并设法寒衣贷金；对于“并不清苦而混得贷金者，甚至有领得外界秘密津贴而仍取得贷金者，亦必有以查究而惩处之”。

第四，妥善安排学生寝室铺位，甚至亲手搬移。此外修缮、检漏、铺亮瓦、开天窗、补楼板、做扶手、扫除、熏炙等等他都一一参与，务使学生有一个较好的居住条件。

费巩做这些琐碎的事务工作，有时想到“以一教授及贵胄

身份，乃终日营营扰扰于此类卑琐之事，抑太辱没”。但是又想到学生生活困苦局促，仍然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来为同学们谋福利。

如果说为了改善同学的物质条件，费巩是“事务繁忙，日不暇给”，“任劳任怨，独蒙其苦”；那么，为了改善同学的精神条件，费巩则付出更多的心血，担当了更大的风险。

费巩认为学校必须培养品学兼优、能改变社会不良风气的人才，他积极倡导导师制，说：“必须学校造就出来的人才，个个有品德，品学兼优，将来能改变社会风气，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中国才有希望，教育才有成就”，“做教员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品之道”。

怎样才能做好导师呢？费巩讲道：“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的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都是好好先生，唯唯喏喏，无可无不可；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所以，训导训导，还是导重于训，训导音近薰陶，还是要从薰陶、陶冶、感化着手。要感化人，所以做导师的，必须以身作则，言行合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对学生必须诚恳关切，毫发无伪，语语自肺腑流出。”^③

费巩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导师。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讲课内容丰富，教学方法着重启发学生思考、学会分析。不少学生选他做导师，多时一期竟有五十多人。费巩做导师，有一个大体计划，每次和同学谈一个问题，如治学、治事、交友、律己、待人、处世、礼仪等；又能根据同学的各自性格特点，因材施教。费巩谆谆教诲，从不厌倦，其热心与负责精神，令人深为感动。学生每有思想问题都来找他商量。这样，他与学生

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感情。

费巩认为学校是治学问、育人才的地方，应该比较自由，应该允许学习各种主义，包括三民主义、天主教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他倡议和支持学生公开地发表各种政治见解，保护学生的言论自由。这样，浙大学生会便创办了《生活壁报》。学生会有权审查稿件，并且负责对作者的姓名保密。这种制度的制定，使浙大的进步势力总是占主导地位，并且紧紧地掌握着对壁报的领导权。《生活壁报》后来改名为《费巩壁报》，在浙大起着权威的舆论作用，一直坚持到解放。

费巩对于那些横行不法和不学无术的三青团学生，非常鄙视和厌恶。他把三青团的牌子从训导处的前门挂到后门，并堵死走道。他对违犯校纪、贪污舞弊的三青团员和军统骨干分子，力主严办开除。他说：“学校不能要这些不肖子孙，他们不学无术，败坏校风，是一伙害群之马。要奖罚分明。”被开除的特务学生，对他更加仇恨，扬言要用武力对付费巩。费巩却对他的导生说：“如果我怕这些，就不会出来任职了。”

他对浙大国民党头子尤其鄙视。此人表面上道貌岸然，披着名教授的外衣，实际是国民党监视和争夺青年的鹰犬。此人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中伤费巩是“哗众取宠”。费巩的回答是：教授加党棍，学者兼特务，才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的败类。由于他嫉恶如仇，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成为特务切齿痛恨的眼中钉。

1940年10月，国民党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当时只有五万人口的遵义城，为了对付民主空气比较浓厚的浙江大学，国民党不惜工本，专门成立了警备司令部，以使用“合法”名义，任意捕人。与此同时，他们胁迫费巩辞去训导长职务。国民党教育部甚至指令浙大“早日物色继任，不容长久令非党员摄行”。

在这种情况下，费巩只得辞职，十二月三日，向竺校长提交了辞职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告以辞职原因，由于内外交迫，外则教部之表示，内则尽是谗言，否则不愿中途而废。”

费巩虽已辞职，对同学仍极关心。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一面制造“皖南事变”，一面加强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遵义警备司令部准备进浙大逮捕进步同学。当时，国民党遵义地区专员高文伯是费巩留英国同学，私交颇好。费巩从高处得悉警察局和特务机关搞黑名单的情况，其中有镇压学生运动的紧急情报。他一面与竺校长商量对策，一面派人通知几个已经暴露的同学到自己住处隐藏，直到形势有所缓和才离开。这几个同学后来相约到了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半年的训导长工作，使他心力憔悴、身体亏虚，医生讲他“心肾两亏，不加调治，且成怔忡”，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压力，纷沓而至。有人指费巩是危险分子，怀疑他另有企图。费巩考虑，如不及早引退，终将被别人罗织诬陷。他不得不告假东归。

对于费巩辞去训导长职务和请假东归，同学和教师都非常惋惜。《生活壁报》上称费巩为学生的慈母，同学们还在他的办公桌上用白漆书写：“费香曾教授出长训导纪念”。师生们送了许多惜别诗给他，热情称颂，使他大为感动。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费巩告假东归，回到上海，住在租界里。他一面休养身体，一面发奋学习，制定读书计划，并按时完成。在此期间，他还教孩子每天临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培养孩子具有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为日寇占领。费巩深感人民的痛苦、民族的苦难，闭门不出，烦闷之极。假期届满之后，费巩毅然告别了亲人，重返浙大。当时从敌占区到内地，要经过道道封锁线，旅途十分艰险。费巩

风餐露宿、一日数惊，受尽折磨、饱尝忧患，经过五十三天，于1943年2月15日到达遵义。

费巩回到浙大，立即设法保护进步同学。当时，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加紧迫害进步人士。浙大同学有被遵义国民党县党部传讯者。费巩为了帮助他们逃离学校，有的资助路费，有的介绍去处，使同学们免于被难。

费巩在帮助同学脱难的同时，他自己却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1943年春天，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遵义工作组曾召开专门会议，策划秘密逮捕费巩，加以暗杀，后恐全国舆论谴责，未及执行，只是严密监视。1944年，国民党教育部密令浙江大学校长室特别注意监视费巩的行动。从此，费巩的一言一行，校内国民党特务便立即知道，费巩已经成为国民党认为是“重点防范”单位内的“重点防范”人物，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和暗杀，处在极度危险之中。但是，费巩毕竟还是一个书生，他对特务的监视，虽然有所觉察，感到“此后讲话亦须谨慎”，却料不到自己的处境如此危险。

尽管如此，费巩在师生中的威望却日益增高，1944年10月31日，他当选为浙大校务委员会的教授代表。

一九四四年春，日寇发动湘豫桂战役，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溃不成军，丧失了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二百多座城市，抛弃居民六千余万，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憎恨，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费巩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不顾个人的安危，从1944年2月开始，连续发表《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论治权与政权之分》、《吾国固有政制与民主政治》、《王之反对党》、《政治风气之转移》等论文，其中心论点为：反对独裁专制，要求公布宪法，实行政治民主，人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允许反对党存在。这些议论，打中了国民党的要害。国民

党反动当局更加仇恨费巩。

1945年1月，费巩利用一年休假机会，应母校复旦大学之聘，来到重庆，准备作《民主与法制》的学术报告，他到重庆以后，利用各种关系，到国民党的交通部、财政部调查人事制度和考试制度，以便进一步充实讲课内容。

2月7日，原浙大学生吴作和到费巩住处看望，递给费巩一张传单，即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政府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党治特务，及妨碍人身自由之法令，惩治贪污等，已经签名的郭沫若、洪深、马寅初、张申府、柳亚子等数十人。费巩看了觉得很合自己的意思，便签名其上。

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文化界的《对时局进言》，引起了很大震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坐卧不宁，他要杀一儆百。特务们奉命对签名人进行威胁、恐吓、利诱，有几个人害怕了，在报上发表声明，说自己并未参加签名。费巩对此极为气愤，再次发表文章，痛斥“怕死鬼”和“小丑”。这样，更引起了特务们的仇恨，蒋介石决定拿费巩来开刀。

3月5日凌晨，费巩在同学邵全声的陪同下，准备乘轮赴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当时重庆尚在黑暗笼罩之中，邵全声送费巩到码头以后，转身去替他取行李，回来以后，不见费巩，四处寻找，终无下落。

费巩失踪的消息传出以后，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社会上营救的舆论极高。在重庆的四十多位留美教授联名上书驻华美军负责人魏德迈，呼吁他出面营救。蒋介石这时不得不假惺惺地下令给“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子戴笠和梅乐斯，要他们查找费巩的下落。戴笠和梅乐斯派出“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和美国“名探”克拉克四处寻找，却不让他们到设在“中美合作所”里的军统局看守所去查找，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当时，周恩来同志正在重庆，他对此非常关心，多次出面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费巩。1946年1月，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提出“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的要求。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首先把张、杨、费巩教授、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等释放出来”。

但是，费巩教授已经为反动派杀害了。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费巩以后，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里，对他严刑拷打，费巩宁死不屈，大骂国民党。国民党反动派害怕阴谋败露，密令迅速把费巩“毁尸灭迹”。国民党特务把费巩残酷杀害之后，竟惨绝人寰地将尸身丢入镪水池里“化”掉。

费巩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人民的自由幸福，坚持真理、追求民主，宁死不屈，壮烈牺牲。遇害时年仅四十岁。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对费巩烈士家属从优抚恤。十年内乱期间，敌我混淆，烈士蒙冤。1978年9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追认费巩教授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士待遇”，纠正了这一冤案，使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费巩教授品格高尚，志行贞洁；谦谦君子，献身教育，为青年导师，教之爱之，犹恐不及；铮铮铁骨，坚持真理，睹民族危机，仗义直言，怒斥群丑。他是反独裁的英雄，争民主的斗士，党和人民永远纪念他！

注

1. 正素、玉如《费巩传》，1981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6页。
2. 同上，第34页。
3. 同上，第50页。

三、黄天烈士传略

在唐山烈士陵园里，有一块黄天烈士的青石墓碑，后面镌刻着碑文：黄天烈士，男，江苏崇明县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在杭州组织“三五剧社”，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七年入陕北公学，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北公学剧团团长，晋察冀联大文工团团长，冀东军区“尖兵剧社”社长。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在杨家峪被围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七岁。

黄天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黄天原名黄廷权，一九〇八年生，他在崇明县第六高等小学读书时是寄宿生，同校长、教员等一起就餐。每逢周末，教师们吃鱼肉荤腥，其他寄宿生们吃不到。星期假日，校长、教师聚在隔壁木行里赌博，置校事于不闻不问，以致教学效果渐趋下降。斯时同桌的赵鼎新和黄天等都很气愤。当赵鼎新表示要写信控告他们时，黄天并未因校长是他的姐夫而徇私，毅然支持，并与十六个高小三年级学生联名向崇明县劝学所（即现在的教育局）揭发他们的不是之处。劝学所以为校长创办该校，不无微功，仅给予批评，未加深究。年幼的黄天，仗义执言，深为人们赞赏。

黄天痛恨有权有势的人，作威作福，为非作歹，他厌恶“权”字，在进中学时，把名字黄廷权改为黄廷材（鼎才），去延安后，又改名黄天。

在家庭中，他是个反封建的勇士。最小的姐姐黄唯，婚后才几天，患肺病的丈夫就去世了。他竭力反对黄唯守寡，后来他去杭州工作时，就把小姐姐带到杭州读书。黄家信奉孔孟之道“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女孩子读书。他主动挑起生活重担，将黄品珍等三个侄女带到杭州读书。

一九三一年，黄天在复旦大学毕业，失业了一年多以后，才去杭州就任浙江省昆虫局图书馆主任。他在学生时代，酷爱进步戏剧活动，参加复旦剧社。因为不善于讲普通话，不能登台演出，就搞剧务工作。繁杂的剧务，涉及到戏剧的演出、编剧、导演等多方面的业务，他努力学习、钻研，为他以后的戏剧创作，积累了经验。一九三五年，他在杭州组织“三五剧社”，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与此同时，他还帮助同事周建一等人学习英语。周是中共地下党员，不久去延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天就是由周介绍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的。

黄天在陕北公学毕业后，留校任“陕公剧团”团长。他将高尔基的《母亲》改编为话剧演出。一九三九年，黄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随华北联大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一九四〇年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一九四二年兼任“抗敌剧社”副社长，被评为模范干部。

一九四三年，黄天随军渡过潮白河，来到冀热辽边区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担任“尖兵剧社”社长。

冀热辽边区是抗日战争中斗争最残酷的地区之一，它接连华北和东北，横垮长城内外，被千里无人区和封锁沟墙相分隔。在封锁沟墙当中，五里一炮楼，十里一据点，敌人力量相当密集。“尖兵剧社”在这种敌情严重的区域活动，战斗极为频繁，宿营地天天变动，大家都不解绑腿，和衣而睡，以便随时投入战斗。他们行军时，除了带有提琴、横笛等乐器，还背着步枪和手榴弹。每逢战斗，他们就作为一支部队作战，有时牵制、有时堵截、有时担任突击。他们既是文艺工作者，又是前线的战斗者。

他们的演出更为别致。把红樱枪插在地上，绑上军毯，便成为舞台背景，点起火把，便能演出。演出时，往往只离敌人据点二、三里路，日寇和伪军躲在炮楼里，能看见演出的灯光，

听到欢呼、鼓掌的声音。

即使“尖兵剧社”隐蔽在敌人驻扎的村子里，演员们也不放弃演出，往往在一间远离敌人的茅屋里，低声演唱“战斗来了”，以鼓舞战士们的情绪。

在敌情严重，不能演出时，“尖兵剧社”便深入连队和村庄，帮助军民学习文化，组织小型剧团。在新解放地区，则帮助建立地方政权，甚至权充干部。

黄天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领导着“尖兵剧社”，活跃在冀东根据地的各个分区，成为文化战线上的一支主力军，给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象。老乡们对“尖兵剧社”评价很高，说：“谁也没有‘尖兵剧社’的戏演得好！”^①他们看到可以作演戏道具的物品，就细心地保存，送给剧社。一个老太太甚至带来一批精壮的小伙子给剧社挑选，作为剧社的补充人员。充分表达了人民对“尖兵剧社”的爱护和支持。

“尖兵剧社”的成就，是和黄天的努力分不开的。

黄天和剧社的同志一起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工农兵群众，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他带头深入生活，每到一处都要访问群众，战士，向群众学习，收集创作素材。他随身带着笔记本，把典型的事例、生动的形象、精炼的语言纪录下来，同时加工锤炼，那怕是晚上睡觉时想起什么事、或是一句台词，都要点上油灯，纪录下来。他抓紧点滴时间进行创作，常说：“最好思考创作的时间，是夜行军。大地静悄悄，只有我们有节奏的脚步声；爬上高高的土岗，眼下那朦胧起伏的燕山山脉，常掀起我笔下（脑中）的波涛。”反映老百姓痛苦和斗争的剧本《沟线上》，就是他一个夜晚构思成功的。这出戏演出时，深深地感动了老乡们，成千看戏的老乡，聚精会神，一点声音也没有。黄天在“尖兵剧社”不到两年时间里，写作了《沟线上》、《拥军模

范于萍》、《前门后部》、《夜深人静时》、《满洲泪》等七八部话剧和歌剧，他还是这些戏的导演。每次演出前，他除了担任舞台总监外，还给演员化妆。演出时，他帮助拉幕、闭幕，又是一名合唱队员。黄天不仅是社长，他什么事都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四二年，日寇在长城沿线东西八百里，南北数百里的地方，用杀光、抢光、烧光等极其野蛮的办法，把所有的老百姓赶进铁路沿线的“人圈”，妄图造成千里无人区，阻止我冀东八路军向东北进军。长城内外的英雄人民，坚决不进“人圈”，他们宁可住进草棚、山洞，用人力拉犁、火石取火，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创造了我军进军东北的条件。一九四五年春季，冀东军区决定解放这一地区。黄天随着部队进入长城内外。看到“人圈”中的乡亲们，全家只有一条破棉被，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十来岁的孩子，冬天吃在火旁、睡在火旁，全身经火烤风吹起了层层鳞片，黑得象乌鸦一样。一次，黄天和部队一起露宿在承德以南的大山中，看到一小块向阳的山坡上，有一顶特大的草帽，他们揭开草帽，里面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说，儿子在八路军某部十二团当机枪班长，自己决心和儿子一样抗战，誓死不进“人圈”，躲入深山，住进山洞，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这块向阳坡是她取暖的地方。特大的草帽用来遮挡不及躲避的风雨。她等待解放，再过人间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使黄天痛苦忿恨、感情激动，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写出了大型歌剧《地狱与人间》，反映“人圈”中群众的痛苦生活。^②

黄天善于团结同志，待人热情、细心、体贴，同志们都愿意找他谈心，说黄天“象一个慈祥的老妈妈”。^③整个“尖兵剧社”在黄天领导下，团结得象一个融洽的家庭，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对于有艺术专长的同志，黄天尤其注意发挥他们的专

长，使人尽其才。

为了扩大“尖兵剧社”在敌占区的影响，黄天组织出版了纪念性刊物《一年》，介绍抗日前线的文艺活动和解放区军民英勇斗争的事绩。这个刊物深深地吸引了敌占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黄天派出有经验的同志，到文化水平较高的乐亭、昌黎两县，吸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动员了北京、天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到解放区，给“尖兵剧社”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为今后文艺工作的开展，积蓄了力量，培养了干部。

为了提高冀热辽地区的文艺水平，黄天带领“尖兵剧社”，和下属各分区社，联合排练、演出剧目，以交流经验，提高各自的创作和排演能力。对没有剧社的地区，黄天积极输送骨干，帮助他们组建剧社。这样，冀热辽地区的文艺活动迅速发展，使抗战的歌声唱遍冀东各地，响彻长城内外，激励着军民去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黄天患有心脏病，组织上给他一匹马，他不要，还是自己背着大挂包走路，说这样更能锻炼身体；给他配备公务员，他也不要，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最方便。

一九四五年“七一”，冀东军区“尖兵剧社”和十五军分区“长城剧社”联合演出黄天创作、今歌作曲的大型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这将是一次空前的大型演出。军区指示，要剧社在“七七”抗战八周年赶到军区演出。由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带领，并由遵化县支队派一个排掩护。七月三日晨，从十五分区出发，走了一天，到达丰润、玉田、遵化三县交界的小山村杨家峪宿营。

七月四日凌晨，由于汉奸告密，敌人集合了一千七百多人，包围了杨家峪。我方乘天色尚暗，雾气弥漫之际，冲出敌人的第一道包围。才参谋长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决定分东西两

路突围。才参谋长和黄天等人向西突围，“长城剧社”的同志向东突围。

才参谋长带领黄天等十几个同志迅速向西突去，不料落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被压缩到一片葡萄藤下，经过激烈的战斗，大家只剩下最后一发子弹，眼看突围无望了。才参谋长把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黄天噙泪环视，也举枪射向自己的头部，通讯员杨斌身受重伤，想阻止黄天已来不及了。接着，音乐队长今歌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枪声停止后，敌人冲上来了。杨斌狠狠地抓住日本鬼子的腿，鬼子嚎叫起来，用刺刀割断了杨斌的喉咙。流血过多的朱愉顶，昏迷后苏醒过来，当他费劲地睁开眼睛时，见到有几个敌人，而所有的同志都躺在血泊之中，他没有丝毫力气动弹，连声音也发不出来，只能又闭上眼睛。他是这场战斗中，唯一活下来的人，记下了这个令人撕裂心肺的悲痛场面。^④

黄天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优秀的人民的艺术家、杰出的艺术领导者。他的鲜血洒在冀东根据地的土地上，培育着那里盛开的文艺之花。

注：

1. 赵熙：《尖兵剧社》，未刊稿。
2. 张瑞：《墓碑前的怀念》，载《冀东文艺》。
3. 王维：《“地狱与人间”的演出》，载《解放军文艺》。
4. 刘大为：《三个共产党员之死》，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冀东子弟兵》，第一百二十六期。

四、杨奚勤烈士传略

杨奚勤，男，四川岳池县余家场人。我校1946年经济系毕业。

杨奚勤于1938年在岳池县中学读书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考入我校经济系。入学后，他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主义著作，钻研《资本论》，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

1946年夏，杨奚勤大学毕业后，回到岳池。其时，岳池县罗渡溪的士绅正集资筹建一所尚用中学，杨即被聘为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尚用中学成为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

杨奚勤深深懂得，只有办好学校，才能取得地方上的支持，才能更好地掩护党的活动。因此，他工作负责，办学认真，治事勤勉，使大部分学生学好了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了学校信誉，博得当地群众和士绅的一致好评。

在办好学校的同时，他积极在教师中秘密发展党员，使相当大的一部分教师成了地下党员。然后，他通过教师对学生进行政治形势的宣传、革命理论的教育，使一部分学生也接受了革命的道理。

杨奚勤对党的工作特别认真负责，细致周到。他布置同志外出联系时，常将联络点的环境、街道式样、何处拐弯、房屋特征、如何叫门、联络暗号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还特别关照，如果遇到几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应如何对付，使得联络工作顺利进行。

1948年夏天，上级党组织决定在华莹山地区组织武装起义，以威胁重庆，牵制国民党的后方兵力，要杨奚勤同志积极准备。

杨奚勤当即派了复旦史地系同学张成勋同志去武胜县渠河东岸石龙场(现名伏龙场)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当时通过特殊关系，把石龙乡的乡长发展入党，掌握了石龙乡乡公所的火枪。又收编了一支华莹山上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是受国民党迫害、生活无着被迫落草的农民队伍，经过教育，使其接受了党的领导。

当时，华莹山地区有一个袍哥韩大爷，手中掌握着几十支人枪。杨奚勤想争取这支队伍参加起义。他和张成勋二人赤手空拳，前去赴会。见面时，韩的卫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经过谈判，韩表示不参加武装起义，但也绝不危害起义队伍。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把韩争取过来，可也解除了后顾之忧。

武装起义虽在积极准备之中，由于时间短促，各项条件尚不成熟。可是因为重庆地下市委遭到国民党破坏，市委负责人刘定国成了叛徒，直接威胁到起义队伍的安全。这时，上级党组织决定，立即组织武装起义。

当时，杨奚勤同志结婚刚刚三天，他无条件地接受上级党的决定，把尚用中学的革命师生及有关力量加以组织。这样，一支有二百人左右的起义部队便在武胜县石龙乡建立起来了。

1948年8月15日，起义部队举行誓师大会，杨奚勤代表上级党委宣布：华莹山起义部队第七支队正式成立，杨奚勤同志任第七支队的政委。他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讲话。会后，开仓济贫，并把队伍开赴华莹山区。

8月28日傍晚，第七支队行军到达武胜县义和乡附近，准备进攻义和乡街镇的时候，突然四周响起了枪声，他们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杨奚勤同志非常镇定，迅速指挥队伍突围，他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则主要攻击敌人封锁我军退路的机枪阵地，以掩护突围。战斗十分顺利，部队突围成功，敌人开始溃退，杨奚勤同志想乘机夺取敌人机枪，不幸被枪弹击中前额，壮烈牺牲，时年28岁。

· 五、王朴烈士传略

王朴原名王兰骏，男，1921年生，四川江北县人，我校新

闻系学生，中共党员，于1949年10月28日被枪杀在重庆大坪，时年28岁。

王朴同志的父亲是个大猪鬃出口商，母亲金永华早年受过新式教育，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崇拜秋瑾女侠的为人。王朴六岁时，曾随父母去过日本，在国外受尽歧视，越年返国。王朴幼年，常听母亲讲述岳飞、文天祥等故事，因此从小就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他读书用功，生活俭朴，虽然家中富有，但从不乱花钱，而对买书和帮助别人，却毫不吝惜。

抗战初期，他先后在求精、广益、复旦中学读书，均因对学校当局的倒行逆施而罢读。他博览群书，后来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马列主义理论。这些跟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拍即合，他心悦诚服地加以接受，并在行动中努力贯彻。他逐渐超越了妈妈给予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反过来向妈妈介绍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高尔基的《母亲》，是他们母子都爱读的小说。

王朴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金永华只好挑起一大群儿女的抚养和教育的担子。因为家中有一大笔田产，生活上倒也没有什么忧虑。她只是希望儿女们能个个成人，在赶走日寇、复兴祖国中作出贡献。她发现：长子王朴的功课好，说话做事都有道理，在弟妹中很有威信；王朴结交的朋友，都是些正派人，他们似乎在干着一件神圣而伟大的、可她还不能理解的事业，不过，她深信自己的儿子是正确的，她只是常常慈爱地关怀他，要他注意身体。的确，自从王朴于1944年秋进入我校新闻系之后，他就生活在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当中。他积极参加了何晓沧等同学创办的《风马牛》壁报社，参加了杜子才、陈以文等同学创办的《中国学生导报》社，他接受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跟刘光、张佛翔同志发生了联系。194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校复员回沪时，他因工作需要没有东

下，留在重庆秘密活动。

1945年7月，他响应党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江北县复兴乡悦来场，创办莲华小学、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王朴担任校长。这些学校成了党在农村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的据点，以此来培养骨干，发展党组织。

1947年冬他担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随着革命的前进，川东各地党的事业有了大的发展，需要大量经费。党组织要求王朴同志，劝说他的妈妈把江北和巴县等地合有1600多担谷子的田产，卖掉了1480担，折合一千多两黄金，借给党作经费。王朴同志还按照党组织的计划，把这笔巨款存入了银行，在重庆宏泰大楼租了一层楼面，开办了“南华贸易公司”，自任经理，母亲金永华为董事长。自此以后，川东地下党购买枪支、药品等等的活动经费就有了着落；“南华贸易公司”还成了与上海、香港等地上级党组织的联络站。

1948年4月，《挺进报》事发，中共重庆地下市委被破坏，特务到江北复兴乡监视志达中学的动向。王朴沉着镇定，让一些同志安全转移，自己却留了下来。

王朴同志预感到形势紧迫，可能发生意外，为了让母亲思想上有所准备，他在妈妈面前朗读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并对妈妈说：“娘，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我更希望你把爱我的心去爱我的同志，继续办好学校，保护好那些老师，这才是你对我最大的爱，最深的爱。娘，我现在就等你的一句话了，你就这样爱你的儿子吧？娘……”。妈妈理解了儿子话中的含意。这时，母子两人泪眼相看，妈妈张开了口，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别过头去重重地点了点头。终于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带有颤抖的声音：“你放心吧，别管我……”。

他们立即动手清理东西。妈妈把棉絮浸湿堵在窗口上，帮助

儿子把党的文件一份一份地烧掉。火光照亮了母子两人的脸，更照红了他们的心。

1949年4月25日早上，王朴同志去重庆跟上级接头，即因叛徒出卖，受到了敌人的监视。同志们劝他赶快离开，但他还不能走。27日早晨，王朴去南华公司上班时，被特务逮捕了。但是，他什么都不说，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敌人开始只是用“以物资资匪”的“罪名”指控这位“经理先生”。岂料叛徒刘定国当堂指认他是共产党员，并对他劝降。王朴同志气愤极了，迅即给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对他威胁利诱失败之后，王朴同志被移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禁。

就在他被转移到“白公馆”时，他就给妈妈和妻子留下了遗嘱：“请转告母亲，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给孩子取名‘继志’，继无产阶级革命之志。

“请告诉我爱人褚群同志，‘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在“白公馆”，王朴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坚定沉着，始终忠贞不屈。他在狱中还继续坚持学习，和同狱难友共同探讨一些理论问题。

1949年10月28日上午，看守突然来说“某处长找你去城里谈话。”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早已作好了准备。在囚车上，他和另外几位难友一同被押去大坪的途中，王朴同志向沿途群众宣传了重庆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鼓舞大家继续斗争。面对着死亡，王朴同志高唱国际歌，英勇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途程。

应该提到的是，王朴同志的弟妹和妻子都继承了烈士的遗志，先后入了党；王朴同志的妈妈金永华老太太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在她八十四岁高龄的时候，于1984年7月

1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继续在儿童教育工作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

王朴烈士的光辉形象，正鼓舞着人们前进！

六、陈以文烈士传略

陈以文，男，湖北江陵人，1923年1月生，我校化学系学生，中共党员。1949年11月14日晚，他跟江竹筠、朱麟等三十多位同志被敌人枪杀在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的电台岚垭，烈士们的遗体被敌人投入硝磺水中毁灭。

陈以文自幼勤奋好学。1935春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入在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1938年春又以优异成绩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在我校化学系，每期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他从小就关心天下大事，热爱祖国和人民。刚进初中那年，正发生“一二·九”运动，他就跟随着武汉的学生到省府门前静坐请愿，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

旺盛的求知欲，使他读了很多文学、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高中时，他已把德国物理学家赖欣巴哈的《原子与宇宙》一书读完。这本书把他带入了中子、量子、光子等微观世界中去，他多么想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啊！可冷酷的现实是：山河破碎、国难深重，又迫使他去探索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当日军迫近武汉，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他随校迁住鄂西建始县三里坝，学校并入省立联中建始高中。在那里，他结识了杜子才、魏世楨两位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介绍陈以文接触了许多革命真理，使他豁然开朗并且确定了自己的道路。1940年9月，经魏世楨介绍，陈以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反动军警几次到学校逮捕进步学生。当时在建始中学任支部书记的陈以文，在上级领导下，妥善地转移了

已暴露的同志，并在党员中加强了教育，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保存了学校党的实力。此后，组织上叫陈撤离。他改名陈济之，在湖南安乡县政府里以雇员的身份为掩护，继续在湘鄂交界地带活动。后来在动乱中失去了跟组织的联系，经友人介绍到枝江县中教英文。尽管这样，他仍自觉按照党的教导广泛团结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把许多进步歌曲介绍给音乐老师，在同学中唱了起来。

终于，他打听到杜子才和魏世楨两位同志都已进了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就设法跟他们取得了联系。1942年秋，陈以文考进了我校化学系。在这个民主空气比较浓厚的学校里，他遵照“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努力学习，积极活动，他被称为我校化学系的高材生。还跟新闻系的同学张济生等合办过《科学与哲学》壁报，探讨学术，颇有影响。

当时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我校设立了“据点”，建立了“核心组”。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也随着形势的发展活跃起来。1944年夏，陈以文跟杜子才等积极筹办《中国学生导报》社。这是一张南方局青年组直接关怀和领导的进步报纸，在当时“国统区”的学生和职业青年中都有一定影响。同时，它又是一个以我校同学为基础、跨校的革命群众团体。陈以文同志以该报副社长的身份，为筹措经费，组织稿件、编排印刷和发行等事务，四出奔走，经常往返于重庆和北碚之间。有时还得徒步走卅多公里的路，有时甚至还得饿着肚子干。当时陈以文在重庆戏剧学校和中学兼课，他把薪俸的大部都给了该报，只留小部给自己和父母，维持最低的生活。随着该报社员的扩大，他的工作也更辛苦，常常在各个学校区里跟社员往来，了解情况，组织学习，总结经验等等，以致累得生了病，还吐过血。

一九四五年前后，中原解放区扩大，急需干部。中共中央南

方局动员一批大学生去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原来输送革命青年经三斗坪去中原解放区的交通线，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了，派出特务加强了封锁。这时，陈以文便以他在湘鄂一带工作过，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跟另一同志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交通线，继续输送了很多进步青年去解放区。仅《中国学生导报》社经陈以文组织，从北碚出发去解放区的前后就有二十多位。

日寇投降后，陈以文同志的父母返回沙市。党组织原拟要陈也回武汉工作，但他以《中国学生导报》社工作需要，对重庆情况熟悉，开展工作有利而留了下来。

1947年春，陈以文同志奉派去上川东农村工作。他改名陈方生，在中共上川东地委、川东临委领导下，在大竹、垫江、梁山、达县、邻水等县沿华莹山一带活动。他脱下学生装，剃了光头，穿上草鞋，戴上草帽，象走乡串镇的农村商贩。他翻山越岭跟各乡农民接触，参加他们的“兰交会”、“三五会”、“姐妹会”。他跟农民一起锄草、插秧、打谷，跟他们一道喝“血酒”盟誓，摆龙门阵，宣传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他生活在农民当中。为了反对抓壮丁，陈以文把年轻农民组成“变工队”，今天在你家干活，明天在他家干活。一旦保甲长来抓壮丁，只一声吆喝，或逃散，或自卫。这个经验曾在当时农村里推广。

经过一段时期活动后，这一带党组织有了发展，逐步建立了武工队。抗丁、抗粮、抗税的活动在这一带农村开展起来。陈以文跟这些武工队一起行军，还自编了一首《一杆红旗哗啦啦地飘》的歌曲，从这村唱到那村，从这个山岗唱到那个山岗。

大竹石干乡牛头寨的邓某，是个袍哥，又是土匪头子。陈以文同志只身往见，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邓跟他签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使我们的队伍在邻水、大竹一带，可以在那里

顺利通过。

邻水县护邻乡住着个姓包的“县参议”，恶霸地主，经多次教育无效，继续为害地方。陈以文同志召开了党的会议，作出了决定：派两名武工队员把他干掉了。除了一霸，群众拍手称快。

工作中，陈以文又病倒了，又吐了血。同志们要他休息，他微笑着说：“为了全国人民早日解放，个人牺牲也值得的。”当他身体稍微好了一点儿，他又拿起了枪，带领着武工队继续战斗了。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五百块银元要他的头。大竹的警察局长说他是共产党里的“神行太保”，来去无踪。

1948年初，陈以文带领的队伍，配合北面梁山、达县农村的武装起义，破坏了敌人的“清剿”。同年三月，陈奉命转移到垫江农村开辟新区，很快就使长江以北，梁垫公路以东，远至忠县一带都成了我们武装活动的广阔地域。

敌人也在这同时加紧了对陈以文的缉捕。他们甚至把陈以文的父亲从湖北沙市抓到渣滓洞集中营，说他是地下党的联络员，逼他交出儿子。这位老人在狱中不屈不挠，说：“我同儿子多年不见面了，叫我到哪儿去找？”“你们乱抓人，父贖子‘罪’，天下哪有这个理？”还说：“我儿子热爱劳苦大众，光明正大，又有何罪？”他深得狱中难友爱戴，称他是“狱中之父”，由于舆论的压力，陈父被关了几个月就释放了。

到了1948年12月，陈以文在垫江周家场做一个恶霸地主的劝说工作。这家伙暗中向特务报告了陈的情况。一天深夜，正当陈以文和朱麟在陈初文家开会时，被大批军警包围，他们一时无法撤退而不幸被捕。一连串的威胁利诱，电刑拷打都没有使他们屈服。敌人要陈以文回答“你们有多少人？哪些是同党？”陈回答说：“我们的人很多，整个垫江县、周家场都是我们的人，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党！”

国民党垫江县党部书记换个口气说：“青年人容易失足，只要悔过就好了……。”

陈以文被激怒了，站起来质问：“为祖国，为民主，为全国人民的解放，无丝毫过错可悔！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残杀人民的你们，才该悔过！”

1948年12月31日，敌人把陈以文同志等移送到了重庆渣滓洞集中营，他们又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但谁也没有畏缩和屈服。

陈以文同志在狱中投入了难友们的学习活动，他把《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背了下来，把《土地法大纲》和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用竹签子蘸木碳粉水，写在撕下来的衬衫布上，传给别的牢房供大家学习。他跟文化低的难友补习文化，讲解通俗的科学常识。他检查了自己在统战工作中，特别在这一次劝说恶霸地主时的失误，使党遭到损失而深感痛心。难友们都深受教育。

当刑伤渐好，就在狱中练“八段锦”以增强体质。他充满信心要在解放以后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1949年11月14日傍晚，渣滓洞岗亭上响起了梆声，开来了四辆军车。接着看守把陈以文等同志一一喊了出去。什么都明白了！

陈以文同志平静地跟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坚定地说：“同志们，天快亮了！斗争到底就是胜利！再见！”

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7岁。

七、石文钧烈士传略

石文钧，男，四川云阳人，我校学生，中共候补党员。

石文钧同志出身于地主家庭，生活富裕。他天资聪慧，学

习努力，是云阳中学的高材生。在云阳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四川万县师范学校。当时，何其芳同志在万县师范教书，对他影响极大。后来，他考入重庆复旦大学读书，受到民主空气的熏陶。离开学校后，他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公务员，还做过小学教师。

1948年初，他在云阳跟刘孟伉同志取得了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村革命运动，发动和组织农民，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年四月，他不幸在万县被捕。

被捕后，他经受了敌人多次审讯，均未屈服，也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后被移送至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

在渣滓洞，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地经受敌人各种酷刑的折磨。敌人对他奈何不得，终于在1949年11月14日晚，把他跟江竹筠、朱麟等三十多位同志枪杀在电台岚垭，遗体被投入硝磺水中毁灭。

八、胡其芬烈士传略

胡其芬，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南。女，祖籍湖南湘潭，1918年3月生，幼时聪慧异常，六岁能文，喜爱歌舞，是父母的明珠，家中的宠儿。1939年，在我校新闻系肄业。

1936年，她在南京女子中学时，受堂兄胡叔度（中共地下党员）影响，与兄弟姐妹等参加抗日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父母返回湖南，遇见张天翼先生，遂参加“伤兵之友”社，终日奔忙不息。1938年，全家入川，她在重庆参加了董必武组织的青年团体，并由她堂兄胡叔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她考进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学习。由于她在校中搞进步青年活动，引起“中统局”特务注意，被迫离校。1939年转学复旦新闻系。当时，她参加了孙寒冰先生主持的

“文摘社”工作，由于才识过人，表现突出，深受孙先生赞赏。

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复旦，孙先生遇难。胡也因身份暴露，被调至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担任副刊《妇女之路》的编采工作，同时为周恩来、邓颖超做点资料工作。她这时改名胡南，经常模拟鲁迅笔法，在报上发表切中时弊的杂文。

皖南事变以后，她一度离开重庆，辗转贵阳，桂林等地，从事妇女运动。1941年底，党组织派她到延安学习。临行时，回家辞行。其姐永芬向她谈起一个亲戚被捕自首的事，她说：

“如果我被捕，决不叛变自首，一定做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到延安，她先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被评为优秀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邓颖超身边工作。重庆谈判期间，她作为中共代表团随员到重庆工作。在此期间，她严守纪律，极少外出，更少回家。后来，她又随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1947年春，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她奉周恩来之命，秘密返回重庆，从事地下工作。

这时，她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人员，广泛联系女工和学生，后来女青年会会长对她产生怀疑，她不得不离开，改作四川省财政厅厅长何北衡的家庭英文教师。

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中共重庆地下市委被破坏，敌人四出抓人。4月某日，她得到通知，要她马上撤离。她在通知另一同志撤离后，又返回何家销毁机密文件，不幸被捕，关在较场口第二监狱，半年后转移到渣滓洞集中营。

胡其芬在狱中表现十分英勇机智。特务头子徐远举对她实行“疲劳轰炸”，一连几天地连续审问，她都机智地对付过去。她有一种见血晕倒的疾病。一次审问时，她故意咬破自己的嘴唇，鲜血直流，使自己晕倒过去，敌人只得被迫停止审问。

在狱中，她还办过英语补习班，组织一些难友讨论土地改革，及时对难友进行教育。她还和曾紫霞同志一起做看守人员和狱医的工作，争取他们传递信件，和外边取得联系。

在狱中，她几次带信给她姐姐。一次讲她可能要转移到成都，要家中给她多准备些棉絮、药品；一次讲敌人已经认出她来了，从此出不来了；一次讲她和江姐，李青林关在一起，她们在做红旗……。她还托人带出一个反映监狱斗争的剧本，可惜已经散失。

重庆解放前夕，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渣滓洞实行疯狂地集体屠杀，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放火焚尸。胡其芬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九、胡作霖烈士传略

胡作霖，男，四川开县人，我校新闻系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重庆《新民报》记者。

胡作霖曾就读于省立重庆联中。为人富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在读高中二时，学校无理解聘了三名进步教师，同学很不满。他与一些进步同学出面反对，被学校开除。由于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终于迫使学校收回了成命。他继续在学校学习，并且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秋，他考入我校新闻系，在系里很活跃。他有一副好嗓子，在中学里就是抗日救亡合唱队的歌手和指挥，他非常喜欢革命歌曲。在夏坝的校园里、新闻系会、晚会上，在三五同学之间都常常可以听到他富有感情的歌声。他想用那些歌声抒发对旧社会黑暗的憎恨，诉说人民的苦难，唤醒沉睡的城镇和村庄，鼓舞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呼唤黎明的早日来临。革命的音乐培养了革命的歌手，革命的歌手唱着歌生

活、战斗。

他热爱读书。小说、诗歌、革命理论，什么都读。还常常跟一些同学交谈、讨论、争辩。谈的范围很广：政治、哲学、经济学，谈国际国内时事形势，也谈人生观，谈未来和理想。在谈话的间歇，常常响起了他的嘹亮歌声，表示那是讨论告一段落。

他从小注意体育锻炼，虽是中等身材，可也壮实如牛，常常在冬天故意不穿棉衣。这位中学时篮球、排球队的队员，拳力很大，足重百磅。那时，每天清晨有个《新华日报》的小报童从北碚过江来送报，深受进步师生喜爱，却为那时复旦的军事教官、特务头子陈曷德所不满。陈经常指使一些特务学生去刁难，欺侮甚至殴打那位报童。这时，胡作霖就常常主动做了报童的“保镖”，有意走在他的前前后后。他常常对同学们说：“这些家伙敢上来，我就请他吃一百磅！”当然，他并没有打过谁。因为，特务学生见有他在，也就避开不来了。

1945年秋，胡作霖同志大学毕业后，到重庆《新民报》社任外勤记者。他出外采访，都是到社会的最低层，报道人间的不平事。他写苦力、失业者、流浪儿等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他也常与《新华日报》社记者一起出席各种进步团体的集会，多次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特务暴行的文章。重庆海棠溪河边，当时有特务在那里训练狼狗，特务唆狗伤人，群情激怒，聚众殴打了特务。他作了专题报道。轰动山城的“浮尸案”，说一木筏上钉着一具一丝不挂的女尸，女尸之夫为袍哥大爷，她因不服丈夫虐待，其夫便凭借流氓势力，将她活活钉在木筏上，顺江漂流。一时山城某些小报，都作黄色淫秽新闻，竞相大肆渲染。胡作霖同志得悉，忙往采访。有人劝他宜少费精力，他瞪着两眼说：“真也罢！假也罢！都能戳这社会一个窟窿！”

在报社他分工担任采访社会新闻。1947年学生运动高涨，他主动参加采访，从七星岗到沙坪坝、北碚、白沙沱，忙忙碌碌，来往奔波。劳顿之余，还常一曲高歌，便消除了疲劳。

1947年6月1日，重庆大、中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反动宪兵、警察、特务倾巢出动，大肆抓人。因为胡作霖同志常常出现在学生运动当中，遂同时被捕。他被关在重庆军统秘密监狱。在狱中，他很巧妙、机智地对付了特务进行的各种挑衅性的审问。一次放风时他遇见一位熟识的同志，胡作霖挤到他的耳边，轻轻地哼了一句“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便带着微笑走开了。由于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各校学生罢课声援，他经报社保释出狱。这是他第一次遭反动派逮捕。

1948年初，他曾回开县家乡去过一次，了解到当时下川东各地在党领导下蓬勃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他返回重庆后，表示不久也决定回乡参加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没想到就在那年6月7日，他在重庆《新民报》社第二次被捕，被囚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

在狱中，他一如既往，乐观豪爽，歌声不断，教难友们大唱革命歌曲。他把叶挺将军的《囚歌》谱成曲子，在狱中教唱；还将难友们创作的《囚徒大合唱》，谱曲教唱，使歌声传遍狱中。这战斗的歌声，使阴冷的牢房，变成了火热的战场。

1949年11月27日，胡作霖同志被敌人惨杀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时年二十九岁。

十、艾文宣烈士传略

艾文宣，男，四川广安县太平乡人，我校教育系肄业，后

转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

他大学毕业后，回乡当过乡长。由于他秉性耿直，厌恶国民党官场恶习，耻于阿谀逢迎，不愿作有害人民的事，遂被撤职。

1946年，他到岳池县尚用中学教语文、历史，教学态度认真，很受学生欢迎。

1948年，他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不幸失败被捕。

在狱中，他镇定沉着，乐于助人。他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难友讲述历代兴亡的史实，赞颂各朝英雄的事迹，以古为鉴，更加坚定了难友们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艾文宣爱好文艺，喜欢写诗、作对联。有一次一位难友年满三十，他作了一付对联：

“为民主而坐牢，九个月中从无怨言；
恨独裁才革命，三十年来视死如归。”

难友们对此十分赞赏，也充分反映了艾文宣同志自己的坚定意志和革命情操。

在狱中，经艾文宣同志联系，集合了二十多位爱好诗歌的难友，秘密组织了“铁窗诗社”。其中复旦同学就有艾文宣、胡作霖、张永昌三位。“铁窗诗社”的宗旨是：“以竹签笔作投枪，以棉布灰作炮弹，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控诉美蒋反动派的罪行，诅咒黑暗，歌颂光明，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们写狱中的生活和斗争，写坚贞不屈的战士，写未来的理想。他们不仅自己写，也鼓舞狱中难友大家一起写。当然，他们也很小心，做诗以背诵为主，必要时才抄在纸上，根本不留作者的姓名。即使这样，有的难友作诗仍被敌人发现，打烂了双腿。可是，难友们毫不畏惧，继续作诗不止。艾文宣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下了他的《宣誓》一诗，可惜至今尚未找

到。

1949年初，歌乐山寒风呼啸，天气奇寒，可也预示着春将到来。难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和迹象，得悉三大战役的胜利，大家耳语互告，欣喜不已。一位难友激发诗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权把牢房当我家，长袍卸去穿囚褂；
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

艾文宣同志当即和了一首：

“别妇抛雏不顾家，横眉冷眼对虎牙；
深知牢底坐穿日，全国开遍胜利花。”

艾文宣跟“铁窗诗社”的难友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诗句，发自肺腑，气壮山河，使同志斗志昂扬，令敌人心惊胆战。正如艾文宣同志在一首诗中说的那样：“中国人还活着，这册血写的帐簿，将是一块历史的丰碑”。

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艾文宣同志被敌人杀害于渣滓洞集中营。

十一、张永昌烈士传略

张永昌，男，四川大竹县人，我校史地系学生。

1937年秋，抗日烽火弥漫祖国大地。张永昌这时考进重庆求精中学读书。他一面努力学习，取得优异成绩；一面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与同学们合办壁报，宣传抗日必胜，反对各种悲观失望、动摇妥协的论调，受到同学和老师的赞许。

张永昌爱好文艺、喜欢历史。他广泛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和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史学论著，每天必读《新华日报》，还偷偷地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九四二年三月，他高中毕业后，父亲原来要他学商科，他却根据自己的爱好，考入了重庆复旦大学的史地系。那时校内民主空气比较浓厚，他受进步师生的熏陶和影响，觉悟更有所提高。

一九四四年，他参加《中国学生导报》社，担任发行方面的工作。这份周报，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关怀下，由复旦大学学生杜子才、陈以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负责，是一份民主的、进步的刊物，在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张永昌在其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张永昌由复旦大学转到重庆求精商学院学习。求精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大多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时事，他广泛联系群众，引导同学阅读进步书刊，使大家逐渐走上爱国、民主、进步的道路，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该院院长曾经施展种种伎俩，企图阻止学生参加民主运动，但张永昌紧紧团结进步同学，和学校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排除各种干扰，使进步的学生运动逐渐开展起来，打破了一潭死水的局面。

1946年底，北平发生沈崇事件。次年1月，重庆学生发动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张永昌被选为全市抗暴联合会主席团成员，示威游行那天，他昂首挺胸地走在队伍的前列。以后，他与《益世报》记者程途（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联系。

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限令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中共代表团成员撤返延安。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新闻记者和民主人士。就在这一危险时刻，张永昌不顾家庭和亲友的反对，决定到重庆《国民公报》做新闻记者。

在《国民公报》，他主动要求采访文教消息，经常往来于学校比较集中的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当时，在特务监视之

下，采访学运新闻，工作十分危险，可他乐此不倦。

1947年8月，经程途介绍，他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他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电台特支委会青年委员，负责青运和新闻界一部分的组织工作。从此，他的工作范围更加广了：为了给党筹措经费，他经常出现在金融市场和纱布市场搜集经济情报资料；为了支援上、下川东武装斗争，他配合程途同志秘密购买武器药品；为了中共重庆市委掌握情况，他多方探听敌人军政情报；为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及时地把《挺进报》送到有关地下党组织、进步师生和文化人手中。尽管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总能出色地完成任

1948年初，敌人下令追捕张永昌同志，情势危急。党组织决定他转移到下川东、黔东游击区去。但在出发前夕，被叛徒刘定国出卖。1948年4月13日，他去重庆南温泉南林中学补行入党宣誓以后，在归途中遭敌人逮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凛凛正气。

1949年11月27日，张永昌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十二、唐慕陶烈士传略

唐慕陶，男，字尚福，别号突，四川巴县长生乡人，生于1920年，我校经济系毕业。于1949年11月27日被敌人杀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唐慕陶同志，幼年聪颖，进本乡天文初级小学，继读三益高级小学，以其成绩优良，常受教师和同学称赞。毕业后入巴县县立初级中学，后以同等学历考入重庆南开高中。他亲见日寇猖狂，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他受到党的教育，提高

了觉悟，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地下联络工作。1941年秋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课余兼任北碚“三才生煤矿公司”会计主任。1946年大学毕业后执教于民兴中学，以进步思想影响学生，旋入重庆聚兴诚银行，充任行员。再半载调赴万县分行，任会计主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加强了法西斯独裁。唐慕陶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地下工作。因事机不密，于1948年6月14日在万县聚兴诚银行被捕。敌人审讯时，他只承认是共产党员。后解押至重庆渣滓洞，经多次审讯，他沉着坚定。一次敌人提他到重庆城内去，要他一起去逮捕他以前南开的两个同学，他拒绝说出那两个朋友的住处。

在狱中，他喜为大众服务，做事踏实认真，敢作敢为，常与看守特务发生冲突。一次，囚室陈作仪同志因拾得特务的一份报纸，阅后投入马桶内，被敌人查出。全室同志受到严密禁闭，不准吃开水的处罚，那时正是大热天，唐慕陶同志便利用放风的时间用竹筒偷偷地送了几筒开水进去。送最后一筒被敌人发觉了。值日特务要打他手心，他反抗。特务就朝他身上乱打，打得他全身鲜血直流。全体难友齐声高呼抗议，特务始罢。

1949年11月27日晚，敌人把他喊出去时，他从容就义，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高贵品质。

十三、何柏梁烈士传略

何柏梁，又名何国彬，男，祖籍四川重庆，1917年生于上海，我校经济系学生，中共党员。

何柏梁，在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后，考入我校经济系，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多种工作，最

后出任重庆安生公司经理，他以职业为掩护，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由于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1949年1月6日，何柏梁在重庆被特务逮捕，关进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

何柏梁在狱中表现坚定勇敢，很关心同志，热心为难友们服务。他常常打扫卫生，冲洗厕所，并做下层特务的工作。他通过一个特务值日官的关系，每周得到一张报纸看。这就使难友们了解到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更加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他还通过这个特务，从外面购买些药品进来，帮助生病的难友们。当时，渣滓洞集中营痢疾、疟疾流行，死了不少难友，弄到药品就治好了不少人。

他家在重庆，每周家中送东西来，他都分给大家用，对于需要营养的难友，他总是多分一些给他们。

在狱中受审时，特务问他：“你是一个公司的经理，有那么多财产，为什么还要参加共产党呢？”他回答说：“是的，我是个经理，有很多财产，应该说，我比你们都阔绰。但我觉得一个人有钱，一个人享福是可耻的，共产党是为全人类谋幸福，使每个人都享福，所以我参加了共产党。”这种广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理想是敌人所不能理解的，骂他是“不易感化的硬骨头”。

重庆解放前夕，何柏梁同志被敌人杀害于渣滓洞集中营。

第三节 著名学生传略*

一、邵力子生平简史

一、简 历

邵力子，原名凤寿，又名闻泰，字仲辉，一八八二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县陶墟乡邵家楼。父亲是清朝官员，幼年随父各处迁徙。一八九七年父死，邵住在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外祖父家。早年在私塾读书，后入南洋公学肄业，①一九〇二年，赴杭州应庚子、壬寅并科考试，中举人。②时年二十一岁。一九〇三年入震旦学院学习。③一九〇五年转入复旦公学学习，一九〇六年秋离校，去日本筹募经费、考察新闻。④一九〇七年四月，协助于右任、叶仲裕等人在上海办《神州日报》。一九〇八年加入同盟会。一九〇九年冬，经于右任介绍至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陕西当局迫害，被驱逐出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工作，并为复旦公学复学奔波。一九一三年兼任复旦教员。一九一六年一月，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受命和叶楚沧办《民国日报》。一九一九年，动员复旦同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担任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参加上海市各马路联合会总会工作。六月，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一九二〇年，邵力子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召开的座谈会，随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⑤

* 编者按：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全，研究也不够，这里仅是部分著名学生传略。

但邵对外以国民党员身份活动，在党内不参加组织生活，以后编入第三小组，与林伯渠等人为一组。^⑥一九二二年，他动员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自己担任教授，后任代理校长。一九二三年，邵与柳亚子、叶楚沧等人创立“新南社”，提倡新文学。

一九二五年，邵力子因担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又因积极支持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五卅运动，被上海英租界工部局驱逐出境。遂去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在黄埔军校，周恩来通知邵力子参加共产党的组织生活。^⑦

一九二六年一月，邵力子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八月，受国民党中央派遣，和谭平山一起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途经上海，中共中央陈独秀、瞿秋白等同志开会欢迎，肯定邵力子为中共工作六年成就，又提出邵力子去莫斯科开会；还是纯粹代表国民党为好。会上欢送邵力子退出共产党，他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就这样脱离了共产党。^⑧九月到莫斯科，十一月二十二日开会，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致祝词。^⑨会后，他参加反帝大同盟，至中山大学听讲。在中山大学，他与傅学文恋爱、订婚。邵前妻王氏，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去世，因忙于工作，至此始与傅学文订婚。

一九二七年四月，宁汉分裂，邵力子由苏联回国。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重新上台，邵力子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总司令部秘书长，与陈布雷、周佛海等为蒋起草文稿。邵被迫从命，但始终反对“剿共”，主张政治解决。

一九三一年二月，邵力子与傅学文结婚。婚后不久，蒋介石命陈布雷代替邵力子职务。邵力子回沪任中国公学校长、复旦实验中学主任。十二月，邵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其时，甘肃情况极为混乱，邵力子起初拒不赴任，一九三二年四月终于就职。一九三三年，邵力子改任陕西省主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邵力子也被拘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邵在其中起了作用。一九三七年二月，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国共两党在庐山再次谈判，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共产党代表，初步达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协议。邵力子担任宣传部长期间，允许左派的、抗日的刊物发行，作风比较民主。陈立夫、张道藩经常找他大吵大闹，蒋介石斥责他说，现在刊物“我知道百分之九十是共产党的，你做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邵便申请辞职，不久获准。^⑩

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邵力子任驻苏大使。一九四三年，任国民参政院、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邵力子在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邵力子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选举。一九四七年，他任国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政府顾问委员。

一九四九年一月，邵力子力主和谈。二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人北上，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前往。四月，邵力子又任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去北平，和中国共产党谈判，主张接受和共产党协议的条款。国民政府拒绝和平协议后，邵遂留居北平。

一九四九年六月后，邵力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主席团成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邵任政务院委员。并在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单位任职。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七年，邵力子以浙江省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

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坚持不懈地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奋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二、复旦种种

邵力子既是复旦最早的学生，又是复旦的教师、校董，他在复旦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又以爱国、民主的精神，推动复旦的发展。

一九〇二年，邵力子在南洋公学专班学习，秋天他去杭州应考期间，南洋公学学生为了反对学校行政的封建压迫，集体退学。一九〇三年春，退学学生一部分创办了爱国学社，一部分和马相伯先生筹建了震旦学院。邵力子也进入震旦学院学习。在震旦学院，他深受爱国老人马相伯的熏陶。他说，马相伯“日讲治学作人之要，古今中外学术源流，往往历数时不止”，“于寻常事物，辄广喻引伸，穷竟天人之至理，融会贯通，博大精深，洵兼备之”，每论及“国事机隍，民生凋敝，痛言救危济亡之道。环睹顾诸子、慷慨歔歔，声泪俱下，无不振奋警惕”。邵力子在这种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下，确立了“力学报国”的决心。^①

一九〇五年，法国天主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阴谋篡夺震旦学院的领导权，全校学生群起反抗，决定集体退学，并推举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七人为干事，协助马相伯，于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邵力子实际上是复旦的创办人之一。一九〇六年秋，邵力子离开了复旦。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邵力子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工作。当时复旦吴淞校舍为光复军司令部所占，经费无着，几有停办之虞。邵力子与于右任一起，将复旦情况向临时大

总统孙中山先生汇报，孙中山先生以复旦为富有反抗外国压迫精神的学校，极为关注，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发补助金一万元，指定校址，协助复旦复校。此后，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等人在《民立报》馆二楼，设立“复旦筹办事务所”，促成了复旦的复校。

一九一三年三月，邵力子兼任复旦公学国文教师。他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反对专制制度，抨击袁世凯复辟阴谋，常出王莽等题目要学生做作文，以启发学生觉悟。

一九一九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五月五日晚，他收到北京关于五四运动的专电后，立即打电话到徐家汇李公祠复旦大学，告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及被捕情况。五月六日上午八时半，他又赶到复旦大学，亲自敲钟集合同学，详细报告北京情况，并且说：“我们学校里面的同学，对于国家观念，在比较上是完备的，今儿……再不表示表示我们刚毅果敢的精神，那不独辜负了学校平日的训诲，你们自己又怎样对得起你们自己的良心呢？”^④在邵力子的教育和李登辉校长的积极支持下，复旦学生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支柱。

邵力子还曾担任复旦国文部的主任，一九二四年他提出将国文部改为中国文学科，担负起培养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人才的任务，一九二五年复旦中国文学科正式成立。

一九二五年夏，邵力子去广州，对复旦仍极关心，每逢重大问题，学校难以解决时，往往出力援助。

例如徐家汇李公祠校舍，原为前清邮传部暨招商局拨款建立，显系公产，辛亥革命后由江苏省都督庄蕴宽拨为校舍。一九二五年李鸿章后人李经方提出诉讼，赖邵力子之力，1931年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会令拨给李公祠屋宇基地永为复旦校产，此案始定。为了感激邵力子对母校的支持，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校长特命名附中新建教室楼为“力学庐”，

作为纪念，^④ 并举行命名典礼。

再如，复旦是一所由爱国师生自己创办的学校，学校经费非常困难。邵力子发起组织校友会，发动同学关心母校，支持母校，他自己也经常向学校捐款。一九三五年，为了庆祝复旦成立三十周年，他一次就捐款二千元，以帮助母校的发展。

又如，复旦是一所爱国民主的学校，“九一八”以后，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一二·九”运动中达到了高潮，成为上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度想封闭学校，赖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从中阻止，始免于难。邵力子对于复旦的进步教师如陈望道等人也是努力保护的。孙寒冰主编《文摘》，其中重要的进步文章，如《毛泽东自传》，就是由邵力子批准刊登的。

邵力子不仅对复旦尽力爱护，而且对马相伯老师，也是十分尊敬的。他和于右任每次到上海，都要去看望马老先生，每逢马老诞辰，他都要去祝贺。抗战一开始，邵力子和于右任就请马老去广西桂林避难，桂林被敌机轰炸后，他们担心马老师的安全，又动员马老去昆明，不料途中生病，滞留越南谅山。在马老一百岁诞辰时，邵力子、于右任发起盛大的庆祝活动。邵力子对老师的热爱和尊敬，是十分感人的。

三、主编《觉悟》

邵力子为了唤起民众、挽救祖国的危亡，长期以来从事新闻工作，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和主编。

一九〇七年，他协助于右任、叶仲裕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从事反对帝制的革命活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邵力子参加《民立报》工作，并兼《民声报》记者。这时，他用力子作笔名，采自《后汉书》。

樊哙传》中的“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他写了许多文章鼓吹革命，反对袁世凯军阀统治。一九一三年九月，随着“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迫停刊。

一九一六年，由中华革命党陈英士发起创办《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实行帝制，他和叶楚沧主持笔政。

袁世凯倒台后，政权仍旧把持在北洋军阀手中。《民国日报》外受军阀压迫，内感经济拮据，常常连印报的纸张也没钱买，甚至捱到半夜，由邵力子、叶楚沧、陈望道等人自掏腰包，典当衣物，买进纸张才能印刷出版。但是，生活尽管艰苦，精神却极昂扬。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邵力子的思想有了飞跃，与叶楚沧发生矛盾。于是，邵力子遂提出出版《觉悟》副刊，自任主编，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

一九一九年六月，《觉悟》从最初几期起，就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学说。这时，邵力子在《觉悟》上继续发表《古训怀疑录》，揭露有些古训是不足为训的。在他选登的文章中，明显地受着五四群众运动的影响，普遍认为今后的革命，不是少数革命党人的革命，而是大多数群众的革命，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依着公理上去做”，“还怕不能救国”。这里固然有着对赤手空拳的群众运动估计过高的天真想法。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觉悟》的最初几期上，有《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妇人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等文章，这对于帮助读者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很大好处，但是选译的文章，大多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

一九二〇年五、六月份以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邵力子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觉悟》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日益明确了。虽然，邵力子本人发表的大量的通信和随感录，主要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解答社会上出现的青年、妇女、劳动、婚姻等问题，而在刊登的文章中，已经提出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要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根本推翻的思想。《觉悟》还参加了当时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论战，反对张东荪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斗争。

邵力子在反对张东荪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斗争中，写了《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主义和时代》、《心与力》等文章。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指出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发实业，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给张东荪以有力的反击，起了良好的作用。

《觉悟》详细介绍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并主张“社会改革一定要以工厂作战场。如果要想社会革命，必须钻进工厂里去”，“真实地和工人做朋友”。

邵力子在编《觉悟》时，得到陈望道的协助，刊登了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杨贤江、瞿秋白、沈雁冰、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等人的文章，《觉悟》基本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当时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本副刊《觉悟》）中最进步的。

在列宁逝世以后，《觉悟》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和译文，其中重要的有李春蕃译的《帝国主义》、张太雷译的《马克思政治学》（即《国家与革命》）。《觉悟》还刊载了丽英女士译的恩格斯的《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觉悟》上还刊登过沈泽民的文艺评论，蒋光慈等人组织的“春雷社”艺术团体的作品，这些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萌芽。

当然，《觉悟》还不是党的刊物、在组织上不受党的领导，

而且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报纸，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觉悟》上也刊登了一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章，如杜威、罗素等人的讲演纪录等等，这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

在《觉悟》上，邵力子提出要发展科学，储备人才。他在《改造社会底最重要的事》的随感录中写道：“将来改造社会以后，科学必愈求其进步，产业必愈求其发达。不过所有科学与产业都要为真正的人民谋普遍的幸福，不再为少数人所利用罢了。但是，科学进步，产业发达，决非空口说白话的事，是必须有专精的学术和技能的，所以改造社会家一方面要唤起群众的觉悟，一方面却要准备高深的学术。俄国在社会革命成功之后，最感困难的就是同志中缺乏专门技术家，不得不在旧有的产业阶级里面去寻觅人才，勉强应用，其间知有多少困难，有多少危险。殷鉴不远，这正是我国青年最要省悟的一点。我国科学幼稚，比俄国更甚，如果不早自储人才，将来所谓的危险，一定比俄国更甚”。

邵力子在主编《觉悟》时，还积极支持成立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想利用办学名义来发财，登报说该校有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等著名教授，学费极高。一九二二年十月，学生来校，不见名教授，遂责问并赶走原来的校长，拟请于右任为校长，于初不答应。学生们转托邵力子帮忙，邵同情学生，力劝于右任答应。^④于便改该校校名为上海大学。成为挂名校长，后来由邵力子代理校长。

上海大学的教员，主要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如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杨贤江、侯绍裘等人，也有不少是复旦大学的教师、毕业生，如陈望道、叶楚沧、刘大白、邵诗舟、郭任远、李权时、谢六逸、毛飞、许绍棣、张廷灏、何世楨等人，都与邵力子有关。

上海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对此，帝国主义十分痛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包围搜查上海大学，抄去《响导》等刊物，遂对代理校长邵力子提出控告。^⑩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认为上海大学是发起运动的主力，遂借此将邵力子驱逐出境。

自从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就开始破坏国共合作，《民国日报》的叶楚沧明显地向右转。邵力子在离开上海时，曾对叶楚沧说，希望留有以后见面的余地。但是，这种劝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在邵力子离开上海以后，《觉悟》就成为不觉悟的东西了，再也看不到共产党员署名的文章。

邵力子离开上海后，对上海大学仍极关心，在他的要求下，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命令说：“上海大学代理校长邵力子，呈请政府准予援助上海大学建筑经费二万元，经十三次委员会议决，决补二万元，由财政部筹拨。”这样，上海大学才在江湾建筑校舍。

四、当地方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邵力子被任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四月就任，一九三三年四月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由杨虎城兼任。蒋介石和杨虎城的关系，由邵力子联系的。这时邵、杨实行军政分治，是双方协商同意的。因此，邵前往陕西接任时，杨虎城亲赴临潼华清池欢迎。在交接以后的几年中，邵、杨之间开诚相处，融洽协作，关系颇好。邵力子在陕西的几年，也做了几件可资记述的事情：

一、赈灾。陕西省连遭几年旱灾，地方穷困至极，民不聊生，饿殍载道。邵到任后，立即赈灾，进行救济。并与南京、上海华洋义赈会联系，争取支援。

二、合作。邵力子呼吁搞合作运动，创办陕西省农业合作

事务局，推动西安及其附近各县建立信用合作社，使农民多少受到一些益处。

三、水利。他积极支持水利专家李仪祉的建议和规划，大力兴修水利，修建了泾惠渠和洛惠渠。

四、农林。努力开荒，注意造林，进行水土保持，提倡选种、积肥，办好在武功的农林学校，培训了一批干部，使农业生产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

五、禁烟。陕西各县，原都种有鸦片，邵到任后，采取措施，分期禁绝。

六、文教。重视中小学教育，选送学生去南京金陵大学特设农林专修班学习，资送青年出国深造。

重视保护维修名胜古迹，对秦腔、皮影等陕西地方剧种，极力扶助，促其发展。

七、交通。协助陇海铁路逐步通车，并修通关中、陕南、和渭北、陕北各县公路，水运也有所发展。

邵力子在陕西期间，杨虎城、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秘密实行西北停火，并准备联合抗日。对此，邵力子加以默许，不闻不问。

五、出使苏联

一九四〇年五月，国民政府任命邵力子为驻苏大使，原因是想设法争取苏联援助。

我国抗日战争以来，苏联热情对我援助。但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援助突然停止。当时，于右任，冯玉祥、陈布雷、张季鸾等向蒋介石建议，派邵力子去任苏联大使，打开僵局。也有不少人劝邵不要去，指出这种一面一底，虚虚实实的把戏，是难以搞好的。但邵力子从搞好中苏邦交，促进国内国共团结出

发，毅然首肯了。

邵力子使苏以后，首先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年七月七日，是我国抗战三周年，苏联报刊热烈祝贺，赞扬我军的英勇抗战。当年冬天，苏联对我援助较多。

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签定。邵力子建议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表示德、意、日同盟对中、苏关系重大，中苏应一致对敌。蒋介石同意后，即与斯大林通了电报，斯大林回电希望中国保持并加强中国人民军。

但是，蒋介石一面表示对苏联加强邦交，一面又在国内发动皖南事变。邵力子原定在一月十七日举行宴会，宴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等人，苏方要求改期，可见苏联对此事的重视。邵力子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剖切陈词，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这个电报起了一定的作用，使顽固势力有所顾忌，有助于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突然袭击苏联，长驱直入，势如破竹。邵力子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却坚信侵苏是法西斯德国失败的开端。邵力子不管蒋介石爱不爱听，把战局转机的判断一再电告蒋介石，引起了蒋的反感。

邵力子在任职期间，签定了假道苏联的中亚细亚共和国运输英国援助我国物资的协定，虽然运输量不大，但在打开僵局方面是起一定的作用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下旬，邵力子回国述职。当时，斯大林格勒仍在危急之中，有反苏偏见的人认为苏联从此一蹶不振，邵力子回国述职时，即不准备叫他回任。邵力子回国后，到复旦等处做报告，指出苏军英勇抗击，必能转败为胜。有些人怀疑他在为苏联作宣传。蒋介石当时要邵担任行政院秘书长，邵坚决谢绝，声明愿回驻苏大使原任。一九四三年初，蒋介石通知邵力子，暂时留在重庆，等候任用，不必再回莫斯科。从

此，他结束了大使生涯。

六、和平老人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解放战争胜利，邵力子多次担任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任务，被誉为和平老人。

邵力子原来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后来又是跨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在二十年代初期，邵力子对蒋介石很佩服，有幻想，“几乎把他当偶像崇拜”。^⑩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蒋介石两次打电报要邵去广州，就是要利用邵力子这种特殊身份。一九二六年蒋介石派邵力子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目的是要邵向斯大林转达他的希望，即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力子觉得蒋的想法不对，指出：“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蒋仍要邵向斯大林转达他的这个意思。邵力子在见到斯大林时，并没有转达蒋的这个要求，而是谈“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斯大林未置可否。^⑪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苏联方面通知邵力子回国。邵到达上海以后，始知蒋已背叛革命。五月，邵去见蒋，蒋不问他在苏联的任务完成如何，要邵仍当他的秘书长。邵这时插翅难飞，只好对蒋说：“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⑫邵曾同张静江发生争论，并同见蒋，最后问蒋：“这样，三大政策岂不完结，仍旧靠帝国主义吗？”蒋怒形于色，斥他走开。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再度上台。委邵为总部秘书长。邵不敢辞，始终反对“剿共”，主张政治解决。^⑬

一九四三年邵力子出任国民参政会和宪法促进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各界民主人士有比较多的接触。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

四日，邵力子参加重庆各党派、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董必武、张澜、冯玉祥等五百余人的集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建立联合政府。

抗战胜利以后，邵力子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了重庆谈判，对促成“双十协定”，起过重要的作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邵力子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加会议，对达成政协决议，也发挥过作用。

一九四六年夏，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扯毁《政协决议》，悍然宣布召开一党专制的“国民大会”，邵力子拒绝参加竞选。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在军事全面崩溃以后，为了争取喘息时机，提出愿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的建议。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退居幕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后，派邵力子、张治中、彭昭贤等五人为代表和中共商谈和平，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邵力子明知这项使命艰巨，为了保持国家元气和减少人民痛苦，表示愿当代表，但不当首席代表。当时，中共发言人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二月三日，李宗仁与邵力子去上海，经多方协商，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邵力子以私人资格随同前往。二月二十日，中共方面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叶剑英等设宴招待代表团。邵力子被邀在会上发言。他说：“和平未能早实现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不选天津式的和平”。邵力子等人到石家庄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带着毛主席致李宗仁的信，回到南京。

李宗仁、何应钦决定成立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原拟请邵力子担任首席代表，他力辞首席代表，改推张治中担任，邵则以代表身份参加。

在北平谈判时，邵力子已认清蒋介石对和谈不抱诚意，希望桂系能够接受中共意见，在武汉、南京、广西等地实现局部地区和平解放，以促使全局和平。他把这个想法和李宗仁驻北平的联络员黄启汉谈过，要黄转告李宗仁。

在和谈期间，毛泽东主席曾分别找代表团成员个别交谈，其他代表都认为“惩办战犯”那一条难以接受，只有邵力子不提这个问题。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以后，李宗仁拒绝签字，谈判决裂。邵力子已作好不返南京的各种准备。

当时，邵力子还作了最后的努力，急电李宗仁“莫离南京一步”。李宗仁不听，飞去桂林。邵力子、章士钊又去电劝告，希望李宗仁在桂林“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李宗仁没有接受，又去广州。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又给李宗仁写信和打电报，劝其“当机而立断”，“力求所以勒马悬崖之计”，“共商恢复和平之道”。但是李宗仁没有也无力来恢复和平谈判了。邵力子为了争取和平，真是煞费苦心，不愧是“和平老人”。

七、解放以后

和平谈判破裂以后，邵力子留在北京，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还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工作，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一九五四年，邵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提出一个重大的国策问题，即要实行计划生育。他讲：“社会主义社会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计划

经济的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祖国更加富强”。他撰写《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反驳那些不加研究就用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吓人的谬论。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他自己花钱把他的有关节制生育的文章集纳成《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小册子出版，分送给有关人员。现在，计划生育已作为基本国策载入宪法，可见邵力子当年提出这个问题的远见卓识。

一九五七年，邵力子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台湾委员会主席。他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为台湾和平解放，作出重大努力。每年重大节日和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和忌日，他都发表谈话，赋诗著文，对台湾的故旧和广大军政人员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情况，衷心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掌握命运，为统一祖国作出贡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右任在台湾赋诗，怀念大陆：“破碎河山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邵力子便发表《勉励在台旧友》，引用于的诗后说，“我知道，这不只是于老个人的伤感，也代表了在台湾的许多朋友的心情。”他更加努力从事和平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工作。在他逝世后的追悼会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着重地肯定了他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而奋斗不懈的业绩。

八、思想、性格、作风

邵力子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他的思想是在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中不断进步的，始终紧跟着时代前进的步伐。

他的性格坦率诚挚，光明磊落、刚毅不阿，坚持真理，不畏权势。他一生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好学不倦，晚年更加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他工作十分繁忙，尽

量抽出时间读书，坐在汽车里读书，几乎成为他的习惯，即使只有一二十分钟，他也要在汽车里看书。

他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他家门口不设警卫，任人出入，在西安一时传为佳话。

邵力子一生自奉极为节约，但待人极为宽厚，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胜过百倍。他对一些老同学、老同事，总是有求必应，慷慨相助，尽量设法解决人家的困难。每月领到工资后，按月给那些贫困的朋友们寄生活补助费。每逢寒冬腊月，还耽心他们衣服单薄，额外补助御寒衣着费用。邵力子有位老朋友的儿子，先天性心脏病发作，住院开刀需要很多钱，急得孩子父母团团转，走投无路。他闻讯后，立即派人送去两百元，孩子父母收到这钱，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抢救及时，孩子很快恢复了健康。

邵力子反对封建婚姻，反对妇女守寡，教导青年要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他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他的次子邵子刚，留学意大利，不幸死在国外，儿媳在家抚育遗腹子。邵力子力劝儿媳先去日本读书，然后改嫁。他在重庆特为儿媳举办婚礼，请于右任证婚，邵力子把儿媳当作女儿看待，自己作主婚人。曾经传为美谈。

邵力子是一位令人怀念不已的长者！

注释：

- ① 1961年5月13日，邵力子在复旦讲话中提到：复旦是从震旦来的，1903年从南洋公学一班闹风潮散学而分出来的，有的同学认识马相伯先生，成立震旦，我是其中的一位学生。邵力子先生又在其他地方提到曾在南洋公学读书。周天度著，《蔡元培传》第11页中，叙述邵力子在南洋公学学习，因而认定邵力子是在南洋公学肄业过的。
- ② 清朝庚子、壬寅并科考试，为1902年秋。当时南洋公学特班学生去应试的很多，同科中举人的十二人。黄炎培亦为其中之一，见黄炎培：《八十年来》，第34页。

- ③ 邵力子：《相伯先生寿言》。见《复旦同学会会刊》1939年3月号，八卷二号。
- ④ 1961年5月13日，邵力子在复旦讲话中提到，他1906年住在吴淞复旦公学，发大水，不久离开复旦。据以推算，应在1906秋离开复旦，邵去日本募款，亦应在此时。
- ⑤ 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见《“一大”前后（二）》，第45—46页；又见周佛海《扶桑筑影溯当年》，《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55页，均讲邵力子是最早的共产党员。
- ⑥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238页。
- ⑦ 万枚子：《怀念新闻师尊邵力子》，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八辑，第31页；又见邵力子1961年5月13日在复旦的讲话。
- ⑧ 同⑦，又见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
- ⑨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一）第144—145页。
- ⑩ 孙越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我的关系》，见《文史参改资料》选辑第十八辑，第10页。
- ⑪ 同⑧
- ⑫ 汪嘉骥：《五四后本校大事追忆》
- ⑬ 朱承洵：《附中力学庐开幕琐闻》，见《复旦同学会刊》1934年12月号，四卷三期。
- ⑭ 《上海大学史料》第38页。
- ⑮ 同上第131—132页
- ⑯⑰⑱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0卷第184页。
- ⑲ 万枚子：《怀念新闻师尊邵力子》《文史资料选辑》第88卷，第22页。

二、金通尹传略

金通尹先生（1891——1964年），名问诛，一级教授，是一个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浙江平湖人，生于一八九一年三月十九日。幼读经史。一九〇五年，就学于马相伯先生创

办的复旦公学；一九一〇年以高等正科理科第一名毕业。一九一二年，考入北洋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学，毕业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在安徽第五中学任教，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一八年秋，应母校复旦大学之聘，任数学教授。

鉴于国家建设急需工程人员，他便于一九二一年，在复旦筹办土木工程学系（初称理工科）。当时既无设备，又无教师，经费缺乏，困难重重。他独承艰巨，自兼主任，讲授数学、力学等基础课程。精打细算，妥善安排，设备仪器与年俱增。为聘教师，对知名工程学者，多次登门，以情相邀，以礼相请，使开设课程，渐臻全备。经他苦心经营，土木系声誉渐著，各地慕名来学的渐增，遂与会计系并列，成为复旦学生最多的两大系。他是我国创办土木工程专业的较早者之一。复旦土木系，至一九五一年归并于交通大学土木系止，三十年间，毕业学生千余人，曾经肄业者又数百人，分布全国各地，从事房屋、桥梁、铁路、公路、市政、水利等建设，以及教育、科学和党政领导工作，均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所贡献，颇有成绩。

一九二三年，复旦大学授予金通尹先生为名誉理学硕士学位。

一九二九年八月，李登辉校长丧妻，孤身一人，悲伤过度，遂命金通尹兼任学校秘书长，总理全校的行政、教务和总务工作。每天，金先生办公桌上、文件、书信、报表、帐单等，总是厚厚一叠。他最早到校，最晚离校，从早到晚，除上课、接谈外，终日伏案，批文件、审报表、稽核帐目，起草和修改信稿，认真不苟，无片刻空暇；他在办公室午饭后，饭前饭后，亦不休息。更因日寇侵犯，政府压制，群情郁结，纷扰时起，排难解纷，倍极辛劳。

复旦当时为私立大学，经费极少。金先生本节约精神，紧

缩开支，积累镢铢。在他兼任秘书长的七年中，扩建图书馆，新建卫生院（即佩琳院），收购土地，扩展校址，添造宿舍（在简公堂南侧），购买“燕园”，开办排字印刷所和电动木工场，增添大批图书仪器。对学校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虽今日看来，皆微不足道，然在当时条件下，实非容易。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侵占沈阳。复旦师生集会声讨。李校长和金先生相继演说，慷慨激昂，以强敌侵袭，民族危急，激发师生爱国之情。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军进攻上海。复旦地处淞沪要道，日军三次占领。幸金先生预见于此，令各处将档案、帐册、图书、仪器装箱，连同部分校具设备，运存于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附中。后借该处开学上课。得使学校减少许多损失，弦歌不致中辍。

一九三三年秋，校务委员会推选金通尹为理学院院长。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国难日益深重。上海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一九三五年，继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之后，掀起抗日高潮。当时复旦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国民党政府为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对复旦领导人施加压力。李校长和金先生不畏强暴，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保护爱国学生。复旦学生带头赴京请愿，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军警中途逼回。于是，联合他校学生，组织宣传队，拟下乡宣传抗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无印刷宣传品经费，李校长和金先生解囊相助，使之成行。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夜半，军警多人终于在复旦校外宿舍逮捕学生。同时，特务数人翻越学校围篱，潜入女学生宿舍捉人，被人发觉。一女特务不及逃遁，为学生所扣。次日，大批军警闯入学校，逢人便打。李校长和金先生等非常气愤，前往制止，亦遭殴打。围守校外的军警竟举枪射击，误杀警察，反诬复旦学生所为，拟兴大

狱。李校长和金先生则痛加驳斥，据理辩护，奔走呼吁，积极营救。被捕学生，终得释放。因此，国民党政府对李校长和金先生深为不满，迫使李校长于是年八月告假，金先生同时也辞去秘书长兼职。复旦校董会推金先生为校董。

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战起，复旦西迁，初上庐山，继至重庆。此时，人心惶惶，秩序紊乱。金先生勇任繁剧，代理教务长。先借重庆复旦中学上课，后在北碚黄桷树镇租用民房复学，学校始得安定。后因父病告假回沪。乃遵李校长命，在复旦上海补习部（在当时公共租界赫德路）任教务委员会主席、土木系教授。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租界。他便恳辞职务，杜门谢客，蓄须明志，在家读书赋诗，诗多忧国忧民之思。

一九四五年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金先生出任上海晋元中学校长。一九四六年夏，任天津北洋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次年夏辞职。旋回复旦，任土木系教授。金先生博通土木工程学，曾先后讲授应用力学、材料力学、钢筋混凝土理论、砖石工学、水力学、水文学、河工学以及其他专业课程。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金先生任复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土木系教授兼主任。一九五一年夏，复旦土木系归并于交大土木系，调他担任震旦大学理工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夏，新建青岛工学院，又调他任院长。他依靠领导，团结同志，筹策建设，不遗余力。一九五六年夏，青岛工学院停办，改任武汉测绘学院副院长，分管总务。该院为五所院校的测量专业合并的新建学校，校舍、宿舍等刚竣工不久，其他设施均尚未完成。金先生不辞劳瘁，巡视检查，辟划经营、卓著劳绩。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得年七十有四。十八日湖北省委韩宁夫同志主持追悼会，周恩来总理送来花圈，湖北省委书记王任

重同志、省长张体学同志、高等教育部都有唁电，会场两侧，遍悬武汉测绘学院师生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武汉市委员会和各支部的輓联三十余对，感情真挚，表示对金先生逝世的深切哀悼。

金先生不好荣利、不图名位，以毕生精力为国家培养人材，勤勤恳恳，殚思竭虑，四十余年如一日。他还曾任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代表、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议论国事，语不妄发，精辟透彻、切中时弊。领导武汉民进市委工作，认真负责。逝世前一日，尚与往访者讨论民进工作多时。他兼通理工，并好文史，广读诗书，能文善诗。著有《率楼韵文选》，并有史作四篇和其他韵、散文三十余篇。

金先生为人正直、不阿权势，主持正义。一九四七年夏，他闻将解聘进步教授张志让先生，出而劝阻。他认识许多国民党要人，但从从不趋炎附势，也不为所拉拢。一次，蒋介石来上海，传令召见，他则设法躲开。清正自持，不与合污。解放后，见到共产党为国为民，兴利除弊，不禁赞叹不已，衷心拥护，主动靠拢。他在诗词中写道：“共念有生来，举国忍陵辱。而今起醒狮，不复伤逐鹿；正气辉日星，伟烈壮河岳。”“推倒三山重压，万物得春舒”。可见其心情的欢欣振奋。皓首耆年，犹努力读马列之书，服膺共产主义，老而弥坚。终于在一九五八年五月，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完全凭是非曲直，从国家人民利益而非由个人得失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

金先生忠于职守，对工作尽心竭力，认真踏实。处事公正，不厚亲薄疏，无门户之私。对人诚实，不说假话，不虚伪敷衍；待人仁厚，真心实意，出于至诚。爱人以德，与人为善；未尝有疾言厉色，亦无巧言佞色。怒责人，严律己。谦虚谨慎，

虚怀若谷，自作联语：“勤求己过，乐受人言”，悬于客室，时以自勉。因为他正直公正，诚实诚恳、谦虚仁厚，故能使人敬服，得人信任。因而能鼓励人、团结人，激发人的积极心。

金先生主要以其模范行为教育学生；其言则婉约诚挚，析理透彻，发人深思。他不作豪言壮语，亦无奇特行为。但其平日的一言一行，无不端正，足为楷模。正是那些看似平凡的寻常言行，给人以很大教育。身教重于言教，凡受其教，或与之交，莫不受其熏陶而深为所感。虽相隔日久，犹怀念之不已。一九八一年，为纪念他诞生九十周年，散处全国各地的学生百五十余人集资抄印其所著《率楼韵文选》。一九八四年，在沪学生和复旦校友等八十余人，为他逝世二十周年举行纪念会，有从北京、重庆、长沙、武汉、济南、南京、广西、浙江等地寄来纪念诗文和题字，其中有曾在青岛工学院和武汉测绘学院工作过的同事，足见人们对他的缅怀和景仰。一九三〇年，他在《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序文中，以自重勉励同学，他说：唯有自重者能有所不为，有所不争，有所必为，有所必争。这正是他为人的准则。他的生平言行，可概括为四句话，不为所不当为，不争所不当争，为所当为，争所当争。他为人品德，可概括为四个字：诚、正、谦、仁。经师易得，人师难遇。金通尹先生不愧是一位难得的人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三、竺可桢传略

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于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三月七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县）的一家米店里。

他的父亲就靠经营这月小店，维持他和妻子以及三个男娃

娃和三个女娃娃的生活，家境并不富裕。竺可桢虽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也得不到过多的照顾。比他大十四岁的哥哥考中了秀才，在东关镇小学教书。竺可桢五岁就进入这个小学。在他哥哥严格要求下，从小培养了刻苦、认真学习的良好习惯。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四书》、《五经》之外还接触到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开拓了眼界。

当时，他从经常接触到的农民中，听到他们“靠天吃饭”、“人种天收”的议论，年轻的竺可桢就开始了“老天爷”的观察，开始认识到气象变化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命运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九〇五年，竺可桢十五岁就离开家乡，进入上海澄衷学堂。由于自幼体弱，又营养欠佳，加上经常废寝忘食的读书，因此显得面黄肌瘦。公子少爷胡适是他的同班同学，对别人说：“瞧竺某这穷小子，包管活不到二十岁。”这些话传到竺可桢的耳里，引起深思并下决心加强体育锻炼。这不但使他体质逐渐增强，并从此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一生坚持体育锻炼，并在古稀之年还能科学事业奔波在祖国的西北各地。所以，他常喜欢跟朋友们说：“从反对自己的人那里，也可以得到好处呢！”

他在澄衷学堂以成绩优良，为人正直在同学中博得很高威信。为反对校长独断专行，聘用不称职的教师，大家推他为学生代表跟校长谈判，竟因此触怒了校长的“尊严”，竺可桢和他的同学都被“勒令停学”了。于是他于一九〇八年，转学来到复旦公学。

在复旦公学时，他待人和气、刻苦用功、成绩优良，给当时的同学如陈寅恪、金通尹等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不久，他转到唐山路矿学校学习土木工程，在那里又是全班最优秀的学生。一九一〇年，竺可桢二十岁，考上了第二次庚款留美生。

他先进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发现当时美国农业科学水平并不怎么样，想转入理科，却未获准。在那里他深感美国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于是参加了由中、印、日和拉美留学生等组织的“国际俱乐部”，并被选为委员。

一九一三年夏天，他在伊利诺斯大学毕业了。当时，国内正处于辛亥革命后不久政局混乱的局面。这促使他再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地学系去专攻气象学，认为还是踏踏实实学好科学，为中国广大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的好。他在哈佛又以他的勤奋求学、成绩优良获得好评。当时几个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等组织了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一九一六年这个团体的主要发起人都转入哈佛大学，竺可桢立即参加了该社，并担任《科学月刊》的编辑。《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是他发表在该刊，用现代气象学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论文，至今仍很有价值。

一九一八年秋，竺可桢在美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正值北洋军阀战混时期，谁也不重视科学事业。当时，又正好是他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之后，家境不佳的时候。他的朋友打算介绍他去作海关监督，可以有较丰厚的待遇。但是，竺可桢不愿放弃科学，他应聘于武昌高等师范，在那里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一九二〇年，他转到南京高师任地学系主任，教地学通论、气象学和世界地理等。他开始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的地理学、气象学家。由于看不惯校长吹捧江苏督军齐燮元，竺可桢于一九二五年离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一年，于一九二六年到了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为总干事，即请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

当时，中国没有气象台。只有由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为了他们的航运事业，在长江流域设有几个测候所和由法国天主教会控制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而日本气象台公然把我国沈阳、

长春、天津、南京、杭州和台南的气象列入日本的城市气象范围，完全蔑视了我国的存在。竺可桢非常气愤，曾著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大声疾呼，然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竺可桢决心为中国争气，经他努力，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气象台，并在各省设置了四十多个气象站和百多个雨量站。他坚持把英制气象记录改为国际通用制，坚持中国海关管理气象站权力，坚持气象电报集中广播的权利，尽自己的一切努力跟帝国主义势力作了不屈的斗争。他在南京气象台以身作则地刻苦工作，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其间先后开展了高空探测、无线电气象广播，整理了中国气象资料，为中国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六年四月，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出任副院长为止，共达十三年之久。他以科学家的严格精神办学，结合他回国以来的实践，发扬浙江大学的优良传统，提倡科学风气，明确以“求是”二字作为校训。他培养的目标是造就“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求学生不仅能“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而且“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为此，尽管在抗战时期的困难情况下，他仍努力设法罗致教授，建设师资队伍，依靠他们“民主办校”；四出张罗资金，充实图书、实验室设备，改善教学环境。当浙江大学在搬迁中辗转来到遵义之后，设置了文、理、工、农、医、法和师范等七个学院，后来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在浙大演讲时还称誉它是“东方的剑桥”。

当浙大西迁到江西泰和，竺可桢前往广西宜山察勘新校址时，他的妻子张侠魂和二子竺衡得了痢疾，竟因缺乏药物先后病逝。竺赶回泰和时，竺衡已死，没过几天，妻子也离开了人世。他强忍悲痛，料理好后事又继续为浙大迁往宜山的事昼夜

奔忙。

当浙大离开杭州时，竺可桢知道文澜阁内藏有《四库全书》这一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建议教育部将它西迁。教育部就委托浙大负责此事。竺可桢专门派了李絮非和陈长水两位工作人员负责。这套书共计十六万八千多册，经过多少艰难险阻，终于运到了贵阳子母洞。直到抗战胜利，这部书又随浙大完好地迁回了杭州。

虽然竺可桢当时是按照“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工作，但在关键时刻他总站在进步力量的一边。一九四〇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为了抵制国民党党棍控制浙大，保护学生，不顾该党棍以辞职相威胁，就准他辞职并启用了他反对的费巩教授，取代了他担任训导长。费巩帮助学生自治会，办起了《生活壁报》，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后来费巩教授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由重庆去北碚复旦在船码头被特务绑架失踪。为了怀念这位民主战士，同学们把《生活壁报》改为《费巩壁报》。当费教授失踪的消息传来，竺可桢立即四处奔走，多方打听，努力营救。竺可桢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他打听到费巩已遇害时，还不愿相信，第二天还去有关方面打探情况，没有放弃营救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一月太平洋战争波及香港时，人民群众对孔祥熙用专机把老婆孩子连同四条洋狗从香港接到重庆，而对许多陷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却不闻不问一事非常愤怒。浙大学生也准备参加遵义市区的游行。竺校长连忙出来劝阻，说“街上的军警早就荷枪实弹等在那里了。弄得不好会流血。就在学校集会、演说、抗议吧！”同学们对他说：“竺校长，你也是爱国人士，难道你对香港的那些同仁，不寄予同情？”他说：

“我同情你们，也支持你们，可最好你们不要去游行。”同学们还是坚持要去，而且说得很有道理。他的眼睛也湿润了，从一个学生手中接过纸旗，带着学生一起走出了校门。

在行进中，竺可桢顺道去遵义警备司令部找到司令，要求他下令军警不要干涉这次学生的游行。这样，总算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是，以后蒋介石责备了那个司令并命令他“严密监视”浙江大学。

日寇投降以后，浙江大学又迁回了杭州。竺可桢原以为赶走了日寇后可以集中精力搞科学，搞教育，医治战争的创伤了。岂料蒋介石发动内战，镇压人民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并把特务的魔掌伸进了高等学府，也伸进了他的浙江大学，竺可桢的心情十分苦闷。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特务在校外绑架了浙大学生于子三等四人。竺可桢立即四处打听营救，岂料特务已先下毒手。当竺可桢于十月二十九日找到当时的省主席沈鸿烈时，沈告诉他，于子三已自杀。竺当即责问：“于子三何罪，需要自杀？”沈无言以对。竺即引用《孟子》中语，责问：“杀人以挺与刃，何以异乎？”他立即约了医生、学生代表等去伪保安司令部于子三遇害的现场，时伪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法医已先在，布置了一种自杀的假现场，该“首席检察官”要竺可桢在“于子三以玻璃自杀”的法律文书上签证，竺可桢以科学家的严格求实精神，询问“为什么没有留下遗嘱？”“用来自杀的玻璃哪里来的？”拒绝签证。

当时，他悲愤交集，体力不支，幸经医生打了一针才没有晕倒。随后，他又向《大公报》、《申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于子三是无辜的，要求当局查明真相，惩办凶手。后来，当于子三之死大白于天下时，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愤怒，纷纷抗议示威。蒋介石命令朱家骅劝说竺可桢“更正”。竺的回答是：“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他跟同学们说：“真理在我们这

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而那个时候，解放战争的形势更好，刘邓大军已经渡过了黄河，直驱大别山，蒋家王朝开始摇晃了。

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隐蔽在上海。上海一解放，跟陈毅市长的几次接触以后，竺可桢思前想后，结论说“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晚上，他跟几位科学家在北平应周恩来的邀请共进晚餐，亲切交谈，商讨新政协的筹备事宜，征询他们对于科学、工农业建设的意见。竺可桢深有感触：新中国需要科学，科学在新中国大有用武之地。

建国以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科技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气象学会理事长，兼任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中德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建国以后，为了合理地、充分地利用我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竺可桢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综合考察。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间，他经常出现在西北黄土高原实地考察，访问许多丰产模范，总结他们的经验，分析水、风、地形、坡度、雨量、土质、植被等等自然要素对农作物的影响。一九六一年，他以七十一岁高龄参加南水北调考察队，活跃在海拔四千米阿坝高原、深峻的雅砻江峡谷。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竺可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沫若在支部大会上赠诗说：“雪里送来炭火，炭红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这正是对竺可桢恰当的评价。他学识渊博，曾从事许多学科的研究，一生著作不少，有《竺可桢文集》等问世。

在诸多研究中，竺可桢特别提倡物候学。他从一九一八年回国后不久就每天观察、记录物候和天气，并将两者联系起来

研究，注意物候知识在农业中的作用，还搜集古代有关物候的文献资料。他根据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南京的物候记录安排农事，证明比依据二十四节气安排更好，因而主张以物候观测为基础，制定新的农事历。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间，他逐渐组织建立了物候观测网。建国以后，自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三年，他连续二十四年，每天观测，从未间断，全部记录完整保存。一九六六年，他写成《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一百周年纪念会。以后，他又不断增补修订。这一著作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大家公认他在气候学的历史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气象学家吉野正敏说竺可桢：“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他为人们留下的丰硕遗产，非常宝贵。这是他毕生研究的成果，但还说是“初步研究”。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广，古代资料又非常复杂，竺可桢再加上自己历年观察积累的记录资料，应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得出气候变迁的分析成果，这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无怪英国《自然周刊》评论“竺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并说“西方气候学者无疑将为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

科学无止境，竺可桢还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晚年又写了《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提出还必须探索物候的内因和外因，必须从生理学、遗传学方面来深入研究，揭示其中的奥秘。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竺可桢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用他那颤抖的手，记下了他坚持一生的、最后一天的气象记录：“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只是这最后一天的记录，只能依靠气象局的报告，他已不能亲自到室外观测了。因此，他还负责地在这段记录的旁边注

上了“局报”两个字。

他的手举了举，但终于没有能再举起来。伟大的科学家勤奋一生，无愧于人民地用高度负责的精神走完了科学家的道路，终年八十三岁。

竺可桢不仅古文修养很好，而且年轻时就学会了英、法、德三国语文。建国以后，从六十多岁起开始学习俄文，他坚持了十年，终于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就能熟练掌握它了。他是南方人，南方口音很重。到北京工作后，为了工作，生活方便，他还认真学习普通话。每逢冬季，他还常常带了女儿去北海溜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体育锻炼。直到八十三岁时心肺才逐渐衰竭，但他仍坚持每天观测气象和物候。他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苏联气候界又在宣传地球变冷的消息；说列宁格勒近些年比一九四〇年温度低摄氏一度。我在《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已指出，这类摄氏一度上下的变迁，过去五千年中极为普遍，不能以此为地球变冷的证据。”看来，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科学见解。他在这段文字的前面，还用红笔写下了“杞人忧天”的标题。

他的前妻张侠魂不幸在抗战中病故以后，到一九四〇年，跟原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工作的同事陈汲女士，在峨眉山结婚。从此，竺得到了一位贤良的助手，替他担负起照顾女儿竺梅和儿子竺安的生活和日常家务，让他更能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中作出成绩来。当一九七四年一月竺可桢住进病房后的一天，陈汲来到他的床前，他想起应该交代一件后事，说：

“我身后有件事要办”。

“什么事？”

“竺薪的存款，全部当作党费交给党吧！”

陈汲答应了。原来自一九六六年以来，竺可桢把逐月工资

的三分之一，用“竺薪”的名义存入银行。七年来已达万元左右。竺可桢律己严格，对子女也一样。他常对陈汲说：“对子女不可溺爱，也不要给他们多余的钱。给他们太多的钱，反而害了他们。”

竺可桢认为科学精神就是“求是”，追求真理。他注意古今中外资料的搜集，注重实践、考察、记录。这种精神也养成了他天天写日记的习惯。一九三六年元旦前的日记，在抗战时散失。自一九三六年元旦到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逝世止，共三十八年零三十七天的日记，无一天间歇，共有八百万字左右。这些日记不光是他个人科学生涯的见证，还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一份留给后代的宝贵遗产。

虽然他在复旦公学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母校却满怀深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卅一日，他到过北碚复旦大学，并应史地学会之请，向复旦师生作了《大西洋宪章与战后和平》的报告。会后，他参观了母校。在日记中，他回顾了他在光绪末年在复旦的往事，写道：“复旦有学生一千九百人，川籍四百人，较清末远盛矣。”但他也指出：“复旦房屋不少而设备太差，是其缺点也。……知文学院院长现为伍蠡甫，梁宗岱为外文系主任，陈望道新闻系主任，理院为李达……。”这反映了他对复旦母校的关心。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李登辉病逝上海。十二月廿一日，复旦同学会发起在青年会四楼举行李登辉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许绍棣主持，大家推竺可桢担任主祭。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下感受：李登辉“其人品确极可佩，不愧为一代宗师也。”又称赞李“奉基督教甚虔而罕以强聒人，可谓有古代君子之风。”

竺可桢待人诚恳、亲切。他最恨吹牛拍马。他认为阿谀奉迎的人不是老实人，而科学家必须是老实人。他说：“科学的

态度，就是老实的态度，一方面不畏强暴，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同时，也不要武断，不要凭主观臆测，对人对事应一无成见，虚怀若谷。”

这也是竺可桢一生的自我写照。

四、俞颂华传略

俞颂华名垚，又名庆尧，笔名澹庐，江苏太仓人，一八九三年三月九日（清光绪十九年农历正月廿一日）生于上海。

大约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四年，他在复旦公学学习，一九一五年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著作，一九一八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得学士学位。其间，一九一六年底曾回国与钱梅先女士结婚，婚后又去日本学习。

俞颂华在中学时代，就关心时事，喜爱读报，立志做一个利国利民的记者。从日本回国后，一九一九年四月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后又参预《解放与改造》杂志的编辑工作。《学灯》创刊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到一九二五年止，前后换了近十个主编。只有在俞颂华任主编时，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担任主编后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发起“社会主义”的征文。一个多月后，又登出启事，欢迎关于社会问题、劳动问题、产业组合、妇女等问题的稿件。不久，《学灯》上陆续刊出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稿，还刊载了李大钊、陈望道等人所写的文章，转载毛泽东所著《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同时，他还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园地，郭沫若最早的两首新体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张闻天的处女作《梦》和叶圣陶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主编《学灯》时发

表的。

一九一九年底，俞颂华的岳父钱菊人介绍其担任李家整的日文秘书，李当时为北洋政府派驻海参威的外交特使。俞颂华不得不去海参威一次，终因兴趣不合，放弃了这一待遇优厚的职位。

一九二〇年，俞颂华提出赴苏俄采访，在梁启超、张东荪的支持下，他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特派员身份赴苏，一同前往采访的有瞿秋白和李仲武。他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前往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三人之中，只有俞颂华担任过记者、编辑工作，瞿秋白、李仲武两人是俄文专修馆刚毕业的学生。所以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新闻记者的责任，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自己的力量罢了。’……我与颂华说，请他负通信事务指导的责任，我当竭力帮助。”正因为如此，访苏初期发回的几十条专电，估计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出于俞颂华的手笔。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他们从北京出发，二十日到达哈尔滨。时值苏俄红军与谢米诺夫白军在满州里一带作战，铁路中断，滞留五十天后，才继续前进。他们沿途亲身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后所遇到的困难和艰苦生活。火车烧的是木柴，蒸汽不足，走得很慢。又因木材缺乏，停止供应暖气，车中很冷，玻璃窗上结着厚厚的冰。十二月十八日到达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他们在那里访问了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克腊史诺思赤夸夫，俞颂华当晚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了会见情况。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俞颂华等一行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俞颂华等人会见了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外交委员加拉罕、教育委员卢那查尔斯基等苏俄领导人，参观过克里姆林宫。他们在苏俄采访所写的通讯，分别在

上海《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上发表。

五月十九日，在苏俄住了三个多月以后，俞颂华离开俄国，经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转经德国，改任两报驻德国的特派记者。苏俄方面的任务，交给瞿秋白、李仲武两人去完成。当时他们三人已结成亲密的友谊，只得依依惜别。俞颂华离开苏联后，写了《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的长篇通讯，在《晨报》上连续刊登三十七次，向中国读者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相，并根据自己思索的结果，对苏俄得出两点结论：一、“认为俄国革命前途，与世界革命有密切关系”；二、认为“俄国共产党所恶的欧美士商阶级的政府和日本的军阀财阀”，“至于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共产党对之却很表示好意和同情”，他奉劝人们“不必对于劳农俄国发生什么无谓的庸人自扰的恐慌”。在当时条件下，他秉笔直书，敢于为“过激派”的“赤俄”说话，是很有胆识的。他的这篇通讯，是后来《晨报》出版的《赤俄见闻记》一书的主要内容，曾多次再版。

在德国三年，俞颂华仍任记者工作，但时常到柏林大学旁听，同时研习哲学、论理学、马列主义等学科，研究得最多的是黑格尔的小逻辑。1924年，俞颂华由德国回国，在轮船上翻译了斯登堡所著《柏拉图政治教育今解》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回国以后，俞颂华担任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授。1928年，经复旦公学老同学钱智修邀请，他参加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编辑《东方杂志》，同时先后兼任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劳动大学等校教授，讲授社会学、论理学等课程。

他在担任《东方杂志》编辑期间，1931年7月，又应李孤帆之请，兼任“中社”创办的《新社会》半月刊的主编。《新

社会》主张革新政治，抗日救国，反贪污、反独裁，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刊物。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编译所、印刷所、东方图书馆被日军飞机投弹焚毁，损失惨重，《东方杂志》暂停发行。同年5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邀请俞颂华进《申报》，创办并主编《申报月刊》。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仍由俞颂华主编，这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俞颂华在主编《申报月刊》期间，特邀鲁迅、茅盾、巴金等人撰文。刘思慕当时逃亡日本，为了维持生活，经常写稿投寄沪上报刊，《申报周刊》采用较多。1936年初，俞颂华邀请投稿人石西民参加《申报周刊》工作，他发现石西民思想激进，劝其谨慎，但十分信任。当时《申报月刊》还发表了不少介绍苏联建设的文章。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以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俞颂华在《申报》总经理马荫良的支持下，1937年4月与孙恩霖两人，赴西北和延安采访。他们在延安三天，和毛泽东在窑洞里谈了一个晚上，并会见周恩来、朱德、徐特立、傅连璋、张国焘等人。这次采访，他写了《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的通讯，虽在新闻检查时被删去不少内容，但仍向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不少真实情况。他在文章中说：他进延安时，就看到“城门两旁的城墙上‘和平统一’和‘团结御侮’的很大标语”。离开延安时，又“回头看看”“八个大字”，“不由得感觉愉快。因为我觉得八个大字，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虽这聊聊数语，却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是“国难严重的一线曙光”。俞颂华在陕北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分期在《申报周刊》上刊载。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里罕见的消息和图片，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陕北革命根据

地的情况有所了解，揭穿了反动派的谣言和诬蔑。

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后，《申报周刊》停办，他建议《申报》迁汉口出版。他自己则应胡文虎之邀去广州筹办《星粤日报》，后因日机轰炸广州，报纸无法出版而罢。10月初，他转赴汉口，参加《申报》出版的筹备工作。1938年初，因和《申报》汉口版负责人在发行工作上意见不同，发生争执，遂被《申报》辞退。这时，他收到马星野来信，邀请他到湘西芷江任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教授。该校系国民党党校，原来马星野就曾多次邀他，他均未同意；此时为生活和形势所迫，勉强应允。

在芷江政校，他讲授“逻辑学”、“新闻写作”等课。1938年夏，他随政校迁往重庆南温泉。到南温泉后，他常与老朋友俞寰澄、金国宝、邹韬奋、黄炎培、戈宝权、沈志远等过往。1940年夏，陈立夫命马星野送来参加国民党的表格，要他填写，他不愿意，遂离重庆去香港办报。

到香港后，他先任《星报》总主笔，数月后赴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俞颂华在《星洲日报》只工作了九个月便返回香港，原因是国民党为了加强控制海外华侨舆论，向胡文虎施加压力，硬派一个姓关的去当总编辑，把俞迫走。当时，民主政团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梁漱溟邀他担任总编辑。同时，他又应黄炎培之请，和俞寰澄一起，共同编辑《国讯周刊》香港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光明报》、《国讯》停刊。俞颂华在1942年初，逃出香港，辗转至桂林，任《广西日报》总主笔。该报经俞编辑后，邀请金仲华、千家驹、胡仲持等进步文化人撰稿，版面一新，销路由数千份增至二万份。《广西日报》的星期增刊，就是俞颂华主持时办起来的，文章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多采，颇受读者欢迎。

正因为俞颂华工作取得成绩，就不能再在那里呆下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一面通知《广西日报》社长黎蒙，讲俞颂华另有任用，应即辞退；一面致函俞颂华，请他到重庆去做官。俞颂华不愿到国民党政府做官，《广西日报》也舍不得让俞离开。这样，俞颂华就留在桂林，不居名义，从旁协助黎蒙，继续为《广西日报》工作。

1943年5月，衡阳《大刚报》总编辑羊枣被迫离开，编辑部群龙无首，该社社长毛健吾得悉俞的情况，亲自到桂林礼聘，并迎接他到衡阳任《大刚报》总编辑。俞欣然应聘，立即动身。当时，俞身体极其虚弱，医生的结论是：“带病延年”，他却是“带病战斗”。在《大刚报》，他提高“星期论文”质量，创设《星期增刊》，发行敌后航空版。在俞颂华负责编辑时期，成为《大刚报》办得最好的大发展时期。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大刚报》馆迁往贵阳。俞颂华因长期颠沛流离，身体虚弱不堪，遂离开该报到重庆和家人团聚。黄炎培邀他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国讯》半月刊的主编。

1945年8月，抗战结束，位于四川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创设新闻系。该院院长陈礼江请俞颂华出任系主任，并且答应新闻系的聘请教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全由俞颂华作主。他为了培养正直的新闻记者，遂不顾病弱之躯，答应兼任新闻系主任。

抗战结束后，《大刚报》迁南京复刊，邀请他仍旧担任总编辑，如实在不行，请他挂个空名。但他了解到当时的《大刚报》已为国民党C.C.系控制，遂坚决拒绝。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贫病交迫，无地容身，暂住在一位亲戚的小亭子间里。朱家骅和他在德国同学，这时请他赴南京办报，许以洋房汽车，他嗤之以鼻，斩钉截铁地说：“三十年前，我不妥

协，三十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还是不妥协。就是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社会教育学院迁到苏州，他便去苏州工作，兼任《国讯周刊》主编。

社会教育学院的新闻系学生在俞颂华的熏陶下，成为该院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院内许多社团都以新闻系学生为中坚，学生自治会的历届主席也大多是新闻系学生。1947年5月，全国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学生积极响应，成为全院学生运动的主力。院方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对此惊恐万状，力谋镇压，三十多名学生被勒令退学，其中有新闻系多名。俞颂华闻讯由上海赶回苏州，找院长慷慨陈词，劝阻无故开除学生。由于俞颂华和其他进步教师的反对，院方将退学改为停学处分。

1947年夏秋以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势，扩大内战规模，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团体”，俞颂华忧愤交集，肺病加重，于十月十一日大量呕血而逝世，年仅五十五岁。

俞颂华逝世后，黄炎培在悼文中称其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王芸生送的輓联是：“有德有言不朽，无党无派以终”。这些评论大体上概括了俞颂华的生平。

俞颂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把毕生的精力，全都献给了新闻事业。他认为报纸、刊物是传播真理、主持正义、交流消息、启迪民智的读物。为了办好报纸，求真求新，他朝思暮想，矻矻午夜，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还不到五十岁，他已经是背驼齿落，两眼深陷，病体羸弱，老态龙钟了。可是，一提起办报，他就精神抖擞。这种献身精神，使人敬佩。

俞颂华虽然无党无派，但是有德有言，爱憎分明。他认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是正义和公正的精神，不为偏见所蔽；为文论政，要大公无私，代表人民；要忠于人民喉舌的职守，

淡于名利。”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访问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访问革命根据地延安，都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如实的报道。他的政治倾向，是十分清楚的。

俞颂华重名节、有骨气、讲操守。他常说：“我们所珍重的，最是名节，名利身命，粪土而已！”陈立夫拉他入国民党，他不失所守，愤然而去；潘公展逼他做官，他置之不理；朱家骅请他办报，许以洋房汽车，他嗤之以鼻。俞颂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安贫乐道，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正是中国人民的骨气、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的体现。

俞颂华不愧为新闻工作者的楷模！

五、孙越崎传略

(一)

孙越崎原名毓麒，浙江绍兴县同康村人，1893年10月生。他四岁丧母，父亲和继母去黑龙江，依祖母长大。十七岁考入绍兴城内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小学义务任教一年。1913年他到上海徐家汇李公祠复旦公学中学部念书。邵力子先生也是绍兴人，在该校任国文教员，孙深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当时袁世凯已窃据总统职位，还想复辟做皇帝，因而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壓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举国忧愤，定五月九日为国耻日，以志不忘国仇。孙毓麒鉴于有亡国之忧，前途崎岖，因改名越崎，音同而字不同，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用“崎”字取名，在日本很多，中国人罕见，往往有人将“崎”字误写为“琦”的。

1916年，他在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科，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身份，奔走活动。他与当时河北高等工业学校谌志笃、南开中学马骏等发动组织天津各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以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要求释放北京的被捕同学，而被开除学籍。后得蔡元培先生帮助，转入北京大学采矿系，1921年毕业。

(二)

他毕业后因病回绍兴家中休养二年，1924年初他到吉林省新办的穆棱煤矿（现为黑龙江的鸡西矿务局的一个单位）任矿务工程师近六年。该矿地处荒漠、盗匪出入无常，备尝艰辛。但他通过这一段工作实践，掌握了一个新开煤矿的从勘探、建井、产煤和运销的全部生产建设过程。1927年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曾到该矿进行调查，开始认识了这位工作踏实、干劲十足、成绩突出的年轻矿业工程师，对他十分赞赏。

1929年初翁文灏致电孙越崎推荐他为河北省井陘煤矿总工程师，他因准备出国深造，没有答应。1929年秋，他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矿科研究生院学习。但他无意于考取硕士、博士学位，因他学习目的是想回国后办矿，而不是当教授。他选读的课程都是自己在实践中感到不足的方面。后来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半年。实际上他去参观美国东部煤矿的生产建设过程。回国前又到欧洲英、法、德各国参观实习了各种类型的大小煤矿，历时半年。到1932年秋，他经苏联返国。他的家当时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哈尔滨，去国三年，回来却忽然成了亡国奴。他悲愤难抑，在家呆了不到二十天，就乘火车到大连，转搭轮船去塘沽，到了北平。

(三)

这年十二月，他经翁文灏介绍参加了在南京刚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前身），担任陕北石油探勘处处长。由上海订购钻机二台辗转运往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矿，发现出油不多，没有工业开采价值。

1934年10月，他又应翁文灏之邀去河南焦作担任濒临绝境的中福煤矿（由中国人办的中原煤矿公司与英国人办的福公司联合组成）总工程师，当年煤矿情况就迅速好转，后来他继任该矿总经理，产销两旺，年产量达一百多万吨，盈利很多，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华中一带的市场。

(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华北地区，孙越崎任中福煤矿总经理时，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决定把煤矿的绝大部分设备拆迁到抗战后方的四川。这是我国近代煤矿中拆迁到后方而没有沦入敌手的唯一煤矿。当时有些原中原煤矿公司董事长表示反对说，“这是我们河南的财产，不能迁走”。孙越崎向他们讲了三条办法：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走，另在后方找矿区，则敌人不能用而我国可以用。同时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归你们，在后方采矿所得利润也归你们。反对的人被说服了。原来英国福公司的代表也反对拆，说他们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他们的权益。孙越崎说，日本是英国的友邦，但它是我们中国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反对我们，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请示伦敦董事会，也同意了拆迁。

孙越崎全力组织全矿员工进行拆迁地面及井下的机器设备

和材料等，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装车托运到汉口。后经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大力协助，托运入川。他就以这批运川的器材先后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和四川银行界合办了天府、嘉阳、威远、石燕等几个煤矿公司，都由孙越崎任这四个公司的总经理，设四矿联合总公司于重庆。四川原有煤矿规模较小且系土法生产，自中福机器设备及技术员工迁川后，投入以上四个煤矿，开始近代化机器生产，产量大增，仅天府公司的产量，就供应了重庆全部用煤的一半。这对抗战后方工业和上海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的供应，贡献很大，并为四川近代化煤矿的发展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

(五)

我国燃料用油一向仰赖外国，抗战期间因港口被封锁，油源断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决定开发玉门石油。于1940年成立甘肃油矿局，任孙越崎为总经理。当时钻机缺乏，经翁文灏商得中共周恩来同志同意，将原存陕北的两台钻机调到玉门进行钻探，开始出油。同时向美国订购了旋式钻机十台和全套裂化炼油设备。因越南海防也被日军占领，只得用大批卡车改由仰光经滇缅路运到重庆，再转西北玉门油矿，运输路线长达五千余公里。后来仰光也沦陷，炼油设备全未运到，十台钻机运到一部分，只能拼成三套半。所需各种机器设备，只得在重庆三百余家迁川工厂定制。当时甘肃油矿局设总局于重庆，距玉门油矿老君庙矿场2500公里，主要为搜购器材输送到嘉峪关外的戈壁滩上的玉门老君庙矿场建设起一座新兴的石油城。孙越崎每年夏秋期间在老君庙矿场督促生产建设，冬春在重庆。他一人肩负经营甘肃油矿和四川四个煤矿的重任，当时人称他为后方的“煤油大王”。

1942年玉门油矿年产汽油180万加仑及其他煤油、柴油等油料供应西北军用交通和重庆工业民用等需要。这一年日军曾企图强渡风陵渡入侵陕西，由于我们有了玉门油矿的汽油，将苏联供应的大炮从新疆赶运到前线，打破了敌军侵陕的企图。1944年美国空军由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东京时，地勤用油也是由甘肃油矿局供应的。

1942年8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于兰州举行年会。该会每届年会时，公推工作有突出成绩的会员一人，授予金质奖章一枚。孙越崎继凌鸿勋、侯德榜、茅以升之后，在这届年会上得了一枚奖章，以表彰他在抗战后方开发煤矿和石油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孙越崎辞去四川四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由经济部派为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同时又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他在重庆招聘组织了上千名各种技术和工矿管理人才，陆续派在处理和去东北接收各重要工矿企业。他在1946年一年间先后出入山海关九次，往返于北平、沈阳等地主持处理局及东北工矿接收和恢复生产等工作。

1946年1月，翁文灏辞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钱昌照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越崎兼任副主任委员。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改由行政院直属，钱昌照任委员长，孙越崎兼任副委员长。

到1947年1月，孙越崎在平津处理局完成了处理敌伪产业收交国库法币1000亿元的任务及将东北各重要工矿企业交由资源委员会接办以后，他就辞去平津处理局局长及交卸东北特派员职务，到南京专职担任了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7年3月，钱昌照脱离资委会，翁文灏回任资委会委员长，孙越崎仍任副委员长。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越崎继任资委会委员长。1949年3月，何应钦担任行政院长，孙越崎任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任委员，至1949年6月前辞职去香港。

(七)

1947年7月，孙越崎又到东北视察资委会所属各工矿企业，从所见所闻中，使他认识到：国民党的败亡，共产党的胜利，基本上已成定局。何去何从，使他思想上发生变化。1948年2月，鞍山解放后，他从鞍山回到北平的人所说中得知，鞍山解放时，鞍山钢铁公司员工无人伤亡，留在鞍山该公司协理靳树梁、毛鹤年、邵象华、杨树棠、王之玺、李松堂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都被留下并受到优待。其他人员愿留者欢迎，愿走的发路条沿途放行。孙越崎得知此情况，大为感动和欣慰，使他对于共产党对工矿企业工作人员的政策有了具体认识，开始定了心。

1948年10月，孙越崎在南京资源委员会，以委员长的身份召集资委会所属各地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动员他们坚守岗位，保护好厂矿财产档案，弃暗投明，准备迎接解放，得到他们的一致支持，他还让他们回去后向附近会属厂矿负责人秘密转告。这就为资委会各厂矿企业和三万二千职员全部留在原岗位，弃暗投明奠定了基础。

(八)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1948年12月底蒋介石当面要孙越崎把在南京的资委会五个厂即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和马鞍山机器厂拆迁到台湾去。不久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台去奉化，孙越崎以为他一定亡

命国外，就下令把已运到长江码头待运的器材运回厂内按装复工，没有运到台湾。

蒋介石在奉化先后两次命京沪杭卫戍总司令汤恩伯转电孙越崎迅即拆迁工厂。孙因得到当时代总统李宗仁的支持，拒不拆迁。在白色恐怖的蒋管区，这样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幸而后来南京很快解放，得以幸免。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前夕，孙越崎转上海去广州，他携带资委会的美金支票150余万元到广州，电令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各资委会所属厂矿的负责人五十余人到广州向他领取美金兑成黄金或银元，以备在解放前青黄不接时供维持厂矿员工生活之用。孙越崎将该项美金全部发完后，于五月中辞职离开广州到香港。

(九)

孙越崎辞职到香港后，与中共在香港的乔冠华同志取得联系，并得到周恩来同志同意准备北上到京。当时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在港存有大批钨、锑、锡、汞等矿产品，孙越崎为保护此项矿产品移交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策动该所员工组织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与国民党的继孙越崎之后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航琛作针锋相对的保护这批矿产品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该所员工继两个航空公司在港起义之后，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并电毛主席致敬。接到了毛主席的复电嘉勉。接着孙越崎于1949年11月携眷回到北京，奉派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从此展开了他的新的历史篇章。

(十)

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各部会中，只有在孙越崎

领导下的资源委员会是唯一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起来护产，除原在台湾接收工矿企业者外，全部弃暗投明，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议，曾于1983年11月28日发出（83）695号文件中指出：

“解放前夕，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的上海、香港地下党情报组织，对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大量工作。资委会的绝大多数员工帮助我们顺利地接管该会所属的各地厂矿企业作出了成绩。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资委会的全体员工在护厂、护产、迎接解放是有功的，对于我解放后经济上较快的恢复起了一定作用。”并指出“对这些人应该妥善安排。”

资源委员会原来下辖有一百二十一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拥有职员三万二千余人，工人六、七十万人。职员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人员，全部留在大陆参加到革命队伍。连曾任资委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二人，都由孙越崎电请他们从法国、连同在台湾的家属返回大陆。他们都先后回到北京，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优待。

（十一）

孙越崎回到北京后在中财委计划局任副局长时，兼任该局基本建设处处长，对建国初期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定出了一套基本建设程序条例，明确了“施工必先设计”的具体规定，由中财委颁布全国遵照办理。至今仍是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原则。

1952年秋，中央财委撤销。孙越崎原从事煤矿工作数十年，因而调他到离京最近、全国最大的开滦煤矿总管理处任副主任。他不顾年龄大而经常亲自下井视察指导工作，受到全矿员工的好评。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特嫌”受到冲击，隔离审查

一年半后释放，但仍限制行动。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至1979年终于得到了平反。

1976年7月在唐山大地震中，他的住房震倒，他夫妇二人被压在瓦砾堆中，四个小时以后，经邻居抢救挖出，他的肋骨被压断，九死一生，经送北京医院治疗，受到党组织的亲切慰问。他出院后，就定居在北京。1981年调北京任煤炭工业部顾问。

(十二)

孙越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至五届的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中央煤炭工业部顾问，民革中央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建设组组长，中央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等职。他现在虽已年逾九旬，仍精神饱满，耳聪目明，日常工作及参加各种会议不断。近两年来，他还到山东兖州煤矿地区、内蒙包头及西部乌达、海渤湾矿区调查支边，到京郊蔚县调查开发煤气资源，并同全国政协小组到重庆市调查综合体制改革的情况等，回来后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具体建议，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他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深受人们敬仰。

六、孙寒冰传略

孙寒冰（1903—1940年），原名锡琪，江苏南汇县周浦镇人（现属上海市），父亲在上海开一家木器店，很难维持温饱。孙幼年曾随舅父去东北，做过电报局的电报生。因此，他深知劳动人民的痛苦，一生对劳动人民十分同情和尊重。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孙寒冰正在中国公学学习，

他积极投入运动，代表中国公学，参加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工作。第二年，他转学到复旦大学读商科。

复旦的商科主任是薛仙舟先生。薛先生认为只有合作主义可以解救中国劳动人民的贫穷和苦难，他在复旦提倡合作主义，创办合作商店、合作银行，并与《民国日报》合办《平民周刊》。孙寒冰对此很感兴趣，参加了《平民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写出一部《合作主义》的小册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

一九二二年，孙寒冰从复旦商科毕业，做过一个时期的编辑。次年，他与唐淑德女士订婚，唐系民国初年担任过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的孙女，孙寒冰同班同学唐榴的侄女。孙寒冰才华出众，仪表堂堂，风度翩然，品格又好，因而唐榴把侄女介绍给他。孙得唐家资助，去美国留学，起先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两年后得经济硕士学位，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除继续攻读经济学科外，还选读几门文学课程。其时，梅光迪在哈佛教中文，梅系复旦早期学生，孙与其过往甚密。

在美期间，孙寒冰努力学习，涉猎甚广，并搜罗了不少书籍。在暑假期间，他去渔场做工，以弥补学习费用。

复旦大学的一些学生，主要是二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毕业生，这时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复社”的秘密小团体，其主要宗旨是对内搞好母校，对外力求发展，相互提携。孙寒冰也是其中的一员。

一九二七年秋，孙寒冰由美国回国，在母校担任政治学教授。虽然，政治学不是他学的专业，但他天资聪敏，通过自己摸索，博览群书，政治学课程倒成了他的擅长。他以美国 James Wilford Garner 所著《政治科学与政府》一书为教材，边教边译。孙寒冰在翻译时，力求“信、达、雅”，对原书引文中的错误，一一为之校正，在原书断章截句引用他书时，则参照原

本，加以补充。此书在一九三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大学教材。

一九二八年，孙寒冰兼任复旦预科主任。预科类似高中，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态度和蔼，讲解透彻，因而使学生收获较大，怀念不已。

一九二九年，复旦大学根据教育部规定，将原有的科改为院、系，孙寒冰任法学院政治系主任。当年他又兼任国立劳动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劳动大学是国民党政府办的。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比利时社会党政府，把庚子赔款退还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以此款仿照比利时劳动大学的样子，办一个劳动大学。蒋介石委任当时农矿部长易培基兼任校长，校内主要由秘书长沈仲九负责，校址设在上海江湾原上海大学旧址。这个学校是免费的，不仅供给膳宿，而且一年发两套衣服，但是学生要做工，所以投考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家境比较贫苦的，有些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青年，改名换姓来投考的。劳动大学秘书长沈仲九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学校里宣传无政府主义，但不少学生却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孙寒冰在和同学多次接触以后，对此有所了解，他认为在学校里各种学术流派都可以讲，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可以讲的，他便选一些《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英译段落，作为教材，发给同学学习，满足同学的要求。

一九二九年秋，孙寒冰认为要及时介绍外国名著，必需自己掌握一个出版机构。他邀集了章益、伍蠡甫、侯厚培、王世颖、黄维荣等人创办了黎明书局。由于各人志趣不尽相同，一开始就存在了无法统一的矛盾。

创办黎明书局，孙寒冰起了主要作用。黎明书局出版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就是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孙寒冰还和伍蠡甫合编了《西洋文学鉴赏》、《西洋文学名著选》，

交黎明出版，稿费都充作股金。

在黎明书局，孙寒冰担任总编辑，他的编辑方针最初是，只要是著名的、代表一个方面的书，都可以出版。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黎明书局既出版了一些进步作家的著作，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吴觉农、薛暮桥合译的《农业经济学》、郭沫若的《豕蹄》，还负责出版由陈翰笙、钱俊瑞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也出版了一些坏书，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 Böhm-Bawark 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崩溃》等书。

孙寒冰的编辑思想后来也有所变化，逐步关心翻译具有进步意义的书籍。有一次，他收到李卜克内西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译稿，非常喜欢。这是托派分子林一新译的，译文生硬难懂，他只得找来英译本，花了很大力量，逐句校对、修改。他对林一新的政治面貌并不了解，此书便用孙寒冰、林一新合译，以《价值学说史》的名称出版。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复旦大学同学在老校长李登辉支持下，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李老校长怕学生中途出事，特派四个教师同去，其中就有孙寒冰。他对抗日运动，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孙寒冰，章益和陶希圣、樊仲云等十个教授，在国民党 C.C. 系主办的《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即“十教授宣言”）。这篇宣言表面上提倡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反对外来文化，实际上主要是反对苏联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篇东西一发表，陈立夫、陈果夫立即表示赞赏，而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如蔡元培等人则表示不同意见，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参加这样一篇“宣言”的起草和签名，表明孙寒冰当时在政治上还比较糊涂。但在这以后，他在前进的道路上，显然增强了辨别的能力。

一九三六年十月，孙寒冰看到当时出版了很多杂志，师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全部阅读，于是向复旦大学建议，出版一种杂志的杂志，把各种杂志的精采部分摘录下来，定名《文摘》。复旦大学第十六次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这一提议，《文摘》在一九三七年元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这类杂志。

孙寒冰主编《文摘》，除了本人知识渊博外，还有不少有利条件：第一，可以请复旦的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参加。最初参加工作的四年级同学有六、七十人；第二，复旦图书馆有大量的中外书报可以选用；第三，《文摘》交黎明书局出版、发行很方便。

《文摘》出版的时候，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灭亡中国的前夕，孙寒冰确定《文摘》的编辑方针，是“暴露敌人阴谋”，促进全国团结，做好抗日准备。因此，《文摘》刚一出版，受到读者普遍欢迎，很快销售一空，第一、二期，加印到第五版，出版了二万多册。这对孙寒冰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以后孙寒冰把《文摘》看成了自己的终生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孙寒冰提出《文摘》的任务，是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论点，并收集各种材料来证明这个论点，以树立抗战的信心。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版的《文摘》二卷二期上，编排了“芦沟桥浴血抗战”的特辑，在国内第一次翻译并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自传》。当时，虽然国共合作抗日在谈判当中，可是要刊出《毛泽东自传》这样的文章，还是要担风险的。孙寒冰为此特地去南京，找到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由邵力子批准刊载。

“八·一三”沪战发生，《文摘》这样的大型月刊，不得不暂时停刊。孙寒冰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出《文摘》战时旬刊。这样，刊物的篇幅减少了，而出版的次数增多了。那时，

学校西迁，人力大大减少，孙寒冰只能日夜奔波，最后终于累倒，得了伤寒病，发烧到摄氏40℃，整天讲谵语。而他热度刚退，神智稍清，又挣扎着布置工作，有一次甚至昏厥了过去。

上海沦陷以后，《文摘》暂时在租界里坚持，而到了十一月底，租界当局勒令《文摘》停刊。孙寒冰立即布置《文摘》转移到汉口去出版。他本人虽在大病之中，仍然尽力为《文摘》搜集资料、翻译稿件。后来，敌人邮检日益严密，不可能从上海寄稿件到汉口去，这时，孙寒冰病体稍愈，便只身去香港搜集资料。不久汉口失陷，《文摘》又转移到重庆去出版。

这一时期的《文摘》，主要刊载进步的外文译稿。在国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团结抗日；在国际上，反对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国，维护中苏友谊。可是，那时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对德意颇有幻想，反对《文摘》的这个方针。有一次，《文摘》刊载了一篇评论德意日轴心的文章，有人要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查禁，邵极力反对，指出我国正在和日本作战，反对敌人同德意所结的轴心，是对我有利的，有什么道理查禁。为此，双方争持甚烈，这也是邵力子辞去中宣部长的原因之一。^①

对于《文摘》的这种政治态度，国民党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它是中共的应声虫。这引起了黎明书局的大老板王世颖等人的不安，他们借口《文摘》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出版、发行，这对孙寒冰是一个重大的刺激。黎明书局是他发起创办的，《文摘》为黎明赚了很大一笔钱，而大老板们竟然如此对待他和《文摘》，怎么不使他寒心呢？从此，他和黎明书局断绝了往来。

一九三八年底，孙寒冰由香港经昆明到达重庆，出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在教学任务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一九三九年初，他又组织成立了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在艰苦

的条件下，恢复《文摘》战时旬刊的出版。但是，经济上总是捉襟见肘，周转困难。

由于《文摘》在群众中有声望，国民党中有些人想插手进来。一九三九年夏，在香港的许性初听说《文摘》缺乏资金，就去告诉小孔（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小孔一下子答应拨出十万元港币，成立“大时代书局”，出版、发行《文摘》，并且表示“大时代书局”由孙全权办理，小孔决不干预。孙寒冰为此在一九三九年暑假由渝赴港，协助成立了“大时代书局”。当他看到小孔对许性初很不礼貌，加上《文摘》的青年同事反对此举，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不参加“大时代书局”。可是，他感到曾经答应过人家，不能一走了事，便义务帮忙，把“大时代书局”办起来，约请了一些进步作家为“大时代书局”写稿、翻译。这样，“大时代书局”虽然由小孔出资，但却出了一批进步的书籍，也维持了一些进步作家的生活。

一九四〇年三月，孙寒冰从香港返回重庆。这时国民党正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对舆论控制更严。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第六十八、九期合期，被删去了三篇重要文章，刊物大片空白，开了天窗。接着，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第七十期，又被删去一篇文章，开了天窗。看来，国民党政府要对《文摘》下毒手了。

孙寒冰面对着这种险恶的形势，他没有动摇、没有退缩，他在“编者几句话”中明确表示：“文摘和其他一切文化战线上的战友一样，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和改善世界的诚。”“如果我们发现真理站在那一面，我们将在环境许可下尽可能站出来为它说话。”^②

可是，孙寒冰深深地感到，在重庆这种环境下，已不允许他们为真理讲话了。他决定离开重庆，到香港、昆明比较能讲话的地方，向爱国华侨筹集资金，在那里出版《文摘》。同

时，他向学校建议，请在桂林的张志让先生回校担任法学院院长，兼管《文摘》，代他担任主编。他已接受了在昆明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聘约，只等暑假一到，他就要离开重庆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敌机飞来北碚狂轰滥炸，孙寒冰遇难身亡，逝世时年仅三十七岁。

孙寒冰正直诚实、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矢志不移。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就投入爱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更是全力以赴，尽自己最大努力，宣传抗日救亡的真理，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

孙寒冰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教学认真、爱护学生。他对学生的要求严格，而在业务上则尽力帮助同学成长。他要劳动大学的学生陆国香、冯和法，把美国 Getter 所著《世界政治思想史》的近代部分译成中文，经他细心校对修改，有些是重译，再交陆、冯两同学抄清，然后帮助他们出版。这种精神，深深感动了同学。

孙寒冰洁身自好，不愿做官。他虽然交游广阔，对人和蔼可亲，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但他对各种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待的分寸也有所不同。他重视个人情谊，尊重有真才实学的人，爱护进步的朋友和学生，而且愈来愈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在国民党中做大官的朋友，不过是应酬来往，内心是看不起的，他自己也从不谋取一官半职。对于托派分子，后来是有所警惕的。

孙寒冰廉洁淡泊，不想发财。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发财致富，但都没有去做，他始终是一个依靠薪水为生的普通教授。他岳母最初很有钱，可他和岳母的经济是分开的。他的许多同学拉他挂牌做律师，很多人都发了财，可是他在那时却没有接受一个案子。“因为在那时，‘真理’与‘正义’是以金钱和势力作为最后裁判的”，他不愿意“‘真理’与‘正义’的被

歪曲、被零卖、被批发。所以始终没有处理过一件案子”。③

正因为这样，孙寒冰逝世以后，引起复旦全校师生的共同哀悼，学校为他举办了大规模的追悼会。

当时，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夏衍写了《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的悼念文章；胡愈之讲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为真理奋斗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则写了一首悼诗，诗云：“战时文摘传，大笔信如椽；磊落余肝胆，鼓吹动地天；成仁何所怨，遗惠正无边；黄桷春风至，桃花正灿然”⑤这些，是对孙寒冰的最好怀念。

注释：

- ①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83页。
- ② 《文摘》战时旬刊，第68、69号，第1527页。
- ③ 《文摘》战时旬刊，第71号，第1580页。
- ④ 郭沫若：《敬吊 寒冰先生》，见1941年3月16日重庆《国民公报》第二版。

七、沈霁春传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医学研究所副所长沈霁春同志，一九二九年在复旦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生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一级教授。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新四军，任生理学教授，是我国最早在党领导下，为人民军队服务的生理学专家之一，一九五六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部队服役共三十三年，由于长期积劳，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六日在上海病逝。根据他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沈霁春，浙江肖山人，生于一九〇三年一月十四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父亲沈子侄，为前清秀才，年青时

体弱多病，不能出外谋事，遂任本乡长巷小学校长、兼国文教员。沈霁春就在这里读小学。

沈霁春因受其五叔沈肃文的影响，小学毕业后，不愿去钱庄做学徒，一心想升学，又因家贫无力负担，由其五叔和黄炎培介绍，考入上海职业学校。这所学校规定学生上午学习语文、英文、数学、物理，下午到工场做铁工。第一年做的是翻砂，沈因体力不胜，满脸伤痕。母亲怜之，要他另考学校。

翌年，由邵力和五叔介绍，沈霁春考取了徐家汇复旦大学附中。因为学费较贵，父亲为此借债，母亲努力劳作，才能勉力维持。三年级时，由于他朝夕勤读，每年考试名列第一，英文教师邵诗周为他提出全免费申请，获得批准。从此，他每星期为学校工作一天，整理物理实验室或管图书室，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求学。这样的免费，一直继续到复旦大学毕业时为止。

在中学读书时，沈对英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到大学后，他原拟读外语系。后听人说，写作须懂得人的心理，复旦心理系有名，遂进入心理系。因为心理系教的行为主义心理学须建筑在生物学与生理学的基础上，于是他读了生物学科。他在生物学科主任蔡翘教授指导下学习生物学。在民不聊生的旧中国，为了多赚些钱，学习理论科学的大学生寥寥无几，沈是一九二九年复旦生物系毕业的唯一的一名学生。学校为了培养人才，虽然经费非常拮据，还是为这一位全免费生，单独开设了生物系的全部课程。

读书期间，学校民主空气浓厚，邵力子、陈望道做过他的国文老师。他听过鲁迅、恽代英、侯绍裘等人来校作的报告。在“五卅”运动前后，他和邵志刚等同学一起，做过不少宣传工作。由于生性爱静，又因免费要照顾到考试分数，所以他的社会活动总的是不多的。

沈霁春在复旦毕业后，受到师友的重视，到南京中央大学心理系担任助教，一九三三年到三五年又到浙江大学生物系担任助教。在七年助教生涯中，他读了不少生物学的参考书，熟悉了不少生理学技术，²也翻译了一些书籍。

一九三六年春，经同学徐丰彦介绍，沈霁春远渡重洋，去比利时冈特城（Ghent），在国际著名生理学家海曼斯教授（C.J.F. Heymans, 193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第一年是自费，第二年得到庚款资助，一九三八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去法、英、荷兰，瑞士等国著名实验室作短期参观学习。在比利时期间，他主要研究药物对颈动脉区化学感受器反射的作用、某些麻醉药物对蛙类垂体黑色细胞刺激素的作用、以及某些药对防止氯仿和肾上腺素引起心室纤颤的作用。在这短短四年中共发表了三十篇论文，主要文章刊载于《国际药理学和治疗学杂志》（Arch Intern Pharmacodyn et Therap）。他还在比利时主持过国际生理学会议，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声望。

当时，抗日烽火正燃遍祖国大地，大片国土沦亡。沈霁春对此十分痛心，可又无能为力。他日夜专心致志地埋头作实验，藉此暂忘祖国的灾难。他曾写信给父亲说：“我愿意这样地渡过一生”。可是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他躲避。比利时朋友看到他时，总要问起中国的战况。一天，房东太太问：“怎么搞的，大中国被小日本打败！日失一城，你们的城市有多少天可失？”沈霁春无可奈何地回答：“中国幅员广大，有可能逐步调整而最后赶走日本侵略军。如中国象比利时那样小，就太危险了。”话虽如此，他也不能不感到，在祖国危难时，不应再呆在国外了。可是，接到国内师友的来信，都说内地情况混乱，生活不安。一九四〇年，他回到上海，在租界里的雷氏德医学研究所中担任研究员的职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占上海租界，到处横行。他痛恨、忧郁、沉闷，觉得在上海无法居住。一九四三年，大后方有人来找沈霁春去，他去征询中学英文老师邵诗舟的意见，邵告诉他：“重庆很黑暗，光明在解放区”。可是解放区怎样去呢？

一九四五年五月，雷士德研究所同事许邦宪问他，解放区有一个教生理学的机会，愿不愿意去？让他考虑一星期再作答复。沈霁春回家和妻子丁瑛反复商量，虽然觉得雷氏德研究所研究条件较好，日寇可能败亡在即，但是他们已无法在敌伪统治下生活，而且他回想起学生时代恽代英同志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同学邵志刚在苏联的来信叙述的美好情况，决定去解放区，为祖国的解放，尽一份力量。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曹达同志陪同下，沈霁春和夫人丁瑛带着四个孩子和简单的行李，从上海出发，由镇江过江，混过了敌人的关卡，直奔解放区。沿途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步行。小孩走不动，沈霁春背着行李，抱一个最小的孩子在前而走。丁瑛弄来一副箩筐，三个较大的孩子坐在箩筐里，由她挑着走。这样，步行了十一天，终于到达了新四军卫生部驻地——安徽省天长县常庄。

沈霁春到达以后，受到崔义田、宫乃泉两位部长的热情接待，分配到新四军军医学校担任生理学教授职务。从此，沈霁春就成了新四军，穿上了灰色的军装，开始了新的生活。

到了解放区，沈霁春处处感到新鲜。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爱护，感受到了人民军队内部的平等和温暖，他说：“我看到了新的人，扩大了‘家’的含义，置身在一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长期缠绕着他的苦闷一扫而光。

特别是他听了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同志传达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后，更觉得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

国在望了，使他满怀信心地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

在军医学校，第一期三十多个学员，都是从南方自愿参军到解放区来的。他们艰苦朴素，克勤克俭，自己动手盖泥屋，和群众一起改造驻地环境。这些年青年人，在党教育下，积极上进，好学成风。他们刻苦学习，并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一旦战事紧急，随时奔赴战场，做救死扶伤的工作。这一切，更激励着沈霖春做好教学工作。

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新四军卫生部和军医学校奉令北撤，从安徽经苏北到达山东临沂。在临沂，陈毅军长亲切地会见了沈霖春，向他说明共产党过去一直很重视科学，而且今后还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发展中国科学。这些话给沈霖春不少鼓舞与希望。

一九四六年春，国共双方举行和平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和平，准备裁减军队，把军医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医学院。沈霖春这时集中一切力量把教学工作搞好。当时教员很少，学生程度不齐，他就从生物学、解剖学、神经解剖学、生物化学的原理讲起，一直讲到生理学，每周上课达十一、二小时。学员们都非常静心地听讲，刻苦地学习，而且相互帮助，进步很快。沈霖春为了讲好课，克服仪器、设备等等困难，每天备课到深夜。对于学员们提出的问题，总是仔细地耐心地反复地讲解，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不久，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临沂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许多老百姓被炸死，肢体狼藉，血肉模糊，使人惨不忍睹。

白求恩医学院奉命北撤，经过亭子头、独树头、道家庄、河阳、苏村等地。每到一处，老百姓都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医学院做课堂和宿舍。住下以后，沈霖春立即开始教学，在一个地方，通常只能停留一、二个月左右，又要转移。

一九四六年冬，白求恩医学院来到沂蒙山区的李家河北村，原以为到了山区，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做教学工作。不料，敌人紧跟着沂蒙山区开展重点进攻，敌机逐村轰炸扫射，学院不得不到大山边去上课。敌机来时，暂停讲授，四面散开，敌机走后，集合起来，重新上课。就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党还通过各种途经，订购了两箱新出版的欧美医学院课本和杂志，运进解放区，沈霁春欣喜异常，深受感动，埋头读了一个多月。虽然战火纷飞，解放区日益缩小，但是沈霁春和同事、学员、老乡们的思想感情已经融合在一块，血肉相连，生死与共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不久，开始突围。沈霁春夫妇带着四个孩子和群众一起向胶东撤退。沿途都是担架队、挑粮队和随行的老乡，有时只和敌军相距四、五里路，敌人夜晚的灯光都能看见，可是他一点也不害怕，相反，他却真正认识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心的背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

这次突围，沿途经过沂水、王家庄、诸城、高密、平度、莱阳、桃村到达乳山县的夏村。在夏村，医学院安顿下来，教过了整个的夏季。一九四七年秋季，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医学院停了课，学员们到前方为伤员服务，教职员则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和老乡们一起，组织游击队。沈霁春这位生理学专家，这时也拿起武器，成为游击队员。

党中央唯恐医学院的教职员遭遇不测，要他们撤退到大连暂避。九月二十日，沈霁春的一家和医学院的同志，安抵大连。他们组织了医务生活社，编译一些与战争有关的科学文章，间接为前线服务。八个月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沈霁春和白求恩医学院又返回山东。

解放以后，沈霁春先后在济南白求恩医学院、华东生理研究所主持科研和教学工作，一九五三年调任军事医学研究院研

究员。一九五六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以后，沈霁春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研究的项目有：牛的垂体前叶新鲜提取物对大白鼠胰脏锌含量的影响、颈动脉区的感受器的生理学研究，某些毒物中毒研究，潜水生理研究等。

一九六四年，沈霁春领导的研究室并入海军医学研究所，他参加研究高压下呼吸氮——氧混合气体的生理效应及药物对人类排氮的影响，写有“动物与人类的屏气问题”、“氮气在生物学上的应用”一系列论文，对提高我军技术水平作出了贡献。

沈霁春为了推动我国生理学的研究，还翻译介绍国外新发表的科学论著，把他的导师海曼斯的论文《血压的平衡与高血压的形成机制》，《在科学工作中具有独创精神的国外资料介绍》等译成中文。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指责为“崇洋媚外”，对这种愚昧无知，他只能感到痛心。“文革”中，他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但他坚持真理，正直无私。有两个外调青年要他写一份无中生有的“证明材料”，他深为愤懑，坚决拒绝。

“四人帮”被粉碎后，正当科学研究大有可为之时，他不幸病魔缠身，作为特邀代表，竟不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不久，即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沈霁春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为了抗击日寇，他冒着生命危险，抛弃较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和优裕的生活待遇，奔赴解放区，始终和人民同甘共苦，把自己的科学知识，贡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沈霁春勤奋好学，学风严谨。他讲课，总是认真备课，反复讲解，务使同学透彻了解；他带实验，重视严格的科学态度的培养，一丝不苟；他指导论文，要求反复推敲、多次修改；他主

持学术讨论，坚持发扬民主，以理服人。

沈霁春生活艰苦朴素，工作勤勤恳恳，态度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在党内遵守纪律，经常向党小组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从不搞特殊化。

沈霁春的一生，是一个爱国的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

八、朱颐龄传略

一

朱颐龄，是我国第一位玻璃钢结构设计专家，他设计的玻璃钢，填补了我国的空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朱颐龄，浙江海宁人，一九二三年生，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到同济大学工作。

一九六一年，我国面临着严重困难。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许多科研、基建项目都纷纷下马了。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研制新材料，来发展国防工业，便在同济大学设立新材料研究所。朱颐龄就在这个时候，担负起筹建研究所的任务。

当时，朱颐龄的原有知识，远远不能满足新专业的需要。于是，他成天成夜里阅读大量的各种专业书籍。他住在复旦大学第四宿舍，夜读的灯火一直要亮到半夜二、三点钟，正好与对门的复旦老师许自省的灯火，相互映照，成为复旦第四宿舍里的唯一的一对灯火，为邻居们所赞颂。

对所担负的工作，朱颐龄从来不说“我不会”，他日夜苦读，就是要把“不会”变成“会”。当时，大家对国防工业所需

要的材料不熟悉，他根据《实践论》的教导，只有认识材料，才能使用材料、改造材料，并为复合材料设计打下基础。这样，他便和研究所的同志们扎扎实实地从最基本的认识材料开始。一九六二年春，朱颐龄第一个设计的产品是玻璃钢高压容器。他对当时玻璃钢高压容器作了细致的研究，遵循《矛盾论》的思想，找出了质量上的两个主要矛盾，是漏气和强度差。他用铝衬解决漏气问题，又精心解决强度设计问题。朱颐龄在资料极少的情况下，利用基础数学，排起矩阵，硬是一个一个数字地把数据计算出来，提出了自己的设计理论，设计出新型的封头。由于他和同志们的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终于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在同年七月解决了玻璃钢高压容器存在的主要问题。这项新产品，顺利地通过了内部加压、外部用枪弹射击、甚至用飞机从高空掷下来等等试验，都证明性能良好。这一科研成果，为我国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材料研究所的第二项任务，是研制玻璃钢飞机螺旋桨。我国飞机螺旋桨，过去是用数十年乃至近百年成材的梓木木料制造的，不仅木料供应困难，而且浪费极大。经常出现满车皮的木料运来后，全部不合用，又满车皮地退回去的现象。国外当时有用铝合金材料制造螺旋桨，我国受外国封锁，能进口的铝合金，数量很少，而且铝合金不宜锻造，也不是理想的材料。因此，国家要用玻璃钢来制造螺旋桨。我国某一单位，对玻璃钢螺旋桨进行了近两年的研究，认为玻璃钢不能做螺旋桨。朱颐龄在建筑材料工业部玻璃钢高压容器汇报会后，向当时建材部丁鸿副局长详细汇报了玻璃钢的力学性能和设计思想，认为玻璃钢能制造飞机螺旋桨。他的这个观点，受到丁副局长的大力支持，要他和某单位具体研究。但是，他认为玻璃钢能制造飞机螺旋桨，是从玻璃钢的材料性能来说的，对于飞机螺旋桨的

构造完全不清楚，于是连夜到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买了两本飞机螺旋桨的书籍，当夜读完。第二天，他和对方商谈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得到对方的认可。在试制过程中，曾出现气泡、分层等各种问题，在朱颐龄和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努力下，经过大量的试验，终于胜利地通过静力试验。

在试制这一新产品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发生过神秘化的现象，居然不让朱颐龄参加自己设计的玻璃钢飞机螺旋桨的试制生产活动，但他毫不抱怨，日夜守在自己办公室里，以便从事试制的科技人员发生问题时，随时可以找他商量、研究。同时，他还将过去几年的研究成果，从纤维强度到设计思想，总结成文。他认为科学研究成果是全社会的财富，而不是个人的私产，不应随人而亡，而应该留给社会。经过朱颐龄和同志们一年多的反复设计和试验，玻璃钢螺旋桨新产品通过了严格的空军试飞考验而获得成功，填补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又一项空白。当时还平行进行着大型风洞的风机叶片试制，也获得成功，现已连续运转近二十年，仍完好如新。现在这一研究成果已推广应用到民用的冷却塔风机叶片上。这些产品都是根据玻璃钢飞机螺旋桨的原理设计而成的。

玻璃钢飞机螺旋桨制造成功以后，新材料研究所的同志们一鼓作气，又研制出玻璃钢滑翔机。我国第一架玻璃钢滑翔机就是朱颐龄设计出来的。

此外，朱颐龄利用了玻璃钢纤维的高强性能，运用南方棕绷的设计思想（发表在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力学科普通讯》的《床绷力学》来源于此），对水上飞机浮筒激水部分，作了柔性设计，大大减轻了重量。他设计的玻璃钢雷达罩和全玻璃钢天线，都取得了成功。

一九八三年，国际复合材料研究权威人士、日本复合材料科学会名誉会长林毅，参观了我国由朱颐龄设计的玻璃叶片系

列、同济大学新材料研究所和沈阳滑翔机厂于1966年合作制造的玻璃钢滑翔机后，认为中国的玻璃钢不比日本的差，反映了中国玻璃钢制品的设计和工艺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二、

朱颐龄不仅是一位对我国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有重大贡献的科研工作者，而且也是一位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卓有成效的教师。早在一九五二年，当他在同济大学任讲师时，讲课即以物理概念清楚、深透、注重实验，培养学生联系实际的能力为特色，深受同学欢迎，许多青年教师也喜欢听他讲课。他对学生谆谆善诱，认真负责。凡是学生提出的问题，他必定负责作出答复。他自己不懂的，也要找资料、弄明白，为学生解决疑难。一九六一年底，同济大学决定开设《实验应力分析》课程，这是我国第一次开设的新课，当时离开课时间只有十九天。朱颐龄承担了这门课程，他既无现成的教材可以使用，又无任何参考资料可供参考。他就总结自己做过的许多大型实验所得的经验，考虑编写讲义。由于时间紧促，他利用春节例假，把孩子们赶往亲戚家，自己在家里写了几天几夜，最后终于把讲义赶出来了。这本教材，从设计实验方案开始，直到分析试验结果为止，解决了工程上的问题，学了它就能用在工作上。从实验着手，又提到理论高度，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使这本教材创立了一个新的体系。凡是用过这本教材的人，都赞扬它是本好教材。

六十年代，他带了三个研究生。他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让学生自己思考、实践、积累经验，如果因此而发生什么问题，他又乐于承担责任。对研究生所写的报告，他认真负责地进行修改。他还和学生们一起编写《玻璃钢结构设

计》等书籍。此书在一九八〇年出版后，一个月后就脱销。严师出高徒，他所培养的三个研究生，目前都担任了高校科研单位和上海玻璃钢研究所的领导工作。现在他还为同济大学和武汉建材学院带了几个研究生。朱颐龄精心培育年青一代，他希望学生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对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朱颐龄不但在课堂、实验室里传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他还努力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心得，结合理论，著书立说。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挤出时间组织编写了《玻璃钢入门》、《玻璃钢手糊工艺》、《玻璃钢性能测试标准》和翻译的《复合材料力学》等，以及许多复合材料力学和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方面的论文。其中一九六四年由国家高分子测试基地第一次出版的《玻璃钢性能测试标准》，奠定了测试基础，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那本《玻璃钢结构设计》，是在“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耀华玻璃厂退拼车间劳动，利用业余时间，把耀华玻璃厂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二年生产的十种玻璃纤维及其织物的数十万个测试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玻璃钢的年平均强度和离散系数是很稳定的，也发现了受季节气温影响的规律，从而为玻璃钢结构设计，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由于此书中的设计实例和测试数据都是来自我们本国的生产实践，因而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朱颐龄的辛勤工作，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人民也给他以应得的荣誉。他曾获得上海市和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以及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现在朱颐龄担任了国家建材局上海玻璃钢研究所总工程师，民盟上海市委科技支部委员。他还被聘为《玻璃钢》、《固体力学学报》、《复合材料学报》等刊物的编委。此外，他还被选为中国硅酸盐学会常务理事、玻璃钢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力学会科普工作委员和中国玻璃钢工业协会顾问。

组副组长等。

三、

朱颐龄取得的丰硕成果，来自他的辛勤劳动，对党的信任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每当他根据国家需要、挑起重担，就坚韧不拔、奋力拼搏，攻克一个个难关。即使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他有过不该有的不信任，调走他的助手，他也没有因此对工作稍有怠慢，而是心胸坦荡、凭自己能力，全力以赴。他说洋人封锁我们，妄图卡住我们的脖子，但是中国人有骨气，不去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搞科研，不应跟着杂志上的科研论文走，而应跟着国家的生产需要走。总之，他认为科研工作者应该讲究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而不要图虚名。他响应党的号召，千方百计地为使国家富强起来而奋斗，这是努力学习、奋力拼搏、刻苦钻研的原动力。

朱颐龄严于律己，一贯坚持上班，不迟到、不早退，即使在家里工作到深夜，只睡了二、三个小时，也是照常上班。在六十年代初期，为了攻克新材料，约有两年时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一早拖着疲乏的身子和带着灰白脸色去上班，被同志们称为“拼命三郎”。可是，过度的劳累，使他未老先衰。年刚六十的朱颐龄，却似七十多岁的老翁，他身子佝偻、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和心脏病。但他仍然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经常出外开会、讲学。他的工作单位远在浦东，从家里前去单程要两个小时，所以他每天一早就赶去上班。很多人喜欢向他请教，不仅仅是因为他平易近人、热情负责，更主要的是他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他的帮助，往往能够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即使早已走上工作岗位

的研究生，遇到疑难问题时，仍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但是看到他工作繁重、社会活动多、健康情况欠佳，又不忍心给老师增添新的课题，而是劝他注意休息、多加保重。朱颐龄理解学生的心情，他却说：“我因工作忙而倒下，也是心安理得的。”朱颐龄的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给青年科技工作者以生动的教育、树立了典范。

现在，朱颐龄每天工作仍然很忙。他聚精会神地阅读、审查上海玻璃钢研究所的一项项科研项目和报告，为研究生备课和修改他们的科研报告、论文，或是审阅有关刊物的稿件，他还为了丰富和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而埋头学习。他的兴趣极广，对于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书籍，他也经常阅读。如果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不论是科学方面，还是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他都会努力地为你寻找最佳答案。

一个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人，才能使自己的生命迸发出美丽的火花。

朱颐龄就是这样的人！

第五章 体育文娱活动

第一节 体育

体育运动，历来为学校所重视。一九〇二年马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时，就很重视。迨清末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长年埋头书本，根本不注意身体的锻炼，往往弱不禁风。因此，马相伯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军事训练，他特地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同学兵式体操，并且实地持枪打靶，不仅使同学练就强壮的身体，而且具有近代军事知识，为抵御列强，振兴中华培养有用人才。

复旦公学在吴淞建立以后，马相伯经常带领学生去江边散步，学校东边专门设有操场，同学除上操外，经常在校内踢足球，体育之风渐盛。

一九〇七年，严复继马相伯为学校监督（校长）。他亲自向同学演讲体育之重要，专门聘请一位美国武官来校教体操。

为了提倡体育活动，吴淞时期曾经开过一次运动大会，上海男、女各校多来参加。运动场地在校址东边操场（原为水师校场）。运动会开会时，有海军军乐在场演奏，身穿古式军服，往来指挥的是我校校董、海军宿将萨镇冰先生（见《西北通讯》一卷六期，吴念劬：《母校创办时期之回忆与杂谈》）。

一九一三年，李登辉先生继任校长。他认为培养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不可缺一。体育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可以养成互助团结和协作的精神。在李校长的提倡下，复旦的体育运动开展得蓬蓬勃勃。

当时校址在徐家汇李鸿章公祠，为了开展体育活动，学校专门租借农田，辟为操场。同学们更多地喜欢在课余之暇踢小皮球。罗家伦、费巩等人对此兴趣尤浓。罗家伦曾说：“在李鸿章铜像下一早起来读书，在荷花厅上上课，在饭堂前踢小皮球之生活已成过去之黄金时代矣，思之犹有余甘”。费巩在毕业多年后，一次回校还约老同学再次开展踢小皮球比赛，虽然汗流浹背，却是兴味无穷。

一九一七年，复旦升为大学，对体育更为重视。学校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建造了田径场（跑道一圈为三百米）和网球场。同学们还自己集资，在学校支持下建造了体育馆，以开展体育活动。当时学校设有体育部，有主任、助教各一名。另外学校还设有体育委员会，委员包括师、生、员、工各方面的代表，共同商讨开展体育活动，著名教授洪深先生亦被推选为委员。洪深先生曾提议，在校学生必须修读体育课，并要制定出相应的标准，每学期必须通过，将成绩记录下来，否则不能毕业。当时外国大学多如此规定，国内只有清华大学实行。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质，同意洪深教授的建议。

将体育课规定为必修课，最初有不少困难。首先遇到的是体育教师不够，又没处去请。于是，打破常规，由学校体育委员会聘请运动水平较高的学生运动员担任教师，每个任课的学生运动员，学校发给一件绣有校徽图案的羊毛衫，以资鼓励。体育课课程有排球、篮球、足球、网球、室内棒球（即垒球）、乒乓、武术等。上课规定：女生必须穿规定的运动服装，白短袖衬衫、白长裤和白跑鞋（当时女生平时都穿旗袍）。男生除了长衫，其它均可穿。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每天做早操，并定为必修课，由四位校运动员负责领操和点名。体育课被定为一、二、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以后改为一、二年级的必修课。

在二十年代初期，体育比赛成绩的好坏，往往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复旦和南洋公学比赛足球，经常输给南洋，同学们非常着急，拉球员、请教练，总想“报仇雪恨”。

复旦的体育运动，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名震遐迩，声播域外。尤其是复旦男子排球队，从二十年代起，即崭露头角，曾在江南八大学（开始是江南六大学，即：复旦、交大、暨南、光华、中央、持志，后来又增加了金陵和大夏，称为江南八大学）排球联赛中，连续二十次夺魁，开国内未有之纪录。队员曹廷赞、邱广燮等都来自排球之乡广东台山县，均为国内的杰出人才，历次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在旧中国历届全运会中，上海排球队有三分之二的队员是复旦的，可以说那个时期复旦的男子排球队在国内是战无不胜，所向无敌。一九二八年复旦男子排球队南征港粤，夺得全胜而归。一九二九年十月底，复旦排球队远征日本，在扶桑十天，出战六场，尽管东道国裁判偏袒主队，例如：十一月四日与日本冠军队对阵，裁判竟叫我方“触网”达十八次之多。加上东道主安排赛程对我极为不利。当时正值日本开全国运动会，上午我队在神户对日本亚军格轧华队，下午对东京选手队，我队员长途乘船，未遑体整，连战二劲旅，次日即赶到东京再与日本冠军商科大学队交锋，仍然取得四胜一和（因打平后天黑了，日方不愿再战）一负的好成绩，载誉归来。此外，复旦排球队北征平津、青岛，南征香港、广州、菲律宾及马来西亚等地，皆获全胜，影响很大。

复旦的篮球队，久负盛誉，多次夺得江南八大学篮球联赛冠军。队员李大辰、黄炳坤、沈昆南、邱广燮、陈宗祺、周达云等历次代表上海队，参加国际比赛，为祖国争得荣誉。

足球是复旦较有水平的运动项目。在二十年代已有足球队，起初成绩不够理想。后聘请当时球王李惠堂任我校足球队

名誉教练，在严格训练下，球艺进步很快。一九二九年江南八大学足球联赛时，击败足坛皇冠南洋大学队，夺得冠军。复旦足球队员曾参加上海大学生足球队远征澳大利亚。三十年代，学校各系都组有足球队，新闻系足球队和时事新报队比赛，系主任谢六逸教授担任守门员，师生融洽无间，气氛十分活跃。复旦足球队曾获中华足球运动会甲组冠军。一九三五年复旦足球队远征平津，均载誉而归。

复旦田径方面，人才辈出，飞毛腿很多，如黄炳坤、顾再平、程金冠等，均为市、全国纪录的创造者，代表国家队出席远东运动会。复旦越野队，数度获得团体冠军，他们还远征福州，对福建省开展长跑运动起过推动作用。复旦的乒乓球队也多次获得江南八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联赛冠军。网球运动在二、三十年代十分流行，并作为体育课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复旦网球获冠军，全校放假半天。

复旦游泳健将郭振恒，创二百米蛙泳全国纪录，被选为参加一九三六年奥运会的代表队。此外，复旦还有棒球队、手球队。自行车运动在校内也较为普及。学生自己组织竞赛，选出优胜者组成自行车队作长途旅行。马术也是同学感兴趣的一项运动，那时学校后门有一个跑马厅，养着许多马匹，学生可以任意租骑，这给学习马术带来很多方便。

国术又称技击，在复旦亦受重视。一九三〇年，复旦成立技击部，由吴剑岚先生负责，李老校长也报名参加，他对技击很感兴趣，经常请上海著名国术家、拳师来校表演。李老校长认为，技击运动不但能丰富学生的课堂生活，而且可以锻炼体魄，保卫祖国。一九三六年，特请南京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带领武术队来校表演，李老校长亲自前往迎接。在李老校长的关怀下，复旦武术运动非常活跃，使运动员增添信心，为学校争得荣誉。

复旦体育运动取得的这些成绩，和学校领导、教师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李登辉校长和许多教师，都非常重视体育，认为这是挽救危亡、振兴祖国的重要方面。李校长和许多教师自己也参加体育运动，经常观看运动员比赛，当啦啦队，情不自禁地为同学加油。在校代表队夺得冠军后，他们自己掏钱请运动员吃饭，照相留念，以示祝贺，已成惯例，因而同学参加体育活动，劲头十足。

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西迁，国家灾难深重，大型的运动会寥寥无几，但学生们自行组织的体育组织，仍然保持着，在北碚的嘉陵江中练习游泳的，颇不乏人。

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体育课仍然继续，运动会有时也在举行，但是正当光明的新中国和黑暗的旧中国激烈搏斗之时，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严重，同学们争取民主、进步的斗争一浪高似一浪，体育运动不可能成为群众注目的事业。

抗日胜利后，学校迁回江湾，聘请沈昆南为体育教研组主任，他努力修缮各种体育设施，在校外建设大操场，购置体育用具，积极带领同学开展体育活动。一九四七年举办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越野赛跑等项活动，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九日举办胜利后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参加的选手有男女同学184人，竞赛项目有跳高、跳远等数十项，取得较好成绩。但是，体育运动的水平不很高，群众性、持久性亦嫌不足。

第二节 文娱活动

李登辉校长对于学生的文娱活动十分重视。他认为音乐能够陶冶学生优美的性情，美术能够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戏剧

富有教育意义，在学校中大力提倡，加上教师的协助、支持，复旦同学的课余文娱活动，历来开展得活泼健康、丰富多采，并且出现了一些音乐家、戏剧家和著名的演员。

同学的课余文娱活动，大体上有音乐、美术、摄影、京剧、话剧等等。

音乐会成立于1914年4月，由国文教员蒋梅笙、杨雪筠老师发起，内分奏乐和唱歌两部，在奏乐组有国乐箏、笛、笙、箫、胡琴、三弦、琵琶等，西乐有风琴、口琴等。同学们在课余之暇，一起拉唱，兴趣很浓。1920年9月，同学们专门成立了唱歌会，并请庞素配、晏阳初老师来校指导。1922年，音乐会挑选程午嘉同学为会长，程午嘉从小喜爱国乐，现为我国著名国乐专家，南京艺术学院国乐教授。1933年，同学喜爱口琴的人增多，专门成立口琴社，请口琴表演家王庆勋来校指导。嗣后唱歌、诗朗诵、口琴、西乐、国乐分别组成团体，如音乐欣赏会、露茜亚音乐社、群声口琴研究会、合唱团等等。

美术会于1920年成立，主要从事书法、石刻、国画、西洋画方面的活动。在三十年代，一年级新生中成立“二一画社”，国画组由吴剑岚、伍蠡甫老师指导；西洋画组由翁达藻等老师指导。四十年代，校内成立“铁笔艺术研究会”，由陈望道、章益等老师指导，内设书法、绘画、西洋画、图案、美术字、金石等小组。抗战胜利后，另行组织为“复旦书画社”，各种活动不时进行。

摄影术研究会也建立在1920年，为同学有组织切磋摄影术的开始。1925年同学组织的大型文娱团体内设有摄影部。1926年12月另行组织“摄影研究会”，由万维俭、冷隽同学发起，申请李校长在简公堂（今二百号楼）为他们设置玻璃镜框，以便公布摄影成果，获得批准。1927年聂光地等同学组织摄影学会，并举行第一次摄影展览，不仅校内轰动，而且社会上来观

看的也不少，著名摄影家郎静山在报上发表评论，颇多赞语。1929年12月，复旦摄影学会举行第二次展览，参观者“户限为穿”，普遍认为“作品不仅为学校团体中所仅见，抑为海上摄影界所罕有。或以取景胜，或以光线胜，类皆神情毕肖，气韵盎然”。受到特别赞赏的作品有肖承惠的《归途》、张安候的《画舫》、余国琦的《凝视》等。李校长参观后也大为赞赏，建议在次年建校25周年时再展览一次，学校并为摄影学会添置了暗室、放大机和冲洗设备，1930年在建校25周年纪念时，举行了第三次摄影展览，获得很大成功。展览会结束后，选出精品66帧，出版了复旦摄影年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摄影学会要求“会员应努力抗日摄影”，使摄影为抗日救国服务，每周发行影刊，并请留德摄影化学专家卢馥米校介绍“滤色镜”的各种用法，使摄影技术不断提高。1935年建校30周年纪念时，也举行了摄影展览。抗战期间，同学生活困难，无力购置摄影器材，摄影活动比较沉寂。胜利后，成立“复旦摄影新闻社”，摄影活动较有起色。

京剧在复旦同学中亦有相当的市场，1925年建校20年周年纪念会上曾经演出，获得很大声誉。1930年前后，扬善鸣（晚农）、徐叔明等组织“复旦京剧研究社”，报经李校长批准，由庶务处月拨经费五十元，社员每人每月出社费一、二元不等，聘请北平京剧科班富连成社的第一届学生律喜云、梁喜成两位当教师，律不久去世，梁教老生、武生和花脸，以后又续请“名丑”刘斌昆为老师，在我校培养出一些著名的京剧票友。如扬善鸣，学唱梅派青衣，嗓音甜润宽亮，为梅兰芳本人所赞赏，有南京“梅兰芳”之誉，解放后曾任教上海戏曲学校。徐叔明，学唱程派青衣，曾由梅兰芳邀请，编辑《国剧画报》。1932年，复旦京剧社，曾对外义演，为东北义勇军募捐。1941年，重庆复旦大学成立平剧社，其宗旨作“国剧演技及理论之研究”，由

路顺奎、赵承箴老师指导，平剧社一直在活动，1949年，平剧社的负责人为于漪。

话剧在复旦有悠久的历史，很高的声誉，并为我国培养了一些著名的戏剧家和演员，如马彦祥、朱端钧、风子（封季壬）、黄天（黄鼎才）等。1915年10月6日，为复旦建校十周年纪念，复旦教师邵诗周、杨雪筠等发起排演德国名剧《社会钟》，为复旦演出话剧之开始。1916年双十节，为庆祝辛亥革命五周年，袁世凯帝制复灭，复旦师生演出新剧三天，招待社会各界，颇得好评。

1925年由吴发祥、卞凤年等同学组织复旦新剧团，请洪深教授为指导。洪深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对话剧深有研究。复旦话剧活动在洪深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遂得蓬蓬勃勃的发展。新剧团成立后，由马彦祥、陈英、袁仁伦等演出田汉编剧的《咖啡店之夜》，到社会上公演，声名大振。1926年，复旦新剧团改名复旦剧社，先后公演过中外名剧《女店主》、《寄生草》、《西哈诺》、《说谎者》、《五奎桥》、《委曲求全》、《雷雨》等，这些剧本在洪深、应云卫、朱端钧、顾仲彝等人的导演下，由同学马彦祥、吴铁翼、包时、封季壬、梁培树、吴绍炜等人参加演出，得到社会上的好评。复旦剧社还派人帮助圣约翰和交通大学的话剧演出。复旦剧社作为一个大学生的业余戏剧团体，在我国的剧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抗战期间，复旦话剧活动，更加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如演出自编剧本《逃难到北碚》、《古城的怒吼》、《国家至上》和《雾重庆》等。1941年，复旦剧社和复旦青年剧社合并为《复旦话剧社》，由陈望道、万家宝（曹禺）等教授负责指导，1942年元旦，曾演出《北京人》，1946年初，复旦话剧社排演《雷雨》、《芳草天涯》等，均获得好评。

学校里不仅有单一性的文艺团体，也有综合性的文艺团

体，其著名的有缪司社。

1947年初，聂崇彬、朱树兰、沈光瀚（均系地下党的外围组织U.D.Y.即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等同学发起组织综合性的文艺团体“缪司社”（Muse Club），请章靳以教授担任指导，开展文学、诗歌、音乐、舞蹈、话剧、美术等方面的活动。这个文艺团体，由进步同学所组成，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不仅注意各种文娱活动的群众性、艺术性，而且注意其思想性和政治性。1947年2月9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在劝工大楼会场打死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为了揭露国民党的罪行，缪司社和复旦剧社在2月份联合演出由聂崇彬同学执笔的活报剧《梁仁达之死》，戏剧家田汉、阳翰笙、陈白尘等应邀观看，他们对于学校业余剧团能够迅速反映现实生活，表示赞赏。此后，缪司社和其他文艺团体联合举办“五四”文艺晚会，由司徒汉同学指挥，演唱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歌曲，内中穿插诗朗诵，展现了“五四”以来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壮观景象，晚会上还演出了《朱大嫂送鸡蛋》、《王大娘补缸》、《农作舞》等进步节目，一新观众耳目，获得好评。

缪司社的戏剧组，得到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的进步力量的支持，演出了《夜店》、《万世师表》，参加演出的有杨本驹（袁木）、周定、叶百初、刘宏谊等同学，影响极大。1948年上半年，缪司社音乐组同旦声合唱团、音乐欣赏会等团体联合排演《黄河大合唱》，有一百多同学参加演出，气势磅礴、歌声浑厚、感情深沉，效果极佳。这合唱由司徒汉同学指挥，在登辉堂多次演出，又去交大、同济、圣约翰等校演出，激起了同学们爱国主义的情感的风暴。

1947年上半年，缪司社的负责人聂崇彬、朱树兰、葛嬭月、沈关兴同学被捕或毕业离校，改选周洪谦、朱秀钰、

张志泉、李振家、陈必智等人负责，社员增加到一百四、五十人，成为复旦人数最多的艺术团体，配合学生运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支援同济赴京请愿事件中，以及赴杭州悼念于子三同学等活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缪司社在1947年的秋冬之际，还应沪西工人的邀请，派去陈必智、戴幼樵同志前往协助开展文艺宣传活动。

解放前夕，缪司社成员参加了复旦文工团，秘密排演《白毛女》歌剧选段、教唱革命歌曲，教同学跳秧歌舞，以迎接上海的解放。

总之，解放前的复旦文娱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她在培养优秀的、正直的、爱国的、进步的人才中，发挥了自己的巨大作用。

编 后 记

为了庆祝复旦大学成立八十周年，我们仓促编写了这部《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05—1949）。复旦大学解放以后的历史，当继续编写，作为第二卷出版。

本书的编写工作，是在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同志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先后参加本书资料收集工作的有赵少荃、喻蘅、马广仁、许有成、吴让能、虞和静、陈雨文、刘琦、陈宗海、邢蒂蒂、傅德华和复旦大学历史系1981级全体同学。校友王德耕同志义务为本书辛勤搜集资料达一年之久，做了很多工作，特此致谢。

我们在搜集资料工作中，得到二百多位校友及其家属亲友和关心我校人士的热情支持，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是协作的产物。各部分执笔人是：代前言，徐矛；第一、二章，赵少荃，其中陈望道传略由邓明以执笔；第三章，黄贞华；第四章，赵少荃、吴让能、陈雨文、沈嘉元、马地泰、周俊元等；第五章，周达云、黄妮萍、赵少荃、陈必智。图片编辑喻蘅；封面设计，陈同芳。全书由赵少荃主编，经复旦大学副校长邹剑秋同志审定。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红岩纪念馆、北碚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档案室、图书馆及各地校友的大力协助。陈恩凤校友协助组织编写了《复旦大学农学院十四年》，焦雨亭、沈承溶校友编写了《解放前复旦大学商学院概况》等。我们谨此表示深切谢意。

复旦大学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内容，值得深入研究。本书仅仅勾画了一个粗浅的轮廓。有些重要内容，如在校中有着卓著功绩的于右任、张志让等先辈的传记，尚未能发稿，只得在第二卷中补载。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资料不足、研究不够、编写得又很匆忙，肯定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恳切希望广大老师、校友和读者批评指正，提出修改、补充意见，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使得本书修订时内容更加丰富、准确。

编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